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65 号

SDE 解构 · 哲学史

答案住在哪里

希腊三哲与两千年哲学的纠缠史

苏格拉底 · 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65 号

答案住在哪里

希腊三哲与两千年哲学的纠缠史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答案住在哪里——希腊三哲与两千年哲学的纠缠史》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WDS博士立题、定纲与裁定；Claude 十路并行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65 号
ISBN	979-8-90690-465-2
定价	US$23.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正文约 2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立题——希腊三哲的 SDE 解构可作解构后世哲学家的指路明灯——以及书名、五编的结构、篇幅与人选裁定，出自 WDS博士；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分十路并行执笔，再经扩写与统稿成书。

书中原典一律转述大意，不作长段逐字引文；史实、本书的阐释与传说分开记账，总账见第 23 章。全书所用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三大方程、六路径、123原理诸概念，口径以德麦国际专著第 395 号《SDE思想体系入门》为准；三大方程中的 F、G、H 是生成关系的占位记号，不是可计算的公式。书中厨房、饭桌、业主群等日常场景均为说明用的构造，不当证据。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五编二十四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三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世界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发生的。

——王德生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他在湖南农村长大，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在中国科学院获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做博士后研究，曾任职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在新加坡工作与生活。

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5—2021），321 智慧系统（2021—2025），SIO 本体论（2025—2026），SDE 本体论（2026 年至今）。这四站的方向，是从「我们怎么知道」走到「世界上的东西是怎样发生的」。

这一本把这副眼光转向哲学史本身：不问三位希腊哲人各说了什么，而问一个问题怎样在三双手里接连发生，并由此提炼出解构后世哲学家的五个动作。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 一、一口锅，三代厨子

一家老馆子的后厨，老师傅掌勺三十年，人人服他的火候。有人问他："火候是什么？"他答不上来，可第二天照样把每一锅菜做到正好。他的徒弟受不了"说不出"，把一张完美的标准贴到墙上，说真正的火候在那里，每一口锅只是模仿得像不像。徒孙在那张标准下学了二十年，越学越觉得不对劲：墙上的字对一块肉怎样从生变熟，一句话也没说。他说，火候不在墙上，就在这块肉从生到熟的过程里。

这三代厨子，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前后接续，真正在走的不是三个人的学说，而是一个问题的落脚点："X 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住在哪里。苏格拉底让它悬着，柏拉图把它搬到彼岸，亚里士多德把它搬回物中。

◆ 二、先缠绕，端点在后

教科书把三人讲成一场接力：老师教学生，学生批判老师，第三代集大成。这种讲法看得见人，看不见缠绕。本书换一种讲法：先有缠绕，三个人的样子是在缠绕里被生成的。最硬的证据在"师承"这个看起来最线性的地方——学生在后，却参与生成了老师。苏格拉底一字未写，我们所知的苏格拉底主要是柏拉图写出来的；我们所知的"把理念分离出来的柏拉图"，有相当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的转述定型的。就像家族里的"爷爷"，是在三代人的讲述里缠出来的。

◆ 三、一台引擎转了三轮

三个人缠在一起，还转出了同一台引擎的三轮。每一轮都是同一个形状：正在推进的追问，撞上已经沉淀下来、有惯性的土壤，矛盾逼出一个新的答案住处；新答案又反过来改写了下一轮的追问和土壤。苏格拉底的诘问撞上雅典人熟练却说不清的美德词，逼出"知道自己不知道"，城邦以死刑回写；柏拉图的追问在流变的世界里落不了地，逼出分离的理念，学园和对话录回写；亚里士多德的观察撞上学园里沉了二十年的理念论，逼出形式回到质料之中，《工具论》与吕克昂回写，回写太厚，后来板结成了权威。

更要紧的是一条规律：上一轮留下的缺口，正好是下一轮矛盾的一方。苏格拉底的答案没有落点，逼出了柏拉图；柏拉图的答案被抬出世界，逼出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过程被目的预先钉死，两千年后成了近代科学要冲破的壳。所以不能把三人贴成三个字母：同一个柏拉图，在第二轮是被逼出来的新答案，到第三轮已经是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土。

◆ 四、五个动作

从这一轮完整的发生里，本书提炼出解构任何一位哲学家都用得上的五个动作：第一，跟问法，不跟人——先找到他接过来的是哪道题、他认什么算回答；第二，找前置矛盾——他在顶撞谁，谁的答案成了他的地基又成了他的对手；第三，查反向师承——后世的他是被谁讲出来的，把"本人"与"被讲出来的他"分开记账；第四，追回写——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第五，看回绕——他之后，循环有没有绕回去，回来的是什么。

◆ 五、答案搬家的两千年

拿五个动作往后照，答案又搬了好几次家：奥古斯丁把理念收进上帝的心智；笛卡尔把整筐苹果倒干净，只留下"我正在想"；康德发现我们戴着一副摘不下来的眼镜，答案住进了认识的条件，背后却留下一个够不着的物自体，像半个彼岸；黑格尔说一个人是什么，要看他一辈子最后活成什么，答案住进了历史；维特根斯坦站在操场边看孩子们喊"玩个游戏吧"，给了苏格拉底最直接的回答——说不出定义不等于不知道，答案住在用法里；德里达让意义永远在路上，答案再度悬空，这根轴首尾相接。

◆ 六、灯是方法，不是模具

可是并非每位哲学家都在这根轴上。霍布斯问秩序怎样可能，加缪问没有答案时人怎样活，罗尔斯问蛋糕怎样切才公道。把他们硬塞上轴，最好的情况是得到半句真话，最坏的情况是把人放错了位置。而五个动作对他们照样管用。这就是本书的分界：从三哲身上可以带走的是方法，不是那根轴；方法能迁移，模具不能。

◆ 七、回绕不是倒退

思想史还会往回绕：柏拉图的学园在他身后转向怀疑，自称回到苏格拉底；普罗提诺越过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二十世纪有人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回绕、倒退、打转是三件事：回绕回到的是旧位置，土壤却已整体换过，而且是被新矛盾逼回来的，回来以后还改写了后来。正因为有回绕，这台引擎才不是一架只能往上爬的楼梯，而是一条会拐弯、会回流的河。

◆ 八、怎样算错

本书给自己列了失效条件：如果某一轮新答案找不到可识别的前置矛盾，三轮引擎的读法就失效；如果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学说可以证明独立于学园形成，"纠缠"就要降级；如果这本书的解读和教科书的"师承—批判—综合"得出的东西一样，它就只是换了一套说法。全书的史实、阐释与传说分开记账，第 23 章有一张总账。

◆ 九、轮到我们

最后，这道题落到今天每个普通人手里。你问机器"火候是什么"，它答得头头是道，可它从没站在灶台边。答案是住在模型里、住在人与机器之间，还是又一次悬空？本书不下定论，只给出几个可以检查的问题：说通了是不是说对了，错误能不能进入下一次，提问的人站在哪里。

◆ 十、一句话

合上书，只记一句就够了：哲学史不是一场接力，而是一场纠缠；三哲交给后人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盏照路的灯——每一代人都得重新回答，答案住在哪里。

前言

一盏灯是怎样点起来的

◆ 一、一句话起的头

这本书起于一句话。一次讨论希腊三哲的时候，我们先用显露、差异、纠缠这副眼镜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解了一遍：从他们共同接手的那个问题起手，看每一轮的矛盾怎样逼出新的答案住处，又怎样反过来改写下一轮。解完以后，有一句话脱口而出：希腊三哲的这次解构，会成为解构后代哲学家的指路明灯。

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赞美，其实是一个可以检验的主张。如果它是对的，那么从三哲身上提炼出来的东西，就应该能拿到奥古斯丁、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身上去用，而且用出教科书看不见的东西；如果它只是一句赞美，那么一到后世就会露馅，要么什么也照不见，要么照见的和教科书一模一样。整本书，就是拿这句话去走一遍两千年的检验。

◆ 二、为什么偏偏是这三个人

两千五百年的哲学史，人物多得数不清，为什么要从这三个人点灯？

理由不是他们最伟大，而是他们缠得最近、缠得最完整。三个人同在一座城里，师生相授二十年，亲耳听过对方说话，亲眼看过对方的生死；而且三个人前后接续，正好走完了一轮"矛盾—显露—回写"的完整循环，再往后的循环，都隔着几百上千年、隔着抄本、注释者和译者。就像学修钟表的人，第一块拆的最好是一只结构完整、零件都看得见的老怀表，而不是一块封死了后盖的电子表。希腊三哲就是那只老怀表。

◆ 三、这本书的几个硬规矩

这本书给自己定了几个规矩，先摆在这里，请读者监督。

第一，每一个观点都配一个大白话的日常案例。厨房、饭桌、业主群、老面馆、衣柜里的喇叭裤，这些例子不是点缀，是思想落地的地方；哲学讲不进厨房，就还没有讲清楚。

第二，解构一位哲学家，从三层关系出发，不做贴标签的对照表。三个维度怎样同时互相生成，从哪一维起手去看，矛盾怎样逼出新的显露、新的显露又怎样回写，三层都要说到，并且说清它们怎样咬在一起。把某人贴成"差异"、某人贴成"显露"，是本书明确反对的做法。

第三，史实、阐释、传说分开记账。有文献可查的是史实；本书的读法是阐释；晚出或可疑的记载是传说，写到时一律标明，不拿来当证据。"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不让雅典再次对哲学犯罪"都属于传说。

第四，写明怎样算错。一个怎样都对的解释，一次也没有对过。第 23 章专门把本书放上被告席。

◆ 四、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最后交代写法。立题、定纲和每一处待定的裁定，出自人；成文由多位 AI 分头执笔、再经统稿。这是一本人与机器复合写成的书。按本书自己第 24 章提出的检查办法，读者可以问：把人的那一部分撤掉，这本书还成立吗？我们的回答是：撤掉那句"指路明灯"和由它定下的检验方向，这本书就只剩一堆材料。读者若有不同的判断，欢迎写信告诉我们。

导读

◆ 一、一张全书地图

全书五编二十四章，前有导论，后有结语。骨架是"总—分—总"：导论提出问题，五编分头展开，结语收回到那口锅。

第一编"缺口"讲教科书讲不清的东西：三尊雕像排成一排的接力棒叙事，看得见人，看不见缠绕（第 1 章）；关系史与纠缠史的分别，以及本书为什么改从问法起手（第 2 章）；"正—反—合"为什么总差一口气（第 3 章）。

第二编"原型"是全书的中心：雅典的土壤（第 4 章），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各一章（第 5—7 章），学生怎样生成老师（第 8 章），以及把三轮并置、讲清三层关系怎样咬合的第 9 章。

第三编"工序"把从三哲身上看出来的方法拆成五个动作，一章一个（第 10—14 章）：跟问法，找前置矛盾，查反向师承，追回写，看回绕。

第四编"照见"拿五个动作去走两千年（第 15—21 章）：奥古斯丁、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各一章；最后一章请三位不在这根轴上的人——霍布斯、加缪、罗尔斯——上场，检验方法与模具的分界。

第五编"新缺口"回到我们自己：回绕为什么不是倒退（第 22 章），这本书怎样算错（第 23 章），AI 时代答案住在哪里（第 24 章）。

◆ 二、三条读法路线

只想弄懂希腊三哲的读者。 读导论，再读第二编全编（第 4—9 章）。第 9 章是全书的枢纽，读完它，三个人之间的缠绕就清楚了。

想学一套读哲学家的方法的读者。 读导论、第 9 章，然后读第三编五章，最后任选第四编里你最关心的一位哲学家，看五个动作怎样在他身上走一遍；再读第 21 章，看方法和模具在哪里分开。附录一的工作卡可以直接拿去用。

只想知道这件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的读者。 读十分钟速读、导论、第 14 章、第 24 章和结语。你会带走一个问题：在一个随时可以问机器的时代，你自己的答案住在哪里。

◆ 三、几个家常词的约定

本书背后有一套叫 SDE 的思想框架：显露（S）、差异序列（D）、特征纠缠（E）。正文尽量把它们翻成家常话，这里先约定好。

显露。 一样东西从混沌里站出来、被人认出、留得住、说得清的那个样子。本书用"三个可"来检查：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显露不是"结构"，结构只是显露最坚硬的那一种。

差异序列，也叫推进。 一样东西一步步往前走的那串试探、比较、修正与收敛。苏格拉底在街头一个接一个地追问，就是一串差异序列。它不是中性的"步骤"，它关心哪一种差异能推进下去、哪一种被压住。

土壤，也叫纠缠网络。 一个人思考时脚下踩着的全部既有东西：读过的书、对手的学说、所在的机构、手头的语言、时代刚刚经历过的事。土壤不是背景，抽掉它，那件事就根本不会发生。

回写。 新的答案反过来改写生成它的追问与土壤。回写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负的；它要拿史料去看，不能由谁宣布。

三层关系。 本书解构任何一位哲学家，都从三层出发：三个维度同时互相生成、没有谁先谁后（静态层）；从哪一维起手去看（操作层，本书解哲学史一

律先跟问法的推进）；矛盾怎样逼出新的显露、新的显露又怎样回写（动态层）。第 9 章专讲三层怎样咬合。

◆ 四、每章末尾的三样东西

第 1 章到第 24 章，每章开头有一句"这一章的问题"，末尾有三样东西："带走的话"是一句能抄进本子的话；"本章判错句"写明本章的判断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想一想"是两道问你自己日子的题。读得急的人可以跳过，可我们更希望你做一做那两道题，那是这本书唯一想要的回写。

目 录

作者介绍iv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v

前言　一盏灯是怎样点起来的ix

导读xi

导论　一道问了两千五百年的题1

第一编　缺口：教科书讲不清的东西13

第 1 章　三尊雕像排成一排14

第 2 章　先有人，还是先有缠28

第 3 章　"正—反—合"为什么总差一口气43

第二编　原型：希腊三哲——第一轮完整的发生57

第 4 章　雅典的土壤58

第 5 章　苏格拉底：只问不答的人为什么被处死73

第 6 章　柏拉图：把答案搬到彼岸87

第 7 章　亚里士多德：把答案搬回物中101

第 8 章　学生生成老师115

第 9 章　一台引擎转了三轮130

第三编　工序：解构一位哲学家的五个动作145

第 10 章　跟问法，不跟人146

第 11 章　找前置矛盾：他在顶撞谁160

第 12 章　查反向师承：后世的他是谁塑造的175

第 13 章　追回写：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189

第 14 章　看回绕：循环有没有绕回去203

第四编　照见：答案搬家的两千年217

第 15 章　奥古斯丁：答案住进上帝心中218

第 16 章　笛卡尔：答案住进"我思"233
第 17 章　康德：答案住进认识的条件248
第 18 章　黑格尔：答案住进历史262
第 19 章　维特根斯坦：对苏格拉底的正面回答276
第 20 章　德里达：答案永远在路上290
第 21 章　不在这根轴上的人：霍布斯、加缪、罗尔斯304

第五编　新缺口：轮到我们319

第 22 章　回绕不是倒退320
第 23 章　这本书怎样算错334
第 24 章　AI 时代，答案住在哪里349

结语　灯与模具363

参考书目372

附录375

附录一　五个动作工作卡376
附录二　答案住在哪里：一张搬家年表377
附录三　白话小词典378

后记380

导论

一道问了两千五百年的题

◆ 一位说不出火候的老师傅

镇上有家老饭馆，掌勺的老师傅做了三十年菜。红烧肉、干煸豆角、一锅清汤，到了他手里，就是比别人做得好。有一天来了个年轻人，诚心诚意地问他："师傅，火候到底是什么？"

老师傅愣住了。说"大火""小火"？那是火，不是火候。说"油冒青烟就下锅"？换一口锅、换一种油，就不灵了。说"看颜色"？什么颜色才算对，又得从头说起。他想了半天，最后摆摆手："说不清。你在旁边看着，做多了就知道。"

这一幕再平常不过。可请留意它的怪处：老师傅每天都在用火候，用得很准；每天都在教徒弟火候，也教得出来；偏偏一被问"火候是什么"，就答不上来。会用，会教，说不出。

徒弟受不了这种说不出。他想：既然有做得好与做得不好之分，就一定有个标准。于是他把心目中最完美的那一锅——颜色、香气、软硬——写成一张标准，贴在灶台上方的墙上。从此每一口锅都拿来比：像不像墙上那张？像，就是火候到了；不像，就是差了。火候终于有了一个"住处"，只不过它住在墙上，不在锅里。

徒孙在这张标准底下学了二十年，越学越觉得不对劲。墙上的标准说的是成品该是什么样，可它对"一块肉怎么从生变熟"一句话也没说。同样一张标准，五花肉和排骨要走的路不一样，冬天和夏天要走的路也不一样。他慢慢明白：火候不在墙上，就在这块肉从生到熟的那段过程里。

三代厨子，三种回答。第一代说"说不清，但我在用"；第二代说"在墙上那张标准里"；第三代说"在肉自己变熟的过程里"。熟悉哲学史的读者大概已经认出来了：这三代厨子，粗略地对应着古希腊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追问"勇敢是什么""虔敬是什么""美德是什么"，问得别人哑口无言，自己却不给答案；柏拉图把答案搬到了感官世界之外，安放在永恒不变的"理念"里；亚里士多德又把它搬了回来，说事物的形式就在事物之中，在它从潜在走向实现的过程之中。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比喻总会在某处失灵。哲学家不是厨子，苏格拉底也绝不只是一个"说不出来"的人——他说不出答案，却极会提问，而他的提问最后让他丢了性命。但这个比喻抓住了本书要追的那件事：同一个问题，答案的落脚点在搬家。

◆ 这道题：答案住在哪里

"X 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知识是什么，美是什么。这是苏格拉底留下的问法。这类问题，人人都觉得自己懂，一追问就露馅。就像我们天天说一个人"靠谱"，可要你给"靠谱"下个定义，一条一条列出来，列完总有反例：准时的人不一定靠谱，话少的人也不一定靠谱；你说"答应的事都做到"，可有人答应得少、做到得多，有人答应了做不到却会提前打招呼，谁更靠谱？越说越说不清，可下次见到一个人，你照样一眼就觉得他"靠谱"或者"不靠谱"。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以后，人们会给出答案。答案会变，这不稀奇。稀奇的是：两千五百年来，答案"住在哪里"本身在变。

我们把这条线索叫作"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沿着它看，希腊三哲走了三步。苏格拉底那里，答案悬空——问题提出来了，却找不到落地之处，许多对话以"我们还不知道"收场。柏拉图那里，答案搬到彼岸——住进一个不变的、只能凭理性把握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那里，答案搬回物中——住在具体事物自身的形式与生成里。

此后两千年，它还在搬家。奥古斯丁让它住进上帝的心中，笛卡尔让它住进"我思"，康德让它住进人认识世界的先天条件，黑格尔让它住进历史，维特根斯坦让它住进词语的日常用法。到了德里达，答案仿佛永远在路上，意义一再推迟，像是又回到了苏格拉底式的悬空。首尾相接，像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不过要先说一句：蛇头咬住蛇尾，不等于回到原地。德里达的"在路上"和苏格拉底的"悬空"隔着两千多年的土壤，相似的是形状，不是内容。思想会绕回去，却不是倒退，这一点第 22 章专门讨论。

为什么要盯着"住在哪里"，而不只是盯着答案本身？因为答案住在哪里，决定了人们怎样去找它，也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回答。找钥匙就是这样。你认定钥匙落在家里，就会翻沙发缝、掀枕头；你认定它丢在了路上，就会沿着来路一寸一寸地看地面；你认定是被同事顺手拿走了，就会去挨个问人。同一把钥匙，你以为它在哪里，你的整套动作就跟着变，连该去问谁都跟着变。答案若住在彼岸的理念里，寻找它就要靠离开感官、训练理性，数学便成了入门的阶梯；答案若住在物中，寻找它就要去解剖、去观察、去分类，海边的贝壳和墨鱼都值得细看；答案若住在上帝心中，最终的依据就是信仰与启示；答案若住在"我思"里，第一步就是向内反省，把一切可疑的东西先清出去。

所以，答案的住处一搬家，整套求知的手艺都要跟着换：谁说了算，用什么工具，从哪里下手，什么样的证据才算数。哲学史上那些看似抽象的争论，底下往往压着这样实实在在的变动。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不满足于罗列"某某认为什么"，而要追问"他把答案安放在了哪里，这一安放又改变了什么"。

这根轴是本书的一盏灯。但请先记住一句后文会反复说的话：灯是方法，不是模具。不是每个哲学家都在回答"X 是什么"。霍布斯关心的是秩序怎样可能，加缪关心的是荒诞中怎么活，罗尔斯关心的是怎样分配才公正。把他们硬塞进"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就像拿量身高的尺子去称体重。真正可以带走的，是

我们从三哲身上提炼出来的一套看人的动作，而不是这根轴本身。这一点第 21 章和结语再细说。

◆ 这道老题，就在今天的会议室里

读者也许会想：古希腊人争论勇敢、正义住在哪里，跟一个每天上班、带孩子、刷手机的人有什么关系？关系比想象的近。"答案住在哪里"不是哲学家的专利，它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换住处，只是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看。

拿一家公司里最常见的一句话来说："什么是好产品？"在有的公司，这个答案住在老板心里：老板说好就是好，于是开会的时候大家看老板的脸色，谁离老板近，谁的意见就重。在另一些公司，答案住在一张指标表里：日活、留存、转化率，表上的数字说好才是好，于是会议室里最有发言权的人变成了管数据的人，一线的抱怨要先翻译成数字才有人听。还有一些公司，答案住在用户手里那段使用的过程里：产品经理要蹲在用户旁边看他怎么点、在哪一步皱眉、在哪一步放弃，于是最有分量的变成了现场记录和录像。同一句"什么是好产品"，答案住处不同，会怎么开、谁先说话、什么证据算数、新人该学什么本事，全都跟着变。

这就是本书说"答案住处一搬家，整套求知的手艺都跟着换"的日常版本。希腊三哲那里发生的，是这件事在人类思想里第一次被完整地、接连三次地做出来。苏格拉底把"美德是什么"从人人会用的口头禅里拎出来，逼它找一个住处，结果找不到；柏拉图给它在彼岸安了家，于是数学和辩证法成了通往答案的路；亚里士多德又把它请回物中，于是解剖刀和分类表有了哲学上的分量。三次搬家，每一次都改变了"谁有资格回答""凭什么回答"。

所以，读这段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不是为了多知道几个古人的名字，而是为了练出一种眼力：下一次在会议室、在家长群、在任何一场争论里，当有人

说"标准就是这样"的时候，你能多问一句——这个标准住在哪里，它是怎样搬到那里去的，它搬过去以后，又让谁闭了嘴？

◆ 不按人头读，跟着一个问题读

哲学史最常见的读法是按人头读：一位哲学家一章，生平、著作、主要观点、历史影响，读完一位换下一位。这种读法有它的好处，好比参观一座蜡像馆，每尊像前立着一块牌子，一路看下来，谁是谁大致清楚。

可它也有代价，而且代价恰好落在最要紧的地方：人与人之间那些看不见的线被剪断了。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依次站好，中间用箭头连起来，标上"师承""批判""综合"，好像三个人先各自长成，然后才发生了关系。

本书换一种读法：跟着一个问题读。问题是活的。它在一个人那里被提出、被卡住、被改写，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又被拧了一圈。跟着问题走，你会看到按人头读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我们心目中的苏格拉底，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学生写出来的；柏拉图"把理念与事物分离"的那副形象，有不少是经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转述才定型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生成"了老师。

打个球场上的比方。一位几十年前退役的老球星，今天的年轻球迷几乎没看过他一场完整的比赛。可每个球迷都"认识"他：解说员说他脚下技术细腻，老球迷说他脾气火爆、一言不合就跟裁判吵，纪录片又把他拍成一个默默加练到深夜的苦行僧。年轻人心里的这位球星，就是这几种讲法拼出来的，而讲得最多、最动听的那几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什么样子。讲述的人在塑造被讲述的人。哲学史里也是这样，而且更厉害，因为苏格拉底本人一个字也没有留下。这种"学生讲出老师"的史料细节，第 8 章再细细核对。

跟着问题读，还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它让读者手里有一根可以随身带的线。按人头读，读到第十位哲学家时，前面九位的观点已经在脑子里挤成一团；跟着问题读，每读一位，只需问三件事——他接过的是什么问题，他把答案搬到了哪

里，他为什么不得不搬。就像在一座陌生的老城里走，与其背下每条街的名字，不如认准一条河，顺着河走，哪座桥、哪座庙在河的哪一边，自然就记住了。这种"先缠在一起、人的样子后来才定下来"的历史，我们叫它纠缠史，与"先有人、再连线"的关系史相对。第 1、2 章会把这两种看法摆开来比。

◆ 为什么从希腊三哲开始

两千五百年的哲学史，为什么偏偏从这三个人入手？不是因为他们最伟大——伟大与否，见仁见智——而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后世少有的特点：缠得近，缠得完整。

说缠得近，是因为三个人之间的纠缠是当面的。柏拉图亲眼见过苏格拉底在街头问人，亲历了老师的受审与死亡；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学园里待了约二十年，直到柏拉图去世。后世哲学家与三哲之间，大多隔着几百上千年，隔着一代代的抄本、注释和译本。当面的缠绕和隔着书页的缠绕，是两种不同的机制。

说缠得完整，是因为在三个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问题从提出、到卡住、到被逼出新答案、再到新答案反过来改变下一代人处境的整整一圈，而且接连转了三圈。苏格拉底的问题悬在半空，逼出了柏拉图的彼岸；柏拉图的彼岸成了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土壤，又逼出了他的"物中"。这就像观察一家三代的老店：第一代开张，第二代立规矩，第三代改规矩——三代人挨在一起，每一代怎样被上一代逼着变，看得一清二楚。到了第四、第五代，店早已开了分号，各地的掌柜只读过祖上留下的账本，就很难再看得这样清楚了。所以本书把希腊三哲当作一个"原型"：先在这里把一轮完整的发生看清楚，提炼出看人的方法，再拿着方法去看后面两千年。

这也意味着本书不是什么。它不是三哲的传记，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哲学通史。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中世纪的大部分思想家、近代的许多重要人物，都

只会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提；东方哲学更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我们挑的是那些能让"答案搬家"这条线看得最清楚的人，以及几位专门用来检验方法边界的人。

◆ 五编路线图

全书分五编，各有分工。第一编"缺口：教科书讲不清的东西"（第 1—3 章），先指出通行讲法的盲区：三尊雕像排成一排的接力棒叙事看得见人、看不见缠绕；关系史预设两端先在，纠缠史主张缠绕在先；"正—反—合"式的上升叙事又总差一口气，解释不了思想为什么会绕回去。

第二编"原型：希腊三哲——第一轮完整的发生"（第 4—9 章），回到雅典的土壤，逐个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怎样被各自的矛盾逼出新的回答，看学生怎样反过来塑造老师，再把三轮放在一起，看出同一台引擎转了三圈。

第三编"工序：解构一位哲学家的五个动作"（第 10—14 章），把从三哲身上提炼的方法拆成五个动作：跟问法，不跟人；找前置矛盾；查反向师承；追回写；看回绕。每个动作讲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常见误用。

第四编"照见：答案搬家的两千年"（第 15—21 章），用这五个动作依次解奥古斯丁、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最后专门看几位不在这根轴上的人——霍布斯、加缪、罗尔斯——检验这套方法离开原题还灵不灵。

第五编"新缺口：轮到我们"（第 22—24 章），先说明思想史的回绕为什么不等于倒退，再老老实实写出本书在哪些条件下算错，最后把老问题交给今天：当我们去问人工智能"火候是什么"，答案又住在哪里？结语"灯与模具"，回到那口灶。

这五编可以按顺序读，也可以按需要挑着读。想尽快拿到方法的读者，可以先读第 9 章，看三轮发生怎样并在一起，再读第三编的五个动作，最后挑一两位自己熟悉的后世哲学家，看方法用起来是什么样子。想先弄明白本书和通行讲法

到底差在哪里的读者，第一编的三章是绕不过去的。对本书的眼光心存怀疑的读者，不妨先翻到第 23 章，看看我们自己列出的、会让本书判断失效的条件——一个说法敢不敢事先讲清楚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往往比它说得多漂亮更能说明它值不值得读。

◆ 几个会反复出现的词

本书借用了一套叫作"显露—差异—纠缠"的思考工具（下文有时简称 SDE），用它来解构哲学史。这套工具的核心看法是：世界上那些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的东西，不是早早摆在那里等人去发现的，而是在一片土壤里，经过一连串的试探和修正，才"发生"出来的。

几个词先在这里打个照面，正文第一次出现时还会细讲。"显露"，指一样东西被看见、站得住、说得出的那个样子，比如一道菜终于有了稳定的招牌味道。"差异序列"，指一步步的推进、比较、试探、修正、收敛，比如厨子一锅一锅地调，这次咸了下次少放，那次火大了这次早关。"纠缠"，指让发生成为可能的那片土壤，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是实实在在参与其中的东西，比如这家馆子的灶、街坊的口味、上一代师傅留下的规矩。还有"回写"：新长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写生出它的条件，比如招牌菜一出名，进货、排班、熟客的期待都跟着变了，下一道新菜就只能在这个被改过的厨房里琢磨出来。

有一个误会要提前堵住。读者也许会忍不住把三位哲学家和三个词一一对上：苏格拉底管差异，柏拉图管显露，亚里士多德管纠缠。这种对应看起来整齐，其实是错的。同一个柏拉图，在他自己那一轮里是被逼出来的新答案；到了亚里士多德那一轮，他的理念论已经沉成了学园里的土壤，成了亚里士多德要顶撞的东西。位置在轮转，人不是钉在某一格里的。就像同一个人，白天在公司是下属，听安排、交报告、等领导拍板；晚上回到家是家长，安排孩子的作息、替一家人拍板——你不能说他"就是下属"或"就是家长"，要看他此刻站在哪一圈里。第 9 章会把这一点讲透。

同样要提前说明的是：这套工具里的几条关系式和那个"一二三"循环，只是帮我们看清楚的记号与框架，不是可以代入数字计算的公式，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往里套的万能三步法。它们管用的地方，我们用；它们说不出新东西的地方，我们就老实承认。

◆ 三层眼光怎样合在一起用

本书解构每一位哲学家，都要同时动用这套工具里的三层东西。它们各管一件事，又必须咬在一起用，单拿一层出来都会走样。这里先用一件家务事把三层的关系说清楚，正文里再一轮一轮地落到史料上。

第一层是三条关系式，说的是"同时"：显露、差异序列、土壤三者在每一刻都互相生成，没有谁先谁后。第二层是"一二三"循环，本书叫它 123 原理，说的是"一个回合"：差异序列撞上土壤，撞出了矛盾；矛盾逼出显露的改变；新的显露反过来改写差异序列和土壤，也就是回写，于是下一个回合在被改过的条件上开始。第三层是六种起手的路径，说的是"我们从哪一头看起"：三个方面排列起来有六种入口，选哪一个，看手头的任务最吃紧的是哪一面。三层的关系可以这样记：第一层说事情本身怎样缠在一起，第二层说这种缠绕在时间里怎样走完一圈、闭合一圈，第三层说观看的人从哪里下手才不会把这一圈看漏。

拿一个家里给孩子定手机规矩的事来说。孩子玩手机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今天多十分钟，明天再多十分钟，这是一串推进；它撞上了家里的作息、学校的作业量、父母对"上瘾"的担心，这是那片土壤。两头一撞，饭桌上吵了几回，终于逼出一条说得出、守得住的规矩："晚上九点，手机交到客厅。"这条规矩一立，回写就开始了：孩子的作息改了，父母的担心换了样子，孩子也开始琢磨能不能借家里的平板——一串新的推进又在被改过的土壤上开始。这是一个回合。可在这个回合的每一刻，规矩、孩子的试探、家里的气氛又是同时互相撑着的：规矩之所以这样定，是因为孩子这样试探；孩子之所以这样试探，是因为家里是这种气氛。至于起手，一位只想知道"别人家怎么管手机"的家长，从规矩看起就

够了；一位想弄明白"我家为什么总在这件事上吵"的家长，就得先跟着孩子一天里拿起、放下手机的那串过程看，再看规矩，最后看家里的土壤。

还要说明两点。回写不一定是好事，它可以是负向的：苏格拉底的追问最后换来的，是城邦的一场审判。回写也不能凭空宣布，要拿史料去观察——说某位哲学家"重置了什么"，得指得出被重置的那件东西。第 9 章会把三层在三哲身上并排摆开。

这些词不是装饰。我们用它们，是因为它们能帮我们看见教科书叙事看不见的东西。反过来说，如果哪一天发现它们只是给老结论换了一身新衣服，那就该收回。第 23 章专门讨论这件事。

◆ 一条纪律：史实、阐释、传说分开放

讲哲学史，最容易犯的错，是把三种分量不同的东西搅在一起说。第一种是史实：有文献可查的事。比如苏格拉底于公元前 399 年受审，被判死刑；亚里士多德十七岁进入柏拉图的学园，在那里待了约二十年。

第二种是阐释：本书用自己的眼光对史实所做的解读。比如说"苏格拉底之死成了柏拉图写作的起点"，这是一种解读，有史实支撑，却不是史料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阐释可以有锋芒，但要承认它是阐释，并且说清它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推翻。

第三种是传说：晚出的、可疑的记载。比如学园门口刻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句话流传极广，却是很晚才出现的说法；又如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时说"不让雅典再次对哲学犯罪"，也只是相传之语。传说可以讲，因为它们本身反映了后人怎样记忆这些人；但讲的时候一定说明"相传"，绝不拿它当证据。

这就像街坊聊天：某某家闺女考上大学了，是事实；"这孩子从小就看得出有出息"，是解读；"她出生那天院子里飞来一只喜鹊"，就是传说了。三样都可以聊，可要是有人拿喜鹊来证明她有出息，那就是把传说当成了证据。本书在关

键处会标明"这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但不会每段都标——那样读起来像看说明书。第 23 章会把全书史实、阐释、传说的分界列出来，供读者核对。

◆ 从一张排好队的照片说起

最后说说这本书想让读者带走什么。不是一串名字和年代——那些在任何一本哲学史里都查得到。也不是一个结论，比如"答案其实住在某某地方"——本书恰恰认为，每一代人都得重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想交给读者的，是一种看的方式：看一个思想怎样被它所顶撞的东西逼出来，怎样反过来改写自己的土壤，又怎样被后来的人重新讲成另一副模样。

这种看法，从拆一张照片开始。打开几乎任何一本哲学入门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总是并排站着，像三尊雕像，又像一张毕业照。照片拍得很清楚，每个人的脸都看得见。可是照片里少了一样东西——他们之间那几十年的缠绕。第 1 章就从这张照片说起。



第　一　编

缺口：教科书讲不清的东西

导　语

翻开任何一本哲学史教科书，希腊三哲总是站成一排：苏格拉底在左，柏拉图居中，亚里士多德在右，中间画两道箭头，写着"师承""批判""综合"。这张图好记、好考，也确实帮过很多人入门。可它有一个看不见的代价：它只画出了三个人，没画出三个人之间的缠绕。

这一编先不讲三哲本人，而是先拆这张图。第 1 章看接力棒叙事漏掉了什么：时间被压扁，方向只朝一个方向，土壤被缩成背景，批判被讲成一种态度。第 2 章换一个底：关系史预设两端先在，纠缠史主张缠绕在先、端点在后，并交代本书为什么改从"问法"起手。第 3 章检查最流行的那条上升叙事"正—反—合"，看它为什么总差一口气。

读这一编时可以先记住一个家常的比方：毕业照上人人站得整整齐齐，照片却拍不出这几年谁改变了谁。

01

第 1 章

三尊雕像排成一排

这一章的问题

教科书把希腊三哲排成一场接力，这张图漏掉了什么？

◆ 一张没人觉得奇怪的毕业照

翻开几乎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入门书，讲到古希腊，总会出现一个熟悉的画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个人并排站着。有时是三尊大理石半身像，鼻子、胡子、额头的皱纹，一尊比一尊端正；有时是一张示意图，三个名字之间画两道箭头，箭头上写着"师生"。旁边配一句话：苏格拉底教出了柏拉图，柏拉图教出了亚里士多德，三人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奠基时代。这个画面太熟悉了，熟悉到没人觉得它奇怪，也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句：三个人是怎么被排成这一排的，排的时候又剪掉了什么。

我们不妨先拿一张毕业照来对照。毕业那天，全班同学被摄影师排成三排，前排坐着，后排站在凳子上，班主任坐在正中。快门一按，每个人的脸都清清楚楚。二十年后再翻出来，你能指着照片说出：这是班长，这是学习委员，这是总坐最后一排的那个调皮鬼。

可照片里没有的东西更多。没有那年冬天班长和学习委员为了板报吵得不可开交；没有那个调皮鬼高三忽然开窍，把全班的数学风气带了起来；没有班主任一开始其实很讨厌这个班，到毕业时却舍不得。照片拍下的是人，拍不下人与人之间那三年的拉扯。更要紧的是，照片里的每个人之所以长成了照片上的样子，恰恰是因为那三年的拉扯。班长后来做事那么稳，跟当年那场板报之争脱不了干

系；调皮鬼后来当了数学老师，跟他在这个班上被激起来的那股劲也脱不了干系。

哲学书上的三尊雕像，就是这样一张毕业照。人都在，脸都清楚，缠绕不见了。本章要做的，是把这张照片拆开看看：它是怎么拍出来的，它拍得好在哪里，它漏掉了什么，以及——漏掉的东西为什么不是小事。

◆ 接力棒是怎样讲故事的

三尊雕像背后，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故事模板。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接力棒叙事"。它有三个环节：师承、批判、综合。第一个环节是师承。苏格拉底是老师，柏拉图是学生，柏拉图又是老师，亚里士多德是学生。棒子从一个人手里交到另一个人手里，一棒接一棒。

第二个环节是批判。学生接过棒子以后，并不原样往前跑，而是对老师有所不满、有所修正。柏拉图不满足于老师只问不答，给出了理念论；亚里士多德不满足于老师把理念放在事物之外，把形式放回事物之中。教科书往往还会在这里补一句后世流传的格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用来说明学生批判老师是出于对真理的忠诚。这句话的出处和它怎样被后人概括出来，第 8 章再细说。

第三个环节是综合。到了亚里士多德，前人的成果被收拢、被整理、被安排进一个庞大的体系：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一应俱全。于是希腊哲学的"古典时代"在他手里达到顶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个模板不是现代教科书发明的。古代人自己就爱这样讲。公元三世纪前后成书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就大体按照师承谱系来排列哲学家，谁是谁的学生，谁开创了哪一派，一条一条往下排。更早的希腊化时代，已经有专门讲哲学家"师承"的著作。按师徒谱系讲思想，是一种很古老、很有生命力的讲法。

到了文艺复兴，这个画面还被画成了一幅名画。拉斐尔在梵蒂冈宫的壁画《雅典学院》里，把一大群古代哲人画进同一座宏伟的大厅。画面正中，一般认为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肩走来：一位手指向上，一位手掌向下摊开。后来的讲解者很喜欢拿这两个手势做文章——一个指向天上的理念，一个指向脚下的世界。这幅画很美，也很能说明问题：几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希腊哲学，就是一群人站在同一个大厅里，每个人各有一个手势，一个手势代表一种学说。

接力棒叙事的魅力，在于它把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讲成了一条干净的线。就像家里老人讲家史："你太爷爷闯关东，你爷爷在东北扎了根，你爸爸考学回了关内。"三句话，三代人，一条线，孩子听一遍就记住了。至于太爷爷为什么非走不可，爷爷在东北吃了多少苦、跟谁结了仇又跟谁结了亲，爸爸考学那年家里为了凑学费卖掉了什么——这些都被压进了三句话的缝隙里。

◆ 这种讲法对在哪里

在批评接力棒叙事之前，得先公道地说一句：它不是错的，它有它的用处，而且用处不小。首先，它好记。初学者面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最怕的是一团乱麻。接力棒叙事先给出一副骨架：谁在前，谁在后，谁接了谁的话头。有了骨架，细节才有地方挂。就像学一门新语言，先背常用词和基本句型，哪怕说出来的话生硬，也比一开口就去研究方言俚语强。

其次，它抓住了一部分真实。三人之间确实有师生关系：柏拉图早年追随苏格拉底，这在柏拉图本人和色诺芬的著作里都有反映；亚里士多德十七岁进入柏拉图的学园，一直待到柏拉图去世，前后约二十年，这是有据可查的史实。学生也确实批评了老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不止一次地批评理念论，说理念对于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毫无贡献（这一段第 7 章细讲）。接力棒叙事不是凭空编造，它是对真实关系的一种压缩。

第三，它适合理解一个已经成形的体系。这一点最要紧，值得多说几句。当一个人想要搞懂柏拉图到底主张什么、亚里士多德的体系由哪几块构成，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先把学说本身摆出来：理念论是什么，回忆说是什么，四因说是什么，三段论是什么。等学说清楚了，再交代它从谁那里来，最后补充一点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把这种顺序概括为"先学说、再师承、后背景"。

学开车也是这个顺序。驾校教练不会一上来就讲内燃机是怎么从蒸汽机一步步演变来的，也不会讲交通法规是在什么事故之后修订的。他先告诉你：这是油门，这是刹车，这是离合，挂挡是这样挂的。你先把这辆车当作一个现成的整体学会，开上路以后，要是有兴趣，再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对于"学会开这辆车"这个目的来说，这个顺序是最合适的。

教科书的读者，大多数时候的目的正是"学会这套东西"：考试要考，课堂要讲，论文要引。对这个目的而言，先学说、再师承、后背景，是一个好顺序。我们不打算推翻它，只打算指出它的边界：它适合把一个体系当作成品来理解，却不适合追问这个成品是怎么一步步发生出来的。

◆ 照片里少了什么

现在我们回到那张毕业照，看看接力棒叙事拍不下哪些东西。至少有四样。第一样，时间被压扁了。在三尊雕像的画面里，三个人仿佛是同时站在那里的，中间只隔着两道箭头。可实际上，苏格拉底于公元前 399 年被处死时，柏拉图还不到三十岁；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公元前 384 年，比苏格拉底之死晚了十五年，他从未见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度过了约二十年，从十七岁的少年到三十七岁的中年。二十年是什么概念？一个人从刚进工厂的学徒熬成车间主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这二十年里，柏拉图本人的想法也在变，学园里的讨论也在变。一道箭头，把这二十年压成了一个点。

就像我们说"他是王师傅带出来的徒弟"，一句话就交代完了。可真正在一个厂子里待过的人都知道，"带出来"这三个字底下，是无数个夜班、无数次挨骂、无数次自己偷偷琢磨之后回来跟师傅顶嘴。徒弟出师那天的手艺，有多少是师傅教的，有多少是跟师傅较劲较出来的，有多少是在那个车间、那批机器、那群工友中间慢慢磨出来的，一句"王师傅带出来的"根本说不清。

第二样，方向被单向化了。接力棒只能往前传：老师交给学生，学生交给再下一代。可这三个人之间的影响，偏偏有不少是倒着走的。苏格拉底一个字也没有写，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苏格拉底，主要来自他的学生柏拉图、色诺芬，以及同时代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而这三个来源描绘的苏格拉底并不一致。换句话说，是学生的笔"写出"了老师。同样，后世心目中那个"把理念和事物分离开来"的柏拉图，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转述才定型的。学生在讲述老师的时候，也在塑造老师。这件事第 8 章专门讲，这里只先指出：接力棒叙事的箭头只朝一个方向，装不下这种倒流。

日常生活里，这种倒流随处可见。一位老教师退休多年，在学校里留下的名声，主要靠当年学生们的回忆。有出息的学生说他"严厉但公正"，于是他成了"严厉但公正"的老师；如果当年最常提起他的，恰好是几个被他罚过站的学生，那他留下的名声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老师的形象，是学生们讲出来的。

第三样，土壤被缩成了背景。教科书讲到苏格拉底，常常会在章节末尾加一段"时代背景"：雅典民主制，伯罗奔尼撒战争，智者运动。这段文字通常写得很简短，像一张舞台的布景板，人物在前面演戏，布景板在后面摆着，换一块布景板好像也无妨。

可是，苏格拉底的问法恰恰是被这片土壤逼出来的。在一个公民大会靠演说决定战争与和平、民众法庭靠几百位公民投票定人生死的城邦里，"正义是什么""勇敢是什么"不是书斋里的闲谈，而是天天都在用、天天都在争的词。收费教人说话的智者们，又把"怎样把弱的理由说成强的理由"变成了一门可以买卖的

手艺。苏格拉底的追问，正是在这片土壤里长出来的；而这片土壤最后也以一场审判和一杯毒酒回应了他。把这一切叫作"背景"，就像把一棵树脚下的土叫作"背景"——土不是布景，土是树能长出来、长成这样的条件。第 4 章会专门讲雅典的这片土壤。

第四样，批判被看成了一种态度。在接力棒叙事里，学生批判老师，往往被讲成一种品格：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爱真理胜过爱老师。这当然好听，却把事情讲轻了。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要把形式放回事物之中，并不只是因为他性格倔强、不愿跟着老师走。他在学园里待了二十年，理念论早已成了他脚下的土地；他又对生物、对自然有一股非看清楚不可的劲头，后来还在爱琴海的岛上观察海洋生物。当一个人整天盯着一条鱼怎样长大、一只海胆怎样构造，再回头看"真正的鱼住在一个不变的理念世界里"，他会觉得这个说法帮不上忙——它解释不了眼前这条鱼是怎么从小长到大的。批判不是一种道德姿态，而是被逼出来的：他手上的活计，撞上了他脚下的土地。

这就像社区医院里一位干了十几年的护士，当上护士长后的第一件事，是改掉老护士长定下的交班表。同事们私下议论，有人说她翅膀硬了，有人说她有魄力。其实可能都不是：她在那张交班表底下值了十几年夜班，太清楚它是按十几年前的病人编排的——那时来看病的多是年轻人的小毛病，如今病房里躺的大半是要整夜盯着的老人。改表的动力不在她的性格里，而在那张表和今天这间病房之间越来越大的那道缝里。

◆ 先学说、再师承、后背景：一个起手的顺序

上面说的四样缺失，不是教科书作者粗心大意，而是由讲法的起手顺序决定的。这里需要稍微说明一下"起手顺序"是什么意思。

本书借用的这套工具，把任何一件事物的发生看成三个方面同时在起作用。一是"显露"：一个东西被看见、站得住、说得出的那个样子——比如一套成型的学说。二是"差异序列"：一步一步的推进、比较、试探、修正、收敛——比如一个人怎样追问、碰壁、改口、再追问。三是"纠缠"，也可以叫"发生土壤"：让这件事能发生、并实实在在参与其中的那一整张网——比如城邦的制度、前人的学说、师生之间的恩怨。

三者在现实里是同时缠在一起的，没有谁先谁后。但人去分析一件事的时候，注意力一次只能落在一处，总得从某一个方面下手。从哪里下手，就是起手顺序。三个方面排一排，一共有六种排法，每一种都是一条可以走的路。哪条路好，不是看哪条更高级，而是看你要做的那件事最吃紧的是哪一面。

教科书的"先学说、再师承、后背景"，用这套话来说，就是"先显露，再差异，后纠缠"：先把成型的学说摆出来，再交代它经过了谁、怎样一步步传下来、怎样被修正，最后铺一点土壤。这条路的长处，前面说过了：它适合理解一个已经成形的体系。当你的任务是"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学明白"，那么它最吃紧的是"理念论是什么"，从显露起手正合适。

问题在于，一旦起手落在成品上，后面的一切都会被成品吸过去。师承被讲成"这套学说是从谁那里传来的"，背景被讲成"这套学说是在什么时代出现的"。过程和土壤都变成了成品的注脚。

我们可以用一本菜谱来理解这一点。一本好菜谱，第一页写着"红烧肉"，下面列着用料、步骤、火候提示，最后可能有一小段"本菜源于某地，相传某某所创"。照着菜谱做，你能做出一锅像样的红烧肉，菜谱完成了它的任务。可如果你想知道的是：这道菜当初是怎么一锅一锅试出来的？为什么偏偏用冰糖不用白糖？那位"某某"当年在什么样的厨房、面对什么样的食客、被什么样的失败逼着，才一步步定下了这张方子？——菜谱回答不了。不是菜谱写得不好，是菜谱从成品起手，它的整个结构就是为"照着做出成品"服务的。

接力棒叙事也是一本菜谱，菜谱上写着"希腊哲学"。照着它，你能把三个人的主要学说复述得八九不离十。可是三个人之间那几十年的缠绕，那些把他们逼成今天这副模样的矛盾，都被压进了"师承""批判""综合"这三个词的缝隙里。

◆ 草坪上的小路：从成品起手为什么看不见回写

起手顺序的影响，还可以再往深处说一层。这套工具里，除了"三者同时互生"，还有一个回合式的看法，叫 123 原理：差异序列撞上土壤，撞出矛盾；矛盾逼出显露的改变；新的显露再反过来改写差异序列和土壤，这叫回写。前者说每一刻三者都缠在一起，后者说这种缠绕在时间里怎样走完一圈、闭合一圈；而起手顺序，决定了观看的人能不能看见这一圈。

看一件小区里常见的事。楼与楼之间有一片草坪，设计图上，人行道绕着草坪拐了一个大弯。住户赶着上班，有人先斜穿了一次，第二个人跟着穿，一个月后，草坪上踩出了一条光秃秃的斜线。这是一串推进撞上了那片土壤：设计师画的弯路、早高峰的钟点、从楼门到地铁口的直线距离。踩出来的小路越来越清楚，终于成了一条人人认得、天天在走的路，这是显露。接着是回写：物业拗不过，干脆在那条斜线上铺了石板，又在原来的弯路边种了一排灌木；石板一铺，走这条路的人更多了，小区的动线整个变了，新的问题——比如石板路尽头没有路灯——又在这个被改过的小区里冒了出来。

假如你搬进来时石板路已经铺好，你从这条路看起，问"这是什么路"，物业告诉你"小区步行道，某年铺的"，这个回答完全正确。可那一串脚步、那场住户和设计图的拉锯、那次让步之后整个小区动线的改变，都不在这个回答里。从成品起手，你看到的是回写完成之后的样子，回写本身反而隐身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你脚下的地面。

三尊雕像也是这样。接力棒叙事从理念论、四因说这些成品起手，回写就看不见了：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城邦对他那一串追问的负向回写，正是这次回写

改了柏拉图脚下的土壤，让"写下来"成了他回应老师的方式；柏拉图建起学园，把追问从街头搬进一个机构，亚里士多德才得以在里面待上二十年。这些不是"背景"，而是上一圈闭合时留下、下一圈开始时踩着的地面。要看见它们，就得像追那条小路一样，先跟着脚步走。这是本书的解读方向，史料上的核对在第 5 至 7 章。

◆ 为什么"看不见缠绕"不是小事

读者也许会问：知道个大概不就够了吗？漏掉一些细节，有那么严重吗？严重。因为漏掉的不是细节，而是理解的方向。至少有三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我们会把学说当成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在三尊雕像的画面里，理念论属于柏拉图，四因说属于亚里士多德，就像每尊雕像都有自己的底座。可如果理念论是在苏格拉底之死、巴门尼德的挑战、雅典街头那些没有答案的追问之间被逼出来的，那它就不只是柏拉图一个人的产物；如果后世对理念论的理解很大程度上经过了亚里士多德的转述，那"柏拉图的理念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缠出来的。这就像一个家族里流传的"奶奶的拿手菜"：奶奶确实常做，可那道菜的味道，是奶奶跟着婆婆学的手法、加上嫁过来以后迁就爷爷口味做的改动、再加上孙辈们每年春节回家一边吃一边嚷着"还是原来的味道好"所定下来的。说它是"奶奶的菜"没有错，说它只是奶奶一个人的菜，就错了。

第二个后果：我们会把变化讲成必然。接力棒叙事有一个隐含的方向——越往后越完整，到亚里士多德"集大成"。这种讲法容易让人觉得，哲学史是在一级一级往上爬，每一位后来者都比前人更高明一点。可历史并不配合这个方向：柏拉图死后，他的学园后来转向了怀疑派，又回到了近乎苏格拉底式的"悬而不决"；几百年后，普罗提诺越过亚里士多德，重新回到柏拉图。思想会拐弯，会回流。这一点第 3 章会专门讨论；这里只先点出：接力棒只能往前传，它天生讲不了回头路。

第三个后果，也是最要紧的：我们学不会方法。三尊雕像能告诉你三个人各自主张什么，却没法教你怎样去看第四个人、第五个人。因为它从来没有展示过一个思想是怎样被它所顶撞的东西逼出来的，又怎样反过来改变了自己脚下的土地。你记住了三个结论，可下一次面对一位新的哲学家——比如笛卡尔或者维特根斯坦——你手里还是空的，只能再去背一遍他的结论。就像一个人看了一百张别人家的全家福，也学不会怎样理解一个家庭。真正让人看懂一个家庭的，是坐下来听这家人吵一次架。

◆ 换个起点会怎样

如果不从成品起手，从哪里起手？本书的选择是：先跟着问题走，看一个人在追问什么、在哪里卡住、怎样改口、怎样再追问；再看他最后被逼出了什么样的学说；最后追他的土壤——他在顶撞谁，他的学说反过来改变了什么。用前面的说法，就是"先差异，再显露，后纠缠"。这条路，适合的任务是"理解一个人的思想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偏偏是这条路，以及它背后对"先有人还是先有缠"的整个看法，下一章再讲清楚。

这里只做一个小小的试验，让读者先尝一口不同的味道。接力棒叙事讲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般是这样："苏格拉底开创了以对话追问求定义的方法；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了老师的追问，并进一步提出理念论，为定义找到了对象。"这两句话没错，干干净净。

换一个起点，我们会先看到一个人在雅典街头一遍遍地问："你说这件事是勇敢的，那勇敢本身是什么？"被问的人给出一个答案，他找出一个反例；对方修改答案，他再找出一个反例。许多场对话就这样在"我们还是不知道"中结束。这种问法在城邦里越来越惹人厌，最后他被告上法庭，被判死刑。然后我们才看到，他的一个年轻追随者，带着老师留下的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以及老师被城邦处死的这个事实，开始写作。他一篇一篇地写，写的大多是老师在和人对

话，而对话中的那个"苏格拉底"慢慢开始给出老师本人未必给过的回答：真正的勇敢、真正的美、真正的正义，存在于一个不随感官变动的世界里。

两种讲法说的是同一段历史，读起来的分量却完全不同。在第一种讲法里，理念论是一个"进一步"；在第二种讲法里，理念论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回答——被一大堆悬在半空的问题逼出来，被一场死亡逼出来。在第一种讲法里，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继承者；在第二种讲法里，柏拉图同时也是"苏格拉底"这个形象的书写者。哪一种讲法更接近当时的情形，各章会拿史料一点点核对；这里先说明：这是本书的解读方向，不是史料本身。

再打一个日常的比方。一对夫妻结婚二十年，你问他们的孩子："你爸妈是怎样的人？"孩子可能说："我爸负责赚钱，我妈负责管家。"这是一张全家福式的回答，清楚，好记。可如果你在这个家里住上一个月，你会看到：妈妈之所以管得那么细，是因为早年家里穷过、爸爸又有过一次投资失败；爸爸之所以把工资卡交出去，一半是信任，一半是那次失败之后的内疚。"爸爸赚钱，妈妈管家"这个分工，不是两个人各自的天性，而是二十年里一件件事缠出来的。你要是只记住了分工，就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一提到"投资"两个字，饭桌上的空气就会变。

◆ 一个可能的误会：把背景写厚就行了吗

读到这里，有的读者也许会想：说来说去，不就是嫌教科书的背景写得太薄吗？那好办，把雅典的政治、战争、智者运动多写几页，把师生之间的往来多补几段，照片不就有了缠绕？不行。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误会，因为它听起来很合理。

把背景写厚，起手的顺序并没有变。学说还是先摆出来，背景还是排在最后，只不过排在最后的那一段从一页变成了十页。土壤再厚，在这种排法里，它

仍然是给成品垫底的东西，是用来回答"这套学说出现在什么时候"的，而不是用来回答"这套学说为什么偏偏被逼成了这个样子"的。

这就像给一张全家福配一篇长长的图说：拍摄于某年某月，地点在老家院子，当时爷爷刚做完手术，二叔从南方回来过年……图说写得再长，照片还是那张照片，人还是一个挨一个站着，图说只是贴在照片底下的一块纸。真正要看见这家人怎么缠在一起，不是在照片底下多写几行字，而是换一个看法：不先看谁站在哪里，先看那年春节饭桌上发生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让谁变了脸，后来又是怎么和好的——看完这一场，再回头看照片里每个人的站位和表情，你才明白二叔为什么站得离爷爷那么远。

所以，本书要换的不是背景的厚薄，而是起手的那一步。先跟着问法走，让学说从追问与碰壁中自己显露出来，再去追那片土壤，以及学说反过来对土壤做了什么。顺序一换，同样的史料会被放进不同的位置，说出不同的话。

还要防止另一个方向的误会：换了起点，并不意味着把学说本身看轻。恰恰相反，只有看清楚一个学说是怎样被逼出来的，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站得最稳、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塌。一个只会背诵"理念是永恒不变的原型"的人，和一个知道理念论是在什么样的追问与什么样的死亡之间被逼出来的人，面对"第三人"一类的反驳时，反应会完全不同。前者只能复述结论，后者才看得出这个反驳戳中的是哪一根承重的柱子。

◆ 最强的反对：好的哲学史也讲冲突

公道起见，还得面对一个更有力的反对。有读者会说：你批评的是最粗糙的教科书。严肃的哲学史家早就在讲苏格拉底形象的分歧，讲柏拉图晚年的自我批评，讲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的思想变化，还有研究专门争论他早年是否更接近柏拉图。冲突、拉扯、倒流，好的著作里都有，怎么能说接力棒叙事看不见缠绕？

这个反对说对了一半。严肃的研究确实讲了大量冲突，本书后面许多章节的材料，正是从这些研究里来的。但讲没讲冲突是一回事，冲突放在什么位置上是另一回事。在许多体例里，冲突是挂在成品下面的注释：先讲清"柏拉图的理念论"，再加一节"理念论的困难"，再加一节"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冲突讲得越多，成品仍然站在正中，冲突只是它的配件。本书要做的，是把冲突从注释的位置挪到发动机的位置：先看撞上了什么，再看撞出了什么。

这像一场球赛留下的两样东西。一样是赛后的技术统计：比分二比一，进球者、黄牌、控球率一应俱全，连"下半场失误偏多"也写在备注里，问题并没有被藏起来。另一样是全场录像：第六十分钟换人之后，左路为什么突然被打穿，后卫为什么开始往前压，扳平之后教练又怎样调整。要弄明白这场球是怎么输掉又怎么赢回来的，得看录像。两样东西不分高下，各管一件事。

所以本书并不声称发现了别人没见过的史料。我们的说法小得多，也更容易被检验：同样的史料，换一个起手顺序摆放，会显出原来那种摆法显不出的东西。如果读完全书，读者发现我们说出的东西，和一部好的哲学史在注释里早已说尽的毫无二致，就说明这个换法没有带来新东西——这正是第 23 章列出的失效条件之一。还要承认一层代价：从过程起手比从成品起手更慢、更费力，也更依赖证据；对只想先学会一套体系的读者，它未必是更好的入口。

◆ 带着一个问题离开

到这里，我们拆开了那张毕业照，看见它拍下了什么，又漏掉了什么。三尊雕像不是假的，它们是一种压缩：把几十年的缠绕压成两道箭头，把被逼出来的回答压成一个手势，把土壤压成一块布景板。这种压缩适合入门，适合考试，适合把一个体系当作成品来学；却不适合追问这些成品是怎样发生的。

但拆开照片之后，一个更难的问题浮了上来。我们一直在说"缠绕"，好像缠绕是发生在三个人之间的事——先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他

们之间缠了起来。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知道的苏格拉底本来就是柏拉图等人写出来的，如果后人眼中的柏拉图又有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讲出来的，那么在缠绕开始之前，"他们"真的已经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吗？换句话说：是先有人，再有缠？还是先有缠，人的模样才在缠绕中定下来？

这不是文字游戏。一个家族里，"爷爷"是怎样一个人，往往是父亲、叔伯、孙辈三代人在饭桌上一遍遍讲出来的；爷爷本人在世时的样子，和他在家族记忆里的样子，常常并不相同。那么，"爷爷"是先在的那一端，还是三代讲述缠出来的那一端？下一章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带走的话

一张合影拍得出人，拍不出这些年谁改变了谁。

本章判错句

如果接力棒叙事已经能说明学生为什么塑造了老师、思想为什么会回绕，本章对它的批评就是多余的。

想一想

你记得的一位老师，有多少是他本人，有多少是同学们后来一遍遍讲出来的？

你学过的哪一门课，只给了你一排名字，没给你名字之间的线？

◆

02

第 2 章

先有人，还是先有缠

这一章的问题

先有三个现成的人再连线，还是先有缠绕、三个人的样子在缠绕里长出来？

◆ 饭桌上的"爷爷"

很多家庭里都有一位"爷爷"，他早已过世，却一直活在饭桌上。逢年过节，一大家人围坐，总有人会提起他。父亲说："你爷爷那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二叔不同意："那是对外人。对自己家里人，脾气可大了，我小时候没少挨打。"姑姑插一句："他打你是因为你偷了生产队的红薯。"孙子辈听着，在心里慢慢拼出一个爷爷：对外宽厚，对内严厉，最恨孩子手脚不干净。

过了些年，孙子长大了，跟自己的孩子讲起太爷爷，讲的已经是自己拼出来的那个版本，还顺手加上一点自己的理解："你太爷爷那一代人，穷怕了，所以对偷东西特别狠。"这句话爷爷本人从没说过，父亲、二叔、姑姑也没说过，可它从此成了家族记忆的一部分。

现在问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这个家族里的"爷爷"，是一个先已存在、然后被大家讲述的人，还是一个在三代人的讲述中慢慢被缠出来的人？说是前者，当然没错——爷爷确实活过，确实有过一副真实的脾气。可是今天坐在饭桌上的每一个人，所认识、所引用、所拿来教育孩子的那个"爷爷"，又确实是讲述缠出来的。他的宽厚、他的严厉、他"穷怕了"的心理，有些是他本人的，有些是讲述者带进去的，有些是不同讲述者互相纠正、互相补充时才定型的。更微妙的是，这

个被讲出来的爷爷，还反过来塑造了讲述他的人：二叔一辈子对"手脚不干净"特别敏感，孙子教育孩子时也学会了先讲规矩再讲情面。

上一章结尾留下了这个问题。本章要做的，是把它从饭桌上搬到哲学史里，看看"先有人，还是先有缠"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改变我们看待希腊三哲的整个方式。至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史料上究竟是怎样被学生"讲出来"的，那是第 8 章的任务，这里只借这个家常的例子把道理立起来。

◆ 关系史：先有两端，再画一条线

先说我们最熟悉的一种看法，可以叫它"关系史"。关系史的基本想法是：历史上有一个个人物，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各种关系——师生、论敌、继承、批判、影响——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关系一条条找出来，画成一张图。在这张图上，人是点，关系是线。点先在那里，线是后来连上去的。

这种看法再自然不过，我们日常就是这样理解人际的。说"小张和小李是同学"，意思是先有一个小张，先有一个小李，他们之间有一种叫"同学"的关系。关系是附加在两个人身上的东西，就像在两根柱子之间拉一根绳子：绳子可以拉上，也可以解开，柱子还是那两根柱子。

上一章讲的接力棒叙事，就是关系史的一个典型版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三个点，"师承""批判""综合"是三种线。讲清楚了点，讲清楚了线，哲学史似乎就讲完了。

关系史有一个不太容易察觉的前提：两端先在。它默认，在关系发生之前，两端已经各自是其所是；关系只是让他们发生了联系，并不改变他们是谁。就像拉绳子不会改变柱子的形状。

这个前提在很多场合是够用的。两家公司签一份供货合同，签之前各自是独立的公司，签之后还是，合同只在它们之间加了一层约束。把这种情形叫作"关系"，再恰当不过。可是有一些场合，这个前提就撑不住了。

◆ 撑不住的地方

拿婚姻来说。两个人结婚二十年，你还能说"先有一个他，先有一个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种叫婚姻的关系"吗？二十年里，他学会了做她爱吃的菜，她学会了忍受他看球赛时的大呼小叫；他的口头禅里混进了她老家的方言，她的作息被他的夜班重新排过。今天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丈夫，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段婚姻里长成的；这个妻子也是。如果把婚姻这根"绳子"抽掉，你找不回二十年前那两根原封不动的"柱子"——那两根柱子早已在缠绕中变了形，甚至可以说，今天这两个人的样子，就是缠绕的结果。回到希腊三哲，情况比婚姻更极端。

苏格拉底一个字也没有写。我们今天谈论的"苏格拉底"，几乎全部来自别人的书写：柏拉图的对话、色诺芬的回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转述。而这几种来源笔下的苏格拉底并不一致——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里，他是一个吊在篮子里研究天象、教人诡辩的怪人；在色诺芬笔下，他更像一位讲求实际、虔敬守法的长者；在柏拉图笔下，他是一位锋利的追问者，到了某些对话里，又开始讲述灵魂不朽与理念世界。哪一个是"真正的"苏格拉底？这个问题在学界有专门的名称，叫"苏格拉底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说"先有一个苏格拉底，然后他与柏拉图之间有一种师生关系"吗？严格地说，那个先在的苏格拉底我们是够不着的；我们能够着的苏格拉底，恰恰是在师生之间、在学生的书写之中显露出来的。如果把柏拉图这根"绳子"抽掉，我们手里剩下的苏格拉底会单薄得多，而且样子也会不同。

同样的事情，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又发生了一次，只是方向更隐蔽。后世对柏拉图的理解，有一部分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转述定型的：比如"苏格拉底只是追求普遍定义，并没有让普遍者与事物分离，把它们分离开来的是柏拉图一派"这样的划分，就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柏拉图在学园里口头讲授、没有写成对话的那些学说，后世所知也主要靠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学生不仅在批评老师，也在讲述老师；讲述得多了，讲述就成了老师的样子。

◆ 纠缠史：缠绕在先，端点在后

于是我们需要另一种看法。本书把它叫作"纠缠史"。纠缠史的基本想法，可以压成一句话：缠绕在先，端点在后。这句话容易被误读，先把它说准。它不是说苏格拉底这个人不存在，或者是柏拉图虚构出来的——苏格拉底是真实活过的人，有确切的生卒和受审记录。它说的是：我们在哲学史上所认识、所讨论、所继承的那个"苏格拉底"，那个有着特定问法、特定形象、特定思想分量的端点，是在缠绕之中显露出来的，而不是在缠绕之前就已经完整地摆在那里、等着别人去和他发生关系的。

回到饭桌上的爷爷：爷爷确实活过，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家族记忆里那个"对外宽厚、对内严厉、穷怕了"的爷爷，是三代人讲出来的。讲述在先，那个定型的爷爷在后。纠缠史关心的，正是这个定型的端点怎样在缠绕中发生。

用本书借用的那套工具来说，"纠缠"指的就是这样一张网：它不是两个已经成形的东西之间的一根线，而是一片让东西得以成形的土壤。人在这片土壤里长出模样，长出来的模样又沉回土壤，变成下一个人生长的条件。我们叫它"发生土壤"，就是为了把它和"背景"区分开来：背景是被动的，换一块也无妨；土壤是参与其中的，抽掉了，东西就长不出来，或者长成另一个样子。

关系与纠缠的分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检验来看：抽掉中间那根线，两端还在不在、还是不是原来的样子？抽掉了还在、还是原样的，是关系。两家公司解除合同，各自照常营业。

抽掉了就不在、或者不是原样的，是纠缠。把柏拉图从哲学史里抽掉，我们手里的苏格拉底会剩下阿里斯托芬喜剧里的怪人和色诺芬笔下的长者，那个以诘问追索定义、为此从容赴死的哲学家形象会单薄得多；把亚里士多德从哲学史里抽掉，"柏拉图主张理念分离"这一后世最常见的概括，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这个检验不是万能的，它至少有两处边界。第一处：抽掉之后"不是原样"，要说清楚是哪里不是原样。如果只是笼统地说"没有柏拉图，苏格拉底就不一样了"，那几乎对任何两个人都可以这么说——没有隔壁邻居，你也会"不一样"一点。真正有分量的，是能指出具体在哪一处变了样：抽掉柏拉图，苏格拉底身上那一整套关于定义、关于灵魂、关于从容赴死的形象就失去了主要来源，而这些恰恰是后世哲学史上"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最重的分量。说得出这一处，检验才算数。

第二处：抽掉的是我们手里的材料，不是历史本身。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的真实一生，不会因为我们少读了一本书而改变；改变的是我们能够着的那个苏格拉底。所以这个检验测出来的，是思想史上那个定型的端点有多依赖缠绕，而不是那个活人当年有多依赖别人。这两件事不能混。就像家族里的爷爷，他当年是什么脾气，早已定了，谁也改不了；可饭桌上流传的那个爷爷，抽掉了二叔那段挨打的回忆，确实会变成另一个人。带着这两处限定，这个检验仍然说明了一件事：在希腊三哲之间，"关系"这个词太轻了。

◆ 三件事同时在长

纠缠史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它不只是说人与人缠在一起，还说：一个思想的成形，是好几件事同时在长，谁也不是谁的起点。本书借用的这套工具，把一件事的发生看成三个方面在互相生成。用最简单的话说：

一是显露——一个东西终于被看见、站得住、说得出的那个样子。比如柏拉图对话中那套关于理念的说法，终于可以被人识别、被一再讨论、被写下来传给别人。

二是差异序列——一步一步的推进、比较、试探、修正、收敛。比如苏格拉底问"勇敢是什么"，对方答一个，他找出反例，对方改一个，他再找反例；比如柏拉图从早期对话到晚期对话，一路改写、一路自我质疑。

三是发生土壤——让这一切得以发生并参与其中的那张网。比如雅典的法庭与公民大会，智者的修辞课，巴门尼德"知识的对象必须不变"的主张，苏格拉底之死这件事本身。

这套工具有三条写得很简洁的关系式：显露由差异序列和土壤生成，差异序列由显露和土壤生成，土壤由显露和差异序列生成。如果写成符号，就是S=F(D,E)、D=G(S,E)、E=H(S,D)，其中 S 代表显露，D 代表差异序列，E 代表土壤。这里要特别说明：F、G、H 只是占位的记号，意思是"这里有一种生成关系"，三个字母不同，是为了提醒这是三种不同的生成关系。它们不是可以代入数字计算的公式，本书也绝不会拿它们去算任何东西。

这三条关系式要说的核心意思只有一个：三者同时互生，没有哪一个在先。不是先有土壤，再在土壤上走出差异序列，最后长出显露；也不是先有一个完整的学说，再由它推出方法、改造环境。三件事在同一场发生里互相撑着长起来。

拿做菜来说。一道招牌菜的成形，不是先有厨房，再有厨子的试验，最后才有菜；也不是先有一张完美的菜谱，再照着去试、去布置厨房。这家馆子的灶、街坊的口味、上一任师傅留下的手法（土壤），厨子一锅一锅地调、咸了改淡了改（差异序列），那道菜终于有了稳定的、叫得出名字的味道（显露），三者是一起长起来的：厨子的试验因为这口灶、这群食客才是这样的试验；菜的味道因为这一串试验才是这样的味道；而这道菜一出名，熟客的期待、进货的渠道、徒弟学手艺的方式，也就是这家馆子的土壤，又被它改了。

放回苏格拉底身上：他的追问方式（差异序列）离不开雅典人人会用美德词、法庭和公民大会天天在争这些词的那片土壤；他最后显露出来的"知道自己不知道"、他对定义的执着要求，又离不开那一场场追问；而他这样问下去，最终也改变了土壤——城邦以一场审判和一杯毒酒作出了回应，他的死又成了柏拉图写作的起点。三件事是缠着长的，你很难说哪一件先。第 5 章会把这一轮细细展开。

◆ 三脚架这个比喻，和它在哪里失灵

为了说明"同时互生"，最常用的比喻是三脚架。一个三脚架，三条腿互相斜靠着站立。第一条腿靠另两条撑着，另两条也靠剩下的撑着。你不可能先把一条腿单独立好、让它自己站着，再去立第二条——单独一条腿必倒。三条腿必须在同一个动作里一起立住。这正好说明三者为什么没有先后：不是谁先站稳了再去扶别人，而是一起站稳。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循环论证吗？用 A 解释 B，又用 B 解释 A，绕了一圈什么也没说。这个质疑值得认真对待。循环论证的毛病，在于把结论偷偷当作自己的根据：要证明"这本书可信"，理由是"书里说它可信"。三条关系式说的却不是"谁证明谁"，而是"谁和谁一起长"。现实里，互相撑着长起来的东西到处都

有：语言与思想，供给与需求，一个人的性格与他的人际圈子。说这些东西互相生成，并不是在玩逻辑把戏，而是在描述一种实际的状态。可是，我们也必须老实承认：光把"同时互生"说出来，并不能自动打消循环论证的质疑。比喻也有失灵的地方。

第一处失灵：真实的三脚架能站住，不只靠三条腿互相斜靠，还靠地面、靠重力、靠腿与地面之间的摩擦。比喻漂亮地说明了"没有哪条腿先站"，却悄悄省掉了那些不属于三条腿的条件。放到哲学史里，这提醒我们：不能因为说了"三者互生"，就以为把一切都解释完了。

第二处失灵：三脚架的三条腿，我们一眼就能分清哪条是哪条。可在思想史里，显露、差异序列、土壤并不是三根现成的木棍。要说这三者在互相生成，就得在具体的材料里把它们分别指认出来：哪些是柏拉图的追问与改写，哪些是他最后显露出来的学说，哪些是他脚下的土壤——并且拿史料去核对，而不是凭感觉安排。

第三处失灵，也是最要紧的一处：如果一种解释，在任何结果出现之后，都能随意调换三者的位置——这件事成功了，就说是土壤厚；那件事失败了，就说是差异序列没走通；换一件事，又说是显露不够——那么这种解释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它只是一套事后贴标签的说辞，永远不会错，也就永远没有用。

所以，"同时互生"不是一张免检证，而是给我们添了一份证据上的责任。整体地看问题，要比单线地看问题更费力，而不是更省事。一个负责任的整体解释，必须说得出：在什么情况下，它会被证明是错的。全书在第 23 章会把这些条件一条条列出来。这里先立一个规矩：凡是本书说"这一轮的新学说是被某种矛盾逼出来的"，都必须能在史料里找到那个矛盾；找不到，就是我们错了。

这就像一位老中医说"你这病是整体失调"。说整体，本身没有错，人确实是一个整体。可如果他无论你哪里不舒服都说"整体失调"，无论你吃了药好没好都说"整体还在调"，那这句话就不再是诊断，而成了一句怎么说都对的空话。好医生说整体，同时会告诉你：吃三副药，如果某个症状没有减轻，说明我判断错了。

◆ 位置会轮转

"三者同时互生"还带出一个推论，它对理解希腊三哲特别重要：同一个人、同一套学说，在不同的场合里，可以站在不同的位置上。

一个常见的诱惑，是把三位哲学家和三个方面一一对应起来：苏格拉底不停地追问，就把他配给差异序列；柏拉图建立了理念世界，就把他配给显露；亚里士多德讲事物的生成与质料，就把他配给土壤。这样一对，整整齐齐，一看就懂。但这种对应是错的，而且错得很有迷惑性。

拿柏拉图来说。在他自己那一轮里，理念论是被逼出来的新答案——被老师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逼出来，被老师之死逼出来，被"知识的对象必须不变"这一主张逼出来。这时候，理念论站在"新显露"的位置上。可到了亚里士多德那一轮，理念论已经在学园里讨论了约二十年，成了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土地，成了他要去顶撞的那片土壤。同一个理念论，第二轮是显露，第三轮是土壤。位置在轮转。

这就像老城改造时拆下来的一块青砖。它砌在老墙里的时候，是墙面上看得见的那一块，承着上面的分量，墙的样子就是由它和它的同伴撑出来的；墙拆了，它被敲掉灰浆，铺进新修的巷子里，成了路面底下的一块，人们每天踩着它走，却不再看见它。同一块砖，在旧墙里是显出来、撑起来的那一部分，在新路里是垫在下面、让别的东西得以成形的那一部分。你不能说它"就是墙砖"或

者"就是路砖"，要看它此刻砌在哪一处。理念论也是这样：在柏拉图的墙上，它是那块显眼的砖；到了亚里士多德脚下，它成了垫底的路面，他整套学说就踩着它铺开。

所以，本书绝不把哪一位哲学家固定在哪一格里。我们只问：在这一轮发生里，什么在推进，什么显露了出来，什么是那片土壤？换到下一轮，再重新问一遍。第 9 章会把三轮放在一起，专门讲这种位置的轮转。

◆ 把"同时"拉开成一个回合

说"三者同时互生"，还会招来一个更具体的疑问：既然没有先后，本书为什么又一再说"苏格拉底的问题逼出了柏拉图的回答"？"逼出"难道不是一先一后？

这里要分清两种看法，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镜头不同。三条关系式是特写镜头：对准任何一个时刻，显露、差异序列、土壤都在互相撑着，谁也离不开谁。本书借用的工具里还有一个长镜头，叫 123 原理：把这种互撑放进时间里看，它会走出一个回合——差异序列撞上土壤，撞出矛盾；矛盾逼出显露的改变；新的显露回写，把差异序列和土壤一起重置。下一个回合，就在被重置过的条件上开始。"逼出"说的是长镜头里的前后，"互生"说的是特写镜头里的同时，两者并不打架。

看一个家族微信群。群里转发的养生文章一天比一天多，今天"隔夜菜致癌"，明天"某种食物是天然降压药"，这是一串推进；它撞上了这个家的土壤：长辈的面子，晚辈被工作消息淹得顾不上看，还有那位真照着偏方停过药的舅舅。两头一撞，群里闹了一回不愉快，终于逼出一条大家认账的群规："转发健康文章前，先发给小表妹查一查。"这是显露。规矩一立，回写就开始了：群里的转发少了，长辈却改成私聊转发；小表妹成了家里的"查证员"，逢年过节被拉着问东问西；这个家的土壤变了样，下一串推进就在改过的土壤上开始。可在这

个回合的任何一刻，群规、转发、家里的人情又是同时互相撑着的：群规之所以这样定，是因为这家人这样转发；这家人这样转发，又是因为这个家是这种人情。

两点限定要说在前头。第一，123 原理只讲"矛盾—显露改变—回写"这一个循环，不是什么事都能往里套的万能三步法；把"洗菜、切菜、下锅"也叫作 123，就把它用坏了。第二，回写要拿材料去观察，不能宣布；它也可以是负向的——苏格拉底那一轮，回写是城邦的一纸判决，第 5 章会拿史料去看。正因为一个回合是从差异序列撞上土壤开始的，本书才选择先跟问法，下面就说这个起手。

◆ 为什么改从问法起手

既然三者同时互生，没有先后，那我们研究时从哪里下手都一样吗？不一样。三者在现实里是同时在长的，可人在分析时，注意力一次只能落在一处，总得先抓住一头。三个方面排一排，有六种起手的顺序。上一章说过，教科书常走"先显露、再差异、后土壤"这条路：先把成型的学说摆出来，再讲来路，最后铺背景。这条路适合理解一个已经成形的体系。

本书要做的事不同。我们想看的，是一个思想怎样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出来：他在追问什么，在哪里卡住，被什么逼着改口，最后显露出什么样的回答，这个回答又扎根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反过来改变了什么。这种任务，最吃紧的是"过程"——不先跟上那一串活的追问，学说就只是一个摆在那里的成品；土壤也只能被当成布景。

所以本书改走"先差异、再显露、后土壤"这条路：先跟问法，看这个人一步步在问什么、怎样修正；再看他的学说怎样在这串追问里显露出来；最后追他的土壤与回写——他在顶撞谁，谁的答案成了他的土壤，他的学说又重置了什么。

这和一位好的心理咨询师了解来访者的方式很像。一个人说"我总是把亲密关系搞砸"，咨询师不会一开始就给他贴一个人格类型的标签，也不会一开始就追问他的童年。他会先请对方讲最近一次的具体经过：那天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对方说了什么，你接着又做了什么。跟着这一串活的过程走下去，那个反复出现的模式会自己显露出来；模式清楚了，再去追它扎根在哪段早年的经历里。先跟活的，再看显形的，再追扎根的。

起手顺序为什么这么要紧？因为起手错了，后面越努力，离答案越远，而且不会报错。如果我们想弄清理念论是怎样被逼出来的，却从"理念论是什么"起手，我们会把理念论讲得越来越精细，从洞喻讲到线喻，从回忆说讲到辩证法，讲完了，还是回答不了最初那个问题：它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样子？我们会觉得自己一直在用功，却始终摸不到门。

还要说明两点限定。第一，这六种起手顺序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穷尽所有的研究方法；它们只是帮人在动手之前问一句"这件事最吃紧的是哪一面"的提问助手。第二，起手顺序只是起点，不是枷锁。走"先差异"这条路，不等于不看学说、不看土壤，三个方面都要看，区别只在先看哪个。

◆ 最强的反对：这不就是"接受史"吗

还有一个更内行的反对，必须正面回答。熟悉二十世纪思想的读者会说：作者的形象由后来的读者塑造，这件事早有人讲过。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1960）里讲"效果历史"，认为我们理解一部作品，总是已经站在它一路传下来的影响之中；文学研究里还有一整门"接受史"，专门研究一部作品怎样被一代代读者读成不同的样子。你说的"学生讲出老师"，不就是这些老话吗？

这个反对说中了相当一部分，我们乐于承认这份亲缘：本书关于反向师承的许多看法，和这些思路站在同一边。但有两处不同，值得说清楚。第一处，接受

史通常仍然留着一个先在的原点：先有一部作品、一位作者，再研究它被怎样接受、怎样起作用。原点在前，接受在后。纠缠史在希腊三哲这里要说得更重：那个原点本身就是在缠绕里定型的——苏格拉底不留一字，他的"原作"就是学生的书写；柏拉图那个"分离理念"的形象，也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转述定下来的。这里没有一个先放在那里、等着被接受的原点。

第二处，接受史关心的主要是"被怎样读"，纠缠史还要问"被逼出了什么"。它要求在每一轮里指认出一个矛盾，看这个矛盾逼出了什么新的显露，这个显露又怎样回写、改了下一轮的土壤。它不满足于描述一个形象怎样被一层层讲出来，还要说明新东西为什么偏偏在这里、以这个样子发生。这一点能不能做到，要在第 5 至 9 章里拿史料兑现；兑现不了，它就只是接受史换了个名字。

用一个被改编过的故事来说。一部多年前的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视剧。接受史会说：原著在先，电视剧是它的回响，值得研究的是回响怎样改变了人们对原著的理解。可很多人只看过电视剧，从没翻开过原著，人们心里的"这个故事"就是改编缠出来的；电视剧里添的一场戏、一句台词，后来的翻拍都照着保留，这个故事在下一代人手里就沿着那场戏长下去，连重读原著的人，也会带着那场戏去找它的影子。前一种说法看见了回响，后一种说法还看见回响怎样成了下一轮的土壤。这是本书的阐释，读者可以拿后面各章的史料来检验它站不站得住。

◆ 纠缠史不主张什么

一个新的看法，最怕被说过头。在本章结束之前，有必要把纠缠史不主张的东西说清楚。它不主张人物不存在，也不主张史料里的人物都是虚构。苏格拉底受审、柏拉图建学园、亚里士多德在学园二十年，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史实。纠

缠史说的是：这些人物在思想史上的样子，是在缠绕中定型的，要理解这个样子，就得追那场缠绕。

它不主张关系史毫无用处。在许多场合，"关系"这个词完全够用。两位相隔千年、只读过对方几本书的思想家之间，说"影响"或"继承"未必就错。

它也不主张所有的缠绕都是同一种。希腊三哲之间的缠绕是当面的：同在一座城里，同在一个学园里，亲耳听过对方说话，亲眼看过对方的生死。后世哲学家与三哲之间的缠绕，大多隔着几百上千年，隔着抄本、注释者、译者和一代代的教科书。隔代的、经过文本的缠绕，与当面的缠绕，机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第 12 章讲"查反向师承"时，第 21 章讲几位不在本书主轴上的哲学家时，都会回到这一点。

最后，它不主张自己一定对。如果有一天，我们用纠缠史的眼光去读希腊三哲，读出来的结论与"师承—批判—综合"的教科书叙事毫无二致，只是换了一套说法，那就说明这套眼光没有带来新东西，应该放下。如果某一轮的新学说，在史料里找不到可以指认的、逼出它的那个矛盾，那就说明"被矛盾逼出来"这个说法在那里不成立。这些失效条件，第 23 章会集中交代。一个好的看法，应当像一把好尺子：它敢于告诉你，什么样的东西它量不了。

◆ 一个更难缠的追问

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先有人，还是先有缠"这个问题立了起来：在希腊三哲之间，缠绕在先，端点在后；显露、差异序列、土壤同时互生，谁也不是起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轮次里站在不同的位置；而本书改从问法起手，先跟活的追问，再看学说显露，后追土壤与回写。

可是，说到"被矛盾逼出来"，说到"一轮接一轮"，熟悉哲学史的读者一定已经想到了一个名字：黑格尔。黑格尔不也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吗？他的"正

题—反题—合题"，不也是一轮接一轮地往前走吗？苏格拉底悬空，柏拉图搬到彼岸，亚里士多德搬回物中——这听起来简直就是一个现成的"正—反—合"。那么，本书说的这种纠缠与循环，和黑格尔式的辩证上升，究竟有什么不同？是换了一套名词，还是真有一处根本的分歧？

这个问题，下一章来回答。我们会看到，"正—反—合"的讲法很有力量，也确实抓住了一些东西，但它总差一口气——差在它说不清楚：为什么思想有时候不往上走，反而会绕回去。

带走的话

关系先有两端再连线；纠缠是缠绕在先，端点在后。

本章判错句

如果抽掉三人之间的任何一根线，剩下的那个人仍然原样不变，纠缠史的主张在这里就不成立。

想一想

你身上哪一个习惯，是在和某个人长年来往里缠出来的？

如果从你的生活里抽掉一个最重要的人，你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

03

第 3 章

"正—反—合"为什么总差一口气

这一章的问题

"正—反—合"讲得那么顺，为什么总差一口气?

◆ 一条只往上走的线

翻开一本常见的哲学史教材，我们很容易读出一条干净的线：苏格拉底提出问题，柏拉图给出答案，亚里士多德批判老师、综合前人，希腊哲学由此"达到顶峰"。再往后，教材会告诉我们，近代哲学"超越"了中世纪，康德"综合"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黑格尔又把一切"扬弃"进一个更高的体系。每一步都比上一步高一点，像一段楼梯。

这条线读起来很舒服，可是只要多问一句，就会碰到几处说不通的地方。柏拉图死后，他亲手建立、专门追问永恒理念的那所学园，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在阿尔克西劳手里竟然转向了怀疑派，主张对一切判断保持悬置——这听起来更像是退回苏格拉底那种"我不知道"。再过几百年，普罗提诺不去接续亚里士多德那个"更高的综合"，而是越过他，回到柏拉图。如果哲学是在爬楼梯，这些人为什么往下走？教材通常给它们贴上"衰落""复古""倒退"的标签，然后翻到下一页。

一个标签可以是例外，标签贴得多了，就该怀疑图本身。这就好比一位家长给孩子画成绩曲线，从小学一路往上画，到了初二数学突然掉了一截。家长说"退步了"。可如果孩子是从死记题型转向真正弄懂概念，那一截下滑恰恰是另一条路的开始。曲线没有画错数字，画错的是"只能往上"这个预设。

这个预设不只是史学家的事，它会悄悄改变我们读书的方式。一旦相信哲学是在爬楼梯，读者翻开柏拉图，心里就会先给他打上"早期版本"的标签，好像在看一部十年前的旧手机：功能少、反应慢，留着只为怀旧。可旧手机被新手机全面取代，是因为它们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样更快地打电话、上网、拍照。哲学家们却常常不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后来者也并非总在前人的功能上加功能。把柏拉图当旧手机读，我们会错过他在自己那片土壤上真正解决了什么，也会错过他留下的那个窟窿怎样逼出了后面的人。楼梯模型最大的代价，是让过去变得不值得认真对待。

本章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预设。在第2章，我们已经把"关系史"换成"纠缠史"；这一章要再往前一步：即便承认哲学史里充满矛盾和冲突，"正—反—合"这种讲法仍然总差一口气。差在哪里？差在它把矛盾放进了一部只会往上走的电梯。

◆ 让人安心的三种上升叙事

上升叙事并不只有一种样子，大致可以分成三种，彼此叠在一起。第一种是"接力棒"。前人跑完一段，把棒交给后人，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第1章说过的"师承—批判—综合"，就是这种叙事的教科书版本。它的好处是好记，坏处是只看得见人，看不见人与人之间那团缠在一起的东西。

第二种是"正—反—合"。先有一个立场，再有一个与它相反的立场，两者冲突之后出现一个吸收了双方的更高立场，这个新立场又成为下一轮的"正"。这个公式流传极广，常被直接安在黑格尔头上。这里要先做一个史实上的澄清：研究者早已指出，"正题—反题—合题"这套固定说法与费希特的关系更深，后经一些阐释者的通俗化才流行开来；黑格尔本人很少这样用，他在《精神现象学》的序

言里甚至批评过把"三分法"降成一套没有生命的公式。所以，我们批评的是流行的"正反合"图式，不是把这几个字硬塞进黑格尔嘴里。

第三种才是真正的黑格尔式哲学史。在《哲学史讲演录》里，黑格尔反对把哲学史看成一堆互相推翻的意见，他把它讲成精神认识自身的发展过程：后出现的哲学是此前各种哲学的结果，把它们的原则都包含在自身之中。这比"正反合"的公式深刻得多，但它和公式共享同一个骨架：历史是有方向的，越往后越完整，最后的那个位置能够解释前面所有的位置。

这三种叙事为什么让人安心？因为它们和我们在生活里最熟悉的一种讲故事方式一模一样。几乎每家公司的年会都会放一页"发展历程"，一支箭头从左下角斜指右上角：创业、突破、扩张、上市。失败的产品线、走过的弯路、差点倒闭的那一年，都不在箭头上。箭头不是假的，但它是从今天往回画的。上升叙事的力量，正来自这种"从终点往回画"的视角。

◆ 黑格尔做对的那一半

在动手拆这部电梯之前，我们得先公正地说清楚：黑格尔做对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没有这件事，本书的整个框架都立不起来。在他之前，人们讲哲学史，矛盾往往被当成噪音——这个人说错了，那个人也说错了，历史是一串纠错记录，或者干脆是一座意见的陈列馆。黑格尔把矛盾从"错误"提升为"动力"。在他看来，一个立场之所以会被推着走，恰恰因为它自身包含着它说不圆的地方；不是外人来挑刺，而是它自己撑不住了。这个洞见我们完整接过来：本书讲的每一轮发生，都从一个说不圆的矛盾开始。

这件事在家里随处可见。一对夫妻装修房子，丈夫要一间书房，妻子要一个大衣帽间，面积只够一个。吵了两个星期，最后谁也没赢：他们把走廊尽头打通，做了一面顶天立地的柜子，一半放书一半挂衣服，还多出一个两人都没想到

的阅读角。如果没有那场争执，这个方案根本不会出现。矛盾不是装修的事故，是装修的发动机。

黑格尔做对的第二件事，是看到"克服"不等于"扔掉"。他用的那个德文词，中文常译作"扬弃"，意思是既否定又保留。学会骑自行车以后，我们不再盯着车把想怎么保持平衡，但平衡并没有消失，它沉到身体里去了。后来的哲学克服前人，也常常是把前人的东西沉进自己的地基。

第三件事，是他坚持哲学史必须从内部读：不了解一个哲学家在回答谁、反对谁，就读不懂他。这正是本书第三编"找前置矛盾"那个动作的远祖（第11章再详谈）。

所以，我们和黑格尔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讲矛盾。我们承认矛盾驱动，而且感谢他把这件事讲透了。分歧在于：矛盾驱动起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形状？是楼梯，还是别的什么？下面分三处来说。

◆ 第一处不同：两人吵架，还是三方同时缠

"正—反—合"的基本单位是两个立场。正题和反题是同一类东西：都是主张，都是观点，站在同一张辩论桌的两侧。合题则是在两者冲突之后才出现的第三个主张。这里有两个特点：冲突发生在同类之间；第三项在时间上排在后面，是前两项的产物。

本书用的123原理，结构完全不同。为了读者方便，先把三个字母翻成大白话：D是"差异序列"，指一个人怎样一步步推进、比较、试探、修正，也就是他追问的那套手法和步子；E是"特征纠缠网络"，可以理解为发生的土壤，是那个时代已经缠在一起的制度、语言、习惯、前人的答案；S是"显露"，指某种新东西变得可以被认出来、可以保持下去、可以说出来。123原理说的是一个循环：D和E撞上了，撞出的矛盾逼出S的改变，新的S再回过头来重置D和E。

注意这里的矛盾不是两个观点之间的矛盾，而是"手法"与"土壤"之间的矛盾，两者根本不是同一类东西。而且 S 也不是排在后面的第三个观点。按照三大方程的说法，S、D、E 三者同时互相生成：S 由 D 与 E 共同生成，D 由 S 与 E 共同生成，E 由 S 与 D 共同生成。这里的字母和等号只是"谁跟谁一起生成谁"的占位记号，不是可以代入数字的公式；第2章用过三脚架的比喻，三条腿同时着地，抽掉哪条都站不住，这个比喻也只到这里为止。

用厨房来比。"正反合"像两位厨师争咸淡，一个说要咸，一个说要淡，最后各让一步，做出一盘中等咸度的菜。123 原理则像一位厨师带着自己的手法（D），撞上了这口锅、这把柴、这批食客的口味、这季节能买到的菜（E）：他的拿手做法在这口锅里就是做不出来，逼得他改出一道新菜（S）。这道新菜不是两种口味的折中，它是一个此前不存在的东西。而它一端上桌，又反过来改了食客的口味，也改了厨师以后的手法——这就是回写。

把这个区别放到三哲身上，差别立刻显出来。按"正反合"读，柏拉图应该是苏格拉底的"反题"。可柏拉图哪里反对过苏格拉底？他把老师写成自己几乎所有对话的主角。他接过来的是老师留下的那个问题——"X 是什么"——以及老师的死。逼他把答案搬到彼岸的，不是一个与苏格拉底相反的观点，而是一种处境：问题悬在半空，提问的人被城邦处死，巴门尼德又早已说过知识的对象必须不变（第6章再详谈）。这是手法撞上土壤，不是观点撞上观点。

还要补一句：123 原理里的"显露"，也不等于一个新观点被提出来。显露有三个层次，我们叫它"三个可"：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一样东西先得能被人认出来，然后能稳得住、不随风散掉，最后还能被说出来、传下去。这三层不是一回事。一个小区里，大家早就觉得楼下那个路口危险（可识别），但直到有人牵头装了减速带、定了接送孩子的轮班，这份担心才稳住（可维持），再等到它写进业主公约，新搬来的人也能照着做（可表达）。"正反合"只盯着观点之间的

胜负，看不到一个新东西可能卡在第一层、迟迟上不去第二层——而这恰恰是第5章讲苏格拉底时要用到的关键。

再看"合"。合题被设想为保留了双方的真理。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调成一碗汤。他留下了形式，却把它从彼岸拉回物中；他另起炉灶，做出了生物学的分类、三段论的推理、潜能与实现的一整套词汇，这些东西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都找不到"一半"。新的显露常常不是两边的合计，而是第三种东西，连同大量被丢掉、被改写的东西。

◆ 第二处不同：楼梯，还是会拐弯回流的河

楼梯有一个铁律：每一级都比上一级高。在楼梯上，往回走只有一个名字，叫"下楼"，也就是倒退。所以上升叙事遇到学园转向怀疑派、普罗提诺回到柏拉图，只能说它们是"衰落"或"复辟"。

123 原理描绘的循环更像一条河。河没有义务一直往某个方向前进，它顺着地势走，碰到硬岩石就拐弯，在平原上绕出一个又一个大弯，有时候某一段河道几乎掉头朝来处流去。但即便它流回了靠近源头的地方，流过来的已经是新的水，河床也被它自己冲刷改变过。这种"绕回去"，我们在本书里叫回绕。回绕和倒退、和原地打转怎样细分，怎样检验，第14章会正式界定；这里先抓住最粗的一条区别：回来的位置相似，土壤已经不同了。

生活里的回绕到处都是。很多年轻人吃了几年外卖之后，又开始自己在家做饭，做的还是父母那几样家常菜：番茄炒蛋、红烧排骨。看上去回到了原点，可他们是用空气炸锅、照着短视频、按着自己的作息在做；"在家做饭"这件事对他们的意义，也和父母那一代完全不同。说他们"倒退回了父母的生活方式"，显然不对；说他们"进步到了更高阶段的家常菜"，也很别扭。最准确的说法是：循环绕回来了，但每一圈都是在新土壤上画的。

希腊之后的哲学史里，这种回绕至少可以数出好几个：学园在阿尔克西劳那里重新拾起苏格拉底式的悬置，普罗提诺越过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二十世纪德里达的"延异"让答案再度悬在路上，与苏格拉底对话结尾的无解遥相呼应。这些回绕各有各的史料，第14章和第22章再详谈；这里只需要看清一点：如果一个叙事框架必须把这么多重要的转折都解释成"例外"，那么例外本身就成了常态，框架就该换了。

河的比喻还能说明另一件楼梯说不清的事：负向的推动。在楼梯模型里，每一步都要"更高"，一个失败、一次惩罚、一场死亡不可能是台阶，只能是事故。可在 123 原理里，回写可以是负向的。苏格拉底被雅典判处死刑，这是城邦对他那套追问的一次强硬回写——用消灭提问者的方式重置自己的土壤。偏偏是这次负向回写，成了柏拉图提笔写作的起点（第5章、第6章再详谈）。河道被一块巨石堵住，水被逼着另找出路，冲出了一条新河道。巨石不是"台阶"，但它确实是河流形状的一部分。

◆ 第三处不同：有没有一个早就写好的终点

前两处不同还可以算是形状之争，第三处触到了根子：有没有终点。上升叙事几乎总有一个终点，或者至少有一个方向标。黑格尔的哲学史走向精神对自身的完全认识；通俗的进步叙事走向"更科学""更理性""更自由"。终点一旦定下，前面每一步的意义就由它来分配：某个哲学家的价值，在于他离终点近了多少。这就是目的论——用结局来解释过程。

目的论的叙事有一种奇特的说服力，最好的例子是婚礼上的致辞。新郎讲两人的恋爱史：第一次见面就迟到、第一次约会就吵架、分手过一次又复合。在婚礼那天讲出来，每一次吵架都成了"命中注定"的伏笔，每一次分手都是"为了更好地重逢"。可是在吵架的那个晚上，没有人知道这会通向婚礼；同样的吵架，

在另一对情侣那里就是分手的开始。致辞并没有说谎，它只是站在终点往回讲，把当时真实存在的不确定性悄悄抹掉了。

上升叙事讲哲学史，就是在致婚礼辞。它让每一个矛盾都显得只是通往终点的手段，于是矛盾里那个真实的、可能走向别处的岔口消失了。而 123 原理是非目的论的：同一种追问手法，撞上不同的土壤，逼出的显露可以完全不同；谁也不能站在开头说"这条河一定流向那片海"。本书把这一点当作核心立场：我们接过"生成"这个动词，卸掉预先写好的终点。

这里必须回应一个有分量的反驳。为黑格尔辩护的人会说：真正的黑格尔从不预言未来，他说过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只能在一个时代成熟之后去理解它；他的辩证法也远比"正反合"的公式复杂，里面有曲折、有倒转、有理性借人的激情行事的"狡计"。这些都对，我们乐意承认，黑格尔本人的思想比教科书里的三段楼梯丰富得多（第18章会用五个动作专门解他）。但是，"来得太迟的理解"恰恰是婚礼致辞的姿态：它不预言，却在事后把过去全部读成通往现在的路。终点不必出现在开头，只要它在最后充当衡量一切的尺子，目的论就仍然在场。

非目的论也很容易被误解成"怎么都行"，所以要再划一条边界。没有预定终点，不等于没有方向，更不等于随意。水往低处流，河道却没有目的地；地势是硬的，岩石是硬的，河只能在这些硬约束里找路。123 原理里，土壤的约束同样是硬的：一个新显露要算数，必须真的变得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不是谁想宣布什么就能显露什么。拒绝终点，是拒绝替历史预先写好结局，不是拒绝历史有它自己的纹路。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终点一旦定下，谁站在终点，谁就有权给前人打分。在黑格尔的讲法里，越晚出现的哲学越接近完整，而讲述者自己的哲学，恰好处在最晚的位置上。这并不是说他别有用心，而是这种叙事结构天然会这样分配座次。家里排族谱也常有这种情形：哪一房后来最兴旺，族谱就从哪一房的视

角写，其他几房的祖上往往只剩一个名字。非目的论的读法，至少给了那些"没有通向今天"的岔路一个被认真看待的机会——它们不是失败的台阶，而是另一种可能的河道。

◆ 螺旋上升，是不是早已把回绕收进去了

读到这里，熟悉辩证法教科书的读者会提出一个更有力的反驳。辩证法并不只讲直线向上，它还讲"否定之否定"：事物经过两次否定，在更高的基础上仿佛回到了出发点。后来的教科书把它概括成一句很顺口的话：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螺旋不就是会绕回来的吗？学园转向怀疑派、普罗提诺回到柏拉图，放在螺旋图里，不正好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起点"吗？照这样看，本书说的回绕，辩证法早就有了，何必另起炉灶？

这个反驳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确实看见了"回来"这件事，比楼梯模型高明。但只要盯住螺旋的形状看一眼，分歧就出来了。螺旋楼梯每绕一圈，人都比上一圈站得更高；它允许绕，不允许低。也就是说，"回来"在螺旋图里是被事先定好性质的：凡是回来，都是"更高层次上的回来"。至于这一圈究竟高在哪里、拿什么尺子量，螺旋图不必回答，它的形状已经替它回答了。

本书说的回绕，更像山区的盘山公路。公路也绕圈，也常常绕到上一段路的正上方或正下方；可它有时往上，有时顺着山势往下穿进谷底，再从另一侧爬出去。决定它往哪里走的，是山本身的地形，不是一张事先画好的"每圈必须更高"的图纸。阿尔克西劳把学园带回悬置，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如果拿"体系是否完备"来量，它显然低了；如果拿"是否对独断保持警惕"来量，它又高了。回绕本身不带高低，它只告诉我们：同一个位置被重新拾起，而拾起它的土壤已经换过。

还有人会补一句：后来也有思想家把辩证法翻到物质条件这一侧，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去解释观念的变化，这不正是看见了土壤吗？这一点我们乐于承认：把土壤请进来，是对"观念自己运动"这种讲法的一次重要矫正，本书在这一点上与之同路。分歧只在于，一旦同时规定了历史必须依次经过的若干阶段，终点的问题就从后门回来了。看见土壤，与给土壤预先排好座次，是两件事。好比一位老农很清楚哪块地肥、哪块地瘦，这是真本事；可他若因此断定每块地都得按"先种豆、再种麦、最后种棉花"的顺序轮下去，不管这一年的雨水和虫害，那他懂的就不再是地，而是自己脑子里的那张轮作表。

◆ 楼梯也有它管用的地方

批评一种叙事，最容易犯的错，是把它批成一无是处。楼梯模型并非处处失灵，我们得把它管用的地方和失灵的地方分开。在某些局部，积累确实像楼梯。几何学里，一条定理一旦被严格证明，后人就可以放心踩在上面往前走，不必每代人都从头再证一遍；医学里，消毒和疫苗的知识一旦站稳，就很少有人主张退回去。在这些地方，"后来的比先前的更完整"大体是成立的。上升叙事用来讲一门技术、一个体系怎样一层层搭起来，也很顺手，这正是第1章说的教科书写法的长处：先讲清楚一套学说长什么样，再讲它从哪里来，适合入门的人先把体系装进脑子。

它失灵的地方，在于问题本身会变形的领域。哲学追问"X 是什么"，问到后来，连"答案应该住在哪里"都换了，这时就没有一根共同的尺子去量谁更高。好比问"什么样的房子最好"：茅草屋、四合院、电梯公寓，各自回应的是不同的气候、家族结构和城市密度。说电梯公寓比四合院"高一级"，只在"层数"这一条尺子上成立；换成"一家三代能不能住在一起"这条尺子，排名立刻翻过来。哲学史上的大转折，常常就是尺子本身被换掉了。

这里还要防另一个方向的误用。既然批评"正反合"是一个被用滥的三步公式，我们自己就更不能把123原理用成另一个万能三步法。123原理只说一件事：手法与土壤的矛盾逼出显露的改变，新的显露再回头重置手法与土壤。不是随便什么"第一、第二、第三"都叫123。职场上常听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是一份工作流程，里面没有土壤，没有回写，就不该往123上靠。一个框架的锋利，恰恰在于它肯说清楚自己不管什么。

◆ 看的次序，不是走的次序

上升叙事还有一个不太被人察觉的毛病：它把"我们看历史的次序"错当成了"历史自己走的次序"。要说清这一点，得把本书的三层工具放在一起看，看它们各管什么、怎样咬在一起。

第一层是三大方程：在任何一个时刻，显露、差异序列和土壤都在同时互相生成，谁也不比谁先。这一层说的是事情本身怎样缠在一起，它直接拆掉了"正题先在"的前提——没有哪一项能单独站在起点上，等着后来者来反对。第二层是六路径：三样东西同时在长，可人分析时注意力只能先落在一处，于是有六种起手顺序（第2章已谈）。这一层说的是我们怎样下手，它是看的次序，不是走的次序。第三层是123原理：手法与土壤的矛盾逼出显露的改变，显露再回写，重置手法与土壤。这一层说的是事情在时间里怎样一轮轮转。三层的关系可以这样说：方程说明为什么历史本身没有起点；路径说明我们为什么仍然必须挑一个地方下手；123原理说明，从下手处看进去，事情是怎样转出一圈又一圈的。

上升叙事的问题，恰恰出在第二层和第三层被搅在了一起。黑格尔式的哲学史，是站在最晚出现的那个成熟体系上往回看：先拿着终点处的显露，再去找通往它的步子，最后铺上各个时代的条件。这是一条"先显露"的起手路线，作为看

法本身没有什么错，教科书也常这样写。错在它接着宣布：既然我们是从终点看回去的，历史就是朝着终点走过来的。看的次序，被悄悄偷换成了走的次序。

修车师傅最懂这个区别。车进了店，他先看仪表盘上哪盏报警灯亮着，再顺着油路、电路一段段查，最后才问车主平时怎么开、常在什么路上跑。这是他检查的顺序。可车坏掉的顺序完全是另一回事：也许车主三年来总在坑洼路上跑，慢慢磨坏了一根管子，到最后才亮起那盏灯。没有哪个修车师傅会因为自己先看到灯，就说这辆车是"为了亮这盏灯"才一步步坏下去的。本书解哲学史选择从问法起手，同样只是一种看的次序；我们也不能把它说成历史本身的次序。这条约束，我们先用来批评别人，也同样拿来管住自己。

◆ 拿三哲试一试

说了这么多，我们不妨把"正—反—合"实际套在三哲身上，看看它到底差在哪一口气。套上去的样子大概是这样：苏格拉底是"正"，他提出了伦理概念的普遍定义问题；柏拉图是"反"，他把定义的对象推到感性世界之外，成为分离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是"合"，他保留了普遍形式，又把它放回个别事物之中。说实话，这个版本很漂亮，甚至有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话做支撑——他在《形而上学》M 卷第4章里说，苏格拉底的贡献是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但苏格拉底没有让普遍者分离存在，让它们分离的是柏拉图一派。这几乎就是一张现成的"正反合"图纸。正因为它这么顺，才更要看清它在三个地方漏气。

第一口气，漏在土壤上。按公式，柏拉图之所以走向理念，是因为逻辑上需要一个"反题"。可真实推动他的，是老师之死、问题悬置、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和巴门尼德的不变之间的撕扯，是一整片土壤。公式里没有土壤，只有观点和观点。这就像只看菜谱上"先放盐、后放糖"的顺序，却不看那天用的是铁锅还是砂锅、灶上是柴火还是电磁炉。

第二口气，漏在后面。如果亚里士多德是"合"，那么故事应该在这里告一段落，或者以他为新的"正"继续往上。可实际上，学园并没有接着亚里士多德往上爬，而是转向了怀疑；普罗提诺又跳回柏拉图。公式对"合"之后的回绕无话可说。

第三口气最要命，漏在源头。"正反合"有一个默认前提：正题先在，反题后来。可我们今天认识的那个苏格拉底，那个追问"X 是什么"、坚持普遍定义的苏格拉底，本人一字未写，主要是由柏拉图的对话和亚里士多德的转述塑造出来的。换句话说，"正"在相当程度上是"反"和"合"写出来的。这就好比一个家庭回忆当年第一次大吵：丈夫的版本、妻子的版本、孩子长大后听来的版本各不相同，而"那次吵架到底是怎样的"，恰恰是后来几十年的生活一层层讲定的。第一次吵架不是摆在源头的一块石头，而是被后面的岁月缠出来的。反向师承的史料细节，第8章再详谈；这里只要看到，它让"正反合"的时间顺序从根上失效了。

如果换成 123 原理来读，同一段历史会是另一副样子。苏格拉底那一轮，是街头追问撞上雅典人对美德词语的熟练使用，逼出了"知道自己不知道"和"定义要求"的微弱显露，城邦以死刑做了负向回写。柏拉图那一轮，是继续追问在流变的感性世界里落不了地，撞上老师之死与巴门尼德的要求，答案被搬到彼岸。亚里士多德那一轮，是在学园沉淀了约二十年的理念论已经成了他的土壤，撞上他自己的观察和分类，形式又回到物中。这里要提醒一句，这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三轮如何并置、如何咬合，第9章再详谈。我们在此只想指出一个结构上的差别：同一个柏拉图，在第二轮里是被逼出的新显露，到了第三轮已经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土壤。位置在轮转，没有谁永远是"正"或"反"。

◆ 河往哪里流

到这里，我们可以把本章的判断收拢成一句话："正—反—合"总差一口气，因为它只有矛盾，没有土壤；只有台阶，没有回绕；只有终点，没有岔口。我们并不因此把黑格尔扔出门外。他留给我们的那台发动机——矛盾驱动——本书原封不动地装上了。我们拆掉的是他那部只能往上开的电梯，以及电梯顶层那块早已刻好的"终点"牌子。换上去的，是一条会拐弯、会回流、在新的土壤上一圈圈画出相似图案的河。

这样一换，问题的重心也跟着转移了。在楼梯模型里，最要紧的是看清每一级台阶的高度；在河流模型里，最要紧的是看清河床和地势——水为什么在这里拐弯，为什么在那里冲出新道。也就是说，要读懂第一轮发生，我们不能先盯着苏格拉底这个人，而要先蹲下来看他脚下那块地。

那么，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壤？为什么偏偏在那里，"勇敢是什么""虔敬是什么"这类听起来像闲谈的问题，会变得如此要紧，要紧到最终要了一个人的命？下一章，我们就从这块土壤说起。

> **带 走 的 话**
>
> **楼梯只能往上走，河会拐弯、会回流；思想史更像河。**

> **本 章 判 错 句**
>
> 如果思想史上的"回到从前"都能被讲成更高一级的综合而不丢任何东西，本章说的"差一口气"就不成立。

> **想 一 想**
>
> 你见过哪一次"回到老办法"，其实一点也不是倒退？
>
> 你习惯把哪些事讲成"一步比一步高"，它们真的是这样走的吗？

◆



第　二　编

原型：希腊三哲——第一轮完整的发生

导　语

这一编是全书的中心。我们走进公元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的雅典，看一个问题怎样在三双手里接连推进：X 是什么？答案住在哪里？

第 4 章先看土壤：一座天天开会、天天打官司的城，一群收费教说话本事的智者，一场打了二十七年的仗，两位前辈留下的"变与不变"的裂缝，以及人人会用、没人说得清的美德之词。第 5、6、7 章依次请三个人上场：只问不答、最后被城邦处死的苏格拉底；把答案搬到彼岸、晚年又亲手拆自己招牌的柏拉图；把答案搬回物中、却留下目的论尾巴的亚里士多德。第 8 章倒过来看：学生怎样生成老师。第 9 章把三轮并置，讲清"上一轮的亏缺就是下一轮的矛盾"，以及三大方程、六路径、123原理三层怎样咬在一起。

这一编的读法只有一句：不要按人头读，跟着那个问题读。

04

第 4 章

雅典的土壤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为什么偏偏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勇敢是什么"这样的闲问会要了一个人的命？

◆ 一家天天喊"狼性"的公司

先说一家公司。墙上贴着标语，晨会上喊口号，年终总结里写满了同一个词："狼性"。新员工入职第一天就被告知：我们要有狼性。考核表上有一栏叫"狼性表现"，评分从一到五。

有一天，一个刚来的年轻人在会上举手，问了一个很老实的问题：狼性到底是什么？经理愣了一下，说：就是拼，就是不怕苦。年轻人又问：那加班到半夜算不算狼性？经理说算。年轻人再问：可上个月老张天天加班到半夜，年终评分却只拿了二，因为他"不懂配合"——那狼性是拼命，还是配合？经理说，狼是群居的，狼性当然包括配合。年轻人接着问：那上个月小李为了配合大家，把自己的方案让了出去，您又说他"没有狼的进攻性"……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人人都用了这个词三年，人人都按它打分、被它评价、为它加班，可一旦有人认真问"它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更要紧的是，大家并不因此觉得轻松，反而有点恼火：这个问题本身好像在拆台。

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就是一家放大了无数倍的"狼性公司"。勇敢、虔敬、正义、节制、美德，这些词在公民大会上说，在法庭上说，在剧场里说，在宴会

上说，在战场上说，人人熟练，人人在用它评判别人、也被它评判。可它们到底是什么？很少有人停下来问。等到有一个人在街头一个接一个地拦住别人问，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闲谈了，它最后要了这个人的命。第3章末尾留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在那里？这一章就来看那块土壤。

◆ 土壤不是背景

教科书讲到苏格拉底，通常会先放一段"时代背景"：雅典民主、伯罗奔尼撒战争、智者运动。读者读完，往往觉得这段话可以跳过，反正正戏在后面。

本书不这样看。我们在第2章说过，发生一件思想上的大事，脚下总踩着一大片已经沉淀下来的东西：人们怎样说话、怎样吵架、怎样做决定，靠什么吃饭，信什么神，刚刚经历了什么灾难。这片东西我们叫它"发生土壤"，正式的说法是"特征纠缠网络"。它和"背景"的差别在于：背景是可以换掉的布景，换一块布，戏照样演；土壤抽掉了，那件事就根本不会发生。

打个比方。同一粒种子，放在桌上，放一百年也只是一粒种子；埋进地里，它才会发芽。地不是种子的"背景"，地是发芽这件事的一部分。但地也不决定长出什么——同一块地里，种麦子长麦子，种豆子长豆子。土壤是条件，不是原因，更不是命运。

这一点很要紧，因为下面要讲的雅典土壤，很容易被讲成"雅典注定要出一个苏格拉底"。那是另一种偷懒。同一个雅典，几万个公民踩着同一块地，只有一个人一辈子在街头追问"X 是什么"。土壤解释的是：为什么这样的追问在这里会这样要紧、这样刺人；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偏偏是他。后一个问题，属于第5章。还要先交代一句：下面讲的雅典制度、战争和人物，是史实，有文献可查；把它们读成"一块已经憋着矛盾的土壤"，是本书的解读。

◆ 一座天天开会的城

先看雅典人怎样过日子。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后，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女人、奴隶和外邦人不在其列）可以到公民大会去，就战争与和平、结盟与征税、流放与赦免投票。大会在城西的普尼克斯山坡上开，凡是公民都可以上台发言。这意味着：在雅典，谁能说服众人，谁就能左右城邦的命运。

法庭更是如此。雅典没有职业法官，也几乎没有职业律师。陪审员由年满三十岁的公民抽签选出，一个案子动辄几百人坐在那里听，当场投票。原告被告都得自己上台讲。一个人的财产、名誉乃至性命，取决于他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里，用几百个普通人听得懂、愿意信的话，把事情讲圆。

这样的制度有一个后果：那些美德的词，被天天拿来当武器。原告说被告"不虔敬"，被告说原告"不正义"；为一个将军辩护，就说他"勇敢"，攻击他，就说他"鲁莽"。词还是那几个词，用法却像刀一样，谁拿在手里就往谁那边砍。

日常里也有这种情形。小区业主群里吵架，最常用的词是"讲道理"。一方说"我们要讲道理"，另一方也说"你讲不讲道理"。两边都觉得道理在自己这边，可谁也没说过"道理"指的是什么。词越是被当武器用，人们越不会停下来问它是什么——一停下来，手里的武器就钝了。雅典人对这些词熟到了极点，也用到了极点。熟练和不加追问，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 卖说话本事的人

有需求就有生意。既然在雅典，说话的本事等于权力，就有人专门来教这个本事，而且收钱。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智者"。

他们大多不是雅典人，从希腊各地来，在富家子弟中间开课，教修辞、论辩、治理城邦的本领。名气最大的是普罗泰戈拉，来自色雷斯的阿布德拉，收费很高。他留下一句后来人人皆知的话：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有一句：关于神，我

无法知道他们存在还是不存在。另一位是西西里来的高尔吉亚，以演说术闻名，他有一篇替海伦辩护的演说，大意是说言语是一种威力极大的东西，能让人恐惧、平息悲伤、生出喜悦，像药一样作用在灵魂上。

智者的到来，往雅典的土壤里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如果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正义"在你那里是一个样子，在我这里是另一个样子；如果言语像药，那么一个词的意思，就看谁调配、怎么调配。后来流传一种说法，指控智者教人"把弱的论证说成强的"。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把这个说法归在普罗泰戈拉名下；对智者的这类指控，多少带着对手的偏见，但它确实抓住了当时人的一种不安。

用今天的话讲，这有点像满大街开起了"话术培训班"：怎样谈判，怎样说服客户，怎样在会上压住对手。学员学成以后，确实更会说了。可一个副作用随之而来：当人人都知道一句话可以正着说、也可以反着说，"这件事到底对不对"这个问题，就变得可疑起来。不是说没有对错，而是对错好像只剩下"谁说得更漂亮"。这就是土壤里的一股差异：它不断地拆开词与意思之间原本被当作理所当然的联系，让人看见同一个词可以被拉向两个方向。

◆ 帝国的钱，公民的闲

天天开会、天天打官司，需要一个前提：有人有空。一个从早到晚在地里刨食的农夫，很难隔三岔五去山坡上听一整天的辩论，更难在法庭上一坐就是一天。雅典公民之所以能把大把时间花在说话上，背后有两样东西撑着，而这两样东西，雅典人自己很少拿到台面上来谈。

一样是帝国。波斯战争之后，许多希腊城邦结成同盟，共同防备波斯，各盟邦或出船、或出钱，同盟的金库起初设在提洛岛。后来金库被移到雅典，盟邦交来的贡金渐渐由雅典一家说了算，同盟实际上变成了雅典的帝国。帕特农神庙等

一大批工程，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修起来的。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开始给陪审员发津贴，让不富裕的公民也坐得起法庭。另一样是奴隶劳动：家务、作坊、矿山里大量的活由奴隶来做，外邦人也承担了不少工商事务。这些都是史实。它们合在一起，造出了一大群有闲、有一点钱、也有资格议论城邦大事的公民。

这层土里埋着一道雅典人自己很少说破的裂缝。在城里，"自由""正义"是公民之间的口头禅；出了城，雅典对盟邦和弱小城邦用的却是另一套话。修昔底德记下了一段著名的交锋：前 416 年，雅典出兵围攻中立的小岛弥罗斯，雅典使节对弥罗斯人说，正义只在实力相当的双方之间才谈得上，强者做他们能做的，弱者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这段对话是修昔底德重写的言辞，不是逐字记录；但它让后世读者看见，同一个城邦在家门口和在海外，对"正义"这个词用的是两副口径。

大白话说，这像一家公司，内部会议上人人讲"公平""透明""尊重每个人"，转身对供应商却是账期拖半年、合同说改就改，理由是"市场就是这样"。公司里的人未必觉得自己虚伪，因为两套话各管一片，平时碰不到一起。可只要有人把两套话摆到同一张桌上，问一句"我们说的公平到底是什么"，大家就会发现，这个词底下并没有一块能同时托住两边的地。雅典的"闲"，让一个人整天在市场、体育场和朋友家里与人谈话成为可能；雅典的"两副口径"，则让那句"正义是什么"一问就刺痛人。有闲，问题才有人听；有裂缝，问题才有分量。

◆ 一场打了二十七年的仗

再看这块土壤刚刚经历了什么。公元前 431 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后打了二十七年，到前 404 年雅典投降。战争第二年，一场瘟疫在拥挤的雅典城里蔓延，死了大量人口，主政多年的伯里克利也在前 429 年死去。战败之后，斯巴达扶植了一个寡头政权，后人称之为"三十僭主"，他们在城

里大肆清洗。不到一年，民主派打回来，恢复了民主，并在前 403 年颁布大赦，规定不得追究此前的政治旧账。

这一连串事情对一座城的语言做了什么？当时的史家修昔底德写过一段很有名的观察。他在写到科西拉内乱时说，内战中词语改变了它们通常所指的意思：不顾一切的莽撞被称为勇敢，谨慎的等待被称为怯懦，节制被看成没有男子气概的遮掩。这段话常被后人引用，因为它说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当一个共同体撕裂时，最先被撕裂的往往是它的词。

大白话说，就像一个家吵翻了天。哥哥说"孝顺就是把爸妈接到自己家"，弟弟说"孝顺就是别管爸妈的钱"，两个人都满嘴"孝顺"，意思却正好相反。吵到最后，"孝顺"这个词在这家里已经没法用了，一说出口就是在骂人。

苏格拉底开始在街头追问的那几十年，正好是这块土壤被战争、瘟疫、政变一遍遍犁过的几十年。那些美德的词，不只是被天天用，而且正在被用坏、用反、用到失去分量。

◆ 没有经书的虔敬

在那几个美德词里，最容易被忽视、后来却最要命的，是"虔敬"。苏格拉底最终的罪名之一，就是不虔敬。今天的人听到"宗教"，往往先想到一本经书、一套教义、一个教会。雅典的宗教不是这样。它没有一本人人必读的圣书，也没有一个统一解释教义的机构。神的故事散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里，各地版本还不一样；祭司多半是城邦按职位安排的人，管的是仪式，不负责讲道理。对一个雅典人来说，虔敬首先是"做对的事"：按时献祭，参加节庆，不亵渎神庙，不冒犯城邦供奉的神。至于"神到底是什么样""虔敬到底是什么"，很少有人追问，也没有哪个权威给过标准答案。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局面：虔敬是一项可以把人告上法庭、甚至判死刑的罪名，可它的内容却没有任何地方写清楚。什么算不虔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天坐在那里的几百个陪审员怎么看。后世还流传过一些说法，称在伯里克利时代，研究天象的阿那克萨戈拉因为说太阳是一块炽热的石头而被控不敬、被迫离开雅典；这类记载出自晚出的作家，细节多有争议，只能当作一种气氛的旁证，不能当铁证。但气氛本身是清楚的：在雅典，谈论神和天上的事，是一件可能惹祸的事。

柏拉图后来写过一篇对话《游叙弗伦篇》，场景就设在苏格拉底去法院应诉的路上。他碰到一个自信满满、正要去告自己父亲的年轻人，后者自称最懂什么是虔敬。苏格拉底照例问：那你说说，虔敬是什么？对方给了好几个答案，一个比一个站不住，最后借口有事，匆匆走了。这篇对话把整块土壤的困境浓缩成了一幕：一个即将因"不虔敬"受审的人，在法院门口发现，连最懂虔敬的人也说不清虔敬是什么。

日常里也有相似的事。不少单位的规章里有一条"损害单位形象"，可以据此处分人。可什么算损害形象？穿拖鞋上班算不算？在朋友圈发牢骚算不算？条文上没写，全看那天谁在会议室里、心情怎样。一个说不清内容、却可以拿来处罚人的词，是一块土壤里最危险的东西。

◆ 剧场里的两种正义

雅典人还有一所人人都去的"学校"：剧场。每年的酒神节，几千名公民坐在山坡上，连看几天悲剧和喜剧。这些戏不只是娱乐，它们是雅典人公开讨论"什么是对的"的地方。

前 441 年前后，索福克勒斯上演了《安提戈涅》。故事讲的是：国王下令，叛国者的尸体不许下葬，违令者死。安提戈涅的哥哥恰好就是那个"叛国者"。她

偏要去埋葬哥哥，理由是神定下的法高于国王的命令，死者应当入土。国王则坚持，城邦的法令就是正义，不服从就是动乱。两个人都满怀"正义"，都不肯退让，结果一个死，一个家破人亡。

这出戏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没有告诉观众谁对。它只是把"正义"这个词劈成两半，摆在几千人面前：一半是城邦的法，一半是神的法和亲人的情。观众散场回家，带走的不是答案，而是一道裂缝。

用大白话说，这就像单位规定周末必须加班，可那天恰好是母亲七十大寿。领导说"守规矩是本分"，你说"孝顺是本分"。两种本分都是真的，也都叫"本分"，可它们在那一天撞上了。平时这个词好好的，没人觉得它有两张脸；撞上的那一刻，人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想过它到底是什么。

雅典人在剧场里一次次看到这样的撞击。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正义"不是一个可以闭着眼睛用的词。只是感觉到，和说清楚，是两回事。剧场把问题摆出来了，却不负责回答；而追着这个问题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下去，就是下一章那个人做的事。

◆ 两位前辈留下的裂缝

土壤里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来自更早的思想者。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人最有名的思考，多半是关于自然的：万物由什么构成，世界怎样运转。其中有两位，留下了一道彼此打架的裂缝。

一位是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他的话后来常被概括成"万物流变"，最出名的是那个比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因为流过来的水已经不是先前的水。世界是一团活的火，一刻不停地变。

另一位是南意大利爱利亚的巴门尼德。他写过一首长诗，主张恰恰相反：存在的东西存在，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也无法被思考；真正存在的东西不生不灭、不变不动。我们感官看到的变化，属于"意见"，不属于"真理"。

这两个人一摆在一起，问题就来了：如果世界真的像赫拉克利特说的那样一刻不停地流，那么我们能"知道"什么？知道的东西总得站得住吧。巴门尼德的回答是：能被真正知道的，只能是不变的东西。可我们每天面对的，偏偏全是会变的东西。

这道裂缝，苏格拉底本人似乎没有正面去补。后来西塞罗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评语：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唤下来，安置在城邦里、引进家家户户，让它去追问生活、道德与善恶。苏格拉底把问题从"天上的事"转到了"人的事"。但那道裂缝并没有因此消失，它只是暂时沉在土壤底下，等到他的学生柏拉图那里，才被重新翻上来——第6章再详谈。

这次"从天上转到人间"，也不是凭空一跳。柏拉图在《斐多篇》里让临终的苏格拉底回忆过自己年轻时的一段弯路：他曾热衷于追问万物生灭的原因，听说阿那克萨戈拉的书里讲"心灵安排一切"，满心欢喜地找来读，读下去却大失所望——书里讲的仍是气、水、以太这些东西怎样推来推去，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安排是最好的。这就好比问一个人为什么坐在监狱里，他回答：因为我的骨头和筋腱是这样搭在一起的。这段自述是柏拉图写的，多少带着他自己的用意，不能当作苏格拉底的思想自传逐字采信；但它至少说明，在柏拉图眼里，老师转向"人的事"，是先在"天上的事"里碰了壁、被逼着拐过来的。土壤里那道"变与不变"的裂缝，在他身上已经留下了划痕。

日常里的样子大概是这样：一个人天天说"我要找到真正的自己"，可人一年年在变，口味变、朋友变、脾气也变。要找的那个"真正的自己"如果也一直在

变，还算找到吗？如果不变，它又在哪儿？这个问题，不想它的时候没事，一想就睡不着。

◆ 土壤自己也是长出来的

讲到这里，容易留下一个印象：土壤是一块现成的地，人只是在上面活动。这又把土壤讲成了布景。其实这块地本身也是一层层长出来的。雅典人熟练使用的那些美德词，来自几百年间荷马史诗的吟诵、家族的训诫、节庆的颂歌；天天开会的民主制度，来自前六世纪梭伦的立法、前 508 年前后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以及之后几代人在公民大会上一次次的争吵和投票；智者之所以能在雅典赚到钱，是因为民主制度先造出了一大批"必须会说话"的人。每一层土，都是前人某次争吵、某次改革、某个新说法沉淀下来的结果。

第2章讲过三个维度同时互相生成：显露出来的样子，靠推进的过程和已有的土壤撑着；推进的过程，被已有的样子和土壤塑造；土壤本身，又是由先前显露的样子和推进的过程沉淀而成的。这些关系我们只用三个字母简写，它们是提醒，不是可以计算的公式。放在雅典身上，最后一条最容易被漏掉：土壤不是天生的，它是过去无数次"推进—显露"的沉积层。

这一点决定了后面整本书的读法。苏格拉底踩着的这块地，是前人推进与显露沉淀下来的；他的追问会给这块地加上新的一层；而他死后，这层新土又成了柏拉图脚下的地。每一个人既是踩在土上的人，也是给后人造土的人。

日常里，这就像一个家庭的饭桌规矩。"长辈先动筷子""吃饭不许看手机"，孩子以为这些规矩是天生的，其实是爷爷那辈立的一条、爸爸这辈加的一条，有的还是某次吵架之后才定下来的。孩子长大成家，又会在自己的饭桌上删掉几条、加上几条。今天的规矩，是昨天的争吵；今天的争吵，是明天的规矩。

所以，当我们说"雅典的土壤憋着矛盾"，意思不是说雅典人笨，或者那个时代特别糟。恰恰相反：正因为这块地被前人耕得很厚、用得很熟，熟到可以不假思索，那种"一问就倒"的空虚才藏得那么深，也才那么刺人。越是厚的土，越经不起有人蹲下来问一句：这下面到底是什么？

◆ 土壤要被人戳一下才看得见

读者也许会问：本书说解构一位哲学家要从问法起手，先看推进的步子，再看显露，最后才追土壤；可这一编偏偏先用整整一章讲土壤，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矛盾，而且这里正好能看清起手次序的用处。这一章并不是在解构某一位哲学家，它是在给第一轮循环搭场地。更要紧的是，这一章其实也不是从土壤起手的。回头看开篇：我们没有先铺雅典的制度，而是先放了一个在晨会上举手的年轻人。正是他那句"狼性到底是什么"，才让一家公司三年来习以为常的东西显出了形状。土壤平时是看不见的，它就是大家脚下的地，走在上面的人不会低头看；只有当一种推进戳进去，地面裂开一道缝，人们才发现底下原来埋着这么多东西。我们讲雅典，也是借着即将到来的那一戳，回头去看这块地。

大白话说，城市地下的管线平时谁也说不清怎么走，图纸上画的和实际埋的常常对不上；直到哪天修路，一铲子挖下去，自来水管、燃气管、电缆一起露出来，人们才知道这条街底下缠着这么一大团。挖掘不制造管线，但没有挖掘，管线就一直"不在场"。三大方程说土壤与推进、显露同时互相生成，落到这里有一层很具体的意思：土壤能成为一块"说得出来的土壤"，本身就离不开那一铲子。反过来，那一铲子能挖到什么、挖得多深，又取决于底下埋了什么。这里没有谁先谁后，只有一起长出来的一团。

还有一处要防误读。前面把智者讲成土壤里一股"正在推进"的力量，到了本章末尾，又会说他们的摇晃已经成了下一个人脚下的地。这不是前后矛盾，而是

位置在轮转。对他们自己来说，智者是搅局者，是往旧的熟练使用里打楔子的人；可对晚他们一步的苏格拉底来说，"一个词可以被说向两边"已经是满城皆知的事，是他开口之前就摆在那里的条件。同一股力量，看它的人站的位置不同，它在循环里的位置也就不同。这就像一条老街上新开的网红奶茶店，开张头一年，它是搅乱整条街生意格局的那个变数；五年以后，门口排队的人群已经成了这条街的街景，再来开店的人得把它当作既定条件来盘算。所以我们不能说"智者就是差异，雅典就是土壤"，这种一对一的贴标签，恰恰把正在转动的东西钉死了。

至于123原理，本章讲的只是它的前半段：推进与土壤之间的矛盾一点点累积。矛盾怎样逼出新的显露、新的显露又怎样回写，得等下一章那个人出场才看得见。我们也不打算把雅典此前的每一次改革都顺手套成一轮"矛盾—显露—回写"。梭伦、克里斯提尼留下的制度确实沉淀成了这块地，但它们各自算不算一轮完整的循环，要拿史料去一条条看，不能宣布了事。一个框架如果什么都能套，它就什么也没有说。

◆ 人人会用、没人说得清的词

把上面几股力量合在一起，就能看清这块土壤的样子了。一方面，是沉得很厚的一层东西：雅典人对美德词语的熟练使用。从小在诗歌、宗教节日、家训里学会这些词，长大后在大会和法庭上用它们，几乎不假思索。这些词像城里的老路，走了几百年，没人问它通向哪里。

另一方面，是几股正在推进、正在搅动的力量：民主制度把这些词变成了天天挥舞的武器；智者让人看见一个词可以被说向两边；战争和内乱把这些词用坏、用反；思想前辈留下的"变与不变"的裂缝，又让"知道"本身成了问题。

一边要稳，一边要变。一边是"大家都懂，别问"，一边是"真的懂吗，可能根本不懂"。这就是我们说的矛盾在土壤里的累积：张力已经憋在那里，只缺一个出口。用全书的说法，这是第一轮循环的起点——差异推进与既有土壤之间的矛盾已经满了。

但我们要守住上面立下的规矩：土壤憋着矛盾，不等于必然有人站出来。很多时代都憋着类似的张力，最后什么也没发生，或者只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争吵。张力是必要的，不是充分的。要让这股张力逼出点新东西来，还需要有一种特定的推进方式，一个人拿着它，日复一日地往那堆熟练的词里戳。就像一锅水烧到了九十多度，冒着小泡，就是不开。要有什么东西——一粒沙、一点震动——它才会忽然翻滚起来。

那么，缺的是哪一种推进？从土壤这一侧看，答案有点出人意料：缺的不是更多的智者。智者已经够多了，他们也让词语摇晃，可他们是把摇晃当成手艺来卖——你付钱，我教你怎样把一个词拉到你需要的那一边。词越摇晃，他们的生意越好。这种推进不会让张力找到出口，只会让它四处泄漏，变成一场又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争吵。

土壤真正承受不住的，是另一种人：他也让词语摇晃，而且摇得更狠，可他不收钱，也不教人怎样赢；他摇晃一个词，是为了看它底下到底有没有东西站得住。他不站在任何一边，只是不停地问：你说的这个"勇敢"，究竟是什么？

大白话说，车坏了，一种修车师傅会推销给你一堆新配件，换了这个换那个，车照样时好时坏，他照样赚钱；另一种师傅什么也不卖，蹲在车底下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敲，非要找出到底哪里坏了。前一种让车主高兴，后一种常常让车主难堪，因为他敲出来的毛病，有时候是车主自己多年开出来的。

雅典的街头，后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位"蹲在车底下的人"。在不少同时代人眼里，他和智者分不清；可从这块土壤后来对他的反应来看，他刺中的地方，比任何一个智者都深。

◆ 土壤会反咬

最后还要说一件常被忽视的事：土壤不只是被动地等着，它也会还手。公元前 423 年，苏格拉底大约四十六七岁，阿里斯托芬在剧场里上演了喜剧《云》。剧里的"苏格拉底"开着一间"思想所"，吊在篮子里研究天上的事，又教人用诡辩赖掉债务，最后那间学堂被一把火烧了。观众哄堂大笑。

这个形象和柏拉图、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差得很远（三幅画像怎样对不上，第8章再详谈）。但它透露出一件事：在许多雅典人眼里，苏格拉底和智者、和研究天象的自然哲学家，是一路人——都是拆台的、可疑的、把年轻人带坏的。土壤对一种新的、刺人的推进方式，最先给出的反应，往往不是认真对答，而是归类、嘲笑和排斥。

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章看到它的后果。二十四年后，前 399 年，当苏格拉底站在五百人的陪审团面前时，他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特意提到这部喜剧，说他真正要对付的，不是眼前的几位原告，而是多年来在人们心里积下的那个旧印象。

日常里，这种"反咬"并不稀奇。那个在晨会上追问"狼性是什么"的年轻人，过不了多久大概会发现，同事们开始说他"爱抬杠""不合群""心态有问题"。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大家只是给他贴了一个标签。标签一旦贴上，他再问什么，别人听到的都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那个抬杠的人又来了"。

那么，这个在雅典街头追问"勇敢是什么""虔敬是什么"的人，究竟在做什么？他为什么拒绝写一个字，为什么从不给答案，又为什么最后被他的城邦处死？下一章，我们进到第一轮循环的中心。

带走的话

越是用熟了的词，越经不起有人蹲下来问一句：它到底是什么？

本章判错句

如果同时代别的城邦也有同样厚的土壤和同样尖的追问，却没有生出任何张力，土壤这一说就要收窄。

想一想

你所在的单位里，哪一个词人人天天在用，却没人说得清？

如果有人在会上认真追问它，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

05

第 5 章

苏格拉底：只问不答的人为什么被处死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只问不答、一字未写的人，为什么被他的城邦判了死刑？

◆ 一个让人难堪的提问者

还是从厨房说起。一家老馆子的后厨，老师傅掌勺三十年，人人服他的火候。有一天来了个怪人，不学手艺，不问菜价，只问一个问题："师傅，火候是什么？"

老师傅说："火候就是火候，到了就到了。"怪人说："那您教徒弟时，怎么让他知道到了？"老师傅说："看颜色，金黄就到了。"怪人说："可昨天那锅红烧肉，颜色还没金黄您就起锅了，您说那是火候到了。"老师傅说："红烧肉看的是筷子插不插得进。"怪人说："那火候是颜色，还是筷子？还是别的什么，让颜色和筷子都只是它的记号？"

老师傅答不上来。旁边的徒弟和食客先是觉得好笑，接着觉得别扭，最后有人说话了：你一个不会做菜的人，凭什么在这里捣乱？

这个怪人，就是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的样子。他问的不是火候，而是勇敢、虔敬、正义、美德；被问的不是厨师，而是将军、祭司、诗人、政治家、手艺人。结果也差不多：被问的人答不上来，旁观的人觉得难堪，最后城邦把这个提问者送上了法庭，判了死刑。

一个人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问——为什么会被他的城邦处死？这一章用全书的读法来看：先跟住他的问法，看它怎样推进；再看它逼出了什么；最后看这

件事反过来改写了什么。先说一句：我们今天知道的苏格拉底，几乎全部来自别人的记述，主要是柏拉图和色诺芬，三幅画像彼此对不上（第8章再详谈）。下面讲他的言行，多以柏拉图早期对话为据，这是通行的做法，但读者要记得它是"被讲出来的苏格拉底"。

◆ 神谕说他最智慧

据柏拉图《申辩篇》，事情有个奇怪的开头。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丰跑到德尔斐神庙，问神：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女祭司回答：没有。

苏格拉底说他听到这个回答时很困惑，因为他自认一无所知。神不会撒谎，可他也不觉得自己智慧。为了弄明白神谕的意思，他去找那些公认有智慧的人：先找政治家，再找诗人，再找手艺人。结果他发现，政治家自以为懂正义，其实说不清；诗人写出了动人的诗，却讲不出诗里的道理；手艺人确实懂自己的手艺，却因此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和这些人的区别只有一点——他们不知道却以为自己知道，而他不知道，也知道自己不知道。神说他最智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后人把这概括成"无知之知"。

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史实，难以查证；它出自柏拉图的笔下，又是一篇法庭辩护词，修饰的成分不会少。但它准确地说出了苏格拉底这一生的形状：他不是带着一个答案去说服人，而是带着一个问题去检验人。

大白话说，这就像一个新来的质检员。别的部门都说自己的产品没问题，他也不说有问题，只是一样一样拿去测。测完他向厂长汇报："我不知道哪个合格，但我知道，他们说自己合格，是没测过就说的。"这样的质检员，厂长或许欣赏，各个部门大概都不太喜欢。

◆ 诘问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

苏格拉底的提问不是随便聊天，它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样式，后人称为"诘问法"。拿柏拉图的《拉凯斯篇》做例子。两位父亲想知道该不该让儿子学重装格斗，便请教两位将军，其中一位叫拉凯斯。话题转到勇敢。苏格拉底问拉凯斯：勇敢是什么？拉凯斯是打过仗的人，回答得很干脆：勇敢就是坚守阵地、不逃跑。苏格拉底说：可有些军队是边撤边打、诱敌之后再回头取胜的，他们不勇敢吗？拉凯斯承认那也算勇敢。于是第一个定义太窄了。拉凯斯改口：勇敢是灵魂的一种坚持。苏格拉底又问：要是一个人坚持做一件愚蠢的事呢，那也值得称赞吗？拉凯斯说不值得。那么勇敢就不是任何坚持，而是有见识的坚持？可一个懂水性的人跳下水，和一个不懂水性的人跳下水，我们反倒觉得后者更勇敢……说来说去，拉凯斯被绕住了，承认自己说不出勇敢是什么，虽然他明明在战场上见过、做过勇敢的事。

这台机器的运转方式大致是：先请对方给出一个定义；再找一个对方自己也承认的例子，这个例子不合定义；对方修改定义，再找下一个例子；直到对方发现，自己的几个说法彼此打架。它推进的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串差异：用这个词的人，与说得出这个词是什么的人，之间到底差着多远。

这就是全书所说的"差异序列"在第一轮里的样子：不是一步步的流程，而是一次次试探、偏离、修正，把隐藏的裂缝一点点撬开。

被问的人怎么感受？柏拉图《美诺篇》里，美诺抱怨说，苏格拉底像海里的电鳐，谁碰到他就浑身发麻，说不出话来。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则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叮着雅典这匹高大却迟钝的马，让它不得安睡。到了《泰阿泰德篇》，他又说自己像母亲那样做助产士：自己生不出智慧，只是帮别人把心里怀着的想法接生出来，再检查是真孩子还是一阵风。电鳐、牛虻、助产士，三个比方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台机器不往外给东西，它只让人发麻、发痒、发现自己肚子里装的是什么。

◆ 只到"可识别"：一种没有落点的显露

那么，这台机器到底产出了什么？如果去读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它们大多没有结论。《拉凯斯篇》不知道勇敢是什么，《游叙弗伦篇》不知道虔敬是什么，《卡尔米德篇》不知道节制是什么。大家散场时，往往比来时更糊涂。这种结局，希腊人叫作"无路可走"（aporia）。

可是"没有结论"不等于"什么也没发生"。一件东西从混沌里站出来，本书用"三个可"来检查：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苏格拉底的追问做到了第一个：它让一样从前没人看见的东西被看见了——原来我们天天用的词底下，是空的；原来"会用"和"知道"是两回事；原来对一个词，可以要求一个不靠举例的答案。从此以后，"X 是什么"成了一个可以被认出来的问题。

但后两个"可"，他没有做到，也似乎不打算做到。答案没有被留住：每次对话结束，留下的只是一个更清楚的"不知道"。答案也没有被说出来、写下来：苏格拉底一生没有写过一本书。为什么不写，我们只能听别人替他说，最有名的是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借他之口对文字的批评（第6章再详谈）。我们能确定的只有结果：他留下的不是一套学说，而是一种问法和一个死。

大白话说，这像是一位老师傅把一个学徒问醒了：学徒终于意识到"我其实不懂火候"。这种醒悟是真的，也很要紧，没有它，学徒一辈子只会照着做。可醒了之后呢？老师傅既不给菜谱，也不写心得，学徒第二天还得上灶。一个被唤醒、却没有落脚处的问题，就这样被留在了后厨里。

本书把这种状态称为"弱显露"：它站出来了，但还站不稳。这不是贬低。很多真正的新东西，第一次出现时都是这样——先被看见，很久以后才留得住、说得清。

◆ 他真的什么也不主张吗

说苏格拉底"只问不答"，会招来一个很有力的反驳。翻开柏拉图的早期对话，苏格拉底其实说过不少斩钉截铁的话。《申辩篇》里，他劝雅典人不要只操心钱财和名声，要操心自己的灵魂，让它尽可能好。《克力同篇》里，他说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以不义回报不义。《高尔吉亚篇》里，他坚持行不义比受不义更坏。还有那个后人常归在他名下的论题：没有人明知是恶还故意去做，作恶出于无知。一个说了这么多主张的人，凭什么叫"只问不答"？更何况，《理想国》第一卷里的色拉叙马霍斯当面指责过他，说他又在玩惯用的"装傻"，明明有自己的看法，偏要藏起来只问别人。这种后人称为"苏格拉底式反讽"的姿态，到底是真谦虚还是一种策略，研究者至今争论不休。

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必须接住。但细看这些主张，会发现它们和"勇敢是什么""虔敬是什么"不是同一类东西。它们是关于怎样活、怎样对待追问的信念，而不是对"X 是什么"的回答。更要紧的是，它们恰恰是那台追问机器的燃料：如果作恶出于无知，那么弄清"善是什么"就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如果灵魂的好坏比钱财要紧，那么在街头一个个检验人的见识，就不是闲事，而是天下第一要紧的事。主张越坚定，追问就越停不下来。至于这些主张里有多少属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多少是柏拉图放进他嘴里的，那是"苏格拉底问题"的一部分，第8章再详谈。

大白话说，一位老派的体检医生，从不轻易给你下诊断，你问他"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他总说"还要再查"。可他也有几条死守的规矩：没查清楚不许乱吃药，查出来的结果不许瞒病人。你不能因为他守着这几条规矩，就说他其实早就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他坚信的是"怎样查"，不是"查出了什么"。苏格拉底的坚定与他的"不知道"，就是这样并存的。所以本书说他"给答案最少"，指的是他没有给那些被追问的词一个能落脚的定义，不是说他是一个没有信念、只会拆台的人。

◆ 不是只会动嘴的人

讲到这里，容易把苏格拉底想成一个整天在街上抬杠的闲人。各种记载里的他，却不是这样。他当过兵，而且不止一次上战场。柏拉图《会饮篇》里，醉醺醺的亚西比德当众讲起旧事：在波提狄亚的军营里，冬天冷得滴水成冰，别人裹得严严实实不敢出门，苏格拉底照旧穿着平常的衣服、光着脚在冰上走；亚西比德受伤倒地，是苏格拉底护住了他和他的武器。《拉凯斯篇》里，将军拉凯斯也说，在代立昂那场败仗的撤退中，如果人人都像苏格拉底那样镇定，雅典就不会输得那么惨。这些都是柏拉图笔下人物的说法，有赞美的成分，但色诺芬的记述里也有类似的形象：一个能吃苦、不怕死、不贪钱的人。

他也在城邦的关键时刻顶过两次。据《申辩篇》，前 406 年阿吉纽西海战之后，雅典人要把几位没能救起落水士兵的将军一并审判、一并定罪，这不合当时的法律程序；那天恰好轮到苏格拉底所在的部族主持议事，他是唯一公开反对的人，任凭众人喊叫。两年后，三十僭主掌权，派他和另外四个人去萨拉米斯抓一个叫勒翁的人回来处死；另外四人去了，他转身回了家。他说，要不是僭主政权很快倒台，他大概那时就已经死了。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很有意思：他一次顶撞了民主派的多数，一次顶撞了寡头派的权力。他不属于任何一边。他的追问不是哪一派的武器，它对谁都一样刺人。

还有一点：他不收钱。智者开课收费，他在街头和任何人谈，富人穷人、本地人外邦人都可以，从不收学费。他在《申辩篇》里拿自己的贫穷作证，说这足以证明他不是在做买卖。

大白话说，单位里有两种爱提意见的人。一种是嘴上厉害、事到临头躲得远远的；另一种是平时问得人下不来台，可真到出事那天，他是第一个站出来、也是最后一个走的。人们对前一种只是厌烦，对后一种却又敬又怕：敬他的骨头，怕他的问题。苏格拉底在雅典人眼里，大概就是后一种。

这一点对理解他的问法很要紧。他追问"勇敢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不懂勇敢，恰恰是因为他在战场上见过、做过，才知道那几个现成的说法接不住真实的勇敢。会做和说得清之间的那道缝，他是从自己身上看见的。

◆ 第一轮循环：矛盾怎样逼出一个"不知道"

把上面的事放回全书的框架，第一轮循环的三步就清楚了。第一步，推进与土壤之间的矛盾。土壤这一侧，是上一章讲的那块地：雅典人对美德词语沉得极厚的熟练使用，民主法庭和公民大会把这些词当武器，智者让词语摇晃，战争把词语用坏。推进这一侧，是苏格拉底的诘问：一次次把熟练的使用拉到"你说得出它是什么吗"的面前。一边要稳，一边非要问到底；土壤越厚，问出来的空洞越大，张力越大。

第二步，矛盾逼出显露的改变。张力没有逼出一套新学说，而是逼出了一个新的显露："不知道"本身被看见了，"定义"作为一种要求被看见了。这是第一轮的结算点。要注意，它不是苏格拉底事先想好、然后推销出去的东西，它是在一场场对话里被逼出来的。苏格拉底自己说他去找人谈话，是为了弄懂神谕；问着问着，"无知之知"才浮出来。显露是矛盾的结果，不是谁预先放好的起点。

第三步，回写。新的显露反过来改写了推进与土壤。这一步，第一轮走得最惨烈，下面两节分开讲：城邦这一侧的回写是负向的，追随者这一侧的回写则要隔一代人才显形。

这里要提醒一句：把苏格拉底读成一轮"矛盾—显露—回写"，是本书的解读。我们不说苏格拉底就是"差异"这个维度的化身——他的推进离不开雅典的土壤，他的显露也有自己的样子。三个维度在他身上一个不缺，只是这一轮里，显露最弱、推进最强。

◆ 为什么偏偏是这一轮显露最弱

"显露最弱、推进最强"这句话，不能只当结论宣布，得放回本书的三层工具里走一遍，看它到底说了什么。先看三大方程。显露、差异序列、土壤是同时互相生成的，所以"显露弱"不是孤立的一件事，它会立刻牵动另外两样。推进这一侧：因为每一场对话结束时什么都没有被留住，下一场对话只能从头开始，在拉凯斯那里问出来的东西，到了游叙弗伦那里用不上。苏格拉底的追问于是有了一种奇特的样子：它极其锋利，却不累积，像一把天天重新开刃、却从没砍倒过一棵树的斧子。土壤这一侧：一个只留下"不知道"的东西，雅典人没法把它安放进任何现成的格子，只好把它塞进手边最近的那一格——智者、研究天象的人、败坏青年的人。弱的显露、不累积的推进、只会归类的土壤，三样是一起长成这个样子的，分不出哪一样先来。

再看起手次序。如果按教科书的习惯，先问"苏格拉底的学说是什么"，我们几乎拿不出东西；接下来最顺手的做法，就是拿柏拉图的学说去填，把苏格拉底讲成柏拉图的序幕。本书从问法起手，先看他怎样推进，第一轮的分量才显出来：他的全部力量都在步子上，不在落脚点上。起手次序选错了，这个人就会被看小，而且看小了还不自知。

最后看123原理。正因为显露弱，这一轮的回写才走了一条极端的路：城邦接不住一个空着手的新东西，就用最粗暴的方式把它排出去；追随者也接不住，就各自往里填自己的东西。显露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回写会长成什么样子。三层合起来看，"最弱"不是给苏格拉底打的一个分数，而是一个解释：它说明了他的追问为什么那样刺人，城邦为什么那样反应，他死后又为什么会裂出一群彼此差得很远的学生。

大白话说，评价一位只在课堂上提问、从不出书的语文老师，如果去翻他的著作目录，一行也找不到；如果去听他怎样提问，再去看他教过的学生后来各自

写出了什么，这个人的分量才一点点浮出来。看错了地方，就会以为他什么也没做。

◆ 五百人的法庭

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大约七十岁，被三个人告上法庭：诗人墨勒图斯、政治人物安尼图斯、演说家吕孔。罪名有两条：不承认城邦供奉的神，引入新的神灵；败坏青年。"新的神灵"指的大概是苏格拉底常说的那个"灵异"，一个在他要做错事时出声阻止他的内在声音。

陪审团约有五百人。按《申辩篇》的记述，苏格拉底没有求情，没有带着哭哭啼啼的家人上庭，而是照旧盘问原告墨勒图斯，把他问得前后矛盾；又讲起德尔斐神谕，讲自己怎样四处检验别人的智慧；还提醒陪审员，他们心里早已有一个旧印象，来自多年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第4章已谈）。第一轮投票，他以不大的差距被判有罪；照他在《申辩篇》里的说法，只要有三十票倒过来，他就会被开释。

按雅典的程序，定罪后原告提出刑罚，被告可以提出替代刑罚，由陪审团二选一。原告要求死刑。苏格拉底先说，按他对城邦的贡献，应当被安排在市政厅终身享用公餐，就像奥运冠军那样；后来在朋友劝说下，才提出交一笔罚金。第二轮投票，判死刑的票比定罪时还多。

大白话说，这就像一个被告到单位纪委的员工，在会上不认错，反而说："按我的贡献，单位应该给我发奖。"在场的人原本可能只想给他个处分，听到这话，处分就变成了开除。这种态度是骄傲，是讽刺，还是一种宁死不肯把自己的问法收回的坚持？后人争了两千多年，各有道理。

◆ 不逃

死刑没有立刻执行，因为那段时间雅典有一艘船去提洛岛进行宗教出使，按规矩船回来之前不得处决。苏格拉底在狱中等了大约一个月。

柏拉图的《克力同篇》写到，富有的朋友克力同买通了看守，安排好了逃亡，求他走。苏格拉底不走。他假想雅典的法律站在面前和他说话：你在这座城里住了七十年，受它的养育，享它的庇护，从未离开；你若觉得它不公，本可以劝它，或早早离开；如今判决对你不利，你就偷偷逃走，这等于用行动去毁坏法律。他决定留下。

《斐多篇》写他临终的一天：与朋友们谈灵魂不朽，然后喝下毒药，平静地躺下。据记载，他最后一句话是提醒克力同，他们还欠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别忘了还。这句话该怎样理解，后人也争论不休。

这些场景出自柏拉图的手笔，有多少是记录、有多少是塑造，无从细辨。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争议：他本可以逃，他没有逃。他的问法到最后也没有收回，连同他的命一起留在了雅典。

这里有一处常被拿来追问的张力。同样在《申辩篇》里，苏格拉底说过，假如陪审团开出条件，只要他从此不再在街头追问就放了他，他也不会接受，他宁可服从神，也不服从雅典人。可到了《克力同篇》，他又说，判决不利就逃走，等于用行动去毁坏法律。一个宁可违抗城邦也不肯闭嘴的人，为什么又宁死不肯违抗城邦的判决？研究者对此有不少解释，其中比较站得住的一种是：他拒绝的是"停止追问"，接受的是"为追问付出代价"。叫他闭嘴，是要他收回那种问法；判他死刑，只是要他的命。前一样他不给，后一样他给了。大白话说，一位老会计被老板要求做假账，他当面拒绝："这个字我不签。"老板把他开除了，他也不去偷偷删公司的数据泄愤，收拾东西就走。拒绝做假账和接受被开除，看起来一个硬、一个软，其实是同一根骨头：他守的是账本上那条线，不是自己的饭碗。

从回写的角度看，"不逃"还有一层后果。假如他逃去了别的城邦，"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会发生，留给学生们的只是一个流亡老人的晚年，一段可以轻轻带过的尾声；正因为他留下来喝了毒药，城邦那次负向回写才落成一个有头有尾、

可以被一遍遍讲述的事件。这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一个一生不肯写字的人，用"不逃"把自己的结局交到了后来者的笔下。

◆ 给答案最少的人，为什么被处死

现在回到本章的标题。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对照是：希腊三哲之中，被城邦处死的，恰恰是给答案最少的那一个。柏拉图给出了理念，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整套关于自然、逻辑、伦理、政治的学说，他们都活到了晚年，都办了学校。亚里士多德晚年也遭到不敬神的指控，但他选择了离开（第7章再详谈）。只有那个一个答案也不给的人，死在了自己的城里。

本书对此的解读是：苏格拉底只撬动土壤，却不提供替代的东西。一个新学说再离经叛道，至少给了人一个可以接住的东西：你可以反对它，可以把它归类，可以把它装进一座学校，让它在机构里慢慢变成土壤的一部分。而苏格拉底的追问什么也不留，它只把人们脚下的地一块块敲空。城邦没有办法吸收这样一股推进，只能把它排出去。

大白话说，单位里有人提出一套新方案，哪怕方案很激进，领导也知道怎么办：开会讨论，试点，否决，或者采纳。可要是有人什么方案都不提，只是在每次会上问"我们说的'以客户为中心'到底是什么意思"，问到所有人都下不了台——这样的人，最后往往不是被采纳或否决，而是被"请走"。

但这个解读必须加上一道限定，否则就成了把一桩复杂的命案讲成一个漂亮的寓言。不少研究者认为，这场审判还有政治的一面：苏格拉底与"三十僭主"中最凶残的克里底亚有过来往，与那位叛逃斯巴达、给雅典带来大祸的亚西比德也关系密切，在恢复民主不久的雅典，这样的交往很难不让人记恨。而前 403 年的大赦规定不得追究此前的政治旧账，于是政治上的怨气，可能只好借"不虔敬""败坏青年"这类罪名来发泄。

这一面并不全是后人的猜测。苏格拉底死后没几年，一位叫波吕克拉特斯的修辞家写过一篇《控告苏格拉底》，原文已经失传；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里逐条反驳过一位"控告者"的说法，学者多认为针对的就是这类文字，其中一条正是：克里底亚和亚西比德跟苏格拉底交往之后，给城邦带来了最大的祸害。又过了约半个世纪，演说家埃斯基涅斯在一篇法庭演说里对雅典陪审员说，你们处死了"智者苏格拉底"，因为他被认为教出了克里底亚。这句话里有两处值得留意：一是政治这本账，在雅典人心里确实一直记着；二是半个世纪之后，他们仍然顺口把他叫作"智者"——第4章说的那种归类，始终没有撤销。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苏格拉底的死，是政治怨恨与他那种问法共同造成的。本书强调后者，不是要否认前者，而是因为前者解释了为什么偏偏在前 399 年，后者解释了为什么偏偏是他这样的人，在任何一座熟练使用美德之词的城里，都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 回写：一次负向，一次远向

第一轮循环的第三步——回写——在苏格拉底身上分成了两股。一股是城邦对他的回写，方向是负的。新的显露没有被土壤接住，反而激起了排斥：嘲笑，起诉，判决，毒药。回写并不总是"好事"，它只是新的东西反过来改动了旧的格局；在这一轮里，被改动的首先是苏格拉底自己的生命。

另一股，要隔一段时间才看得见。苏格拉底死后的几十年里，他身边的年轻人纷纷开始写作，写的都是"苏格拉底和某某的对话"。写这类对话的不止柏拉图和色诺芬，还有好几位今天只剩残篇的作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甚至把"苏格拉底对话"当作一种已有的文体来提。他的追随者还各自开出了路数大不相同的门派。一个一字不写的人，死后竟然生出了一种文体、几个学派。

这几个学派彼此差得很远，远到让人怀疑它们是不是出自同一位老师。安提斯泰尼抓住苏格拉底的清贫和不在乎世俗评价，往下走出了后来以第欧根尼闻名

的犬儒一路：住在桶里，当街嘲笑权贵。亚里斯提卜抓住苏格拉底的从容自在，却得出了快乐就是善的结论，开出昔兰尼一派。欧几里德（不是那位写《几何原本》的数学家）抓住苏格拉底对"善是什么"的追问，把它和巴门尼德"存在是一"的思想接在一起，在麦加拉开了一派，以擅长论辩著称。同一个人，被一个学生看成苦行者，被另一个看成享乐者，被第三个看成逻辑家。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第一轮显露的性质：正因为苏格拉底没有把答案留住、说清，他留下的东西才能被拉向如此不同的方向。一个写死了的答案只能被接受或拒绝；一个悬着的问法，却可以被每个人按自己脚下的土壤去接。这也是第8章要细谈的"学生生成老师"最早的样子。

这就是回写的另一面：他的死改写了追随者们的推进方式，让"追问"从街头的口头盘问，变成了可以写下来、读下去、传下去的东西；它也改写了追随者们脚下的土壤，"苏格拉底之死"从此成为他们共同的伤口和起点。

日常里，这像一位从不写书的老师傅去世后，徒弟们各自开店，各自写回忆录，每一本都说"师父当年是这样讲的"。书与书之间对不上，店与店的口味也不同，但每一家都挂着他的名字。他生前最不肯做的事——把手艺写成菜谱——在他死后被徒弟们争先恐后地做了。

◆ 留下的残局

苏格拉底留下的，于是是一个残局：一种被唤醒的问法，一个没有落脚处的答案，一个死去的老师，和一群必须把日子过下去的学生。

问题已经被看见了："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不再能被熟练的使用糊弄过去。可答案在哪里？在街头一场场的对话里，它始终悬着。如果正义只是陪审团当天的多数票，那么这位追问正义的人就死得毫无道理；如果正义不止于此，它又该住在哪里？雅典的街上找不到它，任何一个具体的勇敢行为、正义判决，都只能拿来当例子，而苏格拉底恰恰教会了他们：例子不是答案。

那个二十八九岁、眼看着老师死去的学生，接下来要做一件老师从未做过的事：给答案找一个住处，哪怕这个住处不在人间。下一章，我们看柏拉图怎样把答案搬到彼岸。

带走的话

只撬动土壤而不提供替代的推进，最难被吸收，也最容易被排出去。

本章判错句

如果能证明这场审判纯是政治清算，与他的问法毫不相干，本章"给答案最少的人被处死"的读法就要撤回。

想一想

你有没有被一个问题问得下不来台，事后却觉得那个问题问对了？

你更容易接受一个激进的方案，还是一个只提问题、不给方案的人？

◆

06

第 6 章

柏拉图：把答案搬到彼岸

这一章的问题

最想留住老师的学生，为什么把老师写成了另一个人，还把答案搬去了彼岸？

◆ 一个反常：最想留住老师的人，把老师写成了别人

先看一个怪现象。苏格拉底死后，他最出名的学生柏拉图写了二十多篇对话，几乎篇篇以老师为主角，自己却从不开口。在记录老师临终那一天的《斐多篇》里，讲述者点名在场的朋友，提到柏拉图时只有一句淡淡的话：柏拉图，我想，是病了。写书的人把自己从最要紧的那间屋子里删掉了。

一个人如此敬重老师，按常理应当守住老师的样子：老师只问不答，学生就该继续只问不答。可柏拉图做的恰恰相反。他借老师的嘴，说出了老师生前很可能从未说过的东西：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不生不灭的领域，那里住着"美本身""正义本身""相等本身"。苏格拉底在街头追问"什么是勇敢"，问到最后总是悬着；到了柏拉图笔下，答案有了地址，只不过这个地址不在雅典，也不在人间任何一条街上。亚里士多德后来在《形而上学》M 卷第 4 章里说得很直接：苏格拉底寻求普遍定义，但没有让普遍者分离存在，让它们分离的是后来的人。这条转述本身也大有文章，留到第 8 章再详谈。

日常里不难找到类似的事。一家小馆子的老师傅一辈子凭手感炒菜，从不写菜谱；他走后，最忠心的徒弟连夜把"标准做法"写成一张大纸贴在墙上，开头还写着"师父说"。墙上的话，有多少是师父说过的，有多少是徒弟受不了"说不

出"而替师父补上的，谁也分不清。我们在导论里说过，第二轮的柏拉图就是那个贴菜谱的徒弟。这一章要回答的是：他为什么非贴不可，贴上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以及他自己后来怎样对着这张菜谱皱起眉头。

我们沿用全书的读法：先跟着他接过来的问法走，看那个问法在哪里卡住；再看卡住之处逼出了什么新的东西；最后追这个新东西反过来改变了什么。用本书的话说，这是第二轮"矛盾—显露—回写"的循环。这里先交代一句：下面把柏拉图读成第二轮循环，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史料是那些对话、那座学园和后人的记载。

◆ 落不了地的追问：第二轮的矛盾从哪里来

苏格拉底留下的不是一套学说，而是一种问法：X 是什么？不要举例子，要那个让所有例子成为例子的东西。柏拉图接过的就是这个问法，而且接得很认真。问题在于，这种问法一旦放回日常世界，就处处落空。

《理想国》第五卷里有一个尖锐的观察：许许多多美的东西，没有哪一个不会在某个方面显得丑；许许多多正义的行为，没有哪一个不会在某种处境下显得不义。《斐多篇》讲得更具体：两根木棍、两块石头，对这个人看来相等，对那个人看来却不相等。感官碰到的一切，都同时带着"是"和"不是"。你指着一朵花说"这就是美"，下一秒它就谢了；你指着一次还债说"这就是正义"，可若是把刀还给一个已经发疯的朋友，还债就成了帮凶。《理想国》第一卷正是从这个例子开始拆"正义就是欠债还钱"的。

换成厨房的话，这就像你问"什么是恰到好处的咸"，然后去尝各家的菜。同一碗汤，干了一天活的人喝着刚好，刚起床的人喝着发齁；夏天刚好，冬天就淡。你每指一碗，都有人摇头。"咸得刚好"仿佛无处不在，又仿佛哪一碗都不是它本人。这就是第二轮的差异序列，也就是一步步推进、比较、试探、修正的那

条追问链：它不断在具体事物里试，又不断落空。追问本身没有停，可它在流动的感性世界里找不到一块能站住的地。

光有这条落空的追问链还不够，它还得撞上一片特定的土壤。本书说的"土壤"，是指许多因素缠在一起、共同托着一个人思考的那张网，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柏拉图的这张网里，至少缠着三股线。

第一股是老师的死。公元前 399 年，雅典民主法庭判苏格拉底死刑，第 5 章已经讲过来龙去脉。对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来说，这件事的分量不在于悲伤，而在于它把一个问题钉死在他面前：一个城邦可以凭多数票、凭熟练的修辞，判一个追问正义的人有罪，那么"正义"难道只是多数人当天的意见？如果正义没有一个比投票更硬的落脚点，那苏格拉底就白死了。署名柏拉图的《第七封信》讲到，他年轻时本想从政，先对三十僭主失望，又目睹恢复后的民主派处死了苏格拉底，于是对现实政治心灰意冷。这封信真伪有争议，只能当作一种可能的心路，不能当铁证；但即便把它拿掉，老师之死与柏拉图此后几十年的写作之间的牵连，在对话本身里也随处可见。

第二股是问题的悬置。苏格拉底的诘问多半止于无解，大家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更糊涂。对老师而言，这种糊涂是诚实；对学生而言，它是一个必须收拾的残局。就像师父留下一句"火候你们自己慢慢悟"，徒弟们却要开门做生意，总得有个东西能教、能考、能传。

第三股是前人留下的两种相反的答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A 卷第 6 章说，柏拉图年轻时就熟悉克拉底鲁和赫拉克利特一派的说法：一切感性事物都在流变，关于它们不可能有真知。另一边是巴门尼德：真正"是"的东西不生不灭、不动不变，知识的对象必须是这样的东西。第 4 章讲过这两家的分裂。柏拉图把两头都吃了进去：他同意赫拉克利特，眼前的世界确实在流；他也同意巴门

尼德，真知必须抓住不变的东西。两句话一并承认，就推出一个结论：真知的对象不在眼前这个世界里。

于是矛盾成形了：一边是停不下来的定义追问，一边是"感性世界在流、知识对象须不变"这片土壤，再加上老师用性命押上的那个问题不容许悬着。这三者顶在一起，旧的落脚点，也就是苏格拉底那种"悬着也行"的状态，站不住了。逼出来的是一次搬家。

◆ 墙上的标准菜谱：理念为什么要分离

柏拉图的回答是：美的东西会凋谢，可"美本身"不会；相等的木棍会看走眼，可"相等本身"不会。那些"本身"，他称为 eidos 或 idea，中文通译"理念"或"相"。这个希腊词的原义跟"看"有关，指一样东西被看到的样子、模样。柏拉图把它推到极致：真正的"样子"不在任何一件东西上，而是自成一类，独立存在。具体事物之所以美、之所以相等，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理念，或者说"模仿"了理念；它们像得多一些、少一些，但永远不是理念本身。

《理想国》第十卷有个好懂的例子：床。世上有三种床。一种是木匠做出来的那张，一种是画家画出来的那张，还有一种是"床本身"，木匠做床时心里看着的那个样子。木匠的床模仿床本身，画家的床又模仿木匠的床，离真实隔了两层。把它挪进厨房，就是三样东西：墙上的标准菜谱，灶上炒出来的那盘菜，菜单上那张修过图的菜品照片。食客照着照片点菜，厨师照着菜谱炒菜，而在柏拉图看来，只有那张菜谱是"真"的那一样，盘子里的菜只是对它的一次近似，照片更是近似的近似。

这就是"分离"的意思：答案被从具体事物里取出来，单独安放。今天的人对这种安排其实不陌生。售楼处的样板间，家具摆得恰到好处、窗明几净，却没有一个人在里面过日子；买房的人回到毛坯房里，心里比照的是那间没人住的屋

子。再如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千克"到底有多重，是以保存在巴黎附近的一块金属圆柱为准的，全世界的秤，归根到底都要拿去和它的复制品比。这块圆柱不是用来称菜的，它待在恒温的罩子里，不参与任何一笔买卖，却决定了每一笔买卖里"一千克"是什么意思。柏拉图的理念，就是这样一类"不参与，却决定"的东西。

用 SDE 的话说，这是一次新的显露。"显露"指某样东西从混沌中站出来、能被人认出、能留得住、能说出来，本书一直用"三个可"来检查：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第 5 章说过，苏格拉底的追问只走到"可识别"：人们开始意识到"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勇敢"，但答案既没有被留住，也没有被说出来，他本人拒绝著述。柏拉图这一步把三个"可"一次补齐了：理念可以被识别，因为它就是追问要找的那个"本身"；它可以被维持，因为它不生不灭，不会像花一样谢掉；它可以被表达，因为柏拉图把它写成了对话，写成了比喻，后来还建了一座学校专门教它。

这一步的代价，也就藏在它的好处里。答案之所以能稳稳住下来，正是因为它被搬出了这个会变、会坏、会出错的世界。这一点下面还要细说。这里先记住一个对照：苏格拉底的问题在人间落不了地，柏拉图不是让它落地，而是给它另找了一块地，一块不在人间的地。

◆ "以实物为准"倒过来写：分离到底分了多远

这里得先面对一个有分量的反对意见。有学者提醒，"柏拉图把理念分离出去"这个说法，相当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的措辞，柏拉图自己在对话里往往说得更含糊。《斐多篇》里，苏格拉底讲美的东西为什么美，只说是因为"美本身"在它那里出现，或者与它相通，至于究竟以什么方式，他明说不坚持。照这个读法，理念也许并没有被搬到另一处，只是被说成比具体事物更根本；所谓"两个

世界"，是后人把柏拉图的话说死了。亚里士多德的转述怎样定了柏拉图的形，第 8 章专门讲。

这个反对意见至少提醒我们，"彼岸"是本书的比方，不是柏拉图画出的一张地图。可是回到对话本身，答案的地址确实离开了具体事物。《会饮篇》里，第俄提玛教苏格拉底一级一级往上爱：从一个美的身体，到所有美的身体，到美的灵魂、美的制度、美的知识，最后看见"美本身"，它不显现为一张脸、一双手，也不在任何一篇言辞、任何一种知识里，而是自身与自身同在。至于分离之后怎样"出现"、怎样"相通"，柏拉图确实没说清，可没说清的是桥，不是地址。他的含糊落在"怎样连上"，而不在"住在哪里"。

网购的人都熟悉一句话："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柏拉图做的事，正好是把这句话倒过来写：实物仅供参考，以理念为准。手里这件衣服起球了、缩水了，那是实物的事；衣服"应当"是什么样，要回到那张不会起球的图上去找。商家从不交代图和实物之间隔着哪些工序，柏拉图也没交代"分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座没修好的桥，后面《巴门尼德篇》会由他自己来追问。所以本书说"搬到彼岸"，要连同这份含糊一起说：它是对答案地址变化的概括，不是替柏拉图宣布一套整整齐齐的两界宇宙论。

◆ 洞穴、线段与回忆：怎样从影子爬到原件

答案搬到彼岸以后，马上有一个麻烦：人怎么过去？我们活在会变的世界里，用会出错的眼睛，凭什么能认识那个不变的东西？柏拉图为此搭了几座梯子，最出名的是洞穴、线段和回忆。

《理想国》第七卷的洞穴比喻大家多少听过。一群人从小被锁在洞底，只能看前方的石壁；身后有一堆火，火和人之间有人举着各种器物走过，石壁上便映出影子。囚徒一辈子看影子，以为影子就是真实。有一个人被解开，转过身，先

被火光刺得睁不开眼，再被拖出洞口，看到阳光下的真东西，最后看到太阳本身。他若回到洞里想把同伴带出来，眼睛一时适应不了黑暗，反被同伴嘲笑，甚至可能被杀。读到这里很难不想到苏格拉底。

把洞穴挪到今天，也许是这样的：一个人每天刷十几个小时短视频，他对"好菜"的全部认识，来自屏幕上滋滋作响的特写、慢镜头和夸张的配乐。有一天他真进了后厨，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油烟呛人，切配杂乱，锅里的东西看着远没有视频里诱人。他要很久才明白，视频是对菜的再加工，菜本身另有一套道理。等他回去跟朋友说"你们看的都是剪出来的"，大家只会嫌他扫兴。

紧挨着洞穴之前，第六卷还有一个线段比喻：把一条线分成不等的两段，再把每段按同样比例分开，一共四段，从下到上对应四种认识状态，最下面是对影像的猜测，往上是对实物的相信，再往上是数学式的推理，最顶端是对理念本身的把握。它和洞穴说的是同一件事：认识有层级，人可以一级一级往上走，而最高一级不靠眼睛，靠理性。

可是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难题，《美诺篇》把它摆在了桌面上：你要找一样东西，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么找到了你也认不出来；如果你已经知道，又何必去找？这就像让一个从没见过钥匙的人去找你丢的钥匙，他翻到了也只当是一块铁片。柏拉图的回答是回忆说：灵魂在出生之前已经见过理念，学习不过是想起来。《美诺篇》里，苏格拉底不教任何几何结论，只靠一连串提问，让一个从未学过几何的童仆一步步找到把正方形面积加倍的办法。按照柏拉图的解释，童仆不是学到了新东西，而是想起了他本来就知道的东西。

回忆说听起来玄，日常里却有它的影子。一个熟人的名字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别人报出三个名字，你一听到对的那个，立刻说"对，就是他"。你能认出来，说明它其实一直在你那里，只是被盖住了。柏拉图把这种"一听就认得"的体验，推成了一整套关于知识来源的说法。它是不是对的，是另一回事；它解决的

是一个真实的麻烦：如果答案住在彼岸，人必须事先就和彼岸有某种牵连，否则连找都无从找起。

几座梯子的顶端，是辩证法。苏格拉底在街头的诘问，到了柏拉图这里被升级成一门有阶梯、有课程的学问：先学算术、几何、天文这些训练理智的科目，再进到不借任何图像、纯粹从一个理念推向另一个理念的辩证法，最后看到"善本身"，那个照亮一切理念的太阳。街头一来一回的盘问，变成了一条从洞底一直通到太阳的长路。

◆ 从街头到学园：追问换了住处

一个新的答案如果只停在纸上，还算不上一轮循环跑完。本书讲的"回写"，是新显露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动了原先的追问方式和原先的土壤，让下一轮从一个不同的起点开始。回写不能靠宣布，得拿史料去看。柏拉图这一轮，至少有三处回写看得见。

第一处是学园。约公元前 387 年，柏拉图在雅典城外一处纪念英雄阿卡德摩斯的园林里开始教学，后人称之为学园（Academy）。苏格拉底的追问是在市场、在体育场、在朋友家里，碰上谁就问谁；柏拉图把追问搬进了一个有固定场所、有师生关系、能代代延续的机构。这件事的分量很容易被低估。好比夜市里一个摊主凭手艺出名，摊主一走，手艺也就散了；可如果他的徒弟开了一家店，订了培训规矩，招学徒、带学徒，手艺就有了自己的身体。学园在柏拉图死后又延续了很久，第 7 章要讲的亚里士多德就在这里待了二十年。关于学园门口刻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那是晚出的传说，不能当史料用，不过它很能说明后人心目中这所学校是什么样子。

第二处是写作本身，而这里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拧巴。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口讲了一个埃及故事：文字的发明者向国王献上文字，说它

能增进记忆；国王却说，文字只会让人不再用心记，它给人的是提醒，不是记忆，而且写下来的话无法替自己辩护，谁问它，它都只会重复同一句。批评文字最狠的段落，偏偏是用文字写下的。柏拉图找到的折中，是写对话而不写论文。对话里有人问、有人答、有人反驳，结论常常不了了之，读者被迫跟着一起想。这就像一个不愿写死菜谱的师傅，最后写了一本"师徒对答录"：问的是徒弟真会问的问题，答的是师傅在不同场合给过的不同回答，彼此还不完全一致。这样的书能传，又不至于把手艺压成一张死表格。

第三处，也是最关键的一处，是对老师的改写。苏格拉底一字未写，柏拉图却让他在一篇又一篇对话里开口，讲理念、讲回忆、讲灵魂不朽、讲理想城邦。后世读者心目中的苏格拉底，有很大一部分是柏拉图写出来的苏格拉底。这正是本书说的"反向师承"最早、最清楚的一个现场：不是老师造就学生，而是学生在写作中生成了老师的形象。色诺芬、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笔下的并不一样，这个"苏格拉底问题"第 8 章再详谈。在这里只需看到：柏拉图的回写不只改动了未来，也改动了过去。

◆ 一轮之内三样同时在动：电鳐的麻怎样变了意思

矛盾、搬家、回写三拍都摆出来了。可三拍排成一行，很容易让人以为先有追问、再有理念、最后才有学园，像流水线上的三道工序。本书说的三大方程，就是要把这种排队打散：显露、差异序列、土壤三样同时互相生成，写成 S=F(D,E)、D=G(S,E)、E=H(S,D)，其中 F、G、H 只是"由……生成"的记号，不能拿来算。柏拉图这一轮里，最能看清这种"同时"的，是第 5 章提过的那条电鳐。

《美诺篇》里，美诺抱怨被苏格拉底问得浑身发麻。同一篇对话后半，苏格拉底把童仆也问到说不出话，随即回头对美诺说：这孩子现在比刚才强，刚才他

以为自己知道，现在知道自己不知道，倒愿意去找了。同样是发麻，在苏格拉底的街头，它是追问的终点；放进回忆说里，它成了想起来之前必经的一步。新显露的学说没有等追问结束才登场，它当场改变了追问本身的意思：无解不再是失败，而是上升的台阶。这是显露在生成差异序列。反过来，回忆说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又是因为那条追问链一再落空、一再需要解释"人凭什么能找"；学园这片土壤，也是在"发麻有用"这种新理解里才有了存在的理由：既然无解是台阶，就值得为它设一个让人长年被问、长年发麻的地方。三样互为条件，拆不出谁先谁后。

健身的人有类似的体会。第一次练完腿，第二天下楼梯腿软，若没人告诉你这是什么，你会以为练坏了，从此不去；教练一句"酸痛说明练到了，肌肉在长"，同样的痛就成了进步的记号，你开始盼着它，训练计划跟着改，健身房里慢慢形成一股把酸痛当勋章的风气。说法、练法、风气，是一起长出来的。

123原理则把这团同时互生拉开成一个回合，让我们看清它在历史上怎样走了一圈：落空的追问撞上老师之死与巴门尼德的土壤，逼出理念的搬家，搬家又回写成学园和对话体。而我们从那条落空的追问起手，不从"理念论是什么"起手，是六路径里的一个选择。教科书多走 S→D→E，先把理念论摆出来，看到的是一位体系的建造者；本书走 D→S→E，先看追问在哪里卡住，看到的是一个被问题逼着搬家、搬完还不断回头检修的人。两个入口看到的是同一个柏拉图，但只有后一个入口，才看得出下一节那场自我拆修为什么不是意外。三层怎样在三轮上并排咬合，第 9 章再详谈。

◆ 自己拆自己的招牌：《巴门尼德篇》与晚期的退场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柏拉图就成了一个把答案钉死在彼岸、从此高枕无忧的人。可他没有停。在一般被归入晚期的《巴门尼德篇》里，柏拉图安排了一场

奇特的对话：年轻的苏格拉底向年迈的巴门尼德陈述理念论，结果被问得节节败退。巴门尼德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头发、泥巴、污垢也有理念吗？具体事物"分有"理念，是分有整个理念，还是分有其中一部分？如果是整个，一个理念怎能同时完整地待在许多东西里；如果是一部分，理念岂不是被切碎了？最要命的一问是这样的：许多大的东西之所以都是大的，因为它们分有"大本身"；可是把这些大东西和"大本身"放在一起看，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大"，那就需要第二个"大本身"来解释；如此下去，没有尽头。这个论证后来被称作"第三人"论证，名称是亚里士多德那一路传下来的。

用前面的千克原器来想就明白了。所有的秤都要拿去和那块圆柱的复制品比，那么那块圆柱本身准不准，又拿什么来比？它不能跟自己比。历史上它的几个复制品，在多年反复比对中和它彼此差出了几十微克，可谁也说不清是复制品变了还是原件变了，因为原件就是定义本身。标准一旦和被它衡量的东西放在一起，就会追问出"标准的标准"。再想想样板间：毛坯房像不像样板间，要比；可"什么叫一间好房子"，样板间自己也要拿来比。

《巴门尼德篇》里最重的一击还不是这个。巴门尼德指出：如果理念真的完全分离、自成一界，那么它们只和彼此有关系，我们这边的东西也只和我们这边的东西有关系；那样一来，理念对我们就是不可知的，神就算拥有最高的知识，也认识不了我们人间的事。分离得越干净，桥就断得越彻底。

奇怪的是，巴门尼德并没有让年轻的苏格拉底放弃理念。他说，如果有人因为这些困难就否认有理念，那么思想将没有可以依托的东西，讨论本身也就不可能了。他给的药方是更多的训练：沿着一个假设，正着推、反着推，把每一种后果都走一遍。对话的后半部，就是这样一场冗长而艰深的推演。

这说明了什么？本书的解读是：柏拉图没有把理念论当作终点，而是当作一个必须不断被检修的发动机。在《智者篇》里，主讲人换成了一位"来自爱利亚

的客人"，他坦言自己不得不对"父亲巴门尼德"下手，去证明"不是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否则错误和假话都无从解释。连那位为理念论奠基的前辈，也成了被顶撞的对象。

就在这个阶段，苏格拉底的位置也悄悄变了。《泰阿泰德篇》里他还是主角，而且又回到了老样子：讨论"什么是知识"，最后仍旧无解，他自称是帮别人"接生"思想的产婆。到了《智者篇》《政治家篇》，他只在开头露面，随即把主讲的位置让给爱利亚客人，自己在一旁听；在《蒂迈欧篇》里，讲宇宙生成的是蒂迈欧；到了篇幅最长的《法律篇》，苏格拉底根本不出场，主讲人是一位无名的雅典客人。晚期作品中也有例外，例如《斐莱布篇》仍由苏格拉底主讲，所以"退场"是一个大致的趋势，不是一刀切。但这个趋势本身已经够耐人寻味了：那个被柏拉图写成理念论代言人的老师，在柏拉图最成熟、最系统的著作里，渐渐退到了旁听席上。

换个日常的样子来看。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当年喊出一句口号，后来被印在墙上、写进手册。多年以后，还是这位创始人，在年会上亲手把口号拆开来讲：哪一句当年说过头了，哪一句经不起推敲。台下的老员工面面相觑，有人觉得他背叛了初心，有人却明白，这正是公司还活着的标志。柏拉图晚期对理念论的自我批判，就是这样一场发生在招牌底下的拆修。按照对话早、中、晚期的划分来讲这段历史，是学界通行的做法，但具体篇目的先后仍有争议；无论怎么排，引擎在柏拉图自己手里没有熄火，这一点是清楚的。

◆ 彼岸的代价：被贬成影子的厨房

现在可以算一算这一轮的账。柏拉图给了追问一个落脚点，让它从"可识别"走到"可维持、可表达"；他给追问盖了房子，让它从街头进了学园；他还给

后世留下了一整套关于标准、原型、层级的思考方式，直到今天我们说"理想状态""理论上应当如何"，背后都有这一轮的回声。

但这次搬家也留下了亏缺。答案被搬到彼岸之后，此岸的一切都被降了级。具体的东西成了影子，变化成了不完美的标志，过程只是从不像到比较像的爬坡，土壤本身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回到厨房：如果真正的"红烧肉"是墙上那张菜谱，那么灶上那锅肉从生到熟的每一分钟，五花肉今天比昨天肥一点、灶火今天比昨天旺一点，这些全都不算知识，只算"不准"。可是任何一个在灶台前站过的人都知道，手艺恰恰就在这些"不准"里。墙上的菜谱写着"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可那天的肉要两个小时，菜谱说不出原因，也说不出你该怎样知道。

彼岸的答案落回人间时，也碰过壁。据署名柏拉图的《第七封信》和后世的传记，他曾几次渡海去西西里的叙拉古，想让那里的统治者走上哲学的路，把《理想国》里"哲学家来治理"的设想放进一座真城邦里试一试，结果卷进宫廷倾轧，几乎脱不了身。信的真伪有争议，传记更晚，细节不可尽信；但若大致属实，它正是这一轮亏缺的一次现场演示：一张在彼岸画得完美的图纸，拿进一个有派系、有猜忌、有具体的人的宫廷，对怎样施工一句话也没说。好比一个在战术板上把阵型画得滴水不漏的业余教练，带队上了真球场才发现，对手不按格子跑，自家前锋昨晚没睡好，草皮还是湿的，这些没有一样画在板上。

这个亏缺不是小毛病，它直接成了下一轮的矛盾。第 7 章要讲的亚里士多德，就是在这张菜谱下站了二十年的徒孙。他不是从外面来砸招牌的人，他是学园里长大的人，理念论是他脚下的土。这里正好可以看清本书反复强调的一点：不能把三哲静态地对应成三个字母。在第二轮里，柏拉图是被矛盾逼出来的新显露；到了第三轮，同一个柏拉图，连同他的学园和他的理念论，就成了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土壤。好比同一块砖，砌在老墙里是承重的，拆下来铺进院子就成了路

面；位置是在关系里轮转出来的，不是砖上刻的字。三轮之间这种位置的轮转，第 9 章会并排放在一起看。

还有一个问题，柏拉图自己已经提出了，却没有收拾干净。《巴门尼德篇》里那道最重的难题：理念若与事物完全分离，它怎么还能解释事物？一个只待在罩子里的标准，怎么能告诉我们这锅肉为什么今天要多炖半个小时？墙上的菜谱是给了，可它对肉怎么从生变熟，一句话也没说。如果火候不在墙上，它会不会一直就在锅里？下一章，我们跟着那个在学园里站了二十年的人，去看他怎样把答案搬回物中。

> **带走的话**
>
> **受不了"说不出"的人，会把一张完美的标准贴到墙上。**

> **本章判错句**
>
> 如果找不到老师之死、问题悬置与"知识要有不变对象"这几股矛盾在柏拉图文本里的痕迹，第二轮的读法就要重写。

> **想一想**
>
> 你心里有没有一张"墙上的标准"，让你看不起手边那口锅？
>
> 你最敬重的人身上，哪一点被你悄悄改写过？

◆

07

第 7 章

亚里士多德：把答案搬回物中

这一章的问题

在学园待了二十年的人，为什么要把答案从彼岸搬回事物之中?

◆ 一个反常：待了二十年的学生，说老师讲的是空话

公元前 367 年，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从北方的斯塔基拉来到雅典，进了柏拉图的学园。他叫亚里士多德，父亲尼各马可是马其顿宫廷的医生。他在学园一待就是二十年，直到前 347 年柏拉图去世才离开。二十年，几乎是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最好的光阴。

怪就怪在这里。正是这个在学园里待得最久、学得最深的人，后来写下了对理念论最不留情面的批评。在《形而上学》A 卷第 9 章，他说：说理念是范本、其余事物分有理念，是在说空话、打诗意的比方。他还打了个刻薄的比方：设立理念来解释事物，就像一个人要数东西，嫌东西太少数不清，于是先把数目翻一倍再数。原来要解释的是一份世界，现在变成了两份。同一卷里还有一句话，本章要反复回到它：理念对感性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毫无贡献。也就是说，墙上那张完美菜谱，对锅里那块肉怎样从生变熟，一个字也没说。

按常理，学生若觉得老师的核心学说是空话，早就该走了，用不着待二十年。他偏偏留下来，留到老师去世；批评老师时，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 6 章又说了一句很有分寸的话：这番检讨让人为难，因为提出理念说的是我们的朋友；但朋友和真理都可爱，敬重真理却更为神圣。后世流传的"吾爱吾

师，吾更爱真理"，是拉丁格言对这段话的概括，不是他的原话，出处的来龙去脉第 8 章再详谈。

这一章要解开的，就是这个反常：一个人为什么要在一套学说里浸泡二十年，然后才把它推翻？我们的回答先摆在这里，下面一点点落实：理念论不是挡在亚里士多德面前的一堵墙，而是他脚下的土。他在这片土里长大，又在土里撞上了一样理念论消化不了的东西：活物。

我们延续上一章的读法：先看他接过的问法怎样在新的地方卡住，再看卡住之处逼出了什么，最后追这个新东西回头改变了什么。这一章把亚里士多德读成第三轮循环，同样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

◆ 二十年的土：理念论怎样成了他的起点

先说这片土。一个人在一所学校里待二十年，学校的问法、用语、争论方式，就不再是他"学过的东西"，而是他想问题时不假思索就用上的东西。好比一个在老字号后厨干了二十年的厨子，他可以对老板的某条规矩不以为然，可他切菜的手势、看火的眼神、对"一道好菜"的理解，早就是在这间厨房里养成的。他就算有一天出去单干，招牌换了，手上的功夫还是从这里来的。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是从学园的土里长出来的。"X 是什么"的问法是苏格拉底传下来、柏拉图加固过的；追问普遍者、追问定义、区分知识和意见，是学园的日常功课；"形式"（eidos）这个词，本就是柏拉图用来称呼理念的那个词。他后来把这个词留下，只是改了它的住址。这正是"土壤"一词的分量：理念论不是他的对立面，而是他思考时缠在身上的整张网，连同那些问题、那些词、那些争论的习惯。

有一个学术上的争论正好说明这一点。1923 年，德国学者耶格尔提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更接近柏拉图，后来才一步步离开，走向

经验研究。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也受到不少质疑，具体的分期至今没有定论。本书不依赖它的细节，只取一个更稳的事实：亚里士多德是在学园里成形的人，他对理念论的批评，不是从外面扔进来的石头，是从里面长出来的反骨。第 23 章会说明，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的形式学说可以完全独立于学园而形成，本书对第三轮的解读就得重写。

柏拉图死后，学园由柏拉图的外甥斯彪西波接掌。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先去小亚细亚的阿索斯，后来又到了莱斯博斯岛，与后来的继承人泰奥弗拉斯托斯一起工作。不少研究者认为，他大量关于海洋生物的观察，就出自这几年在海边的日子。约前 343 年起，他应马其顿国王腓力之请，去做少年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一路的离开与漂泊，让他从一个讲堂里的辩论者，变成了一个在海边弯腰看鱼的人。

◆ 撞上活物：一枚鸡蛋里的问题

理念论要解释的，是"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它擅长的是数学式的对象：三角形、相等、大小。这类东西不变，正合理念的脾气。可亚里士多德一生花了大量功夫在一类最不合理念脾气的东西上：会出生、会长大、会死去的活物。他留下的《动物志》《论动物部分》《论动物生成》，加起来是他全部著作里分量很重的一块。

在《动物志》里，他描述过鸡蛋孵化的过程：大约到第三天，胚胎里已经能看到一个跳动的血点，那就是后来的心脏。要知道这一点，得一天开一枚蛋，一天一天地看下去。这是一个和"墙上的菜谱"完全不同的认识姿势。菜谱告诉你红烧肉应当是什么样，而一天开一枚蛋，看到的是一个东西怎样一步一步变成它自己。

拿日常的事来比。一个人要弄清"什么是好面包"，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坐在书房里想：好面包本身应当是怎样的，松软、喷香、外脆里嫩。另一种是去面包房守一个通宵：看面团怎样发起来，什么时候该揉，什么时候该醒，炉温高了哪里先焦，酵母放少了会怎样塌下去。前一种得到的是标准，后一种得到的是过程。理念论给了亚里士多德前一种，他的鸡蛋、他的乌贼和鱼，逼他走了后一种。

这里就是第三轮的矛盾所在。他手上越来越多的观察，是一条不断推进、比较、修正的差异序列：这种鱼怎么产卵，那种动物的器官怎样配合，胚胎先长出什么后长出什么。这条序列撞上了他脚下那片土：真正的知识对象是分离、不变的理念。两者顶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扎眼的空洞：如果一个东西"是什么"住在彼岸，那它在此岸怎样长成、为什么长成这样，就完全落在了知识之外。可是对一个研究活物的人来说，"长成"恰恰是全部问题所在。

《论动物部分》第一卷第 5 章有一段话，把这种态度说得很清楚。有些人觉得研究低等动物不体面，亚里士多德劝他们别嫌弃，因为一切自然事物里都有令人惊奇的东西。他还讲了一个关于赫拉克利特的故事：客人来访，见他正在灶边烤火取暖，犹豫着不敢进门；赫拉克利特招呼他们进来，说这里也有神。这个故事本身是转述的逸事，真假无从查考，但亚里士多德讲它的用意很明白：神圣的东西不只在天上，也在灶边。本书全书反复回到厨房，这个故事算是给了我们一个古老的许可。

◆ 渔民、章鱼和多出来的牙齿：观察也长在土里

说亚里士多德"去观察"，容易让人想成一个人拿着放大镜，干干净净地面对自然。实际情形缠得多。他的动物学著作里提到过莱斯博斯岛皮拉一带的海湾，书中大量材料来自渔民、猎人、养蜂人、牧人的口述，有的他核过，有的只记

下"有人说"。章鱼是一个好例子：他记录了一种说法，雄章鱼交配时要用到一条特别的腕足，他自己对这条腕足究竟起什么作用拿不太准；后世的博物学者长期不当回事，直到十九世纪才证实确有其事。同一片土里也长出过错：他在《动物志》里写，人、绵羊、山羊和猪，雄的牙齿比雌的多。这句话张嘴一数就破，后世常拿它来取笑他。

对和错出自同一个人、同一种做法，正好让我们看清第三轮里三样东西是怎样同时缠着的。他的观察这条差异序列，是在土壤里推进的：渔民的嘴、海湾的物产、希腊人习以为常的看法（很可能包括对男女的成见），都在决定他看什么、信什么、漏掉什么。观察也不是一张白纸，它被已经成形的概念牵着走：他在《论动物部分》里解释一个器官，总先问它是为了什么，这种眼光让他看见了器官之间的配合，也让他太快地相信了某些"应当如此"。反过来，这些观察又一点点改写了土壤：从他开始，收集、比较、分门别类地记录活物，成了哲学学校里正经的功课。任何一刻三样都在同时动，这就是三大方程说的同时互生，S=F(D,E)、D=G(S,E)、E=H(S,D) 里的 F、G、H 只是"由……生成"的记号，没有哪一条能替我们算出他会在哪里看对、在哪里看错。

一个到新城市开早点铺的人，最早的生意经多半来自熟客：哪种豆浆好卖，几点人最多，这条街的人爱吃甜还是爱吃咸。熟客说对了，他照做就赚；熟客说错了，他照做就赔。他的"市场调查"从来不是在真空里做的；可铺子开了两年，这条街的早饭口味，又被他慢慢带着变了。

123原理把这团同时互生拉开成一个回合：观察的推进撞上"真知的对象在彼岸"的学园土壤，逼出形式回到质料，新学说又回写成吕克昂里的收集与分类。而本书从鸡蛋和章鱼起手，不从"四因是什么"起手，是六路径里的选择。教科书多走 S→D→E，先把四因、范畴、三段论列成一张清单，学生记住的是一只工具箱；本书走 D→S→E，先看他在海边被什么问题卡住，工具就不再是清单，

而是一件件为解决某个卡点打出来的家伙。学修车也是这样：先背扳手型号的人，和先跟着师傅修过一辆漏油的车、再回头认扳手的人，记住的不是同一样东西。三层怎样在三轮上并排咬合，第 9 章再详谈。

◆ 形式回到质料之中

那么，答案该搬到哪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搬回来，搬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东西里面。他把每一个具体的东西，看作"质料"和"形式"的结合。质料是它由之构成的东西，形式是让它成为"这一个"的那个样子。一尊铜像，铜是质料，雕像的形状是形式。这两样分不开：你找不到一个不是"某种形状"的铜像，也找不到一个不在任何铜、石、木头里的雕像形状。形式不住在彼岸，它就在铜里。

在厨房里，这一点再明白不过。一盘红烧肉，五花肉、酱油、糖是质料；让它成为红烧肉而不是一锅酱油泡肉的那个"样子"，色泽、口感、肥瘦交融的那种状态，是形式。这个形式不在墙上，它就在这盘肉里，就是这盘肉本身做成了的样子。你若想知道红烧肉是什么，最好的办法不是盯着菜谱，而是尝这一盘，再尝那一盘，比较它们，看它们共同成了什么。

这样一来，"X 是什么"这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就有了新答法。在《形而上学》里，亚里士多德说，"是"有多种说法，而首要的是"实体"。具体的个体，这个人、这匹马，在他早期的《范畴篇》里被称为首要的实体；在《形而上学》更复杂的讨论里，他追问实体到底是什么，最后把很大的重量压在了形式上。这一路上有许多困难，学者至今争论不休，本书不深究。对我们的主线来说，要紧的是方向：答案不再悬着，也不再住在彼岸，而是住在物中，住在这一个、那一个具体东西"成了什么"的样子里。

用 SDE 的话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显露。第二轮里，柏拉图让答案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代价是把它抬出了世界。第三轮里，亚里士多德保留

了"可维持"，形式依然是稳定的、可以被定义的；又把它放回了"可识别"的地方，你可以在一只鸡、一盘菜、一座房子里认出它来。答案不再需要一架通往彼岸的梯子。

◆ 潜能与实现：答案开始有了时间

光把形式放回质料，还解释不了变化。一块铜放在那里，什么时候成了雕像？一颗种子埋在土里，什么时候成了一株植物？亚里士多德为此造了一对概念：潜能与实现。

潜能，是一个东西"能成为"什么；实现，是它"已经成为"什么。铜有成为雕像的潜能，雕塑家完工时，这个潜能就实现了；种子有长成植物的潜能，长成了，就实现了。变化，就是从潜能走向实现的过程。

这对概念的力量，用日常例子最容易感到。一个学徒刚进后厨，切菜手抖、看火发慌，可师傅一眼就看出"这孩子能成"。他还不是厨师，但他有成为厨师的潜能。三年以后他独当一面，潜能实现了。注意，这三年并不是"一个不完美的厨师在慢慢接近厨师的理念"，而是"一个能成为厨师的人正在成为厨师"。前一种说法把三年看成一段需要被原谅的欠缺；后一种说法把三年本身当成了要研究的对象：哪一步先、哪一步后，卡在哪里，靠什么跨过去。

"潜能"这个词当时就有人不买账。《形而上学》Θ 卷第 3 章记下了麦加拉派的一种主张：一个东西只有在它正在做的时候才"能"做，不做的时候就是不能。亚里士多德的反驳很朴素：照这么说，一个建筑师不在盖房子的时候就不会盖房子了，那他每次重新动手，岂不是都得重新学一遍？换到后厨就更好笑：大厨下了班回家躺在沙发上，难道就不会炒菜了？他手上那份本事明明还在，只是此刻没有用出来。这场争论的分量在于，"能而未做"一旦被承认是真的，世界里就多

出了一层东西：尚未发生、却已经在那里等着的可能。没有这一层，就只有一张张静止的快照，谈不上一个东西怎样走向另一个样子。

火候问题在这里第一次有了落脚的地方。老师傅说不出"火候是什么"，柏拉图把一张完美标准贴上墙；亚里士多德则说：火候就在这块肉从生到熟的过程里。生肉有熟的潜能，熟是它的实现，而火候，就是让潜能恰好走到实现的那个分寸。它不在墙上，也不悬在空中，它住在时间里，住在锅里，住在肉的变化里。

这一步的意义，本书愿意说得重一点。在第一轮和第二轮里，答案都是没有时间的：苏格拉底的答案悬着不来，柏拉图的答案永恒不变。到了亚里士多德，答案第一次有了时间，它是在过程里成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三人之中，亚里士多德最接近本书所说的"发生学"。他专门写过一部《论生成与消灭》，把"生成"本身当作研究对象：一个东西怎样出现，怎样消亡，生成与单纯的性质改变有什么不同，几种元素怎样混合成新的东西。在他之前，变化常常被当作需要解释掉的麻烦；在他这里，变化本身成了值得研究的东西。

◆ 四因、范畴与三段论：拆开来问的工具

答案搬回物中，追问的方法也跟着变了。柏拉图的辩证法是从一个理念推向另一个理念，一路往上；亚里士多德需要的是能贴着具体事物拆开来问的工具。他造了好几件，这里只讲三件。

第一件是四因。他在《物理学》第二卷提出，追问一个东西"为什么"，至少有四种回答。拿一尊铜像来说：它由什么做成，是铜，这是质料因；它是什么样子，是雕像的形状，这是形式因；谁让它成的，是雕塑家，这是动力因；它为了什么，比如为了纪念、为了供奉，这是目的因。今天的人一听"原因"，想到的多

半只有第三种，谁推了谁、什么引起了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因"要宽得多，它是"为什么"的四种问法。

在家里，这四问天天有人问，只是没人这样排。孩子问"这碗面为什么这么好吃"，你可以说面粉是新磨的，那是质料；可以说拉得细而匀、汤头清亮，那是形式；可以说是外婆做的，那是动力；也可以说因为今天是你生日，那是目的。四个回答都对，而且彼此替代不了。一个只会回答"因为外婆做的"的人，永远学不会做这碗面。

第二件是范畴。在《范畴篇》里，他把我们说一个东西时能说的话，分成十类：它是什么、有多大、怎么样、和别的东西什么关系、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处于什么姿态、有什么、做什么、承受什么。比如说"苏格拉底"，可以说他是人，个子不高，有智慧，比柏拉图年长，在集市上，在下午，坐着，穿着旧斗篷，在提问，被人嘲笑。这十类就像一个老会计的账本栏目：先分清这一笔是收入还是支出、是现金还是欠款，账才不会乱。很多看似深刻的争论，一旦发现两边说的根本不是同一类东西，就自行消散了。

第三件是三段论。在后世被归入《前分析篇》的著作里，他整理出一套推理的形式：如果所有 A 都是 B，所有 B 都是 C，那么所有 A 都是 C。教科书上常举的"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死"，是后人编的标准例子，不是他书里的原例，他本人更常用字母。三段论的意义在于：推理是否成立，可以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就像核对一张报销单，先不管买的是什么，只看金额加起来对不对、签字齐不齐；形式上对了，才谈得上内容。

这三件工具，加上他别的逻辑著作，后来被编在一起，称为《工具论》。这个总名不是他自己起的，是后世编者和注释者的手笔；他的著作整体上经过公元前 1 世纪的安德罗尼柯编订，才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至于说他的书稿曾在地窖里埋藏多年才重见天日，那是斯特拉波等人的记载，可疑的成分很多，本书

只当传说看。这件事本身也提醒我们：我们读到的亚里士多德，同样是经过别人之手编出来的亚里士多德。第 8 章讲反向师承时，这是一条值得记住的线索。

◆ 目的论的尾巴：橡子里早就有了橡树

讲到这里，亚里士多德好像成了本书的英雄：他把答案搬回物中，把生成当成研究对象，造了一套贴着事物发问的工具。可本书不打算把他捧成终点，因为他的潜能—实现里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目的论。

所谓目的论，在这里的意思是：变化有一个事先定好的终点，而这个终点就是变化的理由。橡子之所以长，是因为它要成为橡树；橡树是橡子的"实现"，也是它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像一位手艺人，做每一件事都朝着一个目标去。他在《物理学》第二卷打过一个比方：自然的运作，最像一位医生给自己治病。治病的人和被治的人是同一个，目标就在他自己身上。

这个想法有它真实的力量。一颗橡子不会长成一匹马，一枚鸡蛋孵出的总是鸡。生物的发育确实有方向，器官确实彼此配合，像是为了什么而长。亚里士多德从他的鸡蛋和鱼里看到的，不是幻觉。

可它的代价也正在这里。如果橡树早已作为目的待在橡子里，那么橡子从发芽到长成的整个过程，就只是一条早已画好的路线；路上发生的一切，要么是朝目标前进，要么是偏离目标的"意外"或"缺陷"。过程依然从属于终点，只不过终点从彼岸挪进了种子里。

日常里有个很直观的反例。同一颗橡子，种在花盆里，被人年年修剪，长成一盆精巧的盆景；种在山口的风里，常年被一个方向的风吹着，长成一棵歪脖子树。哪一棵是"实现了"的橡树？盆景不是失败的橡树，歪脖子树也不是偏离了目的的残次品。它们各自是在各自的土里、经各自的变化长成的样子。终点并不预先住在种子里，它是种子、土、风、修剪的手一起缠出来的。

换到人身上更清楚。父母常说"这孩子天生就是学医的料"，好像医生早已作为目的待在孩子身上，二十年只是把它兑现出来。可同一个孩子，遇上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变故、不同的同学，可能成了医生，也可能成了画家，还可能成了一个修自行车却修得极好的人。如果事先把终点钉死，凡是不朝着它走的都成了"走偏"，那么那些真正改变了他的相遇，就都被记成了干扰。

所以，本书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是：接过他的动词，卸掉他的终点。"生成"这个动词，他第一次把它放到了舞台中央，本书接过来；但"生成"不必预设一个早已写好的结局，种子里有的是能成为许多样子的可能，而不是一棵等着兑现的树。这也是本书与第 3 章所说的"正—反—合"上升叙事分道扬镳的地方：那种叙事同样把终点放在开头。这里需要说清楚，用"卸掉目的论"去读亚里士多德，是本书的立场和取舍，不是在宣布他错了；他的目的论在生物学的许多地方至今仍有启发，只是它不能被当作一切生成的模板。

◆ 搬家没有搬干净：不生成的形式与不动的推动者

说亚里士多德"把答案搬回物中"，还得面对一个最强的反对：他真的搬回来了吗？在《形而上学》Z 卷第 8 章，他讲得很明白：铜匠造出一个铜球，造出来的是"这个铜球"，铜不是他造的，球形也不是他造的；形式本身不生成，生成的只是形式和质料合在一起的那个具体东西。照这样看，形式虽然住进了物中，它自己却仍旧不生不灭，和柏拉图的理念同一个脾气，只是换了门牌。更远处还有一处：在《形而上学》Λ 卷，他为解释天体为何永恒运转，推出一个"不动的推动者"，它没有质料，纯然是实现，只以思想自身为对象，万物因为向往它而动。这几乎是彼岸在他体系顶端留下的一间屋子。后来经院哲学正是从这里把他和神学接在一起，第 22 章再说。

这个反对是对的，我们接受它，并把判断收紧：亚里士多德搬回物中的，是自然事物"是什么"的答案；搬家并不彻底，屋顶上还留着一件不肯挪的旧家具。许多人家从老宅搬进新楼也是这样，沙发、餐桌、锅碗都换了新的，老宅堂屋那张供桌却原样请了过来，摆在客厅最高处，平日没人碰，逢年过节全家朝它行礼。新房子里过的是新日子，最高的那个位置却照老规矩留给不住在人间的东西。说他"最接近发生学"，也要连着这一点说：他让生成成了研究对象，却没让形式本身进入生成。这处没搬干净的地方，和上一节的目的论尾巴是同一件事的两头：终点既然不生成，过程就只能朝它走。

◆ 回写与板结：重置了两千年，也压住了一段时间

最后看这一轮的回写。前面说过，回写不能靠宣布，要看史料里实际被改变了什么。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在城东一处名叫吕克昂的地方开设学校，后人也称他这一派为"逍遥学派"，相传是因为他喜欢边走边讲。学园之外，雅典有了第二座哲学学校，而且这座学校的风格明显不同：大量收集资料，整理各城邦的政制，分门别类地研究动物、植物、天象、修辞、诗。前 323 年亚历山大去世，雅典的反马其顿情绪高涨，他遭到不敬神的指控，离开雅典，次年在卡尔基斯去世。相传他离开时说，不让雅典再一次对哲学犯罪，指的是苏格拉底的案子；这句话是晚出的记载，我们只当传说看，可它被人记住，本身就说明后人怎样把这三个人缠在一起讲。

他的回写，至少在三处看得见。一处是推理方式。《工具论》后来成了西方逻辑教育的根底，在很长的时期里，"学会推理"差不多就等于学会三段论。第二处是土壤本身。他的学说经过后世注释者的不断讲解，进入了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又在中世纪的经院传统里被系统接纳，成为大学课堂的骨架。还有一处常被忽略，就是学校本身的样子。柏拉图的学园训练人往上看，从影子爬到理念；吕克昂则训练人往四周看，把能找到的东西先收齐、再比较。古代的书目里记着，

亚里士多德一派整理过一百五十多个城邦的政制，绝大部分已经失传；十九世纪末，人们在一份埃及纸草上重新读到了其中的《雅典政制》，它是出自亚里士多德本人还是他的学生之手，学界仍有讨论，但"成批收集、逐个比较"这种做法属于这个学派，是看得见的。他的继承人泰奥弗拉斯托斯接着写植物，把老师在动物身上的功夫挪到了草木上。好比一个家庭原本照着一本名家菜谱做饭，后来改成每做一回就在本子上记一笔：今天的肉几斤、炖了多久、谁说咸了；十年下来，那本流水账比名家菜谱更懂这一家的锅。追问的住处，从一座往上爬的梯子，变成了一间不断添抽屉的档案室。

第一轮里，答案悬着；第二轮里，答案住进彼岸，追问住进学园；第三轮里，答案回到物中，而他的整套分类与推理方式，回头重置了此后许多世纪里人们怎样问、怎样答。可是回写也有过厚的时候。一套学说被讲得太久、太权威，就会从土壤变成硬壳。到了近代早期，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成了必须先背、不许轻易怀疑的东西，伽利略那一代人要讨论落体和运动，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这层壳。这段故事第 13 章再详谈。这里只需看出一层因果：板结的那一部分，恰恰和目的论的尾巴连在一起。终点被事先钉死的过程，最容易被后人当成不许改动的定论。祖传的秘方传到第三代，不许改一个字，不是秘方本身的错，而是"它早已知道该做成什么样"的那种信念，被一代代传得越来越硬。

◆ 三个人，三个住址，一个还没问完的问题

到这里，第一轮完整的发生跑完了。苏格拉底的答案悬着，柏拉图把它搬到彼岸，亚里士多德把它搬回物中。三个住址各有道理，也各有亏缺：悬着的答案不能教、不能传；彼岸的答案稳了，却和锅里的肉断了联系；物中的答案回到了锅边，却又被一个事先写好的终点拉着走。

我们还得回头看一件被前面几章一再提到、却一直没有正面处理的事。我们关于苏格拉底的知识，几乎都来自他的学生；我们关于"把理念分离"的柏拉图的印象，有一大块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转述；就连柏拉图那些没写进对话、只在学园里讲过的学说，也主要靠亚里士多德记下来。这样看来，在这三个人之间，到底是老师造就了学生，还是学生造就了老师？我们心目中那位苏格拉底、那位柏拉图，有多少是他们本人，有多少是后来的人讲出来的？下一章，我们就来看这种倒着走的师承。

带走的话

火候不在墙上，在这块肉从生到熟的过程里。

本章判错句

如果能证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学说独立于学园形成，与理念论没有顶撞关系，第三轮就要降级为平行发生。

想一想

你学的哪一门手艺，标准说得很清楚，却对"怎么变成那样"一句没说？

你身边有没有一件事，大家都说"注定会这样"，其实要看它长在什么土里？

◆

08

第 8 章

学生生成老师

这一章的问题

学生在后，怎么能生成老师?

西方哲学史上最有名的老师，没有留下一个字。这件事说出来平平无奇，许多读者早就知道：苏格拉底不写书。可是只要停下来多想一步，它就变得古怪。我们说苏格拉底"主张"无知之知，"发明"了诘问法，"要求"定义，"相信"美德即知识——这些"主张""发明""要求""相信"，全都不是他自己落在纸上的。我们手里的苏格拉底，是别人写出来的苏格拉底。而写他的人，主要是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

这就像很多家庭里的父亲。父亲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次，话少，脾气倔。孩子对他的印象，大半来自母亲的讲述："你爸年轻时为了供你上学，一个冬天没买新棉袄。""你爸那人嘴硬心软。"等孩子长大，真正和父亲坐下来喝一顿酒，才发现父亲和母亲讲的那个人有像的地方，也有对不上的地方。可是孩子心里那个"父亲"，已经在二十年的讲述里长成了，很难再拆开。

本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在哲学史上的样子：老师是被学生讲出来的。前面第5至7章，我们按时间顺序讲了三位哲学家各自的一轮发生；本章要倒过来看——不是苏格拉底生出柏拉图、柏拉图生出亚里士多德，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柏拉图生出了我们所知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又定型了我们所知的柏拉图。我们

称之为"反向师承"。它不是一个修辞上的俏皮话，而是全书"纠缠史"主张最硬的一块证据。

◆ 一个不写字的人，被写成了经典

先把史实摆清楚。苏格拉底约生于公元前469年，前399年受审饮鸩而死，一生在雅典街头、作坊、体育场与人交谈，没有留下著作。这一点古代材料几乎没有争议。

更耐人寻味的是，关于"为什么不写"，我们能读到的最有名的一段说法，恰恰出自柏拉图的笔下。在《斐德若篇》里，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埃及的故事，大意是：文字看上去能帮人记忆，其实会让人只依赖外在的记号，不再用心记；而且写下来的话不会回答问题，你去问它，它永远只重复同一句话，被人误解了也无法替自己辩护。

于是出现了一个绕不开的局面：一个批评文字的人，他对文字的批评，是靠他学生的文字保存下来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缠绕。我们不知道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是否真的这样讲过，也不知道这段话里有几分是柏拉图自己的忧虑——一个写了一辈子对话的人，借老师之口提醒读者：别把我写下的东西当成最后的答案。这里我们只能说，文字批评这件事，已经同时属于师生两个人，分不清哪一半是谁的。

一位不识字的外婆，一辈子凭口诀腌咸菜，从不肯把方子写下来，说"写下来就死了，得看天看菜"。后来是外孙女把这句话连同方子一起记在了本子上，还在扉页抄下外婆的原话。今天家里人说起外婆的手艺，引用的正是外孙女本子上那句"写下来就死了"。外婆反对写，外婆的反对却活在了写里。

◆ 三幅对不上的肖像

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中，留下关于他的完整文本的，主要有三个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军人兼作家色诺芬、哲学家柏拉图。三幅肖像摆在一起，对不上。学界把这种困境叫作"苏格拉底问题"：真实的苏格拉底究竟是谁，我们能不能从这些材料里把他还原出来。

第一幅来自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公元前423年上演，那时苏格拉底四十多岁，柏拉图还是个孩子。剧里有一所"思想所"，苏格拉底坐在半空吊着的篮子里研究天上的事，教人如何把站不住的理由说成站得住的理由。一个欠了债的老农把儿子送去学，想学会诡辩赖账，结果儿子学成后反过来用诡辩证明自己有理由打父亲。剧终，老农一把火烧了思想所。在这幅肖像里，苏格拉底是一个兼做自然哲学和诡辩术的怪人，和收费教修辞的智者是一路货色。

这幅画像不能当作纪实，它是喜剧，靠夸张取笑。可它又不能被轻轻放过，因为它告诉我们，在一部分雅典观众眼中，苏格拉底确实可以被放进"智者""研究天上地下怪事的人"这一类里。柏拉图写的《申辩篇》里，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专门提到，早年就有人把他说成研究天上地下、把弱的理由说强的人，还提到喜剧里那个在空中晃荡、自称在空气里行走的苏格拉底，并说这些老印象比眼前的控告更难对付。也就是说，第二幅肖像在自己的画布上，回应了第一幅肖像。

第二幅来自色诺芬。他写了《回忆苏格拉底》，还有一篇也叫《申辩》的作品、一篇《会饮》和一部谈持家理财的对话。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虔敬，守礼，务实，常给朋友出主意：怎么管家、怎么交友、怎么对待父母、怎么带兵。他的苏格拉底很少把人逼到无话可说，更像一位有见识、讲道理的长者。在色诺芬的《申辩》里，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态度强硬，色诺芬的解释是：老人已认定此时死去好过进入衰老。按通行的看法，审判那年色诺芬正随军远在亚洲，他对审判的叙述并非亲眼所见。

第三幅来自柏拉图。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锋利、反讽、追问到底，常常让对方先自信满满地下定义，再一步步发现自己的定义自相矛盾，最后谈话在"我们还是不知道"中结束。柏拉图在审判现场——《申辩篇》里苏格拉底提到柏拉图在座，并愿为他担保罚金。可是苏格拉底饮鸩那天，按《斐多篇》的交代，柏拉图恰好生病，不在场。全书最感人的临终场面之一，作者本人没有亲见。

把三幅肖像排在一起，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人的三个侧面，而更像三个人。一个是滑稽的怪学究，一个是可敬的老好人，一个是让人坐立不安的追问者。

高中毕业二十年，同学聚会，大家聊起当年的班主任。坐在前排的好学生说："老刘最讲道理，有一回我没考好，他陪我在操场走了三圈。"后排的调皮鬼说："老刘？他一说话就绕，问你一个问题能问半节课，问得你想钻地缝。"还有一个在晚会上演过小品、专学老师口头禅的同学，一开口全桌笑倒——他学的那个老刘，是一个夸张了十倍的老刘。三个人都没撒谎，三个人说的又对不上。更关键的是：老刘本人没来，而他退休多年，从来没写过回忆录。

◆ 三幅肖像也有对得上的地方

讲到这里，需要立刻加一个限定，否则"反向师承"会滑成"随便怎么说都行"。三幅肖像虽然对不上，却并非毫无交集。三人都把苏格拉底写成一个靠交谈而不是靠著书来工作的人；都写到他的贫穷、他对衣食的不讲究、他异乎寻常的耐力；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写到他与青年来往密切，都写了他的审判与死亡，都替他辩护；关于他的相貌，柏拉图的《会饮篇》借亚西比德之口把他比作外丑内美的西勒诺斯雕像，色诺芬的《会饮》里他也拿自己的塌鼻子开玩笑。至于审判本身——罪名是不敬城邦之神、引入新的神灵、败坏青年，判处死刑——这是古代材料一致的史实。

所以，"学生生成老师"不是说苏格拉底这个人不存在，也不是说他想怎么被写就怎么被写。三幅肖像之间的交集，构成一层硬约束：任何讲出来的苏格拉底，都不能不交谈、不能富有、不能逃过那场审判。在这层约束之内，才有了被不同学生生成出不同老师的余地。

回到同学聚会。老刘可以被讲成"讲道理的"或者"爱绕的"，但没有人会把他讲成一个从不跟学生说话的人，因为三十多个同学共同经历过他整天找人谈话。共同经历的那一部分是硬的，各自讲述的那一部分是软的。哲学史上的反向师承，就发生在硬的骨架和软的血肉之间。

◆ 一场替死者打的笔墨官司

三幅肖像为什么各说各的？只归给三位作者的性情，就漏掉了更要紧的一件事：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形象不是在书斋里安静回忆出来的，而是在一场争论里打出来的。第5章提过，他死后写"苏格拉底对话"成了风气；这里要补上争论的另一方。审判之后几年，修辞家波吕克拉底写过一篇《控告苏格拉底》，一般认为是展示修辞功夫的文章，原文已失，只能从后人转引里知道个大概。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一开头，就逐条驳斥"那位控告者"：说苏格拉底教青年蔑视法律，说他的学生里出了克里底亚和亚西比德，说他教儿子不敬父亲。不少研究者认为色诺芬针对的正是波吕克拉底，这个对应有争议，但逐条答辩的姿态一目了然。柏拉图的《申辩篇》虽写成法庭自辩，同样是审判之后写给雅典读者看的。我们读到的两幅主要肖像，都诞生于"替死者辩护"的处境。

这里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这场笔墨官司就是一个完整的发生回合。学生们各自写、彼此比较、互相修正，是推进中的差异序列；判决、《云》种下的老印象、控告者的文章，加上作者们自己的哲学关切，是它撞上的纠缠土壤；两者顶在一起，逼出一个新的显露——"苏格拉底"这个人物，比任何活人都

更清晰、更可讨论。这个形象随即回写：后来的学派几乎都认他做源头之一，斯多亚派奉他为贤人的榜样，学园怀疑派援引他的"知道自己不知道"（第22章再谈）。相传斯多亚派创始人芝诺在雅典书铺里读到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从此走上哲学的路——此事见于第欧根尼·拉尔修，属晚出传说；可它被这样讲，就说明后人相信，一个写出来的苏格拉底足以改变活人的道路。

从哪一头起手看这场官司，结果也不一样。教科书从显露起手，先摆出"苏格拉底的思想"，再讲学生怎样继承，学生就成了传声筒；我们从差异起手，先问谁在何时、回应谁而写，再看形象怎样被写出来，最后追它扎进哪片土，学生就成了作者，而且是彼此较劲的作者。

小区里管了二十年事的老楼长去世，业主群里就有人翻旧账，说他经手维修基金不清不楚。他带出来的几个热心人坐不住了：一个写长文回忆他半夜帮人通下水道，一个把他手写的账本拍照贴出来，一个把他的口头禅编成顺口溜贴进楼道。几个月下来，新住户都知道"老楼长"是怎样一个人——一场争论打出来的老楼长，比他生前任何邻居眼里的他都清楚。后来的楼长一上任，人人都说"要像老楼长那样"：争出来的形象，成了后来者的尺子。

◆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长大

三幅肖像里，影响后世最大的是柏拉图那一幅，而这一幅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柏拉图的对话通常被分为早、中、晚三期。这种分期是通行的研究做法，但具体篇目的先后至今仍有争议，我们只取它的大轮廓。在通常被归入早期的对话里，苏格拉底问"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虔敬""什么是美"，对方给出的回答被一一驳倒，谈话常以无解告终。到了通常归入中期的《斐多篇》《理想国》等作品，苏格拉底不再只是发问，他开始提出一整套学说：灵魂不朽，学习就是回忆，在流变的事物之外有不变的理念，哲学家应当治理城邦。到了晚期，苏格拉

底的戏份明显减少：《智者篇》《政治家篇》里主导讨论的是一位来自爱利亚的客人，苏格拉底在旁听；到最后一部长篇《法律篇》，苏格拉底干脆没有出场。

一个主角从"只会问"变成"什么都能答"，再退到边上旁听，最后离开舞台。这条线索很难全部归给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本人——他前399年就死了，而这些对话写作的跨度长达几十年。更自然的读法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在变，他让笔下的老师跟着变。早期对话里的苏格拉底，或许离历史上的那个人近一些；中期对话里讲理念论的苏格拉底，相当程度上已经是柏拉图借老师之口说话；而当柏拉图晚年开始反省理念论、需要另一种讨论方式时，老师就让位了。二十世纪的研究者，比如弗拉斯托斯，就明确主张把早期对话与中期对话里的苏格拉底分开看待，认为两者在哲学立场上相当不同。这一主张本身也有争论，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并非始终如一"，已经是许多研究者的共识。

古代有一则轶事，正好可以放在这里，但必须先说明它的身份：它见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这是公元3世纪前后成书的晚出材料，属于传说，不能当证据用。相传苏格拉底听人念柏拉图写的《吕西斯篇》，叹道："这个年轻人在我身上编了多少故事！"我们引它，不是为了证明柏拉图在编造，而是因为这则轶事说明了一件事：至少在古代后期，人们已经意识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柏拉图自己的手笔，并且觉得这件事值得编一个段子来讲。

连续剧里也有这样的事。一部剧开播时，某个配角只是主角身边一个爱提问题的朋友。观众喜欢他，编剧就开始让他承担更多：第二季他有了自己的人生观，第三季他成了推动剧情的核心，台词越来越像编剧本人的想法。到第五季，编剧想讲一个新的故事，这个角色就"出国了"。观众记得的"这个人物"，是五季下来被编剧一笔笔写出来的，而不是开播时那几句台词。演员本人如果出来说"我最初演的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观众多半还不肯信。

◆ 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转述，定了两个人的形

如果说柏拉图生成了苏格拉底，那么亚里士多德做的是另一件事：他给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划了界，而这条界线后来成了教科书的界线。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那时苏格拉底已经去世十五年。他从未见过苏格拉底。他十七岁进入柏拉图的学园，在那里待了约二十年，直到柏拉图去世。所以，他关于苏格拉底的知识，是二手的；他关于柏拉图的知识，则是一个在学园里朝夕相处二十年的学生的知识。

在《形而上学》A卷第6章，亚里士多德讲了柏拉图学说的来路，大意是：柏拉图年轻时熟悉赫拉克利特一派"一切感性事物都在流变、对它们不可能有知识"的看法；苏格拉底则关心伦理问题，在伦理问题中寻找普遍的东西，最先把思想集中在定义上；柏拉图接受了苏格拉底，但认为定义所针对的不可能是总在变化的感性事物，而是另一类存在者，他称之为理念。到了M卷第4章（1078b），亚里士多德说得更干脆：有两件事可以公正地归于苏格拉底，一是归纳论证，一是普遍定义；但苏格拉底没有让普遍者或定义与事物分离存在，是"他们"——柏拉图一派——让它们分离了，并称之为理念。

这几句话的分量很重。今天几乎每本哲学史教材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区别都是这样讲的：苏格拉底追问定义，但没有理念论；柏拉图把定义的对象抬到感性世界之外，造出了分离的理念。这条线，很大程度上就是亚里士多德画的。

问题在于，画线的人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来画的。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哲学，核心之一就是反对普遍者与个别事物分离：形式就在质料之中（第7章已讲）。他在A卷第9章批评理念论，其中一条是理念对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毫无贡献。一个把"分离"当作对手主要毛病的人，来叙述对手的来历，就很自然地会把"分离"标成对手最突出的标志，并把老师的老师写成"还没有犯这个错误"的人。我们不是说亚里士多德的转述是错的——他是在场二十年的见证者，他的话分量极重——

而是说，他的转述带着他的问法。"把理念分离的柏拉图"这个形象，是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哲学问题里被聚焦、被定型的。至于柏拉图本人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主张"分离"，研究者至今有不同读法；柏拉图晚年在《巴门尼德篇》里就借人物之口严厉追问过理念论（第6章已讲），说明他本人对"分离"的困难并非没有察觉。

这里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亚里士多德的转述同时做了两件事，既生成了"只问定义、不造理念"的苏格拉底，也生成了"把理念分离"的柏拉图。两位老师的轮廓，是被第三个人在一次叙述中同时勾出来的。

单位里换领导时，新上任的部门主管写了一份交接报告，开头一段回顾部门历史："前任主管注重客户关系，打下了好基础；但他把流程标准做成了一本离一线很远的手册，执行中脱节。"多年以后，新员工了解那位前任，读的就是这份报告。报告不一定不公正，写报告的人确实在那里干过多年；但报告是为了论证"我要把标准拉回一线"而写的，前任的形象就围着"离一线太远"这一点被勾勒出来。至于前任当年为什么要写那本手册、手册里是否有过自我修订，报告里一句没有。

◆ 写在书外的柏拉图

反向师承还有更深的一层：我们所知的柏拉图，有一部分根本不在柏拉图的书里。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四卷讨论"处所"时，顺带提到柏拉图有"所谓的未成文学说"，并拿它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说法对照。在《形而上学》A卷第6章，他又转述了柏拉图的一套原理：以"一"与"大和小"为本原，理念由此而来，数也由此而来。这些内容在柏拉图流传下来的对话里，找不到同样清晰的表述。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阿里斯托克塞诺斯记述说，亚里士多德常讲起柏拉图那次题为"论善"的讲演：许多听众来的时候以为会听到财富、健康这些

人间的好东西，结果讲的全是数学、数、几何与天文，最后说善就是一，听众大多失望而去。

于是，"未成文学说"成了柏拉图研究中最大的公案之一。二十世纪有一派德国学者（常被称为图宾根学派）认为，柏拉图真正的核心学说就在这些口传的内容里，对话只是面向公众的外围作品；另一派以美国学者切尼斯为代表，强烈怀疑亚里士多德转述的可靠性，认为他是在用自己的概念框架误读柏拉图。双方各有依据，争论没有结束。柏拉图名下的《第七封信》里有一段话说，关于那些最重要的事，作者没有也不会有成文的论著——可这封信本身的真伪也有争议，不能拿来一锤定音。

我们不必在这场争论里站队。对本章来说，要紧的是这场争论的形状：要认识柏拉图"没写出来"的那一部分，几乎只能通过亚里士多德等学生的记载；而要判断这些记载可不可信，又只能拿柏拉图写出来的对话去比对。老师的书和学生的记录互为对方的检验标准，谁也不能单独站稳。这正是"缠绕在先，端点在后"在文献层面的样子：所谓"柏拉图本人的学说"这个端点，是在对话文本与学生转述的反复互相检验中才逐渐显出轮廓的，而且轮廓至今还在被重画。

一位老中医留下几本工整的医案，后人都说"读医案就能学到他的本事"。可是跟过他的几个徒弟都说，真正的诀窍是他在饭桌上、出诊路上随口说的，比如什么样的舌苔他从来不敢用某味药，医案上只写了用药，没写他为什么不用另一味。徒弟们各自记下的"老师口头讲的"，有重合，也有出入。后人研究他，就得把医案和徒弟们的笔记放在一起对着看：医案里没有的，靠笔记补；笔记说得太玄的，拿医案去核。老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位医生，就在这一来一回的对看中慢慢清楚，又总留着一圈模糊。

◆ "吾爱吾师"是谁替他说的

讲反向师承，绕不开中文世界最流行的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通常被安在亚里士多德头上，作为他反驳老师柏拉图的宣言。它的来历，恰好是反向师承的一个小样本。

能找到的源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6章。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要批评"善的理念"，开头先表示，这项考察令人为难，因为提出理念的是"我们的朋友"；但为了维护真理，哪怕牺牲自己亲近的东西也是应当的，尤其对哲学家而言；朋友与真理都可爱，而敬重真理更为神圣。

注意几处差别。第一，亚里士多德说的是"朋友"，而且是复数意义上的"提出理念的人们"，即学园中的柏拉图一派，并没有说"我的老师"。第二，他的语气是为难，而不是豪迈；这是一段批评之前的礼貌铺垫，不是一句口号。第三，那句简洁对仗的格言，是后世拉丁语传统中逐渐压缩出来的概括，常见的形式是"柏拉图是朋友，但真理是更好的朋友"；中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又在此基础上换了称谓，把"朋友"换成了"师"。

一换之间，意思变了。"朋友"是平辈，批评朋友是同行之间的争论；"老师"是长辈，批评老师就成了"弟子超越师父"的故事。后世需要一个"学生勇于反叛老师"的样板，于是这句话被一代代讲述者打磨成了口号，再安回亚里士多德嘴里。我们今天"认识"的那个高喊"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是这句格言的讲述史生成的。

同样的流向，还见于另一则轶事。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相传柏拉图说过：亚里士多德踢开了我，就像小马驹出生后踢开母亲。这同样是晚出的传说，不能当史料用。可它和"吾爱吾师"一起，塑造了一个固定的剧本：叛逆的天才弟子，被冒犯的老师。这个剧本好讲、好记，也好用来教育人，却把亚里士多德在

学园二十年、深受柏拉图塑造这一面遮住了——第7章讲过，在亚里士多德的成长中，理念论首先是土壤，然后才是对手。

手机上流传的名人名言，很多都经过了这样一番加工：某位作家在一封私信里说过一句犹犹豫豫的话，十年后被做成配图金句，去掉了前后的限定，换上了更响亮的措辞，还常常被安到另一个更有名的人头上。转发的人记住的是那个"说过金句的人"，而那个人，是转发链生成的。

◆ 最强的反对：这不就是史料批判吗

收拢论点之前，先把最有力的反对意见摆上桌：历史学家早就知道，一切传记材料都带着作者的立场，要审查来源、比对异文、扣除偏见，这叫史料批判；"反向师承"不过给这门老手艺换了个名字。而且照这个逻辑，凯撒是被普鲁塔克讲出来的，人人都被"生成"，这个说法还有什么特别？

这个反对一半是对的，没有史料批判，连"三幅肖像对不上"都发现不了。但它有两处没有看到。第一，史料批判的目标是剥掉讲述者、还原端点，剥得越干净越接近"真实的苏格拉底"。本书不反对这项工作，只是多看一步：被讲出来的苏格拉底不是该剥掉的杂质，而是历史上实际起作用的那一个。打动芝诺、让两千年读者坐立不安的，都是柏拉图与色诺芬笔下的形象，不是那个够不着的"本人"。在发生的链条里，被讲出来的端点就是真正干活的端点。第二，三哲的情形有一处是凯撒没有的：讲述者不是站在外面的史家，而是同一个循环里的当事人。柏拉图写苏格拉底时在生成自己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勾画柏拉图时在给自己划出位置。讲述者与被讲述者在同一轮里互相成形，这才叫缠绕，而不只是"有偏见"。

一场球赛之后，记者的战报和队友对队长的回忆都会有偏差，性质却不同。记者写完就走，饭碗不靠这场球；队友讲队长时也在讲自己——"那天队长把最

后一个点球交给了我"，这句话定下了队长是怎样的人，也定下了说话的人在队里是谁。前一种是偏差，后一种是缠绕。怎样在具体的哲学家身上分开记账，第12章再从方法上细谈。

◆ 为什么说这是纠缠最硬的证据

现在可以把本章的论点收拢起来。第2章说过，"关系"这个词预设了两端先在：先有张三和李四，再谈两人之间的关系。按这个思路写哲学史，就是先有苏格拉底，他教了柏拉图；先有柏拉图，他教了亚里士多德；影响从前往后流。这就是"师承接力"的叙事。

本章摆出的史料，让这个叙事站不稳。苏格拉底这个端点，并不是先在那里、然后影响了学生；我们所能接触到的苏格拉底，是在柏拉图、色诺芬、阿里斯托芬的文本里，以及后来亚里士多德的转述里，才显出轮廓的。柏拉图这个端点也一样：他的形象既在他自己的对话里，也在亚里士多德对他的分类、批评与记录里，还在两千年读者围绕"未成文学说"的争论里。学生在先，老师在后——不是在出生年份上，而是在"被我们认识"这件事上。

为什么说这是最硬的证据？因为其他关于纠缠的说法，多少带有阐释色彩：说"老师之死逼出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说"学园土壤孕育了亚里士多德"，都是本书的解读，读者可以不同意。可是"苏格拉底一字未写""三份同时代材料对不上""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分界线主要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转述""未成文学说主要靠学生记载"，这些是文献层面的事实，不依赖任何哲学立场。只要承认这些事实，就得承认：至少在这三个人身上，端点是被缠绕生成的。

用全书的语言再说一遍。我们在第2章介绍过三大方程，其中第一条是S=F(D,E)，读作：显露出来的东西，是由差异序列在纠缠网络中生成的。这里F只是一个"由……生成"的占位记号，不是能代入数字计算的公式。放到本

章，"苏格拉底"这个被我们认识的形象，就是一个显露；生成它的差异序列，是一代代学生和读者的追问、改写、比较、修正；生成它的纠缠网络，是雅典的喜剧舞台、学园的教学、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问题、后世的抄本与格言。这个显露一旦成形，又会反过来规定后人怎样读柏拉图、怎样读亚里士多德。三者同时在动，没有哪一头先站定。

这里还要再划两道边界。第一道：反向师承不等于学生在造假。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都不是骗子，他们各自带着诚意去讲老师，只是诚意也得借自己的问题才说得出口。母亲讲父亲，讲的是她心里真实的那个人；只是她心里的那个人，本来就是在她与父亲二十年的日子里缠出来的。

第二道：反向师承不等于没有约束。前面讲过，三幅肖像的交集是一层硬骨架；文献的年代、抄本的流传、彼此可对照的细节，都在限制讲述的自由。纠缠不是"怎么说都行"，而是"每一种说法都得经过别的说法的检验才站得住"。至于在一位具体的哲学家身上，怎样一步步分辨"本人"与"被讲出来的他"，那是一套专门的工序，第12章再详谈。

◆ 一个留下来的问题

本章从一个反常现象出发：最有名的老师，没有一个字。我们看到，他之所以"有名"，正是因为有人替他写；而替他写的人，又被下一个人重新写过。老师被学生生成，学生又被学生的学生定型。

可是这样一来，一个新的问题浮了出来。如果三个人互相生成，那么前面第5至7章那种"一人一轮"的讲法还成立吗？苏格拉底那一轮、柏拉图那一轮、亚里士多德那一轮，究竟是三台各自运转的机器，还是同一台机器转了三圈？如果是同一台，那么上一圈留下来的东西，是怎样变成下一圈的动力的？柏拉图在第二

圈里是那个被逼出来的新答案，到了第三圈，他又成了什么？这是下一章要回答的问题。

带走的话

我们认识的老师，常常是学生讲出来的老师；讲述有约束，也有添笔。

本章判错句

如果三幅苏格拉底画像在关键处完全一致，看不出各自作者的问法，反向师承就只是一句俏皮话。

想一想

你对父母年轻时的印象，有多少是别人讲给你听的？

哪一位名人在你心里的样子，其实来自一本畅销书？

◆

09

第 9 章

一台引擎转了三轮

这一章的问题

三个人，是三台各自运转的机器，还是同一台引擎转了三轮？

读到这里，很多读者心里会冒出一个整齐得诱人的方案：显露、差异、纠缠，正好三个字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正好三个人。苏格拉底一辈子在追问、比较、试探，那他就是差异；柏拉图把答案稳稳立在理念世界，那他就是显露；亚里士多德把一切放回自然、放回质料、放回生物的生长，那他就是纠缠网络。一一对上，好记好讲，画在黑板上也漂亮。

本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张漂亮的对照表撕掉。不是因为它全错。苏格拉底身上确实有很重的追问色彩，柏拉图确实给出了一个"立得住"的答案，亚里士多德确实最重视事物生长的土壤。错在它把会转的东西钉死了。第5、6、7章分别讲了三个人各自的一轮发生，第8章又倒过来讲了学生怎样生成老师。到了这里，我们要把三轮放在同一张桌子上，看清它们不是三台机器，而是一台引擎转了三圈；看清每一圈里，三个字母都在场，而且每个人在不同的圈里坐的位置不一样。这一章是第二编的收束，也是全书理论的枢纽：后面的五个动作、两千年的答案搬家，都要从这里拿钥匙。

◆ 三轮摆在一张桌上

先把前三章的内容压成一张表。表里每一行都是同一个格式：这一轮里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顶上了，逼出了什么新的显露，这个显露又反过来改写了什么。

	第一轮：苏格拉底	第二轮：柏拉图	第三轮：亚里士多德
推进中的差异序列	街头诘问：追问"勇敢、虔敬、美是什么"	继续追问，但在流变的感性世界里落不了地	观察、分类、生物学研究
撞上的纠缠土壤	雅典人对美德词的熟练使用、民主法庭、智者修辞、传统虔敬	老师之死、问题悬置、巴门尼德"知识对象须不变"	在学园沉淀约二十年的理念论
被逼出的新显露	"知道自己不知道"、定义要求；对话多止于无解	答案搬到彼岸：分离的理念、回忆说、辩证法	答案搬回物中：形式在质料里、潜能与实现、四因、范畴、三段论
回写	城邦以死刑负向回写；他的死成了柏拉图写作的起点	建学园，追问从街头进入机构；老师被改写成对话主角；晚年自我批判	《工具论》重置推理方式，吕克昂与后世注释传统重置土壤；后来板结成权威
留下的亏缺	答案没有落点	答案被抬出世界，过程与土壤被贬为影子	过程被目的预先钉死，回写过厚而板结

这张表里的史实部分——苏格拉底的审判、学园的建立、亚里士多德在学园的约二十年、《工具论》对后世逻辑的长期支配——都有文献可查；而"撞上""逼出""回写"这些动词，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我们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格式里，不是为了显得整齐，而是为了让读者能横着读：读第一列的最后一行，再读第二列的第二行，会发现它们说的几乎是同一件事。

◆ 上一轮的亏缺，就是下一轮的矛盾

横着读，就能看到本章的第一个核心判断：上一轮留下的亏缺，正是下一轮的矛盾所在。亏缺不是上一轮的"缺点"，可以在下一轮被顺手修好；它是下一轮的引擎点火的地方。

先看第一圈到第二圈。苏格拉底那一轮显露出来的东西很特别：他让人清清楚楚地认出了一件事——我们天天在用的美德词，没有一个说得清。用全书的说

法，这个显露达到了"可识别"，却没有走到"可维持"和"可表达"：他拒绝著述，对话停在无解，答案没有地方落脚。当这样一个人被城邦处死，留给柏拉图的就不是一套学说，而是一个悬在半空的问题，加上一个"认真追问的人会被杀"的事实。柏拉图的整个第二轮，就是在这个悬空上起步的：问题既然在流变的街头落不了地，那就给它找一个不变的地方落。他的理念论，是对"无落点"的直接回应。

日常里这种接力最常见于家庭装修。丈夫张罗装修，天天琢磨"咱家到底要个什么风格"，拿着手机给全家看各种图，谁说一个方案他都能挑出毛病，可他自己一直不拍板。装到一半，丈夫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妻子接手，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本样板间图册，翻到一页，说"就照这个来"。她定样板，不是因为她比丈夫更懂审美，而是因为丈夫留下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定论"；她的整个做法，都是对这个空白的回应。

再看第二圈到第三圈。柏拉图给了答案一个家，代价是把这个家搬出了世界。理念不变、完美、自足，感性世界里的一切只是它的影子，生长、变化、土壤，都被降到了次一等的位置。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沉浸了约二十年，这套学说对他首先是土壤，然后才成为对手。他做生物学、观察海洋生物，每天面对的恰好就是被柏拉图贬为影子的东西：一只海胆怎样长出来，一种动物的器官为什么这样排列。在《形而上学》A卷第9章，他批评理念对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毫无贡献。这句话，正好点中了柏拉图那一轮留下的亏缺：答案有了家，过程却没了着落。亚里士多德的第三轮，就是从这个亏缺起步，把形式放回质料，把"生成"当作核心对象来研究。

日常对应：连锁餐饮总部发了一本精美的标准手册，每道菜的成品照片、摆盘角度、出品温度写得清清楚楚。门店来了一个干了多年的店长，他发现手册对"做出来是什么样"讲得极透，对"一锅菜在灶上怎样从生到熟"一句没讲；新来

的厨师照着成品照片练，练不出来。店长于是开始自己写"过程记录"：火什么时候大、什么时候收、油温到什么程度下料。他并不反对手册，他是在手册的空白处开工。

最后看第三圈之后。亚里士多德把"生成"请回了哲学的中心，这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地方。可他的生成有一条尾巴：潜能与实现是目的论的，事物的生长被它"本来要成为的样子"预先规定了。再加上他的著作后来被编订、注释、讲授，在中世纪的学校里成为权威，回写越积越厚，最终板结。到了伽利略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关于落体和运动的说法，成了新科学必须撞开的旧壳。这一轮的亏缺——过程被目的预先钉死、回写过厚而板结——成了近代科学的矛盾所在。这一段的细节，第13章再详谈。

日常对应：一个孩子从小被家里认定"将来要当医生"，于是他做的每件事都被这个目的解释：喜欢拆收音机，是"手巧，适合做手术"；爱看小说，是"浪费时间，耽误考医学院"。这套解释一开始帮他成长，给他方向；可它太厚了，等孩子十八岁真想学建筑，全家人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别的语言来谈论他。孩子要走出自己的路，第一件事就是撞开这套"本来该成为什么"的解释。

把三段连起来，规律就清楚了：每一轮的新显露，都在解决上一轮留下的那个最紧的结；而它自己的解法，又会在别处勒出一个新的结。这不是谁的过错。显露总是有代价的，答案落在某处，就意味着别处被压下去了；被压下去的那一块，正是下一个人起手的地方。

◆ 同一个亏缺，不只点着一台引擎

"上一轮的亏缺就是下一轮的矛盾"，这个说法会招来一个很有力的反对：这是事后画圈。我们已经知道柏拉图后来讲了理念论，回头再说苏格拉底留下的

是"无落点"，当然严丝合缝；换一个结局，照样能回头找出另一个"亏缺"来配它。任何历史，只要从结尾倒着讲，都能讲得像必然。

这个反对要认真接住，而最好的回应恰好藏在史料里。第5章讲过，苏格拉底的学生不止柏拉图一个：安提斯泰尼往简朴与硬气里走，亚里斯提卜往快乐里走，麦加拉的欧几里德把老师对"善"的追问接到巴门尼德的"一"上。同一个"答案没有落点"，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土壤里，点着了好几台不同的引擎：有人把答案落在一种生活方式上，有人落在当下的快乐上，有人落在不变的一上，柏拉图落在分离的理念上。这件事对本书的判断是一次双向的检验。一方面，它说明亏缺不是一条早就铺好、只等后来者去走的路：亏缺只规定哪里发紧，不规定往哪里松。如果亏缺能推出唯一的下一轮，那就又回到了目的论，本书恰恰不这样看。另一方面，它也给"事后画圈"立了一个可以检查的标准：说上一轮的亏缺是下一轮的矛盾，必须能在下一位哲学家自己的文本里，找到他正对着这个亏缺用力的痕迹。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在一篇篇对话里走进无解、在《斐多篇》里平静赴死，又让他在中期对话里开出理念的答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A卷第9章点名说，理念对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毫无贡献。找得到这样的痕迹，交接才算成立；找不到，就只是我们替古人编的接力。第23章会把这类失效条件一条条摆出来。

一支小乐队的主唱兼词曲作者突然退出，只留下排练时反复哼过、始终没写完的一段旋律。剩下三个人各奔东西：一个把那段旋律原样录成了歌，一个干脆转去做几乎不要旋律的鼓点音乐，一个进音乐学院补了一整套作曲规矩，从头写起。三人的起点是同一个空白——那首没写完的歌——却走出了三条路。站在空白这一头，你推不出谁会成什么样；可听任何一个人后来的唱片，都能指出他在哪几首歌里接着、绕着或者顶着那段旋律。亏缺与下一轮的关系就是这样：往前推不出来，往回查得到。

◆ 为什么不能把三个人贴上三个字母

现在回到开头那张被撕掉的表。为什么"苏格拉底等于差异、柏拉图等于显露、亚里士多德等于纠缠"不能成立？最直接的理由，就在上一节的表里：每一轮都有自己完整的三个字母。苏格拉底那一轮里，有差异序列（街头诘问），有纠缠土壤（雅典的法庭、修辞、虔敬），也有显露（无知之知、定义要求）。柏拉图那一轮、亚里士多德那一轮也一样。三个字母不是分给三个人的三份家产，而是每一轮发生都必须同时具备的三个侧面。少了任何一个，那一轮根本转不起来。

更深一层的理由，是位置会轮转。同一个柏拉图，在第二轮里是被逼出来的新显露：他的理念论，是老师之死和问题悬置合力逼出的那个答案。可是到了第三轮，他已经不是答案，而是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土壤：二十年学园生活，理念论是空气、是课程、是同事们的共同语言，是亚里士多德一切思考的出发地。同一个柏拉图，换了一轮，就换了座位。

这就像同一个男人。周末回父母家，他是儿子：母亲问他吃饱没有，父亲叮嘱他开车慢点，他在饭桌上被安排、被惦记。周一回到自己家，他是父亲：他检查孩子作业，他安排家里的开销，他在饭桌上惦记别人。问"他到底是儿子还是父亲"，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他在哪个家里，就坐哪个位置；离开具体的家去问他"是什么"，就什么也问不出来。

◆ 儿子与父亲：把位置轮转讲透

这个例子看着家常，里面却有好几层，值得拆开讲，免得它被读成一句俏皮话。其一，座位由所在的圈决定，不由人的内里决定。那个男人没有一个"本来"的身份藏在儿子和父亲背后，坐在父母的饭桌边，他就是儿子；坐在自己家

的饭桌边，他就是父亲。柏拉图也一样。问"柏拉图在这套框架里是什么"，必须先问"在哪一轮里"；不报轮次，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

其二，座位换了，带过去的东西却不清零。这个男人当父亲时叮嘱孩子"开车慢点"，用的往往正是当年他父亲叮嘱他的那句话、那个语气；他在儿子座位上接下来的东西，成了他在父亲座位上发出去的东西。轮转不是换一张面具，而是上一个座位上的沉积，变成了下一个座位上的材料。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这样从第二轮走进第三轮的：它没有消失，它沉了下去，成了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地、手里的词。亚里士多德讲"形式"，用的正是柏拉图讲理念时常用的那个希腊词，只是他把它放回了质料之中。土壤不是被推开的，是被接过来再翻一遍的。

其三，也是这个比喻最要小心的地方。家里的座位是事先命名好的，"儿子""父亲"是亲属称谓，一个人还没学会说话，就已经被放在某个位置上了。三个字母的座位却不是事先排好的角色，没有人提前宣布柏拉图将在第三轮里当土壤。我们之所以说他是土壤，是因为在史料里看见亚里士多德脚踩着他、又顶着他用力。座位只能从这一轮实际发生的作用里认出来，不能事先分派。所以，说"柏拉图在第三轮里是纠缠土壤"，不是给他换一张新标签，而是在描述他在那一轮里干了什么；离开那一轮，这句话就不成立。比喻借的是"换圈换座"这一点，不借"座位早就排好"那一点。

其四更细：同一段时间里，一个人可以同时坐两个座位。那个男人周末带着孩子回父母家吃饭，饭桌上他既是儿子又是父亲——母亲往他碗里夹菜，他往孩子碗里夹菜，两个圈在同一张桌上叠着。柏拉图晚年也是这样。在亚里士多德那一轮里，他的理念论已经是学园的土壤；可在他自己尚未转完的那一轮里，他还在一篇篇晚期对话里检修理念论（第6章讲过《巴门尼德篇》的自我拷问，和《智者篇》里对"父亲巴门尼德"的顶撞），那是仍在推进中的差异序列。亚里士多德在学园的约二十年里，两轮一直叠着，同一个柏拉图在两个圈里各坐一个座

位。静态对应表最看不见的，正是这种重叠：表格里每个人只能占一格，而历史里的人常常同时站在好几个圈的交界上。

苏格拉底的位置轮转更复杂。在第一轮里，他的诘问是推进中的差异序列；到了第二轮，他的死和他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了柏拉图写作的土壤；而第8章讲过，我们今天认识的那个"苏格拉底"形象，又是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在后来的书写里一步步显露出来的。同一个人，在差异、纠缠、显露三个位置上都坐过，而且坐的先后顺序，并不是按他的生卒年排的。

静态对应还有一个实际的害处：它会把一套用来看"生成"的工具，变成一台贴标签的机器。标签一贴，思考就停了。家里人之间也常这样：说"老大是红脸，老二是白脸，老三是和事佬"，说多了，大家都信了，老二哪天温柔一次，全家都觉得反常，没人去想他其实一直在变。给哲学家贴字母，等于提前宣布他只能是什么，也就看不见他在不同的缠绕里会变成什么。

◆ 第一层：三大方程——每一刻都在互相生成

既然不能静态对应，那该怎样用这三个字母？全书的回答分三层：三大方程、123原理、六路径。它们不是三套平行的理论，而是同一件事从三个尺度上看。我们先一层层讲，再讲它们怎样咬合。

最底下一层是三大方程（第2章已初步介绍）：显露由差异序列在纠缠网络中生成，S=F(D,E)；差异序列由显露与纠缠网络生成，D=G(S,E)；纠缠网络由显露与差异序列生成，E=H(S,D)。F、G、H只是"由……生成"的占位记号，不是可以代入数字的公式。三条放在一起，说的是一件事：三者同时互生，没有谁先谁后。

拿柏拉图那一轮来试。理念论是显露，它是在辩证法的追问中、在学园与雅典的土壤里生成的——这是第一条。可辩证法本身的样子，也是被理念论和学园

塑造的：正因为相信有一个不变的理念等在那里，追问才有了"上升"的方向，才发展出从假设一步步往上推的方法；正因为有了学园这样的机构，追问才能成为日常的训练，而不是街头的偶遇——这是第二条。学园这片土壤，同样是被理念论和辩证法生成的：没有这套学说和这种方法，就不会有这样一个让人在一起几十年做研究、教数学、辩概念的地方——这是第三条。三条同时成立，拆不出一个"最先"。

第2章用过三脚架的比喻：三条腿互相撑着，抽掉哪一条都站不住。这个比喻只能用到这里——三脚架的三条腿是先做好再拼起来的，而三大方程说的是三条腿在互相撑的过程中才长成腿。日常里更贴近的是一个家的"家风"。家规（立在那里、说得出来的东西）是在一家人日复一日的磨合、争执、让步中定下来的；可一家人怎样争执、怎样让步，又是被家规和这个家的处境塑造的；这个家的处境——亲戚怎么走动、邻里怎么看、孩子上什么学——又被家规和日常磨合改写着。你问"这个家先有家规还是先有吵架的方式"，就和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没有答案。三大方程管的是"同时"：任一时刻，三者都在场、都在动。但它不管"时间"：它不告诉你事情是怎样一步步变化的。这就需要第二层。

◆ 第二层：123原理——把同时互生拉开成一个回合

123原理说的只有一个循环：差异序列与纠缠土壤顶上了，形成矛盾；矛盾逼出显露的改变；新的显露回写，重置差异序列和纠缠土壤。一、二、三，就是"矛盾—逼出—回写"这三拍。它不是万能三步法，不能把任何三个步骤都叫作123；"计划、执行、总结"不是123，"早年、中年、晚年"也不是。判断是不是123，看有没有那个矛盾、有没有被逼出来的改变、有没有能在史料里观察到的回写。如果说三大方程是一张静止照片里三者的互相勾连，那么123原理就是把这张照片放进时间里，看它怎样走完一个回合。三轮对照表的每一列，就是一个123回合。

这里要特别讲讲"回写"。回写是循环闭合的条件，不是"反馈"或"复盘"。复盘是事后坐下来总结经验，总结完一切照旧也可以；回写是新的显露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土壤和推进方式，改完之后，下一轮的人站在一块不同的地上。苏格拉底那一轮的回写是负向的：城邦用死刑回应了他，这个回应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柏拉图面对的土壤——"认真追问的人会被杀"成了一个事实。柏拉图那一轮的回写是建学园：追问从街头进入了机构，这是可以在史料里看见的改变。回写不能宣布，只能观察：说某个学说"影响深远"，不算回写；指出它让哪个机构建起来、哪种方法成了课程、哪些人因此换了说话的方式，才算。

日常对应：一家小饭馆推出一道新菜。食客的口味和厨房的做法顶上了——客人越来越想吃清淡的，可厨房只会重油重盐，这是矛盾。厨师被逼着试出一道清蒸做法，这是逼出的改变。这道菜卖火了之后，回写开始：店里换了一批蒸笼，采购改进了更新鲜的鱼，熟客开始专门冲这道菜来，带来的新客人口味又不一样了。厨房的做法变了，食客的构成也变了。到这一步，一个回合才算闭合；而闭合之时，新的矛盾往往已经埋下：清淡菜多了，原来爱重口味的老客开始抱怨。

◆ 第三层：六路径——我们从哪一头起手去看

第三层是六路径。三个字母排列起来有六种顺序：先看显露、再看差异、后看土壤，是S→D→E；先看差异、再看显露、后看土壤，是D→S→E；依此类推，一共六种。六路径说的不是事物本身按这个顺序发生——三大方程已经说了，三者同时互生——而是观察者、行动者从哪一头起手。选哪一条，要看手上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全书常说的"任务DNA"。

教科书通常走S→D→E：先讲某人的学说是什么，再讲他从谁那里学来、跟谁争论，最后讲时代背景。这条路适合理解一个成形的体系，学生先拿到一张完

整的地图，再去看地图是怎么画的。本书解哲学史走D→S→E：先跟着问法的推进走——他在追问什么，追问怎样一步步推进、受阻、转向；再看这追问逼出了什么学说；最后追学说背后的土壤与它对土壤的回写。理由在第2章已讲：我们要看的是纠缠，而问法的推进最能暴露一个人在顶撞什么。

日常对应：认识一个新同事，有几种起手方式。先看他的简历和头衔，知道他"是什么人"，再看他怎么做事，最后打听他从哪家公司出来——这是先看显露。先看他开会时怎么提问、遇到难题怎么拆，再看他最后拿出了什么方案，再去了解他原来的团队和行业——这是先看差异。先打听他的出身、行业和过去的老板，再看他做事方式，最后看他的成果——这是先看土壤。三种起手都能认识这个人，但看到的重点不同。要和他合作一个项目，先看他怎么做事最有用；要给他定岗位，先看简历也许更快。

◆ 三层怎样咬在一起

现在可以讲三层的咬合了。一句话：三大方程保证"同时"，123原理展开"时间"，六路径决定"入口"。三层缺一不可，而且缺了哪一层，剩下的两层都会走样。

只有三大方程，没有123，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缠成一团的结，知道一切都在互相生成，却讲不出任何历史：柏拉图为什么偏偏在苏格拉底死后把答案搬到彼岸，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偏偏在学园二十年后把答案搬回物中，都无从说起。就像只知道"家风和家规互相塑造"，却讲不出这个家是在哪一年、因为哪件事改了规矩。

只有123，没有三大方程，循环就会退化成一条传送带：第一步矛盾、第二步显露、第三步回写，然后下一个人接着来。这正是本章开头那张静态对应表的来源——一旦忘了每一刻三者都在场，就很容易把三拍分给三个人，"苏格拉底

负责矛盾，柏拉图负责显露，亚里士多德负责回写"。三大方程在底下拉着，提醒我们：每一拍里三个字母都在，矛盾那一拍也有显露，回写那一拍也有差异推进。

只有六路径，没有前两层，就只剩下一套读书技巧：先看这个，再看那个。路径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进入的是一个同时互生、又按回合推进的东西；入口不同，进去之后看到的是同一台引擎的不同侧面，而不是各自不同的东西。

三层咬合，用一个厨房里的场景可以完整地看一遍。一家人做年夜饭。任何一刻，菜的样子、做菜的手法、厨房里的条件（谁在帮忙、灶有几个眼、老人爱吃什么）都在互相牵制：多一个帮手，手法就能变，菜也跟着变——这是三大方程。从头到尾看，有一个个回合：老人牙口不好和红烧肉要有嚼劲顶上了，逼出一道炖得更久的新做法，新做法占了一个灶眼，于是另一道菜只能改成凉拌——一个回合闭合，下一个矛盾已经开始——这是123。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家吃年夜饭的女婿，想弄明白这桌菜，你可以先尝菜（从显露起手），可以先站在厨房门口看丈母娘怎么忙（从差异起手），也可以先问清楚家里有几口人、谁忌口（从土壤起手）——这是六路径。三层说的是同一顿饭，只是尺度不同：瞬间、回合、入口。

把年夜饭换回哲学史，三层要在三轮上并排看，才看得出咬合的好处（这里是本书的解读）。入口选在差异这一头，三轮就各是一段追问的推进：街头的诘问，学园里的辩证，海边与吕克昂里的观察分类。顺着这个入口走，三个回合首尾相接：第一轮的负向回写（老师之死）成了第二轮的土壤，第二轮的回写（学园和它沉积了二十年的理念论）成了第三轮的土壤，第三轮的回写（《工具论》与后来的注释传统）又成了后世的土壤。要是换从显露起手，三轮看上去就是三套学说依次排队，交接处那道缝——上一轮的回写怎样变成下一轮的土壤——恰恰最容易被一步跨过去。三大方程则守在每一个交接处：交接不是一棒递一棒的

那一瞬，而是两轮在同一片土上叠着转的一段时间，前面讲过的学园那二十年就是如此。入口决定看见什么，回合给出先后，方程提醒交接处从来不是一个点；少看一层，这段历史就会被讲成一张静态的表、一条传送带，或者一套读书技巧。

◆ 引擎不是楼梯

最后要防一个误读。说"一台引擎转了三轮"，很容易让人以为三轮是在往上走：苏格拉底低，柏拉图中，亚里士多德高，哲学一轮比一轮进步。这正是第3章批评过的"正—反—合"上升叙事。引擎转圈，不等于车在爬坡。

第一，每一轮解决上一轮的亏缺，同时生出自己的亏缺，没有哪一轮是没有代价的"更高"。亚里士多德确实把过程请回来了，可他也给过程装上了预定的终点；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比柏拉图更少一个结，只是结换了位置。

第二，没有预定终点。亚里士多德是三人中最接近发生学的——他把"生成"本身当作核心对象。本书接过的正是他的这个动词，但卸掉他的目的论：生成不是朝着一个早就写好的结果长去，同样的起点在不同的土壤里会长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第三，循环会回绕。三哲之后，学园在阿尔克西劳手里转向怀疑派，又回到了苏格拉底式的悬置；普罗提诺越过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这些回绕的细节，第14章和第22章再详谈；这里只需记住，一台会回绕的引擎，不可能是一部只往上开的电梯。

日常对应：揉面。揉一轮，面里的筋就变了，下一轮揉的已经是另一团面；揉到一定时候，还要放着醒一醒，让它松回去一点，再揉。揉面没有"最终完美的面"，只有这团面今天要做馒头还是做拉面。一个只会往一个方向使劲、认定面越硬越好的人，做不出好面。

◆ 留下的问题

本章把三轮摆在了一张桌上，讲清了三件事：上一轮的亏缺是下一轮的矛盾；三个字母不能贴给三个人，因为位置在轮转；三大方程、123原理、六路径是同一件事在瞬间、回合、入口三个尺度上的样子，咬合在一起才能用。

希腊三哲是这台引擎第一次完整地转起来的样本，史料相对集中，师生当面缠绕，轮与轮之间的交接看得见。可是两千年后的哲学家，很多是隔着几百年、经过注释者和译者去和前人缠绕的；他们追问的，也未必是"X是什么"。面对这样一位陌生的哲学家，我们不能把三轮对照表直接套上去——那会把一盏灯用成一个模具。我们需要的是从这三轮里提炼出来的、换一个人也能照着做的工序：先看他在追问什么，再看他在顶撞谁，再看后世的他是被谁讲出来的，再看他改写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最后看循环有没有绕回去。这五个动作，就是第三编要一个一个拆开讲的。第一个动作，是第10章的"跟问法，不跟人"。

> **带走的话**
>
> **上一轮的亏缺，就是下一轮的矛盾。**

> **本章判错句**
>
> 如果某一轮的新答案找不到可识别的前置矛盾，或者三个人可以固定贴成三个字母而不丢东西，本章的读法就失效。

> **想一想**
>
> 你上一次跳槽或搬家，是被上一份工作、上一处房子的哪个缺口逼出来的？
> 你现在的做法，会给下一个接手的人留下什么缺口？

◆



第　三　编

工序：解构一位哲学家的五个动作

导　语

从三哲那一轮完整的发生里，可以看出五个动作。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规则，而是从苏格拉底那里看到问法、从柏拉图那里看到前置矛盾与改写、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看到回写与板结、从三人之间看到反向师承、从三人之后看到回绕，一样一样拣出来的。

这一编一章讲一个动作：跟问法，不跟人（第 10 章）；找前置矛盾，看他在顶撞谁（第 11 章）；查反向师承，看后世的他是谁塑造的（第 12 章）；追回写，看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第 13 章）；看回绕，看循环有没有绕回去（第 14 章）。每一章都讲清这个动作是什么、为什么非做不可、怎样做、常被怎样用歪，先拿三哲回头示范，再拿一位后世哲学家小试。

五个动作合起来，就是导论说的那盏灯。灯给的是方法，不是结论。

10

第 10 章

跟问法，不跟人

这一章的问题

读一位哲学家，为什么要先跟他的问法，而不是先跟他这个人？

◆ 记住了一个人，却没碰到他的题

先说一件常见的事。有人想跟一位名厨学本事，花了半年研究他：他用哪个牌子的刀，围裙怎么系，几点到后厨，骂徒弟时说什么口头禅，连他早年在哪条街摆过摊都打听清楚了。半年后让这人上灶，炒出来的菜和从前一样。他不是不用功，他把功夫用在了"这个厨师是谁"上，而这位厨师真正的本事，藏在另一个问题里：他这些年一直在跟哪道菜较劲，那道菜从前为什么总做不好。

读哲学的人常常走同一条路。说起苏格拉底，许多人能讲出一串细节：长相不好看，柏拉图的《会饮篇》里亚西比德把他比作西勒诺斯雕像，外表粗陋、里面藏着神像；他常年赤脚；他的妻子脾气不好（色诺芬已有提及，更夸张的泼水之类故事则出自晚出轶事，靠不住）；他在狱中饮下毒芹汁。这些都记得，可要是追问一句"他到底留下了什么"，回答往往只剩一句"他说自己一无所知"。人物越来越鲜明，问题越来越模糊。

这一章要讲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次序倒过来：**跟问法，不跟人**。先弄清一位哲学家手里攥着的是哪道题、他怎样问、他认什么样的东西算回答，再去看他的生平、性格和时代。生平不是不要，而是要等它对问法起了作用，才请它进门。

◆ 问法不只是一个问题

"问法"这个词需要先说清楚，因为它比"问题"多出两层东西。同样一句"什么是正义"，苏格拉底问出来，和两千多年后罗尔斯问出来，是两道不同的题。苏格拉底要的是一个定义，一个能把所有正义的事统统罩住、又能经得起反驳的说法；罗尔斯要的是一套分配规则，问的是一群彼此有分歧的人，怎样安排制度才算公平（第21章再详谈）。字面一样，题不一样。所以一个问法至少包含三样东西：**问的是什么；怎样问，也就是用什么步骤去逼近；以及什么算回答，什么不算**。第三样最容易被忽略，却最能暴露一个人的底牌。

拿家里的事打个比方。孩子不肯吃饭，奶奶问"为什么不吃"，心里要的回答是"饭菜不合口"，于是换菜；医生问"为什么不吃"，要的回答是"有没有发烧、积食"，于是摸肚子；老师问"为什么不吃"，要的回答也许是"在学校受了委屈"。三个人问的是同一句话，认可的回答完全不同，接下去做的事也完全不同。想知道这三个人各自在解决什么，听他们问的那句话没用，要看他们**听到什么样的回答才会停下来**。

在本书使用的发生学语言里，这件事有个名字，叫"任务 DNA"：一个问题本身最吃紧、最该先抓住的那一面。这个说法用在读哲学家时有两层。一层是他手里那道题的 DNA：他到底在解决什么，什么算解决。另一层是我们读他这件事的 DNA：我们想弄明白的，不是他的体系长什么样，而是他的思想怎样一步步发生出来。后一层决定了我们的起手方式。教科书讲哲学家，通常先摆出学说，再讲师承，最后补上时代背景，这是先看已经成形的学说、再讲来路、后铺土壤的次序，适合理解一个体系。本书要追的是纠缠，所以换一个起手：先跟他的追问序列，也就是一步一步怎么问、怎么被驳回、怎么改问（这一面我们称为"差异序列"，指推进、比较、试探、修正、收敛的那条路）；再看学说怎样显露出来；最后追他扎根的土壤和他留下的回响。"跟问法"就是这条路的第一步。

◆ 起点错了，越努力越远

为什么非要从问法起手？因为起点上的错误有一个阴险的特点：**它不报错**。开车导航时把目的地输错一个字，系统照样规划路线，照样提醒你前方三百米右转，你开得越稳、越守规矩，离真正要去的地方越远。中途走错一个路口，导航会立刻重新规划；可目的地输错了，沿途没有任何一个提示会告诉你。读哲学也是这样。中途读错一段话，后面的段落会跟你打架，你会察觉；可要是一开始就把一个人的题看错了，后面每一页都会被你顺手装进那个错题里，越读越"通"，越通越错。

跟人而不跟问法，最常见的有三种起点错误。第一种是**逸事化**：把一位哲学家读成一串故事。故事好记、好讲，可故事回答的是"他是个怎样的人"，不是"他在解决什么"。苏格拉底赤脚、饮鸩，这些放在任何一个怪人或殉道者身上都讲得通，唯独讲不出他那道题。

第二种是**把结论当问题**：一上来就背"柏拉图主张理念论""亚里士多德主张四因说"。结论是一个人跟问题较劲之后的结算点，单看结算点，就像只看一张收据上的总额，不知道钱花在哪、为什么花。背熟了"理念是永恒不变的"，却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一个不变的东西不可，那么理念论在你眼里只能是一个古怪的念头。

第三种是**贴时代标签**：说"他是奴隶制城邦的思想家，所以如何如何"。时代确实是土壤，但标签把土壤压成了一个形容词。同一个雅典，养出了智者，也养出了苏格拉底，还养出了把苏格拉底送上法庭的那些人。土壤不会替一个人选题。

这三种错误都会让人很勤奋。查生平可以查一辈子，背结论可以背一整本，贴标签可以贴满一面墙，每一样都"有收获"，就是摸不到门。

◆ 人为什么总是先跟人

既然跟人容易走偏，为什么大家还是忍不住先跟人？这不全怪读者懒，有三股力在推。第一股力来自我们的脑子。人对人的兴趣远远大过对题的兴趣。小区里谁家孩子考上了名校，大家记得他每天几点起床、上过哪个补习班、他妈妈怎么陪读，却很少有人问一句：这孩子那三年真正啃下来的是哪几类题？人物有面孔、有情节，题目只有一行字，记忆天然偏向前者。

第二股力来自讲述的方式。哲学史一旦写成书、进了课堂，就要按人分章：第几章某某，生平、著作、思想、影响。这种排法方便查找，却在不知不觉中告诉读者：单位是人。题被切成碎片，散在各人名下，一道题在三个人手里怎样改问、怎样搬家，反倒没人讲。

第三股力最隐蔽：跟人让人安心。记住一个人说过什么，就像拿到一份标准答案，可以复述、可以考试、可以在饭桌上引用；跟一道题，却意味着要和他一起站到那个说不清的地方，忍受一段没有答案的时间。苏格拉底的对话之所以让人读着难受，正是因为它不给你那份安心。很多人宁可背"苏格拉底说他一无所知"这句结论，也不愿意陪他把一场追问从头走到无解，因为前者省力，后者费神。

看清这三股力，就知道"跟问法"不是一句轻巧的口号，而是一种逆着习惯的纪律。它要求读者每次翻开一位哲学家，先按住想记人名、记结论的那只手，问一句：他在跟哪道题较劲？

◆ 回头看三哲：同一道题的三种问法

用这个动作回看希腊三哲，会发现他们三人接力的，与其说是一套学说，不如说是一道题的三种问法。这里只看问法，三人各自的学说和那三轮循环，第5至7章已经展开，第9章做过并置。

苏格拉底的问法，在柏拉图早期对话里看得最清楚。《游叙弗伦》里，游叙弗伦正要去告发自己的父亲，苏格拉底问他什么是虔敬。对方答：虔敬就是我现在做的事，告发作恶的人。苏格拉底不收这个回答，他说自己要的不是一两个虔敬的例子，而是让一切虔敬之事成为虔敬的那个"样子"本身。《拉凯斯》里，将军拉凯斯说勇敢就是守住阵地、不逃跑；苏格拉底提醒他，有的骑兵正是边退边打仗的，退着打的人难道就不勇敢？《美诺篇》开头，美诺列出男人的美德、女人的美德、孩子的美德，苏格拉底说自己问一个，对方却给了一窝。

把这几段放在一起，苏格拉底的问法就显出来了：问"X 是什么"；不接受举例，不接受列清单；只接受一个能罩住所有实例、并且经得起反例的说法。他手里的那根尺子极严，严到他自己也给不出能过关的回答，所以这些对话多半停在无解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M 卷第 4 章替他总结了两项贡献：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两项都是"问法"层面的贡献，不是结论。苏格拉底留下的，首先是一个提问的标准。

柏拉图的问法在接过这道题时悄悄变了。还是在《美诺篇》里，美诺被问急了，反过来抛出一个难题：你要找的东西，你要么已经知道，那就不必找；要么根本不知道，那你找到了也认不出来，所以探究不可能。这个难题后来被称为"美诺悖论"。苏格拉底式的追问一旦被这样反问，就逼出一道更深的题：**一个"X 是什么"的回答，要想可能被找到、被认出、站得住，它必须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该住在哪里？**　这已不是"虔敬是什么"，而是"能被定义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他后来的回答，回忆说也好，分离的理念也好，都是对这道新题的回应。看清这一点，就明白理念论不是凭空的玄想，它是对"什么算回答"这根尺子的追究：既然流变的感性事物经不起这根尺子，答案就只能住在不流变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的问法又换了一层。《物理学》第一卷里，他回顾说，早先做哲学的人被巴门尼德的论证困住了：一个东西要生成，要么从"是"生成，要么

从"不是"生成，前者不必生成，后者无中不能生有，于是生成似乎不可能。亚里士多德拿出质料、形式和缺失这三样来拆这个结。到《形而上学》Z 卷开头，他说"存在是什么"这个自古以来一再被追问、一再令人困惑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实体是什么"。把这两处并看，他的问法是：**一个东西怎样成为它所是的那个东西？变化和生成怎样可能，而又不让答案散掉？** 他要的回答，既得像苏格拉底要求的那样有普遍的形式，又不能像柏拉图那样把形式抬到事物之外，因为那样就解释不了一块肉怎样从生到熟。

把三种问法摆在一起，可以列成一张简表：

	问的是什么	怎样问	什么算回答
苏格拉底	某个美德"是什么"	街头诘问，以反例逼退	罩住一切实例、经得起反驳的普遍定义（他本人没有给出）
柏拉图	能被定义的东西必须是什么样、住在哪里	对话、辩证法，追问回答的条件	不随流变而变的对象
亚里士多德	一个东西怎样成为它所是	回顾前人、观察、分类、推理	在事物之中、能说明变化的形式与原因

这张表的用处，不是让人背三行字，而是让人看见：如果只跟人读，三个人会被读成三尊各说各话的雕像；跟着问法读，就能看见同一道题在三个人手里怎样被改问，每一次改问又怎样决定了答案搬到哪里去。答案从悬空到彼岸再到物中，搬家的动力藏在问法的变化里。这是本书的解读，不是三人自己的说法。

◆ 问法在人与人之间流动

跟问法还有一个跟人得不到的好处：它让我们看见缠绕本身。跟人读，人和人之间只剩下"关系"：谁是谁的老师，谁批评了谁，谁综合了谁。关系的两端是先摆好的，像两颗钉子，中间拉一根线。跟问法读，看到的是一道题在几个人之间流动，每经过一个人就被改问一次，而这个人自己也在接题、改题的过程里被

塑造成后来的样子。柏拉图不是先成为"理念论者"、再去回应苏格拉底的；他是在接住老师那道没答完的题、被美诺式的反问逼到墙角之后，才长成了我们认识的柏拉图。端点是在缠绕中长出来的，这就是第2章说的"缠绕在先，端点在后"。

家里也有这样的事。一位母亲常问女儿："你到底想要什么？"女儿小时候听着烦，觉得那是催促。多年后女儿当了母亲，发现自己也在问孩子同一句话，可她要的回答变了：母亲当年要的是一个明确的志向，她要的是孩子别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愿望。同一句话在两代人之间传下来，被改问了一次，而两代人各自成为什么样的母亲，恰恰是在这一问一改之间定型的。如果只记"母女关系"，这一层就看不见。

所以，跟问法不只是读书的技巧，它是进入纠缠史的门票。一道题在谁手里被怎样改问，比谁拜了谁为师更能说明思想是怎样发生的。后面四个动作，找前置矛盾、查反向师承、追回写、看回绕，都要沿着这条问法的线去走；线没找到，后面的动作就没有着力点。

◆ 这个动作在三层里站在哪里

第9章说过，三大方程、123原理、六路径是同一台引擎在瞬间、回合、入口三个尺度上的样子。"跟问法"既然是五个动作的第一个，就得说清它在这三层里各占什么位置，否则很容易被误读成"问法最重要，其余都是陪衬"。

先看入口这一层。六路径讲的是从哪一头起手去看，本书解哲学史选的是先跟差异序列、再看显露、后追土壤这一条，"跟问法"就是这条路上迈出的第一脚。为什么选这一头，是由我们这件事的任务 DNA 决定的：我们要追的是一种思想怎样发生，而一个人怎样问、怎样被驳回、怎样改问，是这条发生之路最先露在文本表面的那一截。可是要记住，入口的次序不是发生的次序。先从问法读

起，不等于问法先于学说和土壤存在；就像看病先问症状，不是因为症状比病先有，而是因为症状最先被病人说出口。

再看瞬间这一层。三大方程说三者同时互相生成，放在这里，意思是一个人的问法本身就是被他已经显露的东西和他扎根的土壤塑造出来的。苏格拉底那根"只收普遍定义"的尺子，离不开雅典人天天在法庭和公民大会上熟练使用美德词这块地，也离不开他自己已经显露出的"知道自己不知道"；他拒绝修辞性的回答，拒的正是智者教出来的那一套。所以读出他拒绝什么的那一刻，我们其实已经碰到了他的土壤。跟问法是一个把手，不是一刀切下来的薄片：抓住把手往外一拉，学说和土壤会连着一起出来。

最后是回合这一层。123原理讲矛盾逼出显露改变、显露再回写重置推进与土壤，这样一个回合在问法上会留下一道清楚的痕迹：改问。柏拉图被美诺式的反问逼到墙角，把"虔敬是什么"改成"能被定义的东西是什么样"，这个改问的位置，正是那一轮矛盾逼出新显露的位置。因此读问法时，最该盯住的不是问法平平稳稳的段落，而是它拐弯的地方，那是引擎转动时在文本上留下的齿痕。

修车师傅听发动机，可以作个对照。他先听声音，这是入口；那声音是零件、机油、路况一起造成的，拆不开，这是同时；声音在某一公里突然变调，就是故障发生的那个回合。好师傅从声音起手，却从不以为毛病只在声音里，他最竖起耳朵的，正是变调的那一下。

◆ 怎样读出一个人的问法

道理不难，难在动手。我们给出三个追问，每一个都可以在文本上落地。**第一问：什么让他坐不住？** 找一个人的问法，最好的入口不是他最得意的结论，而是他反复回到、始终放不下的那个地方。一位老师傅三十年里换过很多菜式，可有一道汤他每隔几年就重新琢磨一遍，那道汤就是他的题。读哲学家也一样：

看他的第一部作品问了什么，最后一部又问了什么；看哪个困难在不同著作里反复冒头。柏拉图从早期对话到晚期的《巴门尼德篇》，一直绕不开"一与多""分有"这些难处，晚期甚至借巴门尼德之口把自己的理念论驳得相当狼狈。一个人肯拿自己的看家理论开刀，说明那道题比那套理论更要紧。

第二问：他拒绝了什么样的回答？ 这是三问里最锋利的一问。一个人拒绝什么，比他接受什么更能暴露他的尺子。苏格拉底拒绝例子；柏拉图拒绝感性事物作为知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拒绝与事物分离的形式。家里也是这样：一个人挑对象，嘴上说的条件常常是客套，被他一口回绝的那几个人，才说出了他真正在意什么。读文本时，留意那些"你说的不是我要问的""这算不上回答"的段落，问法就在那里显形。

第三问：这道题最吃紧的是哪一面？ 也就是读它的任务 DNA。有的题最吃紧的是"它到底是什么样"，比如一部法典的体系；有的最吃紧的是"它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里的"，比如一个人怎样陷入一段关系；有的最吃紧的是"它扎根在怎样的土壤里"，比如一个地方为什么总出某类事。哲学家手里的题也分这几种，而且同一个人一辈子未必只有一种。读出这一面，才知道他的学说该从哪一头去理解。读不准的时候，宁可多问一步，不要硬选。比如有人请你"帮看看这个团队的问题"，你先要问清是分工架构不对、推进节奏不对，还是彼此不信任，问清楚本身就是在读 DNA。

把三问在苏格拉底身上走一遍，看它们怎样咬合。第一问，什么让他坐不住：几乎每篇早期对话都绕回同一个场面，有人自信地用着一个美德词，他追问那个词到底指什么。第二问，他拒绝了什么：拒绝例子，拒绝清单，拒绝"大家都这么说"，也拒绝靠修辞赢得掌声的回答，后一条正是他与智者的分界。第三问，这道题最吃紧的是哪一面：不是某个美德的体系，也不是雅典的风俗，而是一次追问怎样一步步把一个自信的人推到"原来我不知道"，这道题最吃紧的是那

个推进的过程。三问走完，一句话就写得出来了："他问一个美德词是什么，只收经得起一切反例的普遍定义，用一连串追问把熟练的使用者推到无解处。"每一个半句都能在《游叙弗伦》《拉凯斯》《美诺篇》里找到出处。三问之后，还有一条小纪律：**用一句话写下他的问法，并写下你从文本哪几处读出来的**。写不出一句话，说明还没读出来；写得出却指不出文本，说明那句话可能是你自己的题，借了他的名字。这和装修时量尺寸一个道理：报给师傅的每一个数，都得说得出是从哪面墙、哪个角量的，说不出来的数，多半是凭印象估的。

◆ 最强的反对：问法是不是我们读出来的

到这里，一个认真的读者会提出一个很硬的反对。所谓"读出问法"，靠的是一个人的文本，尤其是他接受什么、拒绝什么；可我们判断哪段话算"拒绝"、哪段话算要紧，又得先有一个关于他问法的猜想。这不是绕圈子吗？更麻烦的是苏格拉底：他一字未写，我们读到的"苏格拉底的问法"，主要出自柏拉图的笔，那它会不会其实是柏拉图的问法，借了老师的嘴（三幅画像对不上的"苏格拉底问题"，第8章已详谈）？

这个反对要正面接，而且要承认它说中了一部分。读问法确实是一个来回：先有猜想，再拿文本对，对不上就改猜想。但来回不等于原地打转，关键在于有没有东西能让猜想吃亏。修车师傅也是先猜"多半是皮带松了"，然后去拧、去听，拧紧了声音还在，他就得认错改猜。读问法时，能让猜想吃亏的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拒绝"的段落，它们比"主张"的段落硬，因为拒绝往往要付代价：苏格拉底不收游叙弗伦的回答，对方被问得招架不住，最后推说有急事匆匆走开；一次次让体面人下不来台，最后在法庭上算总账。一个人肯为拒绝某类回答付代价，那根尺子多半是真的。另一类是反复用力的地方：如果一个人的著作一再在你认定的问法之外使劲，那就是你读错了，不是他跑题了。

至于苏格拉底，诚实的做法是把账分层。他问"X 是什么"这件事，不只柏拉图一家这样写：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开头一带也说，他总在讨论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之类人事上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M 卷第 4 章则把普遍定义记为他的贡献。几家来源各有立场，却在这一点上对得上，这属于硬骨架。可是那根尺子严到什么程度，比如是否非要罩住一切实例、对举例是否一概不收，就主要靠柏拉图早期对话了，这一层要老老实实记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名下。哪些是骨架、哪些是讲述者添的血肉，正是第12章那个动作要细做的事。

所以，反对意见没有推翻这个动作，而是给它加了一道护栏：读出的问法永远是一个可以被文本推翻的猜想，并且要注明是从谁的讲述里读出来的。这就像翻一个朋友的旧聊天记录，想弄明白他那年到底在纠结什么。你可以先猜是工作，再去看他回绝了哪些邀请、删掉了哪几条朋友圈；猜错了，那些回绝会一条条跟你对不上。

◆ 小试一位后世哲学家：斯宾诺莎

拿一位第四编不专门讲的人试一下手。斯宾诺莎（1632—1677）的生平极有故事性：1656 年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团逐出；靠磨光学镜片维持生计，深居简出；生前只以本名出版过一部讲笛卡尔哲学的书，《伦理学》在他去世那年才随遗著刊行；后世有人奉他为圣徒式的哲人，也有人骂他是无神论者。跟着人读，很容易读出一个"孤独的异端"。这个形象未必错，但它回答不了他在解决什么。

跟着问法读，入口在他未完成的《知性改进论》开头。他在那里自述：经验告诉他，日常生活里人们追逐的东西，财富、名誉、感官快乐，大都虚空无益；于是他决心探究，有没有一种真正的善，一旦得到，就能让人持续地享有最高的

快乐。这是一道"怎样活"的题，可他认什么算回答？这里要用上第二问：他拒绝一切依赖运气、会被夺走的好东西作为回答。于是《伦理学》采用几何学的次序写成，定义、公理、命题、证明一路推下来。这种写法常被当作一种古怪的文体癖好，跟着问法看，它恰恰是"什么算回答"的显形：他要的善，必须像几何证明一样不随境遇改变，任何人只要循着推理就能得到。

斯宾诺莎的答案落在哪里，粗略说，落在对整个自然那张必然秩序的理解里，他用"神，即自然"来称呼那张秩序。这里只点到为止，本书不为他单独立章。小试的目的只是演示：同一个人，跟人读得到一则传奇，跟问法读得到一道题和一把尺子；而他的生平，被逐出社团、不受聘于大学、只求安静地想，在读出问法之后才显出意义，它们是这道题的代价，不是这道题本身。

◆ 这个动作常被用歪的几种方式

"跟问法，不跟人"是一条好用的纪律，用歪了也会伤人。一把好刀切菜利落，拿反了先割自己的手；纪律越锋利，用歪时伤得越深。下面几种误用最常见，前两种是把问法读浅、读偏了，中间两种是把这个动作用过了头，后两种是忘了问法自己会移动、也会在转述里走样。

误用一：把问法读成口号。 有人把一位哲学家的问法缩成一句金句，比如"苏格拉底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据说刻在德尔斐神庙，苏格拉底确实常引用它，可它不是他的问法，它说不出他接受什么回答、拒绝什么回答。问法要带着那根尺子一起写下来，否则只是一张标签换成另一张标签。这就像把一家老店概括成"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说了等于没说。

误用二：拿自己的题替古人提问。 读亚里士多德，问他"为什么不做受控实验"；读柏拉图，问他"怎么看待民主选举的投票率"。这些问题可以问，但它们是我们的题。用自己的题去审古人，读出来的只会是古人的"不及格"。这像是拿

今天的外卖平台标准去评价一家五十年前的小饭馆：它当然不合格，可它那时在解决的根本不是配送问题。

误用三：以为跟问法就可以把人抹掉。 这是对本章最大的误读。我们说"不跟人"，是说不从人起手，不是说人不重要。生平进来的时机，是它改变了问法的时候。苏格拉底之死就是这样的材料：如果没有前 399 年那场审判，柏拉图的问法未必会转向"答案必须住在一个不会被处死的地方"（第6章已细讲）。这时候，人生事件已经成了问法的一部分。判断标准很简单：一条生平材料，拿掉它，你对他那道题的理解有没有变化？没变化，它就是轶事；有变化，它就是问法的土壤。

误用四：以为每个人都在问"X 是什么"。 本书用"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串起两千年，这根轴对希腊三哲和第四编的几位很好用，对另一些人就不好用。霍布斯问的是秩序怎样可能，加缪问的是在荒诞中怎么活，罗尔斯问的是怎样分配才公正，硬把他们塞进"X 是什么"，就是把灯当成了模具（第21章再详谈）。跟问法的意思恰恰是：每个人都要重读他自己的问题，包括那些不在这根轴上的人。

误用五：以为一个人的问法一辈子不变。 柏拉图晚年对理念论的自我批判，已经说明问法会在本人手里移动；维特根斯坦早晚期的自我顶撞更是典型（第19章再详谈）。读出一种问法之后，还要留意它在哪里转了弯。一位厨师年轻时琢磨怎样把菜做得好看，中年琢磨怎样做得稳定，老了琢磨怎样把手艺教出去，三道题都是他的，只是不在同一时候。

误用六：隔着译名读问法，却忘了译名也在改题。 中文读者说苏格拉底问"美德是什么"，这个"美德"已经替他收窄了题。他追问的希腊词 aretē，原本可以指任何东西的出色之处：刀的出色在于锋利，马的出色在于跑得好，人的出色又在于什么？所以他的题更接近"做好一个人，那份出色到底是什么"，而不只是今天说的道德品行。读成后者，他和工匠、将军、政客那一场场对话里为什么

老拿手艺打比方，就显得莫名其妙了。译名怎样一层层改写一个人的形象，第12章再详谈。这就像听一位外地老师傅讲"火要旺"，他嘴里的"旺"也许指的是火苗贴住锅底的样子，而不是火开到最大，照字面去学，只会把锅烧糊。

◆ 读出问法之后

到这里，我们有了第一个动作：先找到一个人攥着的那道题，连同他的问法和他的尺子。可是一旦把三哲的问法摆在一起，一个新的疑问就冒出来了。苏格拉底为什么偏偏要一个普遍定义？柏拉图为什么偏偏不放心流变的世界？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偏偏要把形式拉回物中？很少有人凭空生出一道题。一道题的锋口，几乎总是对着某个已经存在的回答磨出来的：那个回答在他身边站得好好的，人人都在用，偏偏在他在意的某一处接不住。换句话说，读出一个人的问法，下一步就得追问：**他在顶撞谁？谁的答案成了他的土壤，又成了他的对手？** 这是第二个动作，第11章来讲。

> 带走的话
>
> **起点错了不报错，只会让你越努力离答案越远。**

> 本章判错句
>
> 如果跟人起手与跟问法起手，读同一位哲学家得出的东西没有区别，这个动作就只是换了顺序。

> 想一想
>
> 你最近一次没解决的难题，问题本身问对了吗？
>
> 同一句"为什么不吃饭"，你最常问出的是哪一种问法？

◆

11

第 11 章

找前置矛盾：他在顶撞谁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新学说开口之前，它的对手在哪里？

◆ 儿子接手父亲的店

一家开了三十年的面馆，老板退休，儿子接手。街坊都以为儿子会守着老规矩：凌晨四点熬汤，碗大量足，不接外卖，墙上贴着"本店只做一种面"。结果儿子接手第一个月，先改的偏偏是父亲最得意的那一条——他开始做第二种面，还接了外卖。

老顾客议论纷纷，说这孩子不孝，把老店做坏了。可要是坐下来跟儿子聊一聊，会听到另一番话：父亲那套规矩在三十年前是对的，那时街上只有工厂工人，大家要的就是一碗管饱的面；如今工厂搬走了，街上住的是上班族和学生，中午只有二十分钟，谁也来不及排队等一碗面。父亲的规矩，正是他每天站在灶前时感到最别扭的那个地方。

儿子的新做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为了和父亲作对。它是被父亲留下的东西"顶"出来的：父亲的规矩就是他脚下的地，也是他天天要撞上的墙。这一章讲五个动作里的第二个：找前置矛盾。上一章说，读一个哲学家，先读出他接过来的问法。这一章要追问的是：这个问法的锋口，是对着谁磨出来的？谁的答案成了他的土壤，又成了他的对手？

◆ 前置矛盾不是"影响"

教科书里有一个现成的词，叫"影响"：柏拉图受苏格拉底影响，亚里士多德受柏拉图影响，康德受休谟影响。这个词不算错，但它把事情讲得太顺了，好像思想是一桶水，从上一个人的桶倒进下一个人的桶，倒得多就"影响大"，倒得少就"影响小"。前置矛盾是另一回事。它说的是：前人的某个回答，已经沉进了后人的土壤里，成了他学习、说话、思考时离不开的东西；与此同时，后人自己的推进——他的观察、他的经历、他碰到的新问题——又偏偏在这个回答接不住的地方撞上了它。一边是沉得很厚、有惯性的旧回答，一边是停不下来的新推进，两边的张力，就是前置矛盾。用全书的话说，这就是一轮循环的第一步：推进与土壤之间的矛盾。新的学说，是这股矛盾逼出来的结算点，不是谁的天才凭空放下的起点。

大白话说，"影响"像是说儿子从小吃父亲的面长大，所以也会做面；"前置矛盾"则是说，儿子正因为从小吃这碗面、太熟悉这碗面，才最清楚这碗面在今天哪里不对劲。前一种说法只看到了继承，后一种说法同时看到了继承和冲撞，而且看到两者是同一件事。

◆ 为什么非找不可

不找前置矛盾，会出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把一个哲学家讲成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才。翻开许多通俗读物，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论，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仿佛某天早上醒来，灵光一闪，一个学说就诞生了。这种讲法很好听，可它让读者完全看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答案，不是别的？一个学说被从它的矛盾里拔出来，就像一句吵架时的狠话被截掉了上下文，听起来要么莫名其妙，要么只剩下口号。

第二种毛病更隐蔽：把学说讲成一个自己会动的起点。好像理念论自己就有力量，自己推着柏拉图往前走，自己生出了学园。这就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全书一直守着一条纪律：显露出来的东西，是矛盾的结算点，不是第一因。找到前置矛盾，才能把一个学说放回它被逼出来的那一刻。

日常里，这就像听到邻居家传来一句"你永远都这样"。只听这一句，你会以为说话的人脾气很坏；可要是知道之前那半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碗没洗、约好的事又忘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五次——这句话就有了分量，你甚至能猜到下一句会是什么。一个学说也是这样，它总是一场争吵里的一句话。

◆ 前置矛盾不是"时代背景"

还有一个词容易和它混在一起：时代背景。第1章已经说过，教科书喜欢在讲学说之前放一段背景，读者往往一跳而过。前置矛盾和时代背景的差别，在于它窄、它具体、它有方向。时代背景说的是"那时候怎样"：战争、瘟疫、民主、王朝更替，这些东西笼罩着所有人。前置矛盾说的是"他在哪里卡住"：哪一个现成的回答，在哪一个具体的地方，接不住他手头的哪一个新东西。

打个比方。时代背景像天气：那天下着大雨，路上所有人都湿了。前置矛盾像鞋里的一粒石子：只有这个人在这只脚上感到了它，他走路的姿势因此变了。要理解他为什么一瘸一拐，光说"那天下雨"是不够的，得找到那粒石子。

雅典的战争和瘟疫，是那一代所有人的天气；可让苏格拉底一辈子在街头停不下来的，是一粒具体的石子：人人熟练使用的美德之词，一问就空。同一场雨里，有人去打仗，有人去经商，有人去写悲剧，只有他被这粒石子硌着。找前置矛盾，就是去找那粒石子。

当然，天气和石子不是无关的。正是那场雨把路泡软了，石子才更硌脚：战争把美德之词用坏，才让"一问就空"显得格外刺眼。前置矛盾长在时代里，但它比时代窄得多，也准得多。

◆ 怎么找：去三个地方

前置矛盾不会自己写在书的扉页上。要找它，可以去三个地方看。第一个地方，是他点名反驳的人。这最容易，也最容易看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A 卷第 9 章里一条条列出理念论的困难，对手是谁一目了然。可点名的对手不一定是最要紧的对手，有时候只是一个方便的靶子。

第二个地方，是他悄悄借用的东西。这往往比点名的对手更能说明问题。一个人反对谁，却还在用谁的词、谁的分类、谁的问题，那个人多半就是他真正的土壤。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的理念，可他自己学说的核心词"形式"，在希腊文里正是柏拉图用来称呼理念的那个词之一。他把这个词从彼岸搬回了物中，可词本身是从学园里带出来的。顶撞的人站在被顶撞者的地上，用的是对方的家伙什。

第三个地方，是他学说里最用力、最拧巴的那一处。一个学说在哪里写得特别费劲、绕了特别多的弯、留下了特别多的补丁，那里多半就是矛盾最紧的地方。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里让年轻的苏格拉底被老巴门尼德问得节节败退，问的正是"事物怎样分有理念"——这是他自己的学说最拧巴的地方，也正是下一轮矛盾会从那里爆发的地方。

找到候选的对手以后，还要做一个检查：这个对手，是不是真的在他的土壤里？他读得到吗？他身边的人在讨论吗？如果一位哲学家根本没机会接触某个思想，却被后人说成"在顶撞"它，那多半是后人替他安排的对手。前置矛盾必须是他身在其中的矛盾，不能是我们从后来的位置往回看时排出来的。

大白话说，看儿子为什么改店，先听他嘴上抱怨什么（点名的对手）；再看他改了以后，哪些老东西其实还留着，比如那锅凌晨四点熬的汤（悄悄借用的东西）；最后看他在哪件事上最犹豫、改了又改，比如要不要撤掉墙上那块"只做一种面"的牌子（最拧巴的地方）。三处对上了，才知道他到底在跟什么较劲。

◆ 回头看三哲：每个人的对手，也是他的地基

把这个动作放回希腊三哲，三轮循环的第一步就各自清楚了（细节见第5、6、7章）。苏格拉底顶撞的，是雅典人对美德之词的熟练使用，以及智者把这些词说向两边的本事。可他追问时用的，恰恰是这些人天天在用的词；他的对话总从对方最有把握的说法开始。没有雅典那块被说熟了的地，他的追问就没有东西可戳。

柏拉图顶撞的，有几股：城邦用多数票判死了追问正义的人；老师留下的问题悬而未决；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流变，可知识需要站得住的对象。可他顶撞这些，用的正是老师的问法和巴门尼德"真正存在者不变"的思路。他的彼岸，一半是对流变世界的反抗，一半是从前人那里借来的地基。

亚里士多德顶撞的，是他在学园里待了二十年的理念论。可他不仅借用了理念论的词，还借用了它的整个问题：事物的"是什么"住在哪里。他只是给出了相反的住址。

三个人都是这样：对手不是站在外面的敌人，而是脚下的地。这正是"前置"两个字的意思——矛盾不是在他开口之后才出现的，它在他开口之前，就已经沉在他的土壤里了。

◆ 矛盾的两边：一边厚，一边活

找到了对手，还要看清矛盾的两边各是什么样子。一边是旧回答，它的特点是厚。厚，指的是它已经沉进了许多地方：写进了课本，装进了机构，变成了日常说话的方式，变成了人们不假思索的判断。柏拉图去世时，理念论已经不只是他书里的一个说法，它是学园里的课程，是一群人讨论问题的共同语言，是年轻学者入门时先要学会的东西。越厚的回答，越有惯性；它不需要谁天天去维护，自己就会一代代传下去。

另一边是新推进，它的特点是活。活，指的是它在动、在试、在不断碰到新东西：亚里士多德在莱斯博斯岛的海边观察乌贼和鱼，一样一样地记，一样一样地分；每一次观察，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怎样长成这样的？这股推进停不下来，它每天都会带回一些旧回答装不下的材料。

矛盾有多紧，不看哪一边单独有多强，要看两边是不是正面撞上了。旧回答再厚，如果新推进不碰它，也相安无事；新推进再活，如果没有一个厚重的旧回答挡在前面，它也只会四处流散，撞不出什么来。只有当一个很厚的回答，正好挡在一股很活的推进的路上，张力才会累积到逼出新东西的程度。

大白话说，一家公司有一套用了十年的报销制度，人人都会填，谁也不觉得它有问题——这是厚的一边。来了一个新业务，全是海外出差，币种、票据、时差处处对不上——这是活的一边。只要新业务不多，大家就凑合着填；新业务一旦成了主业，每个月几百张单子卡在那里，财务部就不得不坐下来，把整套制度重新想一遍。新制度不是谁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是被厚的制度和活的业务挤出来的。

这一点也帮我们检查找到的对手对不对：如果你找到的"旧回答"其实很薄，在他身边根本没几个人当真；或者你找到的"新推进"其实很死，他本人并没有在那个方向上真正动过手，那么这个矛盾多半是你安排的，不是他经历的。

◆ 对手也塑造了顶撞的方式

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容易漏掉：前置矛盾的两边，并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碰巧撞上的东西。第2章讲过三个维度同时互相生成的关系，其中一条是：推进的方式，本身就是被已有的显露和土壤塑造出来的。放在这里，意思是说，后人顶撞前人的那股力气，它的方向、它的手法，往往就是前人教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能那么细致地拆解理念论，用的是学园二十年训练出来的论辩功夫；他追问"事物的是什么住在哪里"，这个问法本身就是柏拉图交给他的。他是用老师教的拳法，打在老师身上。

大白话说，吵了二十年架的夫妻，吵架的方式会越来越像。丈夫学会了妻子翻旧账的本事，妻子也学会了丈夫冷着脸不说话的那一招。外人看来，他们是对立的两方；可他们对立的方式，是在彼此身上一点点学来的。

所以，找到对手之后，不妨再问一句：他顶撞对手的那套家伙，是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答案还是那个对手。这正是纠缠和一般所说的"关系"不同的地方：不是先有两个现成的人，再发生一场冲突；而是两个人在冲突里，连同冲突的方式，一起被缠了出来。

◆ 三层怎样落在这个动作上

第9章说，三大方程、123原理、六路径是同一台引擎在瞬间、回合、入口三个尺度上的样子。上一章已经给"跟问法"在三层里定了位，这一章的动作也要这样走一遍，否则"前置矛盾"很容易被用成一句万能的"他反对前人"。

先说回合这一层。123原理的第一步是推进与土壤的矛盾，找前置矛盾，找的就是这一步。但这里有个容易滑过去的陷阱：在回合里排第一，不等于它是一个可以单独拎出来的"原因"。没有被逼出来的那个新显露，我们其实认不出哪一股张力才是要紧的。雅典人用美德词用得一问就空，这件事许多人都碰到过，偏

偏只有在苏格拉底那里，它逼出了"知道自己不知道"和定义的要求。所以前置矛盾是从结算点倒着认出来的：先看见一个回合闭合了，才回头确认是哪一股张力让它转起来的。这一点也给这个动作加了一条约束：只能在一个确实发生了显露改变的地方去找前置矛盾，不能见到一点分歧就说"这里有引擎在转"。

再说瞬间这一层。三大方程里有一条是说，土壤本身是被已有的显露和推进生成的。放在这里，意思是前人那个"厚"的旧回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地层，而是前一轮显露沉下去、又被一代人反复使用之后压出来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在第二轮是被逼出的新显露，到第三轮已经沉成了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土（位置为什么会这样轮转，第9章已详谈）。所以"脚下的地"和"迎面的墙"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一面朝下、一面朝前。前面讲的"他借用对手的家伙什"，也是同一条方程的另一面：推进的方式被已有的显露和土壤塑造。

最后是入口这一层。本书的起手次序是先跟追问的序列，再看学说的显露，后追土壤。有人会问：前置矛盾明明碰的是土壤，怎么排在第二个动作？看看前面"去三个地方"的找法就明白了：第三个地方，是他学说里最用力、最拧巴的那一处。我们正是先从第10章读出的问法出发，再借学说显露出来的最拧巴处做定位，最后才顺着它摸到下面那块地。入口的次序没有乱，只是这一步把三样东西一口气串了起来。

一个小区的停车规矩可以说明三层怎样咬合。当年定"一户一个车位、先到先停"，是业主们吵了好几轮才显露出来的办法，后来沉成了人人默认的地（瞬间里，旧显露沉为土壤）。几年后电动车多了，充电桩只能装在少数车位旁，充电的人和占位的人天天顶牛（回合的第一步）。物业要弄明白这场纠纷，最省事的入口不是翻小区历史，而是先听业主群里吵的是哪一句话，再看新方案里改得最犹豫的是哪一条，最后才去翻当年那份规矩是怎么定下来的（入口）。三层说的是同一场纠纷，缺了哪一层都会把它看歪。

◆ 写成一句话

做这个动作，最后最好落成一句话。句式可以很简单：某某的回答，在某处，接不住他手里的某样东西。拿三哲试一试。

苏格拉底：雅典人对美德之词的熟练使用，在"它到底是什么"这一问上，接不住他在战场、法庭、街头见过的真实的勇敢与正义。柏拉图：老师的追问，在流变的世界里落不了地，接不住他对"知识必须有站得住的对象"的要求，也接不住老师被多数票判死这件事。亚里士多德：学园的理念论，在"事物怎样生成、变化"这一处，接不住他在海边和解剖台上看到的一切。

这样写有两个好处。一是逼自己具体：不能写"他反对传统"，得写清是哪个传统、在哪一处、接不住什么。二是方便检查：一句话写出来，别人可以拿史料去对，看那个旧回答在他身边是不是真的厚，那个接不住的地方是不是真的被他反复撞过。写不出这句话，说明这个动作还没做完。日常里，这就像医生写病历。不能写"病人身体不好"，得写"右膝在下楼梯时疼，上楼不疼，已经三个月"。越具体，越能查；越能查，才越可能对。

◆ 反叛是引擎的第一步

这样看，"学生反对老师"这件事就要换一种眼光。很多人读到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第一反应是道德上的：学生怎么能这样对老师？后世还替他编好了一句漂亮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是后世的拉丁格言，源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 6 章，大意是：提出理念说的是我们的朋友，这让检讨变得为难；但朋友与真理都可爱，敬重真理更合乎虔敬（出处与流传第8章再详谈）。

从前置矛盾的眼光看，这根本不是道德瑕疵，而是循环得以转下去的第一步。一个学说沉淀下来、变成后人的土壤之后，它就有了惯性；如果后人只是恭

恭敬敬地继承，矛盾就被压平了，引擎也就熄火了。思想史上许多辉煌一时的学派，正是死于学生太忠诚：没有人再去顶撞，学说就在一代代复述里慢慢变成一层硬壳（这个"板结"的问题，第13章再详谈）。

要补一句限定：反叛是必要的，不等于凡反叛都有价值。顶撞得要有真实的推进做底子——儿子改面馆，是因为他每天站在灶前看到了客人的变化；如果只是为了显得和父亲不一样，换一种面、换一块招牌，那叫折腾，不叫推进。前置矛盾的两边都得是真的：旧回答真的沉得很厚，新推进也真的撞上了它接不住的地方。

◆ 最强的反对：是不是把思想史讲成了吵架史

说到这里，必须面对一个分量很重的反对。有人会说：你们这套讲法太偏爱冲突了。思想史上大量的进展，是安安静静的继承和补充：学生把老师的分类补全，把老师漏掉的例子添上，一辈子没有顶撞过谁。把每一次变化都讲成"顶撞"，就像把每一对相处平和的婆媳都讲成暗中较劲，听起来深刻，其实是一种口味偏见。而且，只要存心去找，任何两个人之间总能找出一点不合，这样的"前置矛盾"永远找得到，也就什么都没说明。

这个反对的前一半，我们要接下来。第一，前置矛盾说的是推进与土壤之间的张力，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它完全可以在毕恭毕敬的气氛里发生。亚里士多德的接班人泰奥弗拉斯托斯，是出了名的忠实弟子，接掌吕克昂、续做植物研究，处处沿着老师的路走。可在他传下来的一篇短小的《形而上学》里，他对"是不是万物都为了某个目的"一连提出了好些疑问，大意是许多东西看不出是为了什么。一个最忠心的学生，恰恰在老师体系最用力的目的论上轻轻碰了一下。没有吵架，张力照样在。第二，确实有大量变化不是被矛盾逼出来的，而是同一个显露在既有方向上的小修小补。面馆的儿子把汤里的盐少放一点，那是调

整；改成做两种面、接外卖，才是被顶出来的改变。123原理只讲后一种回合，不把每一次小修都叫作循环，这本来就是全书的纪律。

反对的后一半，说前置矛盾"永远找得到"，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个动作自己带着几道能让它落空的检查。一道是前面说的"三处对得上"：点名的对手、悄悄借用的东西、最拧巴的地方，三处要指向同一股张力；随手捏造的矛盾，通常只对得上一处。一道是"一边厚、一边活"：旧回答在他身边要真有人当真，新推进要他本人真动过手。还有一道是刚才说的回合约束：必须有一个确实被逼出来的新显露，才能回头认它的矛盾。这三道检查有任何一道过不去，结论就该是"这里找不到前置矛盾"，而不是再换个说法硬找。

大白话说，一个好的家庭调解员不会认定"每对夫妻都有矛盾"，那等于什么都没说；她会先看这家人最近到底改了什么大事，搬家、换工作、老人搬进来，再回头找是哪两样东西在那件事上顶住了。没有大改动的家，她就说这家人过得挺稳，不必硬找病根。

◆ 后世小试：把老师"倒过来"的人

拿一位第四编不专门讲的人试一下手。马克思年轻时是黑格尔哲学的学生，属于当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几十年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里写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是头朝下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才能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这段话几乎是一份前置矛盾的自供状。对手是谁？黑格尔。悄悄借用的是什么？辩证法本身——马克思没有扔掉它，而是要把它"倒过来"用。最拧巴的地方在哪里？在于"神秘外壳"和"合理内核"能不能真的剥开：后世围绕这一点争论了一百多年。这里只点到为止：用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能看出，马克思的出发点不

是凭空提出一套新学说，而是在黑格尔的地上，对着黑格尔最用力的地方撞了过去。这和亚里士多德借柏拉图的"形式"去反对柏拉图的分离，是同一种姿势。

而且马克思的前置矛盾也不止一股。黑格尔之外，他还在顶撞同样出身黑格尔门下、却已经转向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1845 年前后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再往外，还有他后来花了几十年去啃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三股矛盾缠在一起，才有了他后来的样子。只抓黑格尔一股，就会把他讲窄。

再用"一边厚、一边活"查一查。厚的一边好找：黑格尔去世后的十来年里，他的哲学是德国大学里最有分量的话语，连反对他的青年黑格尔派，也用他的词吵架。活的一边，马克思自己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交代过一个线索：他在《莱茵报》当编辑时，头一回不得不对所谓"物质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议会里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摩泽尔地区农民的处境，让他感到为难，这成了他转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这是当事人的自述，按下一节的说法要打个折扣；可它至少指出了一股真实在动的推进：一个从书斋里出来的人，在报纸版面上撞上了穷人捡枯枝算不算偷这样的具体事，而他手里那套从黑格尔那里学来的国家与法的说法，在这里接不住。厚的地挡住了活的路，这才撞得出东西。大白话说，一个法学院毕业生进了街道调解办，头一个月就发现，课本上那套条文在邻里为一棵树吵翻天时用不上，他后来做的所有事，都是从那一个月的别扭里长出来的。

◆ 当事人的自述也要查

找前置矛盾时，最诱人的材料是当事人自己的说法。康德说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第17章再详谈），笛卡尔在《谈谈方法》里讲自己怎样对学校

里学的东西逐一失望，马克思说要把黑格尔倒过来。有了这些话，对手似乎就不用找了，本人已经交代了。

这些自述当然要用，它们是最直接的证据。但也要记得：一个人回头讲自己的来路时，讲的是一个故事，而讲故事的人总会挑一个最清楚、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点。真实的矛盾可能更早、更杂、更模糊；他点名的那位，也可能只是众多对手里最好讲的那一个。

大白话说，问一个创业成功的人"你为什么出来创业"，他多半会讲一个干脆的故事：某天开会，老板否决了他的方案，他当晚就决定辞职。这个故事不一定是假的，可如果去看他之前三年的日记，也许会发现，不满早就在一点点积累，那次会议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自述是线索，不是结论。用它找到候选的对手之后，还得回到上面说的三个地方去对：他的著作里，真正最用力的地方是不是对着这个人？他悄悄借用的，是不是这个人的东西？对得上，自述就成了硬证据；对不上，就要怀疑这个故事是后来讲顺的。这一点也和下一章有关：连一个人对自己的讲述，都已经开始在塑造后世眼中的他了。

◆ 这个动作常被用歪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事后安排对手。后人知道了结局，便往回给前人排对手，排得整整齐齐，却不管那个对手是不是真在他的土壤里。检查办法就是上面说的：他读得到吗，他身边的人在谈吗？

第二种，只找一个对手。真实的矛盾往往是几股缠在一起的。柏拉图同时在顶撞城邦、老师的悬置和流变的世界；只抓住其中一股，就会把他讲成单线条的人。

第三种，把矛盾讲成私人恩怨。哲学史里确实不乏师生翻脸、同门相轻的故事，讲出来也好看。可是把"亚里士多德为什么离开学园"讲成"他没当上学园主持人所以生气"，就把一场思想上的冲撞降格成了办公室八卦。恩怨可以作为材料，不能代替矛盾。

第四种，把顶撞讲成全盘否定，忘了他借来的东西。这是最常见的。只看见亚里士多德批评理念论，看不见他通篇在用学园的词、学园的问题，就会以为他和柏拉图是两个世界的人。其实，顶撞得越狠，借得往往越多。

第五种，把这个动作用成万能钥匙。不是每一次思想变化都有一个戏剧性的外部对手。有时候，矛盾在一个人自己身上：晚年的柏拉图顶撞的是中年的柏拉图，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顶撞的是写《逻辑哲学论》的自己（第19章再详谈）。也有时候，我们确实找不到清楚的前置矛盾。找不到，就老老实实说找不到；硬编一个对手出来，这个动作就失去了它的刃。

第六种，把找到的矛盾当成判决书。找出亚里士多德在哪里顶撞了柏拉图，只说明第三轮是从哪里转起来的，并不等于宣布亚里士多德赢了、柏拉图输了。顶撞者撞出的新显露，自己也会留下亏缺；被顶撞的旧回答，几百年后还可能被人绕回去重新拾起（普罗提诺越过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第14、22章再详谈）。大白话说，球赛复盘时找到"就是这一脚传球让防线脱节"，是找到了局面转折的地方，不是在给谁定罪；下一场换了对手，同一脚传球也许正是破局的妙招。

◆ 顶撞之后

前置矛盾告诉我们：一个哲学家开口之前，他的对手已经在他脚下了；他开口，是在对手的地上，朝着对手接不住的地方撞过去。

可是还有一件事这个动作看不到。一个人撞出了新的东西，后世怎样记住他？我们手里那个"柏拉图"、那个"亚里士多德"，是他们本人，还是后来的学生、注释家、教科书一遍遍讲出来的样子？前置矛盾往前看，看的是他顶撞了谁；下一个动作要倒过来看：后世的他，又是被谁讲出来的？这是第三个动作，第12章来讲。

带走的话

顶撞的人站在被顶撞者的地上，用的常是对方的家伙。

本章判错句

如果找到的对手在他身边根本没人当真，或者他从没在那个方向上真正动过手，这个前置矛盾就是后人安排的。

想一想

你最想改掉的那条老规矩，你自己从它身上学到了什么？

试着用一句话写下：谁的回答，在哪一处，接不住你手里的什么？

◆

12

第 12 章

查反向师承：后世的他是谁塑造的

> 这一章的问题
>
> 我们手里的那个哲学家，是他本人，还是后人讲出来的他？

◆ 网红菜的"正宗做法"

有一道家常菜，最早是一位老太太在自家小馆里随手做的。她做法随意，今天多放点糖，明天少放点醋，客人吃得高兴就行。后来一个美食博主拍了视频，配上"祖传""地道""三十年老味道"的字幕，播放量几百万。全国各地的饭馆跟着学，学的是视频里那一次的做法：那天老太太恰好多放了一勺糖。

几年以后，这道菜有了"正宗做法"：必须多放一勺糖，必须用某个牌子的醋，装盘必须撒一把葱花——最后这一条，是因为视频里那天老太太的孙子顺手撒了葱花。有游客专程找到老太太的小馆，吃完在网上留言："不正宗，和视频里不一样。"

这个故事里，谁定义了"正宗"？不是老太太，而是后来的博主、模仿者和吃过模仿版的食客。原作者活在自己的厨房里，被讲出来的"她的菜"却活在千家万户的菜单上，而且后者反过来成了评判前者的标准。

哲学史上，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们读到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很少是他们本人原原本本的样子；更多时候，是经过一代代学生、编者、注释家、译者、教科书讲出来的样子。第8章已经在希腊三哲身上看到了这种现象：柏拉图写出了我们所知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定型了我们所知的柏拉

图。我们把它叫作"反向师承"。这一章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拿去用的动作：面对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去查一查，后世的他是谁塑造的；并且学会怎样把"他本人"和"被讲出来的他"分开记账。

◆ 反向师承是什么

先把意思说准。普通的师承是往下走的：老师教学生，前人影响后人。反向师承是往回走的：后人的讲述，反过来决定了前人在我们眼中的样子。它不是说后人能改变前人做过的事——苏格拉底喝下毒药，这件事谁也改不了；它说的是，前人以什么形象、什么学说、什么分量进入后世的思想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述他的人。

这就是全书说的"纠缠"最硬的地方。如果哲学史只是关系史，那么先有一个现成的苏格拉底，再有一条线连到柏拉图，线的两端各自独立。可事实是，我们手里那个苏格拉底，离不开柏拉图的笔；拿掉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个端点就模糊了一大半。用全书的话说：缠绕在先，端点在后。

要立刻补一句，免得说过头：反向师承不等于前人只是后人的发明。第8章说过，几份互不相同的讲述之间，总有一些对得上的硬骨架——苏格拉底确实整天找人谈话，确实没有写书，确实被判了死刑。硬骨架是约束，讲述是在骨架上长出来的血肉。查反向师承，就是要分清哪些是骨架，哪些是血肉，血肉又是谁添上去的。

日常里，这像一个家族的族谱。太爷爷生于哪年、娶了谁、有几个孩子，这些写在户籍上，是骨架；太爷爷"为人忠厚、乐善好施"，是后来修族谱的人写上去的，是血肉。血肉未必是假的，但它是修谱人眼中的太爷爷，带着修谱人那个年代的讲究。

◆ 塑造者有五种手

一位哲学家被后世塑造，往往要经过好几双手。大致可以分成五种。第一种手是编者。很多哲学家的著作，并不是以他们自己安排的样子流传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现存的著作，大多是讲课用的稿子，经过公元前 1 世纪安德罗尼柯的整理编订，才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第7章已谈）。连"形而上学"这个书名，通常也被认为出自编者之手：希腊文的意思大致是"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些书"，原本可能只是编排顺序上的标记，后来却成了一门学问的名字。编者决定了什么和什么放在一起、什么先读什么后读，读者看到的整体面貌，首先是编者给的。

第二种手是注释者。古代晚期有一大批人专门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注，他们中许多人属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倾向于证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表达不同。于是，第7章里那个与老师针锋相对的亚里士多德，在不少注释里被磨去了棱角，变成了柏拉图的一个温和补充。后世通过这些注释读亚里士多德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和解版"的他。

第三种手是译者。一部希腊文的书，经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再到今天的各种现代语言，每过一道手，词义都会挪动一点。亚里士多德讲"存在者是什么"时用的一个核心词，拉丁译者译成了 substantia，字面意思近于"站在下面的东西"，中文再译成"实体"。读中文的人一看到"实体"，很容易想到一块硬邦邦、实实在在的东西；可这个意思，有相当一部分是拉丁译名和中文译名一层层加上去的。

第四种手是门徒和继承人。一位哲学家身后，掌握他手稿、名声和解释权的人，往往对他的形象有决定性的影响。柏拉图去世后，学园由他的外甥斯彪西波接掌；此后一代代主持者往哪个方向讲柏拉图，学园就讲出哪一个柏拉图。到了公元前 3 世纪阿尔克西劳主持时，学园转向怀疑派，讲出来的是一个只破疑、不立说，处处效法苏格拉底悬而不决的柏拉图，与中期对话里大讲理念的那一位大

不相同（这次转向第14、22章再详谈）。同一所学园、同一批书，换一位掌门，祖师的面貌就跟着换。大白话说，老厂长退休后，厂史馆墙上挂哪几张照片、配哪几句话，是接班人定的；挂的是老厂长带头扛麻袋，还是老厂长拍板引进新设备，后来进厂的年轻人心里的老厂长就是两个人。本章后面还会讲一个极端的例子。

第五种手是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它们的力量最大，因为读的人最多。为了好讲、好记、好考，教科书会把一个人压成几句口号：柏拉图等于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等于四因说，黑格尔等于正反合。第18章会讲到，"正题—反题—合题"这个三段式，并不是黑格尔本人常用的说法，他甚至讥讽过把三分法机械套用的做法；可这几个字已经和他的名字焊在一起，焊得比他的任何一部书都牢。

还有一种常被忽略的手：敌人。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云》里把苏格拉底写成一个吊在篮子里研究天象、教人诡辩赖账的怪人（第4章已谈）。敌人的讲述同样会进入后世的形象，有时候还比朋友的讲述流传得更广。

大白话说，一个人的名声，是他自己、他的家人、他的同事、他的对头、记者和茶余饭后的议论一起塑造出来的。你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光听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够。

◆ 隔代的缠绕：从当面到经文本

第2章提过，希腊三哲之间的缠绕是当面的，后世的缠绕大多是隔代的、经过文本的。到了反向师承这里，这个差别就要说清楚了，因为它决定了塑造的方式很不一样。

第一个不同：当事人不能回嘴。柏拉图写苏格拉底时，苏格拉底已经死了，不能出来纠正；可色诺芬和别的门人还在，阿里斯托芬的戏观众也还记得，讲得太离谱，同时代人会有反应。到了一千年以后，一个中世纪学者讲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不能回嘴，同时代的见证人也早已不在，能约束他的，只剩下手里那几本抄本。约束越少，塑造的余地越大。

第二个不同：中间隔着许多层，每一层都有自己的问法。当面的缠绕，一般只有一层讲述；隔代的缠绕，是讲述的讲述的讲述。一个现代读者读到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一位二十世纪学者根据十九世纪的校勘本、参照中世纪拉丁译本、又借助古代晚期希腊注释写成的导读。每一层讲述者，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读前一层的：古代注释者关心怎样调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学者关心怎样让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神学相容，近代学者关心他的哪些说法被新科学推翻了。每一层都在原有的形象上，按自己的问题添一笔、抹一笔。

第三个不同：会断档，也会重新发现。当面的缠绕是连续的；隔代的缠绕常常中断。亚里士多德的许多重要著作，在拉丁西方曾长期难得一见，直到十二、十三世纪，才经由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和新的拉丁译本重新大规模进入欧洲大学。重新发现的时候，带回来的不只是书，还有一路护送这些书的注释和解释框架。被重新发现的他，和当年失去的他，已经不是同一个样子。其中一位护送者分量极重：十二世纪生活在安达卢斯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鲁世德（拉丁名阿威罗伊），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写下了大量注释，他的注释随着拉丁译本进入欧洲，影响之大，以至于在许多拉丁学者笔下，提到"那位注释家"不用点名，指的就是他。十三世纪的欧洲学者读亚里士多德，很多时候是透过阿威罗伊的眼睛在读；后来围绕"阿威罗伊主义"的激烈争论，又反过来决定了亚里士多德在大学里能被怎样讲、不能被怎样讲。一个希腊人的形象，在一位阿拉伯注释家和一群拉丁神学家的争论里被重新塑形，这是当面缠绕绝不会有的局面。

大白话说，当面的缠绕像同一个村里口口相传的老人故事，讲歪了会有人站出来说"不对，我亲眼看见的"；隔代的缠绕像一封转了很多手的信，每个转信的

人都在信封上写了几句话，有的还拆开来改了几个字，最后送到你手里的，是一封层层叠叠的信。

◆ 怎样把"他本人"和"被讲出来的他"分开记账

第8章留下一个承诺：在一位具体的哲学家身上，怎样一步步分辨"本人"与"被讲出来的他"。这里给一套可以照着做的工序，分五步。第一步，分层。把关于这个人的所有材料按年代排开：他本人亲手写的东西；同时代人的记述；门人和继承者的整理；古代或中世纪的注释与译本；近现代的校勘和研究；教科书与普及读物。分层的目的，是看清你手里的每一句话属于哪一层。很多误会，都出在把第五层的话当成了第一层的话。

第二步，找硬骨架。在各层之间，找那些彼此独立的来源都同意、又难以出于讲述者私心的东西。生卒年代、著作是否存在、生平大事、同时代多人一致记载的言行，大多属于这一类。骨架找出来，才知道讲述的自由有多大边界。

第三步，看每一层讲述者自己的问法。这是最要紧的一步，也是"跟问法，不跟人"（第10章）在这里的应用。每一位讲述者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柏拉图要回答老师死后正义住在哪里，所以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越写越会讲理念；新柏拉图主义注释者要调和两位大师，所以他们笔下的亚里士多德越写越温和。知道了讲述者在解决什么，就能大致判断他会往哪个方向添笔。

第四步，回到原文验关键句。凡是一句"大家都知道"的名言、一个人人挂在嘴边的标签，都要回到本人的著作里去查：他真的这样说过吗？在什么上下文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黑格尔的"正反合"，都是在这一步露出原形的（第8、18章已谈）。

第五步，分开记账。查完之后，不要急着说"后人歪曲了他"，而是把账分成两本：一本记他本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一本记后人讲成了什么、为什么这样

讲、这样讲又造成了什么后果。两本账都是哲学史，后一本有时比前一本影响还大。

大白话说，就像整理一位去世老人的遗物。先按年代把东西分堆：他自己写的信、朋友寄来的信、子女后来贴的照片说明。再找几样谁也赖不掉的东西：房产证、毕业证、单位的工作证明。然后想一想，贴照片说明的那个子女，当时为什么这样写。最后，凡是家里流传的"爷爷常说的一句话"，都去他的信里找一找原话。找完了，不是把子女写的说明全撕掉，而是分开放：这一盒是爷爷的，那一盒是家里人讲的爷爷。

◆ 讲述者常往哪几个方向添笔

第三步说要看讲述者的问法。实际做起来，会发现添笔的方向大致有几种，认熟了，查起来快得多。一种是调和。讲述者手里有两位都敬重的前人，偏偏两人说法相反，他便倾向于证明他们其实不矛盾。古代晚期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注释家，就是这一类。调和会把棱角磨平，把原本的冲撞讲成分工。大白话说，家里两位长辈当年吵得不可开交，到了孙辈讲起来，就成了"爷爷管外头、奶奶管里头，配合得很好"。

一种是拔高。讲述者需要一位开山祖师，便把前人讲得比他本人更完整、更有体系、更有先见之明。很多学派追认祖师时都是这样，把祖师一句随口的话，讲成了一整套学说的种子。大白话说，公司上市以后，创始人当年在小饭馆里说的一句"我们以后要做大"，被写进了企业文化手册，成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

一种是丑化。讲述者把前人当靶子，便把对方讲得比本人更极端、更简单、更容易打倒。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是一例；哲学史上，一个学派描述它要推翻

的旧学派时，也常常是这样。大白话说，离职员工讲起前公司，往往只剩下最糟的几件事。

还有一种是压缩。讲述者要在有限的篇幅里交代一个人，便只留下最好记的一两句。教科书多半是这一类。压缩本身不坏，坏在压缩之后，人们以为那一两句就是全部。大白话说，一个人在同学录上的一句"爱笑、爱打篮球"，不能当成他的一生。

这四种方向常常混在一起出现。知道它们的存在，读到任何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形象时，就可以先问一句：这是被调和过的、被拔高过的、被丑化过的，还是被压缩过的？

◆ 回头看三哲：讲述的接力

把这个动作放回希腊三哲，会看到一条和师承方向相反的接力（细节见第8章）。苏格拉底的形象，主要由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写作定型，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又添了一个漫画版。柏拉图的形象，有相当一部分是经亚里士多德的转述定型的：《形而上学》里那句"让普遍者分离的是后来的人"，几乎成了后世理解柏拉图的钥匙；他口头讲授、未曾写下的学说，也主要靠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才为人所知。亚里士多德的形象，则由编者安德罗尼柯、古代注释家、阿拉伯学者和中世纪拉丁学者一层层塑造，到十三世纪，在许多学者笔下，他已被径直称为"那位哲学家"，仿佛哲学家只有他一个。

这条接力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每个人既是被塑造者，又是塑造者。柏拉图被亚里士多德塑造，同时塑造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被后世塑造，同时塑造了柏拉图。这正是纠缠的样子：没有一个人站在链条外面，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 讲述者身上的三层

前两章都给自己的动作在三大方程、123原理、六路径这三层里定过位，这一章也照做一遍。走下来会发现，查反向师承其实是把前两个动作，原样用在了讲述者身上。

先看瞬间这一层。三大方程说显露、推进、土壤同时互相生成。放到一位讲述者身上，"被讲出来的他"就是讲述者那里新显露出的东西：十三世纪大学里那个亚里士多德，是经院学者讨论问题的推进，和基督教神学、阿威罗伊注释、拉丁译名合成的那块土壤，一起生成出来的形象。它有名字、有标准讲法、有考试题，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三样都齐了。同一个亚里士多德，在讲述者动笔之前是他脚下的土壤，讲完之后又成了一个新的显露，再沉下去，变成下一代的土壤。位置在轮转（第9章已详谈），被讲的人也一样轮转。

再看回合这一层。一次重要的重新讲述，本身就是一个123回合：讲述者的问法，和前人留下的原文、硬骨架顶上了；比如阿威罗伊主义者讲出的那个亚里士多德，与神学土壤在灵魂是否个别不朽之类的问题上撞在一起，逼出一个新的形象；这个形象写进课本、定进章程，再回写，重置后人读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二十世纪的尼采考订版全集也是一个回合：研究者的推进与档案馆版本顶上，逼出一个新的尼采，再重置了此后几代人的读法。所以反向师承不是一次性的"被歪曲"，而是一轮接一轮的回合，每一轮都留下新的地层。

最后看入口这一层。本书的起手次序是先跟推进、再看显露、后追土壤，上面那套五步工序的第三步，"看每一层讲述者自己的问法"，就是这个次序在讲述者身上的落地：先读讲述者在解决什么（第10章的动作），再看他讲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最后追这个形象沉进了哪一片土壤，又顶撞了谁（第11章的动作）。讲述者也有自己的前置矛盾：新柏拉图主义注释家要调和两位大师，是因为他们脚下同时踩着两位大师的学说：在他们的学校里，学生通常先读亚里士多

德、后读柏拉图，前者被当作登堂入室的台阶。课程既然排成一条路，两位大师就最好说的是同一件事，彼此冲撞的地方便成了要被磨平的地方。

一道菜在家族群里的转发可以说明这一切。奶奶的红烧肉做法，先是大姑凭记忆写了一版发进群，那是大姑那代人的讲法；表妹照着做，嫌太甜，改了糖量又发一版，还注明"奶奶原版"；再过几年，谁家孩子看到的"奶奶的红烧肉"，已经是表妹那一版。每个转发的人都按自己的口味读前一版，读完又写出一版新的，新的一版沉进群里，成了下一个人的底本。想弄清奶奶到底怎么做，就得一版一版往回看：谁写的，那人当时在解决什么，又改动了哪里。

◆ 后世小试：一位被妹妹讲出来的哲学家

拿一位第四编不专门讲的人试一下手。尼采（1844—1900）是哲学史上反向师承最触目惊心的例子之一。1889 年初，尼采精神崩溃，此后十年不能写作，由母亲和妹妹照料。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掌握了他的手稿，在魏玛建立了尼采档案馆。她从哥哥大量零散的笔记里挑选、编排，出版了一部名为《权力意志》的书，把它当作尼采的"主要著作"推出。她自己倾向于德国民族主义，丈夫还是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尼采生前在书信里对这类反犹主张表示过厌恶，也因此与妹夫交恶。可在妹妹的经营下，尼采的形象渐渐被拉向了她自己的立场，后来又被纳粹宣传所利用。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研究者花了几十年的工夫，重新整理尼采的手稿，编出以原始笔记为准的考订版全集，把"尼采本人"和"档案馆讲出来的尼采"一点点分开。这几乎就是上面五步工序的一次大规模实演：分层，找骨架，看讲述者的问法，回到原文验关键句，分开记账。这里只点到为止。它提醒我们：反向师承不只是学者书斋里的细节，它可能决定一个人在几代读者心目中是什么样子，甚至决定他的名字被拿去做什么用。

◆ 最强的反对：既然都是讲述，还有"本人"可言吗

这个动作会招来一个从相反方向打过来的反对。如果我们手里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是层层讲述的产物，连本人留下的文字也是一种自我讲述，那么"分开记账"岂不是一句空话？两本账里，"本人"那一本根本记不起来；最后只剩下各说各话，谁讲都一样，哲学史就成了一场没有裁判的故事会。

这个反对抓住了一点：确实没有一个可以直接触摸的"本人"。但它推得太远了，理由有三。第一，讲述之间会互相卡住。几份来源立场不同，却在同一件事上对得上，这件事的可信度就远高于任何一份单独的讲述；反过来，一份讲述跟其他几层打架，它的问题也会暴露出来。第二，讲述受原文的约束。原文本身也是讲述，但它是讲述链上离事件最近、改动最难的那一环，后来的讲法要和它对质。第三，新材料会让旧讲法吃亏。尼采手稿重新整理之后，档案馆版本的许多编排站不住了；这说明讲述不是谁讲都一样，有的经得起对质，有的经不起。

亚里士多德本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读到的他，文字简省、论证密集，像一本本讲课笔记，许多人因此以为他天生不会写漂亮文章。可西塞罗曾称赞亚里士多德的文笔如流金之河。这句称赞，和现存著作的面貌很难对上。较通行的解释是，亚里士多德生前也写过面向公众、文辞讲究的对话体作品，只是这些作品大多失传，传下来的主要是学派内部讲课用的稿子。这里有两点值得记下。一点是，"流传"本身也是一双塑造者的手：哪些书活下来、哪些书丢了，决定了后人眼中的他长什么样。另一点是，我们之所以能察觉这一层塑造，恰恰是因为另一层讲述，也就是西塞罗的证词，和现存面貌对不上。讲述之间的错位，正是看穿讲述的入口。

所以，承认"本人"只能隔着讲述去接近，不等于放弃分辨。这就像一位老邻居去世后，几个人对他的回忆说法不一：一个说他脾气倔，一个说他心肠软，一个说他抠门。你见不到他本人了，可三个人都提到他每年冬天给楼道里的流浪猫

搭窝，这件事你就可以记下；只有一个人说他抠门，又恰好跟他有过节，这一条你就要打个问号。见不到本人，不等于分不出真假，只是分辨要靠讲述与讲述之间的对质。

◆ 这个动作常被用歪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以为能剥出一个"纯粹的本人"。把后人添的笔一层层剥掉，最后剩下一个干干净净、没有被任何讲述沾染的原貌——这个想法很诱人，但做不到。本人留下的文字本身，也是他在自己的土壤里、对着自己的对手写下的，他对自己的讲述同样是一种塑造（第11章说过，当事人的自述也要查）。查反向师承，是把账分清，不是找到一个零点。

第二种，一概斥为歪曲。讲述者不全是篡改者，很多时候他们是保存者和贡献者。没有安德罗尼柯的编订，我们可能读不到亚里士多德；没有柏拉图的写作，苏格拉底大概只会剩下喜剧里的漫画。讲述有偏差，也有功劳，两本账要一起记。

第三种，什么都推给后人，替本人开脱。黑格尔的"正反合"标签是后人焊上去的，可"后来的哲学把先前的收进来、因而更高"这条主心骨，确实写在他本人的哲学史讲演里（第18章再详谈）。尼采的形象被妹妹扭曲了，可他著作里那些锋利甚至危险的句子，也不全是妹妹编出来的。分开记账，是为了把批评打准，不是为了给偶像洗白。

第四种，忘了"被讲出来的他"也是真实的历史力量。后世的尼采、后世的亚里士多德，即便与本人有距离，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几百年的思想和行动。不能因为它"不是本人"，就当它不存在。

第五种，把一切差异都算到讲述者头上。一个人前后说法不一致，有时候不是后人讲歪了，而是他本人变了。柏拉图早期对话里的苏格拉底只问不答，中期

对话里的苏格拉底大讲理念，晚期对话里苏格拉底退到一边（第6章已谈）：这里面有多少是柏拉图在不同时期塑造老师的方式变了，有多少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变了，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用材料去争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判若两人（第19章再详谈），那主要是本人在顶撞自己，不是讲述者的问题。查反向师承之前，先要看一看：这道差异，是发生在讲述的层里，还是发生在本人的一生里？

大白话说，一个人二十岁和五十岁的照片判若两人，不一定是照相馆修图修过了头，也可能是他真的变了。先分清是修图还是变老，再去评论照片。

◆ 这本书自己也是一层讲述

最后要对读者坦白一件事：本书本身，也是三哲的又一层讲述者。我们用"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去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用"矛盾—显露—回写"的循环去读他们的转折，这本身就是一种添笔。我们的问法是：思想怎样在纠缠中发生？带着这个问法，我们自然会把三哲讲得彼此缠得更紧、转折更像一台引擎。它属于上面说的哪一种方向？大概既有一点拔高——把三人讲得像一次完整的发生；也有一点压缩——把他们庞大的学说收到一根轴上。

所以，本书自己也要接受五步工序的检查。我们尽量在每一处标明，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本书的解读，哪些是传说；第23章还会专门列出，在什么情况下本书的讲法算错。读者完全可以把本书当作第五层或第六层的讲述，拿去和原典、和别的研究对照。

大白话说，一个讲家族故事的人，最诚实的做法不是声称"我讲的就是真相"，而是说清楚：这个故事我是听谁讲的，哪几件事有凭据，哪几处是我自己的理解。听的人才知道该信几分。

◆ 被讲出来的他，改变了世界

这最后一条，正好把我们引向下一个动作。很多时候，真正在后世土壤里起作用的，不是一位哲学家本人，而是被讲出来的他。中世纪大学里被奉为权威的，是经过注释与翻译塑造过的亚里士多德；被纳粹利用的，是档案馆编排过的尼采；被几代学生背诵的，是"正反合"的黑格尔。这些被讲出来的形象，一旦沉进后世的土壤，就开始反过来重置后人的问法和做法。

那么，一个人的学说——无论是他本人的，还是被讲出来的——究竟怎样改写了后来的世界？它重置了什么，又在什么时候从一股新鲜的力量，变成了一层谁也不敢动的硬壳？这是第四个动作：追回写。第13章来讲。

> **带走的话**
>
> **把"他本人"和"被讲出来的他"分开记账，两本账都是历史。**

> **本章判错句**
>
> 如果分层、找骨架、看讲述者问法之后，得到的形象和最流行的讲法毫无差别，这个动作在这位身上就没有增量。

> **想一想**
>
> 你转发过的一句"名人名言"，你回原文查过吗？
>
> 你是怎样被别人讲述的？哪一种讲法离你最远？

◆

13

第 13 章

追回写：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个人的学说改写了后来的世界，又在什么时候变成了谁也不敢动的硬壳？

◆ 一张没人敢改的方子

街口有家卤味店，开了三代。第一代老板是个爱琢磨的人，当年嫌别家卤汁太咸，自己一味一味试，改了几十回，才定下一张方子。这张方子救活了店，也改变了整条街：对面两家学着减了盐，来进货的小贩开始按他的口味挑货，连附近人家过年自己卤肉，都照着他家的味道调。到第三代，方子被装进镜框挂在后厨，谁动一钱八角就是"欺祖"。偏偏街坊的口味早变了，年轻人嫌油重，店里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这个故事里有两件事值得分开看。第一件，那张方子曾经真的改了一条街：别家的做法、顾客的挑法、家里的习惯都跟着动了。第二件，同一张方子后来成了最难改的东西，而且越是当年改得彻底，后来越难改。第一代老板本人是个最爱改方子的人，可他留下的方子却变成了"不许改"的代名词。

哲学史里也有这样的方子。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处处动手观察、给海洋动物分类、反复修正前人说法的人；一千多年后，他的书却成了大学里不许绕开的课本，到伽利略的时代，要推翻一条关于落体的旧说，得先和"亚里士多德说过"这句话打一场仗。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里还感叹过，逻辑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退过一步，也没能再进一步，看上去已经完成了。一个人的学说

能让后人觉得"已经完成"，这既是最高的赞美，也是一种危险的信号。这一章讲五个动作里的第四个：追回写。它只问两件事：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两件事要放在同一本账上记，因为我们会看到，它们常常是同一块土的两面。

◆ 回写是什么：一轮循环怎样把门关上

先把"回写"这个词说清楚。在 123 原理里，一轮发生是这样走的：一个人推进问题的那条差异序列（D，也就是他一路追问、比较、试探、修正的过程），撞上他所处的发生土壤（E，也就是他身边缠在一起的制度、语言、前人的答案、人们的习惯），两者顶不下去了，逼出一种新的显露（S，新的说法、新的做法、新的答案落脚点）。到这里，一轮还没有完。新的显露得反过来进入那片土壤，改掉后来者推进问题的方式，也改掉土壤本身。这一步就是回写。没有回写，这一轮就没有闭合，新说法只是一阵风。

拿家里的事打个比方。一家人吃饭总吵架，女儿提议"吃饭时手机放进门口的篮子"。提议本身是一个新显露。它有没有回写，不看全家当天是否点头称好，而看三个月后：篮子是不是还在门口，吃饭时聊天的话题是不是变了，来做客的亲戚是不是也被要求把手机放进去，女儿自己成家后是不是把这个规矩带了过去。规矩进入了一家人的日常，改了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改了这个家的"土壤"，这才叫回写。

请注意回写同时改了两样东西：后来者推进问题的方式，和他们脚下的土壤。这两样不是先后关系，而是一起被改的。篮子放在门口，一方面改了每个人吃饭时说话的路数（这是序列被改），另一方面改了这个家的规矩、家具摆放和来客礼数（这是土壤被改），而改过的土壤又会反过来让下一次的提议有不同的起点：等到这家人再讨论"周末要不要一起出门"，大家已经习惯了"先定一条规矩再试一试"的商量办法。三大方程说 S、D、E 同时互生，在回写这一步看得最清楚：新显露落下去的那一刻，序列和土壤一起换了样子，下一轮的起点也就跟

着换了。这里的"方程"只是说三者互相生成的关系记号，不是可以代入数字去算的公式。

有三点要先划清。第一，回写不是"反馈"，也不是"复盘"。反馈是信息回流给原系统做微调，复盘是事后回头总结经验；回写说的是新显露进入土壤、重置后来的序列和土壤，是一轮发生能否闭合的条件。单位开完会写一份复盘报告，报告锁进柜子没人再看，这只是复盘；会上定下的新流程让所有部门的表格都改了格式，才是回写。

第二，回写可以是负向的。土壤也可能用拒绝、惩罚、驱逐去回应一个新显露，而这种拒绝同样会重置后来的序列。一个员工在会上指出流程漏洞，被领导当众训斥，从此大家开会都不说话——新显露被压回去了，可会议室的空气确实被改写了。

第三，回写要拿史料去观察，不能宣布。说"柏拉图影响深远"是一句宣布，什么也没观察到；说"柏拉图死后，学园由他的外甥斯彪西波继任，成了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机构，追问从街头搬进了有师生、有课程、有继任者的地方"，这才是一个可以查证的观察。

◆ 为什么必须追回写

不追回写，会发生两种看不见。第一种看不见，是只见学说，不见它改了谁。教科书讲哲学家，往往到"提出了什么"就停了，好像一个学说说出来就自动存在、自动正确。这就像评价一条新交通规则只看条文写得漂不漂亮，从不去路口看看司机的开法变没变。条文写得再好，路口照旧乱，这条规则就还没有真正发生；反过来，有的规则条文粗糙，却让一座城市的司机十年后形成了礼让行人的习惯，它的分量要从路口去量。

第二种看不见，是看不见下一轮的矛盾从哪里来。本书反复说"上一轮的亏缺是下一轮的矛盾"，可亏缺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正是在回写里长出来的：回写把新答案压进土壤，土壤变厚变硬，后来者就撞在这层硬土上。不追回写，下一位哲学家的出场就像从天上掉下来，只能说成"他天才地发现了前人的错误"。追了回写，我们才看得见后来者撞上的那堵墙是谁砌的、怎么砌厚的。好比一个新来的店长大刀阔斧改店，外人只看见他"有魄力"；知道前任留下的规矩怎样一层层压到让员工动弹不得，才明白他的魄力是被逼出来的。

所以追回写不是给一个人"算功劳"，而是在为下一轮找土壤。功劳簿只往上加分，回写账本却要同时记两栏：它重置了什么，它在哪里结了硬块。这两栏常常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 怎么追：去三个地方取证

回写不能宣布，那就得去找证据。我们建议到三个地方取证，正好对着发生的三个面。第一个地方，看后来的人怎么提问。回写最深的一层，是改掉后来者推进问题的方式，也就是改掉下一轮的 D。一个人的说法被人记住，不算深；后来的人连提问都只会照着他的框架提，才算深。判断一位名师有没有真改变一个学科，与其数他的学生多少，不如看学生出的题：如果一代人出的考题都默认他划定的题型，他就回写进了别人的提问里。

第二个地方，看土壤里新长出的东西：制度、课本、词汇、分工。学园、吕克昂、大学的课程表、注释传统、被翻译进别种语言的术语，这些都是回写落进 E 的痕迹。日常里也一样，一个人有没有改变一家公司，看他走后留下的东西：报销流程、内部黑话、谁和谁坐一个办公室。人走了，流程还在、黑话还在，回写就在。

第三个地方，看他本人后来怎样改自己。回写不光作用于别人，也作用于发出者本人。新显露一旦进入土壤，土壤的反应又会反过来逼他修正自己。柏拉图

晚年在《巴门尼德篇》里借人物之口自曝理念论的困难，就是这一类痕迹；第15章要讲的奥古斯丁，晚年专门写了一部书逐篇检讨自己的旧作，也是。一个厨师开店十年，菜单改没改、改了哪道菜、为什么改，比他开业时的宣传语更能说明他的手艺在土壤里经历了什么。

取证之后，还要分辨方向：是正向回写（新显露被接住、被维持、被传下去），还是负向回写（被拒绝、被惩罚、被压回去）。两种都要记，而且常常交织在同一件事上。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时间尺度。回写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段很长的过程，追的时候要把钟表拨大。一位哲学家活着时被冷落，死后两代人才被读懂，这样的事并不少见；反过来，生前风光无限，死后十年就无人问津，也常有。如果只看他在世那几十年，前一种人像是没有回写，后一种人像是回写极厚，两样都可能看错。这就像种果树，栽下那年看不出什么，判断一棵树种得值不值，要看五年、十年后它结的果，以及邻居是不是也跟着种了同一个品种。所以追回写时，我们至少要追到他身后两三代人，看他的东西是被接住了、被改造了，还是被埋掉了；必要时还得追上几百年，因为有的回写要绕一大圈才落地。

◆ 取证的手要倒过来走

这里要把三层关系在这个动作上走实一遍，否则"追回写"很容易被误当成万能的"第三步"。先说起手次序。本书解一位哲学家，整体走的是D→S→E：先跟他推进问题的序列，再看学说怎样显露，最后追土壤与回写。六路径说的就是这种起手排列的不同，同样是"在土壤中经由序列成为显露"，从哪一头下手，看见的东西就不一样。可是一到回写这一步，取证的手往往要倒过来：先站在今天或者某个后世的土壤里，看见一样东西——一门课程、一个术语、一种考题格式——再往回摸，它是从哪一次显露落下来的，那次显露又是被哪一条序列逼出来的。整体的阅读仍是先D后S再E，到了E这一端，手却是从痕迹往源头走。这

就像侦探破案，讲给读者听时按案发顺序讲，可他自己查案，是从现场的一个烟头、一道划痕开始往回推的。两种次序不矛盾，一个是讲清楚的次序，一个是查出来的次序；混淆了，就会把讲述的顺序当成证据的顺序。

再说 123 原理。回写是一轮"矛盾—显露—回写"的闭合条件，不是任何事情做完之后的"第三步"。一个人写完一本书、开完一次课，不等于完成了回写；回写有没有发生，要看后来的序列与土壤有没有被它改掉，而这只能等土壤自己给出答案。所以我们不把"回写"挂在每一次行动的尾巴上，也不把任何三步流程都叫作 123。厨师端上一道新菜，客人吃完结账，事情办完了三步，可这道菜有没有回写，要看半年后它是不是还在菜单上、别家有没有学去、熟客点菜的习惯有没有因它而变。

最后说三大方程。回写之所以不能"一次算清"，正因为显露、序列、土壤是同时互生的：新显露一旦落进土壤，土壤变了，土壤变了又改了后来者的序列，后来者的序列又会生出新的显露，反过来把前一次显露重新解释一遍。前一位哲学家的回写，常常要靠后一位的显露才显出它的分量，甚至改变它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份回写账，过一百年再看，可能要改记。

◆ 三哲回顾：一次负向，两次正向

用这个办法回看希腊三哲，三轮回写各有面目。第 5 至 7 章已经分别讲过，这里只把"回写"这一栏抽出来对照。苏格拉底的回写首先是负向的。他在街头追问"勇敢是什么""虔敬是什么"，把熟练使用这些词的人问到说不出话，他的显露只到"可识别"——人们认得出他在干什么，却没有一个可以维持、可以写下来的答案。前 399 年，城邦以不敬神、败坏青年的罪名判他死刑。这是土壤对新显露的拒绝。可拒绝本身改写了土壤：一个人因为追问而死，这件事成了柏拉图写作的起点，"苏格拉底之死"此后成为西方追问传统最有分量的一个画面。好比一个

吹哨人被开除，公司以为事情了结了，多年后这个开除案却成了行业教材，改写的是整个行业。

柏拉图的回写是正向的，而且落到了机构上。约前 387 年他建学园，追问从街头搬进了一个有场地、有师生、有传承的地方；苏格拉底式的诘问被改造成辩证法；老师被写成了对话的主角。这一轮的回写之厚，从一个细节就看得出：亚里士多德在学园待了约二十年，他后来批评理念论用的每一件工具，几乎都是在这片土壤里磨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的回写，最显眼的一块是逻辑。后人编成《工具论》的那组著作，把"怎样从前提推出结论"整理成可以一步步检查的格式。从此，在一大片文明里，"会不会推理"有了一套公认的检查办法。这就像有人发明了记账的复式格式，从此全世界的会计都按这个格式记账，连"账对不对"的意思都被它重新定义。吕克昂、注释传统、后来的大学课程，都是这一轮回写落下的土壤。

他的回写还有不那么显眼的一块：分门别类本身。在他之前，"哲学"差不多是一锅烩；在他之后，研究动物、研究天、研究灵魂、研究城邦、研究诗，各有各的书、各有各的问法。今天大学里按学科分院系，追到很远的源头，有他整理知识的这一手。好比一个人第一次在超市里把货架分成生鲜、粮油、日化，后来所有超市都这么摆，顾客连"去哪一排找酱油"的直觉都是被这个摆法训练出来的。

三轮放在一起看，回写的方向和厚薄各不相同：苏格拉底那一轮，土壤先拒绝了他，可这个拒绝本身被下一轮接住；柏拉图那一轮，回写落成了机构，却连他本人也被逼着回头检讨；亚里士多德那一轮，回写落得最深、最广，深到后来成了课本，也深到后来成了墙。

◆ 回写的厚薄怎么量

说一轮回写"厚""薄"，不能凭印象。我们给三把可以拿到史料上去用的尺子。第一把尺子量宽度：它改了多少地方的提问。只改了一个学派内部怎么说话，是窄；改了逻辑、自然研究、伦理、政治、诗学好几块地方的问法，是宽。第二把尺子量深度：它有没有沉到"不觉得是一种选择"的地步。浅的回写，人们知道自己在用谁的说法；深的回写，人们用着它，却以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最能看出深度的一个标志，是连反对者也只能用它的词汇来反对：中世纪围绕亚里士多德的禁与立，争吵双方都在用"实体""形式""潜能"说话，这就是深。第三把尺子量可逆性：如果把它抽掉，后来者还能不能照常提问。抽掉一个装饰性的说法，什么也不影响；抽掉一套推理格式，整栋楼的论证都会塌一角，这样的回写就是承重的。

拿手机支付打个比方。二维码收款刚出来时，只有年轻人和少数店铺用，这是窄而浅；几年后菜市场的大妈摊位上也贴了码，这是宽；再后来，有人带着现金去买菜反倒被找不开零钱，连不喜欢它的人也只能照着它的规矩来，这是深；哪天系统停一个下午，整条街的买卖就停摆，这是不可逆、承重。量到这一步，就知道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工具，而成了街面土壤的一部分。

三把尺子同时也是板结的预警。宽、深、不可逆，本身都不是坏事；可当三者同时达到顶点，而又没有人再去问"它为什么是这样"，土就开始变硬了。下一节就拿亚里士多德细看这个过程。

◆ 回写过厚：亚里士多德怎样变成"那位哲学家"

现在说板结。我们沿着史料追一遍亚里士多德在拉丁西方的命运，就能看到回写怎样一层层变厚，最后变成伽利略必须撞开的旧壳。六世纪初，波爱修斯把亚里士多德的几部逻辑著作译成拉丁文，此后几百年，拉丁西方手里的亚里士多德主要就是这几部逻辑书。十二、十三世纪，他的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

等著作陆续经由阿拉伯文和希腊文译本进入西方，伴随而来的还有伊斯兰世界学者的大量注释，其中伊本·路世德（阿威罗伊）因注释亚里士多德之勤，在拉丁世界被称为"注释家"。

接下来的走向并不是一条直线。十三世纪初，巴黎曾禁止在课堂上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到 1255 年前后，这些书却成了巴黎大学艺学院规定要讲的课本。托马斯·阿奎那在著作里径直称他为"那位哲学家"，不必再写名字，人人知道指谁。1277 年，巴黎主教唐皮耶又发布谴责，列出两百多条命题，其中不少与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说有关。禁、立、再谴责，来回拉扯，可拉扯的结果是他越来越深地进入了课程、术语和论证习惯：争论双方都得用他的概念来争。这正是回写变厚的样子，连反对他的人也只能在他搭的台子上反对。

厚到什么程度？伽利略在 1632 年出版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里，让一个名叫辛普里丘的人物代表亚里士多德派说话；书里还借人物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学者亲眼看了解剖，看到神经从大脑发出，却说若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书上写着相反的话，他就信了。这个故事是伽利略讲的，未必实有其人，可它准确地画出了板结的样子：观察已经摆在眼前，书的权威仍然先于眼睛。1638 年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里，伽利略用一个思想实验去拆"重物比轻物落得快"：把一重一轻两块石头绑在一起，按旧说，轻的会拖慢重的，整体应该更慢；可绑在一起的整体更重，又应该更快，旧说自相矛盾。至于他在比萨斜塔上当众扔两个球的故事，出自他的学生维维亚尼所写的传记，许多史家怀疑它并未发生，这里只当相传，不作证据。

这里有一个反讽，也是本章最想讲清的一点。板结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性格。他是最爱看、最爱分类、最肯说"前人说得不对"的人；《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里，他在批评柏拉图一派的善的理念之前说过，朋友和真理都可爱，但更应敬重真理。板结的是他留下的东西：他的结论被抄进课本，他的方法却没有被一起抄进去。后人继承了他看过的结果，没有继承他去看的习惯。这就像那张卤

味方子，第一代老板留下的是"试了几十回之后的配比"，第三代守住的只是配比，却丢了"试几十回"这件事本身。

所以板结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标志：一个学说从"用来看东西的工具"变成"不许再看的理由"。工具可以磨钝、可以换掉；理由一旦立起来，谁去看，谁就成了冒犯者。我们在伽利略那里观察到的，正是这种转变。这里要附一句限定：伽利略与教会的冲突牵涉天文学、神学与教廷政治，远不止"亚里士多德权威"一个因素，我们只取其中与回写板结相关的这一面，这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对那段历史的完整交代。

◆ 维持不等于板结

讲到这里，容易生出一个误会：好像凡是长期不变的东西都是板结，凡是被奉为经典的都该推倒。这不对。S 的"三个可"里有一个"可维持"，一个新显露要真的发生，就得能被维持住、能经得起时间；一套东西用了几百年还在用，可能只是它确实好用。

那么维持和板结怎么分？我们给一个可以观察的分界：看它还能不能被问。维持住的东西，你去问"为什么这样"，它答得出来，而且允许你拿新情况去试它，试出问题它会改；板结了的东西，你去问"为什么这样"，得到的回答是"一直就是这样""书上就是这么写的""祖宗定的"，再追问，提问的人就成了麻烦制造者。

拿乘法口诀说。小学生背"九九八十一"，背了上百年没改，这是维持，不是板结：任何一个孩子问"为什么是八十一"，老师都可以拿九排九个豆子摆给他看，答案经得起问。可同一所学校里，如果"作文开头必须引用一句名人名言"这条规矩传了二十年，学生问为什么，老师答"历来如此"，那就是板结了：它最初可能是一个好办法，后来却不再接受检查。

拿这把尺子回头看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事情就清楚了。三段论作为检查推理的格式，一直到今天还在逻辑课上教，它经得起问，这是维持；可"重物下落快于轻物"这样的自然哲学结论，在某些课堂上被当作不必再检查的前提，问它的人要先回答"你凭什么反对亚里士多德"，这就是板结。同一个人的遗产里，维持和板结可以同时存在，追回写就要把它们分开记，不能一锅端。

板结还有一个来源常被忽视：回写越成功，后来者越不必亲自走一遍发出者走过的路。走过路的人知道每一步为什么这样走，也知道哪一步是迫不得已；只拿到结果的人，只知道"这样走"。一个老司机知道某条路为什么要绕开那个路口，因为当年那里塌过方；后来他把路线写成导航，几十年后路口早修好了，导航还在绕，跟着导航开的人也就一直绕。导航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没有人再去问"当初为什么绕"。板结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不是谁存心守旧，而是结果传下去了，理由没传下去。

◆ 最强的反对：回写是不是事后追认

这个动作有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反对意见。有人会说：所谓"追回写"，不过是看到后来发生了什么，再倒过来把功劳或罪过记在前人头上。后来的事千头万绪，你挑出几条跟他沾边的，就说是他的回写，这和"事后诸葛亮"有什么两样？只要愿意，什么都能追认到亚里士多德身上。

这个反对有分量，我们接住它，并且承认它指出了一个真实的危险。回应分两层。第一层，回写要有可追的链条：从他的某一部书，到某一个译本、某一位注释者、某一份课程规定，再到某一种考题、某一套术语，每一环都能指出文献。指不出中间环节的"影响"，只能算相似，不能算回写。第二层，要做一次反事实的检查：如果没有他，这一处土壤会不会照样变成这样？如果几条互不相干的路都会走到同一个结果，那这份功劳就不能独记在他名下。

这第二层检查还会带出一个意外的发现：很多记在本人账上的回写，其实一半属于中间的人。拉丁西方读到的亚里士多德，是经过波爱修斯的译笔、阿拉伯学者的注释、大学课程的编排一路送进去的；"亚里士多德的回写"，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些中间人的回写，这正是第12章说的反向师承在回写账上的投影。小区楼道里装上了感应灯，大家都记得是某位业主提的议，可真正让灯装上去的，还有那位跑了三趟物业的楼长，和那位垫钱先买灯泡的邻居。账要记，就得把经手的人都记上。

所以我们给这个动作立一条自律：说"这是他的回写"之前，先说清链条，再做反事实检查，最后分清哪一部分归本人、哪一部分归讲他、译他、编他的人。做不到这三步，就只说"相似"或"有关"，不说"回写"。这里的分寸是本书的方法约定，不是史料本身给出的结论。

◆ 常见误用

追回写是一个容易用歪的动作。我们列五种最常见的走样。第一种，把名气当回写。一个人被引用得多、被立像、被写进教科书，不等于他回写了土壤。有的人名气极大，后人的提问方式却一点没被他改；有的人默默无闻，他定下的一个格式却被所有人在用而不知道是谁定的。小区里人人知道某位业主嗓门大，这是名气；可真正改变了小区的，也许是当年那个提议在楼道装感应灯、后来搬走了谁也记不住名字的人。要看的不是人被记住没有，而是土壤变了没有。

第二种，只记正向，不记负向。如果只把"被接受、被传承"算作回写，苏格拉底这一轮就闭合不了，他的死就只成了一个悲剧故事，而不是一轮发生的关键一步。负向回写同样在改土壤，而且常常改得更深。一所学校开除了一个质疑考试制度的学生，学校以为事情过去了；十几年后这个学生写的回忆文章让全国家长重新讨论考试制度。开除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负向回写，它的后效要在十几年后去量。

第三种，宣布代替观察。"他深刻影响了后世""他奠定了基础"这类话，说得越响，越容易掩盖什么也没查。追回写的句子应当可以被查错：哪一年、哪个机构、哪本书、哪套术语、哪一种考题格式变了。说不出具体的痕迹，就宁可说"这一点我们还没有证据"。厨房里同理，说"这道菜影响了整个菜系"不如说"自从这道菜出来，周边馆子的菜单上有八家加了同类做法"。

第四种，把板结算在本人头上，或者反过来，用后来的板结去否定当初的回写。前一种错，是把伽利略时代的僵化记在亚里士多德账上，好像他本人就是个守旧派；后一种错，是因为后来板结了，就说当初的回写不值一提。两种错都把"回写"和"板结"拆成了两件事。其实它们常是同一块土：正因为当初回写得深，后来才压得硬。一座老桥后来成了交通瓶颈，不能就说造桥的人错了；没有这座桥，这座城根本长不到需要拓宽的规模。

第五种，把回写当成一次性的事件。有人以为一个学说"被接受"那天，回写就完成了。其实回写是一连串事：被接住、被改造、被误读、被禁、被重新抬出来，每一步都在重新改写土壤。亚里士多德在拉丁西方先只有逻辑、后来全集进来、被禁、成为课本、被谴责、成为"那位哲学家"，每一段都是回写的一环，少看一段，账就记错。一家老字号的招牌，三十年里换过几次字体、被仿冒过几回、上过几次电视，每一回都在改它在街坊心里的分量，不能只算开张那一天。

◆ 后世小试：笛卡尔留下的那道墙

最后拿一位后世哲学家试一试这个动作，只点到为止，详细的解构留给第四编。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里，从怀疑一切开始，落到"我正在思考"这件无法再怀疑的事上。追他的回写，先问他重置了什么：此后很长时间里，哲学家一开口就先问"我怎么知道"，认识论站到了哲学的前排，这是改掉了后来者提问的方式。再问他在哪里板结：他把心灵与物体分成两种不同的实体，这个分法后来渗进了日常语言和常识，以至于今天人们说"身体累了但心还想

做""脑子知道、心不接受"，都像是在用他的格局说话。等到后来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想把身心重新连起来，撞上的往往就是这道已经成了常识的墙。第 16 章再详谈笛卡尔怎样走到这一步。

追完回写，我们手里有了一本两栏的账：他重置了什么，他在哪里结了硬块。可还有一件事这本账记不下。回写把土壤压硬之后，后来的人有时并不往前走，而是转身往回走，去翻出更早的那一轮：学园在柏拉图死后不到百年，竟然转向了怀疑，说自己回到了苏格拉底；几百年后又有人越过亚里士多德，直接回到柏拉图。这种往回走，是倒退，还是另一种前进？这是下一章要追的第五个动作：看回绕。

> **带走的话**
>
> **改得越彻底的方子，后来越难改。**

> **本章判错句**
>
> 如果找不到史料里看得见的回写痕迹，只能宣布"他影响深远"，这个动作就没有做成。

> **想一想**
>
> 你家里或单位里，哪一条规矩当初救过急，如今却没人敢改？
>
> 你自己定下的哪个习惯，正在从工具变成枷锁？

◆

14

第 14 章

看回绕：循环有没有绕回去

这一章的问题

思想往回走，是倒退，还是另一种前进？

◆ 衣柜里的喇叭裤

一位母亲收拾衣柜，翻出一条自己年轻时穿过的喇叭裤，正要扔，上高中的女儿一把抢过去：别扔，现在正流行这个。母亲笑了：我们那时候穿，你外婆说像扫大街的；你们现在又穿回来了，时尚就是转圈。

可是仔细看，女儿穿的和母亲当年穿的并不一样。女儿那条，面料加了弹力，腰线高了，裤脚的弧度收了一点；她不是配一件紧身花衬衫，而是配一件宽大的卫衣和一双运动鞋。她穿它，也不是因为街上人人都穿，而是因为前几年满大街的紧身小脚裤看腻了，大家想要一点宽松和松弛。母亲当年穿喇叭裤是赶时髦，女儿今天穿喇叭裤，某种意义上是在反对上一轮的时髦。裤子的形状回来了，可回来的方式、回来的理由、回来以后搭配出的整体，都是新的。这就是本章要讲的事。

哲学史上，这样的"穿回来"一再发生。柏拉图死后不到一百年，他的学园转向了怀疑，宣称回到苏格拉底；几百年后，有人越过亚里士多德，直接回到柏拉图；两千多年后，有人把答案重新悬在半空，与苏格拉底对话结尾的"无解"遥相呼应。上升叙事管这些叫"衰落"或"复古"，第3章说过，它解释不了。这一章讲五个动作里的最后一个：看回绕。

◆ 回绕、倒退、打转

要看回绕，先得把三件看上去相似的事分开。"回绕"这个词，第3章用河流拐弯回流的比喻引出过；这里第一次给它立下正式的界线，并且同时给它的两个近邻——倒退与打转——立界，后面各章凡说到这三个词，都以这里为准。

回绕，是答案的落脚点回到了某个旧位置，但它脚下的土壤已经整体换过；而且它之所以回来，是被当时的新矛盾逼出来的，回来以后又改写了后来的东西。女儿的喇叭裤就是回绕：形状回到了上一代，面料、搭配和穿它的理由全是新的；它是对紧身裤的厌倦逼回来的；它回来以后，又带动了一整套宽松的穿法。

倒退，是连土壤也想退回去，仿佛中间这些年没有发生过。如果女儿不但穿回喇叭裤，还非要找当年的老面料、配当年的花衬衫、梳当年的发型，而且认定现在的一切都不如从前，那就不是回绕，是倒退。倒退的标志，是拒绝承认中间发生过的东西。

打转，是逼它回来的始终是同一个矛盾，回来以后也什么都没有改写。如果每隔三年，同一批人以同一个理由在喇叭裤和紧身裤之间来回换，每次都说"这次不一样"，每次结果都一样，那就是打转。打转的标志，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所以，判断一次"回到从前"是不是回绕，可以问三个问题。第一，回到的是哪个旧位置？第二，逼它回来的，是当时的什么矛盾？第三，回来之后，它又改写了什么？三个问题都答得出来，才算回绕。答不出第二个，多半是怀旧或模仿；答不出第三个，多半是打转；在第一个问题上发现它连土壤也一并要回去，那是倒退。第22章会拿这三个问题，一个一个去问三哲之后的几次大回绕。

◆ 同一个落脚点，为什么不是同一个显露

这个三分法不是凭感觉划的，它直接从三大方程里来。三大方程说，显露、差异序列、发生土壤三者同时互生：显露由序列和土壤一起缠出来，序列由显露和土壤一起塑出来，土壤又由显露和序列一起改出来。方程只是关系的记号，不是算式，可它有一个很硬的推论：一个显露离不开缠出它的那条序列和那片土壤。两个相隔几百年的答案，落脚点哪怕一模一样，只要推它出来的序列不同、托住它的土壤不同，它们就不是同一个显露，只是长得像。

由此，三种"回到从前"在这个框架里各有位置。回绕，是新的序列在新的土壤上，缠出了一个落在旧址附近的显露；它看着像旧的，生成它的三股线却全是新的。倒退，是想让土壤也退回去，好让旧显露原样复活；可按三大方程，中间那几百年已经缠进了土壤，抹不掉，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倒退做不到，只能"表演"：把旧形状摆出来，同时假装中间的东西不存在。这也说明了倒退为什么常常显得僵硬——它要花很大力气去压住已经发生过的东西。打转，则是序列和土壤都没有动，同一个矛盾一次次逼出同一个显露，显露又一次次没能改掉土壤。

用 123 原理的话说，回绕是一轮完整的循环：新矛盾逼出显露，显露回写，重置了序列与土壤，只是这一轮的落脚点恰好落在旧址附近。打转是一轮循环缺了闭合的那一步：矛盾逼出了显露，回写却没有发生，土壤原样不动，于是下一次又撞上同一个矛盾。倒退则是把回写的方向倒过来，想让土壤往回重置，抹去中间那几轮回写。三者的分别，说到底是"回写有没有发生、往哪个方向发生"的分别。

大白话说，一个人戒了几年的夜宵，后来又开始吃，可现在吃的是自己煮的一小碗杂粮粥，因为他上了夜班、到半夜真的会饿，这是回绕：吃夜宵回来了，理由和吃法都是新的，而且他因此调整了整个作息。另一个人戒了又吃、吃了又戒，每次都是因为心情不好吃回去，每次都在体检后戒掉，十年如一日，这是打

转。还有一个人，非要回到十年前那种烧烤配啤酒的吃法，还说"这些年的讲究都是瞎折腾"，可他的胃已经不是十年前的胃了，这是倒退，而且是一种做不到的倒退。

◆ 从哪一头起手，就看见什么

三分法还和六路径有关。六路径说的是起手次序：在土壤中经由序列成为显露，可以先从显露看起，也可以先从序列或土壤看起，次序不同，看见的东西就不同。看回绕，起手次序几乎决定了结论。

如果先从显露起手，也就是先把两个答案摆在一起比，看到的首先是像：阿尔克西劳的悬置和苏格拉底的无解很像，德性伦理学和亚里士多德很像。从这一头出发，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就是"古已有之""换汤不换药"。教科书常用的先学说、后师承、再讲时代的次序，正是这样起手，所以它讲回绕时，常常只讲出"复兴"二字。

如果先从序列起手，先问"他一路是怎样推进到这里的，在哪里卡住了，转向了谁"，看到的首先是不同：阿尔克西劳一路是在和斯多亚派缠斗，苏格拉底一路是在和街头的熟练使用者缠斗；同一个悬置，是从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上走出来的。接着再看显露，再追土壤与回写，相似与不同才会各归其位。这就是本书一直走 D→S→E 的理由，在回绕这个动作上看得最清楚。

日常里也一样。两个人都辞职回老家开了民宿，只看结果，是"同一种选择"；可一个是在大城市做了十年设计、想把自己的手艺用在老房子上，另一个是生意失败、回家躲债，顺手把空房挂上了网。先看结果，你会说他们一样；先看他们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一步，你才知道这是两件事，而且你能预见，他们的民宿三年后会长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 为什么要看回绕

前四个动作已经能把一个哲学家讲得很清楚了：他的问法，他顶撞的对手，后世怎样讲他，他改写了什么。为什么还要第五个？第一个理由，回绕是检验全书框架的地方。全书一直说，思想的发生是一个循环，不是一架楼梯：矛盾逼出新的显露，新的显露回写，回写又在被重置的土壤上生出新的矛盾；这个循环没有预定的终点，可以走向任何方向，包括往回走。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哲学史上就应该能看到一次次真正的回绕，而且这些回绕不能被讲成"倒退"。如果哲学史上一个回绕都找不到，或者所有的"回到从前"都只是倒退和打转，那么上升叙事反倒更有道理，本书的框架就要打折扣。看回绕，是让我们自己的说法去接受事实的检验。

第二个理由，回绕暴露了一个答案没用完的部分。一个旧位置之所以能被重新拾起，说明它当年并没有被用尽：它还有一些东西，在当时的土壤里长不出来，要等土壤换过之后才长得出来。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在他自己的时代只走到了"可识别"，没有被留住，也没有被说清（第5章已谈）；可正因为它悬着，后人才能一次次回去拾起它。一个被说死、写死的答案，反而很少被回绕。

第三个理由，回绕让我们看清一个问法的寿命。"答案住在哪里"这道题，并没有在亚里士多德手里了结；它的落脚点搬来搬去，有时搬回旧址。一道题被一再回绕，说明它还活着。

大白话说，看一个家族，光看每一代人做了什么还不够，还要看有没有哪一代人，把爷爷那辈扔掉的东西又捡了回来——比如孙子回到乡下，重新种起了爷爷那几亩地，用的却是无人机和滴灌。这种"捡回来"，最能看出爷爷那辈的东西里，还藏着什么当年没长出来的苗。

◆ 怎么看：三个信号

回绕不总是自己报上名来。有时候当事人大张旗鼓地宣布"回到某某"，有时候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往回走。可以留意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自称"回到"。很多回绕会打出"回到某某"的旗号：学园的怀疑派说自己回到苏格拉底，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说要回到古典。这是最明显的线索，但也最需要查，因为旗号常常比实际更响。打着"回到"旗号的，可能是回绕，也可能只是借古人的名头说自己的话。

第二个信号，是跳代引用。一个人绕过他紧邻的前辈，直接去引一个更早的人，这往往说明他觉得紧邻的前辈把路走窄了，要回到岔路口重新走。普罗提诺越过亚里士多德去接柏拉图，就是一次跳代。大白话说，一个年轻厨师不学师父，偏去学师父的师父，多半是他觉得师父那一辈把手艺改坏了。

第三个信号，是旧词新用。一个早已过时的词，忽然在新的场合被重新用起来，而且用出了新意思。旧词回来了，往往说明它曾经指向的那个落脚点，又被人需要了。三个信号都只是线索，不是结论。看到信号以后，还是要回到上面那三个问题：回到哪里，被什么逼回来，回来后改写了什么。

◆ 三个问题去哪里找答案

三个问题说起来简单，真要回答，还得知道去哪里找材料。第一个问题，回到的是哪个旧位置，要对照着两边的原文看。回绕者宣称回到的那个人，到底说过什么；回绕者自己说的，又是什么。很多时候，一对照就会发现，他回到的并不是那个人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个点：阿尔克西劳回到的，是苏格拉底的悬置，不是苏格拉底在街头的那种生活方式。说清"回到的是哪一个点"，比笼统地说"回到某某"有用得多。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矛盾把它逼回来的，要去看回绕者当时的对手和处境。他那个时代占上风的回答是什么？那个回答在哪里接不住他？这其实就是把第11

章的动作再做一遍，只不过这一次，要找的是"为什么偏偏要从旧东西里找武器"。一个人去古人那里找武器，往往是因为眼前的武器都被对手占了。

第三个问题，回来以后改写了什么，要去看回绕之后的土壤。有没有新的学派、新的课程、新的文体、新的争论因此出现？后人有没有接着他的路往下走？这就是第13章追回写的办法，用在回绕身上。如果一次"回到从前"之后，什么都没有变，它多半只是一阵风。

大白话说，判断女儿穿喇叭裤是不是一次真正的回绕，不能只看裤子。要看她回到的是喇叭裤的哪一点（宽松的裤腿，而不是那一整身打扮）；要看她为什么回去（紧身裤穿腻了）；还要看她回去以后，有没有带动一整套新穿法（宽松的上衣、运动鞋、不那么刻意的搭配）。三样都看到了，才能说这一轮时尚真的绕回来了。

◆ 三哲自己身上的小圈

严格说来，回绕要在链转出去以后才看得清，下一节会说明这一点。不过，在三哲自己身上，也能找到一些小小的回绕的影子，值得看一眼，因为它们提醒我们：回绕不一定隔着几百年，有时就发生在一个人的一生里，甚至发生在一本书的写法里。

一个影子在柏拉图晚年。第6章讲过，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里让年轻的苏格拉底被老巴门尼德问得节节败退，问的正是理念论最要命的难处。在这篇对话里，答案没有落地，讨论以一连串极其艰深的推演告终，读者很难说出它的结论是什么。这有点像柏拉图自己绕回了老师那种"问到最后悬着"的样子，只不过这一次被追问的，是他自己中年时立起来的学说。用三个问题看：回到的是苏格拉底式的追问；逼它回来的，是理念与事物之间怎样"分有"的难题；回来以后，他晚期的对话发展出了新的分析方法，这些又成了学园里的亚里士多德接着往前

走的材料。这是本书的解读，柏拉图本人并没有说"我要回到老师"，学界对《巴门尼德篇》的用意也众说纷纭。

另一个影子在亚里士多德。他的《形而上学》第一卷，用了好几章去回顾前人：泰勒斯说万物出于水，有人说出于气，有人说出于火，恩培多克勒讲爱与恨，阿那克萨戈拉讲心灵，柏拉图讲理念。他一边回顾，一边把前人的说法一一放进自己的"四因"框架里去检查，认为前人各自摸到了一两种原因，却没有看全。在那一卷的末尾，他说早期的哲学像是在牙牙学语，话还说不清楚。

这很有意思：亚里士多德回到了全部前人那里，但他是带着自己的框架回去的，回去的目的是证明所有前人都在朝他的方向摸索。这算不算回绕？按三个问题看，它更像一种"回顾"：他确实回到了旧位置，但他并没有被那些旧位置改变，而是把它们收编进了自己的体系。这提醒我们一个分别：回到旧东西那里，可以是为了从那里拾起没用完的东西（回绕），也可以是为了证明旧东西都在通向自己（收编）。前者让旧位置重新长出新东西，后者把旧位置变成了自己的注脚。第3章批评的上升叙事，其实正是这种收编式回顾的放大版。

大白话说，一个人回老家，可以是回去学爷爷那套被大家忘掉的手艺，回来以后改进了自己的活计；也可以是回去转一圈，然后对乡亲们说："你们看，你们当年那些法子，其实都是在往我现在这套做法上靠。"两种都叫"回老家"，意思完全不同。

◆ 三哲之后的第一个圈

第三编讲动作时，我们的规矩是先回头拿三哲做示范。可回绕这个动作有个特殊之处：三哲是一条只转了三轮的链，回绕要在链转出去以后才看得见。所以这里看的，是三哲刚刚身后、离他们最近的那个圈。细节留给第22章，这里只做一次示范。

柏拉图去世后，学园先后由斯彪西波等人主持。到了公元前三世纪，阿尔克西劳主持学园，学园的风气大变：它不再教授一套关于理念的学说，而是主张对一切问题都不轻易下判断，凡事都能从正反两面去论证，最后悬而不决。阿尔克西劳和他的追随者自认为，这才是苏格拉底的真传。

拿三个问题问一问。回到的旧位置是什么？是苏格拉底式的悬置，答案不落地。逼它回来的是什么矛盾？是学园自己的理念学说已经沉成了厚土，同时外面兴起了斯多亚派这样一个自信能把握真理的强劲对手；学园用悬置去对付独断，用老师的老师去对付老师的学说。回来以后改写了什么？它把"不知道"从一种个人的诚实，变成了一套可以系统运用的论辩方法，并且一直传到了后来的怀疑论传统里。三个问题都答得出来，这是一次回绕。

而且很清楚，它不是倒退：阿尔克西劳不是回到雅典街头去一个个拦人，他是在一所有着百年历史、有课程、有对手的学校里，用一套成熟的论辩技巧做这件事。形状是苏格拉底的，土壤是柏拉图之后的。

◆ 后世小试：二十世纪回到亚里士多德

拿一个第四编不专门讲的例子试一下手。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英语世界的道德哲学长期被两大路数占据：一种看行为的后果，大致是功利主义的传统；一种看行为是否合乎义务和规则，大致是康德的传统。1958 年，英国哲学家安斯康姆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现代道德哲学》，矛头直指这两种路数，认为它们用的"道德上应当"这一类概念，已经脱离了曾经支撑它们的土壤，变得空洞；她建议先把这类概念搁置，回去好好研究人的品格、动机与德性。二十多年后，麦金太尔在 1981 年出版的《追寻美德》里，把这个方向推向了更大的范围，主张现代道德讨论之所以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是因为丢掉了亚里士多德那种以德性和人生整体为中心的传统。此后，"德性伦理学"作为第三种路数，进入了许多伦理学教科书。

问三个问题。回到的旧位置，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问的不是"这件事该不该做"，而是"一个好人是什么样的"。逼它回来的矛盾，是现代道德理论的规则与计算，接不住真实道德生活里那些关于品格、关系和一生成败的问题，道德争论陷入了僵局。回来之后改写了什么？它改变了伦理学的版图，也影响了医学伦理、职业伦理等许多领域里讨论问题的方式。

同样，它不是倒退。今天的德性伦理学者，并不打算恢复古希腊城邦的奴隶制和对女性的排斥，也不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整套生物学；他们是在现代心理学、现代社会的土壤上，重新拾起"品格"这个落脚点。喇叭裤回来了，面料是新的。这里只点到为止，它说明回绕不是古代才有的事，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也一再发生。

◆ 三分法的边界：一场运动里三样都有

三分法分得清楚，真实的历史却很少分得这样干净。一场大的"回到从前"，往往是好几股线缠在一起，有的线在回绕，有的线在倒退，有的线在打转。三分法不是给一整场运动贴一张标签，而是拿去一股一股地分。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人文学者打出"回到古典"的旗号，重新去找、去校、去读希腊罗马的原典，这一股带出了新的校勘学、新的教育、新的文体，后来还改写了整个欧洲的学问版图，按三个问题看是回绕（第22章再详谈）。可就在同一场运动里，也有一股人认定写拉丁文只许用西塞罗用过的词、只许照西塞罗的句法，仿佛西塞罗之后一千多年的拉丁文都不算数。伊拉斯谟在 1528 年写过一篇对话《西塞罗派》，专门讽刺这种做法。这一股，就近乎倒退：它不只要回到旧形状，还要把中间长出来的东西一并否认。同一面"回到古典"的大旗下，回绕和倒退并肩走着。

打转也需要一个限定：它很依赖看的时间尺度。拉近了看，许多事情都像打转；拉远了看，几乎每一轮都留下了一点东西。家里关于"孩子该严管还是该放

养"的争论，一家人可能十年里来回吵了好几轮，每一轮的理由都差不多，看上去是打转；可等孩子长大回头看，每一轮争吵其实都改了一点家里的规矩，某一次定下的"周末自己安排"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这是打转"的时候，要交代是在多长的尺度上说的。在哲学史上，我们宁可谨慎：几十年里的来回拉锯，可以说是打转；放到几百年里看，就要再查一遍有没有什么东西被悄悄留了下来。

这些边界不削弱三分法，反倒说明它为什么有用。正因为真实的历史是缠在一起的，才需要一把能一股一股去分的刀；要是历史本来就分得干干净净，也就用不着这把刀了。

◆ 这个动作常被用歪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见圈就说回绕。思想史上相似的说法到处都是，只要两个相隔千年的人说了一句意思相近的话，就宣布"这是回绕"，那就是看图说话。相似不等于回绕；回绕要能答出那三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是什么矛盾把它逼回来的？答不出，最多只能说"相似"。

第二种，用回绕去证明"古已有之"。有一种常见的论调：现代人说的什么新东西，古人早就说过了。这把回绕用反了。回绕恰恰说明，旧位置回来的时候，土壤已经换过，带回来的东西是新的。说"古已有之"的人，只看见了形状的相似，没看见面料的不同。

第三种，把回绕浪漫化。回绕不一定是好事。被逼回来的旧位置，可能把它当年的毛病也一并带回来。德性伦理学回来了，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面临的问题——德性的标准由谁来定，不同共同体的德性彼此冲突怎么办——也跟着回来了。回绕不是"复兴"的同义词，它只是循环的一种走法。

第四种，不肯承认倒退和打转。有些"回到从前"确实就是倒退或打转，硬要把它们说成回绕，是在替框架护短。全书的框架之所以可以检验，正是因为它允

许有些圈不是回绕。真诚地说出"这一次是打转"，比把一切都讲成回绕更有力量。

◆ 最强的反对：回绕会不会是一张永远不输的牌

这个动作有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反对意见。有人会说：你们的说法太方便了。哲学史往前走，你们说是循环在推进；往回走，你们说是回绕；回绕得不像，你们说是"土壤换了"；实在说不圆，还可以叫它打转或倒退。无论历史怎么走，这套说法都不会错——而一个永远不会错的说法，其实什么也没说。

这个反对击中了一个要害，我们正面接。我们的回应是：三分法并不是什么都能装的口袋，它给每一次判断都留下了可以被驳倒的地方。说一次"回到从前"是回绕，就是在作三个可以去查的断言：它回到的旧位置可以在两边的原文里对照出来；逼它回来的矛盾可以在当时的对手和处境里找到；它回来之后改写的东西可以在后来的课程、文体、争论里看到。三个断言里任何一个查不实，"回绕"这个判断就得撤下，改判成相似、怀旧、倒退或打转。这样一来，每一次判断都是可以输的。

更要紧的是，整个框架也是可以输的。本章开头说过，看回绕是让全书的框架去接受事实检验：如果把三哲之后的几次大回绕一一查过，发现它们几乎都答不出第二个问题，回去的理由只是书恰好译了过来、碰巧被人读到了，看不出任何当时的矛盾，那么"思想史是被矛盾推着走的循环"这个说法就要大打折扣。第23章会把这类失效条件一条条列出来。

大白话说，一个算命先生无论你结婚还是离婚都说"我早算到了"，他的话就不值钱；一个修车师傅说"换了这个零件，要是开起来还响，就说明毛病不在这儿，我再往别处查"，他的话才值得听。我们希望这个三分法站在修车师傅这一边。

◆ 回绕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

最后说一件看回绕时会顺带发生的事：它会悄悄改变我们对思想史时间的感觉。上升叙事给人的时间感，是一支箭：越往后越高，古人站在箭尾，我们站在箭头。这种时间感有一个后果：读古人，像是参观博物馆，看的是"我们已经走过的地方"。

看回绕看多了，时间感会变成另一种样子，更像一首被反复翻唱的老歌。每隔些年，就有新的歌手把它重新唱一遍，编曲换了，乐器换了，唱的人对这首歌的理解也换了；可有些句子，一代一代的人都会在自己最难的时候重新想起来。这时候，苏格拉底就不只是两千四百年前的一个古人，他是一个还会被重新唱起来的声部；"答案住在哪里"也不是一道已经被解完的旧题，而是一道每代人都可能被逼回去重做的题。

这种时间感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在重复"。翻唱和原唱不同，回绕和原位不同。它只是意味着，后来者不一定更高，前人也不一定只是台阶；谁站在箭头，要看那一刻的矛盾把谁推到了前面。

◆ 五个动作合在一起

到这里，第三编的五个动作就讲完了。把它们排在一起，正好是一条完整的路：先跟问法，不跟人：读出他接过来的是哪道题，他认什么算回答（第10章）。再找前置矛盾：看他在顶撞谁，谁的答案成了他的地基和对手（第11章）。再查反向师承：看后世的他是被谁讲出来的，把本人和被讲出来的他分开记账（第12章）。再追回写：看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第13章）。最后看回绕：看他之后，循环有没有绕回去，回来的是什么（本章）。

这五个动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全是从希腊三哲那一轮完整的发生里看出来的：苏格拉底那里看到了问法，柏拉图那里看到了前置矛盾和改写，亚

里士多德那里看到了回写与板结，三人之间看到了反向师承，三人之后看到了回绕。导论里说，这盏灯给的是方法，不是结论；五个动作，就是这个方法。

大白话说，这像一套给老房子做体检的流程：先看它当初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盖的，再看它是推倒了什么旧房子盖起来的，再看后来的住户把它说成了什么样，再看它改变了整条街的什么、又在哪里变得改不动了，最后看后来有没有人照着它的老样子重新盖了一栋。五步走完，一栋房子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

可是方法讲得再好，不拿到真实的材料上去用，也只是纸上的流程。三哲之后两千年，"答案住在哪里"这道题经过了许多双手：有人把答案收进上帝的心里，有人把它安在"我思"之上，有人把它放进认识的条件，有人把它交给历史，有人把它放回日常的用法，有人让它再次悬在半空。下一编，我们拿这五个动作，一个一个去看答案怎样搬家。第一站，是一位把柏拉图带进基督教世界的北非主教。

带走的话

回绕回到旧位置，土壤已经整体换过；倒退要连土壤一起退，打转什么也留不下。

本章判错句

如果一次"回到从前"答不出是什么新矛盾把它逼回来、回来后又改写了什么，就不能把它叫作回绕。

想一想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被重新捡回来的老东西，用法已经全变了？

你身上有没有一件事，是在原地打转而不是在回绕？

◆



第　四　编

照见：答案搬家的两千年

导　语

方法讲得再好，不拿到真实的材料上去用，也只是纸上的流程。这一编拿五个动作，去走三哲之后的两千年。

答案先被奥古斯丁收进上帝的心智（第 15 章），又被笛卡尔安在"我正在想"这件事上（第 16 章）；康德发现我们戴着一副摘不下来的眼镜，答案住进了认识的条件（第 17 章）；黑格尔把它交给历史（第 18 章）；维特根斯坦把它放回人们每天的用法，对苏格拉底做了最直接的回答（第 19 章）；德里达让它再一次悬在路上，这根轴首尾相接（第 20 章）。最后一章请三位不在这根轴上的人上场——霍布斯、加缪、罗尔斯——检验方法与模具的分界（第 21 章）。

每一章只抓住一位哲学家的一个侧面。读者若因此对某一位动了心，最好的下一步，是去读他本人的书。

15

第 15 章

奥古斯丁：答案住进上帝心中

这一章的问题

答案从柏拉图的彼岸，怎样搬进了上帝的心中？

◆ 第四编怎样读

从这一章起，我们离开希腊，进入两千年。第四编每一章只请一位哲学家上场，用的是第三编那五个动作：先跟他的问法；再找他在顶撞谁；然后看答案落在了哪里；再追他的回写，看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查一查后世的他是被谁讲出来的；最后看循环有没有在他身后绕回去。五个动作的次序可以随材料调整，但每一章都要落到同一个问题上：在他手里，"X 是什么"的答案，住到了哪里？

要先说明两点。第一，第四编选的六位，只是这根轴上最醒目的几个落脚点，不是哲学史的全部；还有许多重要的哲学家，因为他们的问题不在这根轴上，或者篇幅所限，没有专章，第21章会专门讨论那些"不在这根轴上的人"。第二，每一章都只能抓住一个人的一个侧面。一位哲学家的一生远比一个"落脚点"丰富，读者若因此对某一位有了兴趣，最好的办法是去读他本人的书。好，第一站：一位生在北非、死在北非，却改变了整个欧洲一千年思想的主教。

◆ "没人问我，我就知道"

公元四世纪末，一位北非的主教在写一本回忆自己前半生的书。写到后来，他忽然停下来，问了一个问题：时间是什么？他接着写下了一段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大意是：时间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给他解释，却茫然不知了。

读到这里，熟悉本书前几章的读者大概会心一笑。这不正是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制造出来的那种局面吗？人人天天用"勇敢""正义"，一问就说不出；人人天天说"时间"，一问也说不出。七百多年过去了，地点从雅典换到了北非，提问的人从一个光脚的老兵换成了一位主教，问题的样子却几乎一模一样："会用"和"说得出它是什么"之间，隔着一道缝。

这位主教叫奥古斯丁（354—430），那本书是他的《忏悔录》。他和苏格拉底不同的地方在于：苏格拉底问完就让问题悬着；奥古斯丁却要给答案找一个最可靠的住处。他最后找到的住处，是上帝的心智。

大白话说，一家连锁饭馆，最早的老师傅说不清火候是什么（苏格拉底）；第二代把一张完美标准贴在总店墙上（柏拉图）；到了这里，标准不再贴在墙上，而是收进了总店老板的心里——每一家分店的每一锅菜，都是照着老板心里那份标准做的，而且这份标准，本来就是老板当初开店时定下的。这一章，就来看答案怎样搬进了"老板心里"。

◆ 他接过的问题：变动的心，怎样抓住不变的真理

先跟问法。奥古斯丁接过来的，仍然是"X 是什么"这道题，但他的问法加了一层分量。他关心的不只是"正义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而是：一个会变、会错、会受欲望摆布的人的心，怎么可能抓住一个不变、不错的真理？如果真理真的存在，它在哪里？我凭什么能接触到它？

这个问法里，有他自己的整个前半生。他年轻时聪明、放纵、野心勃勃，在迦太基、罗马、米兰教修辞，前途光明，内心却一直不安。《忏悔录》开篇有一句后人反复引用的话，大意是：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不安，直到安息在你里面。他的追问不是书斋里的游戏，而是一个焦虑的人在找一块能站住的地。

他认什么算回答？这里要用上第10章说的第二问。苏格拉底只要一个不靠举例的定义，柏拉图要一个不生不灭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要事物自身的形式。奥古斯丁要的，是一个既不变、又能让他的心安下来的东西：它必须是真理，也必须是可以去爱、可以在其中安息的东西。一个冷冰冰的完美标准不够，它还得是"谁"的。

大白话说，一个漂泊多年的人想找一个"家"。只要一套标准的房子不够，他要的是一个有人在等他的地方。奥古斯丁要的答案，就是这样一个"有人在等的家"。

◆ 他在顶撞谁：摩尼教、怀疑派与他自己

再找前置矛盾。奥古斯丁的对手至少有三股，而且每一股他都亲身待过。第一股是摩尼教。奥古斯丁年轻时在摩尼教里待了大约九年。摩尼教讲善恶二元：世界上有一股光明的力量，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两者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在世界和人身上搏斗。这套说法起初很吸引他，因为它把他自己身上的挣扎解释得很直接：我做坏事，是我身上那股黑暗在作怪。可越往后，他越不满意：如果恶是一种和善平起平坐的实在，那么善就不是最高的、不变的；而且这套学说在回答天文、自然的问题时漏洞百出。他后来的一个著名主张，恶不是一种实在，而是善的缺失，就是在顶撞这股旧回答。

第二股是怀疑派。奥古斯丁十九岁时读到西塞罗的一部劝人学哲学的书《荷尔顿西乌斯》（今已失传），从此爱上了智慧。可西塞罗背后的那个传统——第

14章讲到的、转向怀疑的学园——也给他留下了一个难题：如果什么都不能确定，人怎么可能找到真理？他离开摩尼教后，一度陷入这种怀疑。皈依之后不久，他写的最早几部书里，就有一部专门反驳学园派。有意思的是，柏拉图亲手建立的学校绕回到苏格拉底式悬置之后，七百年后，这个回绕成了一位基督徒必须翻过去的墙。

第三股是他自己。这一点在奥古斯丁身上格外突出。《忏悔录》里最有名的场景之一，是他在米兰的一个花园里痛哭，挣扎于要不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心里早已承认了真理，意志却拖着他不肯走。他把这种状态描述为"两个意志"在自己身上打仗。前置矛盾不只在他和别人之间，也在他自己身上：他的理智已经被说服，他的生活还没有跟上。

大白话说，一个人决心戒烟，道理早就懂了，医生的话也听了，可每天晚饭后手还是会摸向口袋。他对抗的不只是烟草广告和抽烟的朋友，还有那个"明知道却做不到"的自己。奥古斯丁的问法之所以那么急切，正因为这第三股矛盾在他身上烧得最旺。

◆ 柏拉图是怎样到他手里的

在三股矛盾的夹缝里，奥古斯丁碰到了一样东西，《忏悔录》第七卷称之为"柏拉图派的书"。这些书是希腊文写的，他读的是拉丁译本，译者是一位名叫维克多里努斯的著名修辞学家。学者一般认为，书的内容主要是普罗提诺以及他的学生波菲利一系的著作——也就是第3章和第22章提到的，那个越过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

这里正好用得上第12章的"查反向师承"。奥古斯丁读到的柏拉图，不是我们在第6章看到的那个写对话的柏拉图，而是经过七百年、经过普罗提诺一系重新讲出来的柏拉图：在普罗提诺那里，理念已经不是孤零零摆在彼岸的一件件原

件，而是住在一个最高的"理智"之中，是这个理智的思想。再往前，罗马时代的一些柏拉图主义者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学者斐洛，也已经有过"理念是神的思想"一类的说法。换句话说，把理念收进一个心智之中，并不是奥古斯丁凭空想出来的，他接过的是一条已经铺了几百年的路。

而且，在奥古斯丁所处的拉丁西方，能直接读到的柏拉图原著少得可怜。一般人能读到的，主要是《蒂迈欧篇》的一部分拉丁译本。拉丁世界在之后几百年里认识的"柏拉图"，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奥古斯丁、通过西塞罗、通过这些零星译本讲出来的柏拉图。

奥古斯丁说，这些书让他第一次明白了，有一种不是物体、不占空间的实在；明白了恶不是实在；明白了真理不在外面的世界里，而要往高处、往里面去找。可他也说，这些书里没有他最需要的东西：没有"道成肉身"，没有一位为人而死的上帝，没有谦卑。柏拉图派让他看见了家在哪里，却没有给他回家的路。大白话说，就像一个迷路的人，从一张旧地图上终于看出了自己家的方位，可那张地图上没有画任何一条能走过去的路，他还得另找一个能带路的人。

◆ 新的落脚点：理念收进上帝的心智

奥古斯丁最后找到的答案，可以分两半说。前一半关于"答案在哪里"。在一部回答八十三个问题的小书里，有一个问题专门谈"理念"。奥古斯丁在那里说，理念是事物的原初形式，是事物稳定不变的道理，它们本身不是被造的，因而是永恒的、始终如一的，它们包含在神的心智之中。一切生成和消逝的东西，都是按照它们被造出来的。

这一步，把柏拉图的彼岸做了一个关键的改造。在柏拉图那里，理念自己就在那里，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在奥古斯丁这里，理念不再自己独立存在，而是属于一个"谁"——它们是造物主心中的设计，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心里早已有

的那份蓝图。世界是照着这份蓝图从无中造出来的。于是，"X 是什么"的答案有了一个新地址：上帝的心中。正义本身、美本身、马本身，都是上帝心中的道理；人间的一切正义、美、马，都是照着这些道理造出来、又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这些道理的东西。

回到总店老板的比方。柏拉图那时，标准菜谱贴在墙上，没有作者，自己就在那里；奥古斯丁这里，菜谱不在墙上了，它在老板心里，而且这家店连同它的每一口锅，都是老板照着心里那份菜谱一手开起来的。墙上的菜谱只能被照着做；老板心里的菜谱，还关联着一个会看、会管、会爱这家店的人。

用全书的话说，这是一次新的显露：答案从一个无主的彼岸，搬进了一个有位格的心智。它比柏拉图的彼岸更"可维持"，因为它有了一个永恒的主人；也更"可表达"，因为它和一整套经书、礼仪、教会的语言接在了一起。

◆ 往里走的路：真理住在里面的人那里

后一半关于"人怎样够得着答案"，这一半是奥古斯丁真正独特的地方。既然答案在上帝心中，人怎样够得着？奥古斯丁的回答是：不要往外走，回到你自己里面去；真理住在内在的人那里。这句话出自他的一部早期著作《论真宗教》，大意如此。在他看来，人在自己的心里，能看见一些不随自己改变的东西：比如"七加三等于十"，你今天看是这样，明天看还是这样，换一个人看也是这样；它比你的心更高、更稳。你的心会变，可你在心里看见的这个真理不变。这就说明，有一道比人心更高的光，照进了人心，人是在这道光里看见真理的。后人把这称为他的"光照说"。

这样一来，求真的路就转了一个方向。苏格拉底的路在街头，在人与人之间的盘问里；柏拉图的路在学园，在一级级向上的辩证训练里；亚里士多德的路在

海边和解剖台，在对事物的观察里。奥古斯丁的路在里面：先往里走，进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再往上走，在内心里看见那道比内心更高的光。

大白话说，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外面吵吵嚷嚷，各种说法互相打架，你越听越乱；直到某个夜里一个人安静下来，回到自己心里，忽然有一件事变得很清楚，清楚得不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倒像是本来就在那里，只是你终于看见了。奥古斯丁会说：这就是那道光。

这条"往里走"的路，后来走出了很远很远。一千两百年后，有一位法国人也在一间屋子里，关起门来往里走，一直走到"我正在想"这件事上（第16章再详谈）。只不过那位法国人在里面找到的落脚点，和奥古斯丁不一样。

◆ 时间住在哪里：门开了一条缝

现在回到本章开头那个问题。奥古斯丁问"时间是什么"，并没有问完就走。他在《忏悔录》第十一卷里绕了很久：过去已经不在了，将来还没有来，现在一闪就过去，那么时间究竟在哪里？他最后的回答是：在心里。过去活在记忆里，将来活在期待里，现在活在注意里；所谓时间长短，是心灵自己的一种伸展。他说得很谨慎，大意是：我看时间不过是一种伸展，至于是什么东西的伸展，我说不准，若不是心灵本身的伸展，那倒奇怪了。

他举的例子是背诵一首熟悉的圣诗。开口之前，整首诗都在期待里；念着念着，一句一句从期待移进记忆；注意力始终站在当下那一句上，把将来送往过去。换成今天的大白话：你唱一首熟到不用想的老歌，唱到一半，前半首在记忆里，后半首在期待里，而你此刻只唱着这一句。同样是五分钟，在医院走廊里等检查结果，和陪朋友聊天，钟表一样长，心里的长短完全不同。

这一段值得停下来看，因为它让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了两个地址：理念住在上帝心中，时间却住在人心里。这里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奥古斯丁自己的总结：答

案一旦和"心"连在一起，人的心也就被拉到了答案的门边。神的心智是正屋，人的心是正屋旁边开着的一道侧门；奥古斯丁走侧门是为了进正屋，后来的人却会在侧门里停下来，把它当成屋子本身。两千年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89节又引了"没人问我，我就知道"这句话，把它当作哲学困惑的样板（第19章另有谈到奥古斯丁的地方）。

◆ 罗马陷落：答案为什么不能住在任何一座城里

这个地址还被一次大事件从反面加固过。410 年，西哥特人阿拉里克的军队攻入罗马城，劫掠数日。一些坚持旧神的人说：罗马正是因为抛弃了祖先的神、改信基督，才遭此报应。奥古斯丁从 413 年起动笔写《上帝之城》，前后十余年，写成二十二卷。他的回答，大意是：两种爱造出了两座城，爱自己到轻视上帝，造出地上之城；爱上帝到轻视自己，造出天上之城。罗马也好，任何一个帝国也好，都只是地上之城，不是答案的住处。

这一块土壤的剧变，让"答案住在上帝心中"多了一层分量：答案若住在罗马，罗马一倒就无家可归；住在上帝心中，城倒了，家还在。这里要附一个限定：《上帝之城》极其庞杂，我们只取它与"答案住在哪里"相关的一条线。大白话说，一个人把全部的自我认同押在所在的公司上，公司一倒，他整个人也垮了；另一个人知道手艺长在自己身上，公司倒了，换个地方照样开火做菜。奥古斯丁把答案从一切会倒的东西里搬了出去。

◆ 三股线怎样同时缠出这个地址

现在把全书的三层关系在奥古斯丁身上走一遍，免得把他读成"一个人想出了一种学说"。先看 123 原理。矛盾的一头，是他那条差异序列：摩尼教九年，失望，转向怀疑，读到柏拉图派的书，花园里痛哭，一路试、一路弃、一路改。另一头，是他脚下的发生土壤：晚期罗马帝国的拉丁世界，他赖以为生的修辞学

行当，维克多里努斯的译本，米兰主教安布罗斯的布道（正是从安布罗斯那里，他学会了把旧约读成寓意，而不是死抠字面），以及后来崩塌中的帝国。序列要一个能让心安下来的不变真理，土壤递给他的，要么是两股力量的永恒搏斗，要么是悬而不决，要么是一张没有路的地图。两头顶不下去，逼出了新的显露：理念收进上帝心中，再加一条往里走的路。回写紧跟着来：他辞去修辞教职，回到北非家乡塔加斯特，与朋友过起团体生活；391 年在希波被推举为神父，几年后成为主教，此后三十多年写书、讲道、论战，把这个新地址写进了拉丁教会的日常。

再看三大方程。这个地址不是先想好、再落地的；地址的显露、问法的转向、土壤的改造，是在几年之间互相生成的。最好的证据是《忏悔录》的文体：全书从头到尾是对"你"说话，问题不再对着街坊、学生或自己发，而是对着答案的主人发。新的落脚点一显露，就立刻改了他提问的样子；而这种向上帝倾诉、在倾诉中追问的写法，又成了后来拉丁世界灵修写作的一片土壤。地址、问法、土壤三者同时在变，分不出谁先谁后。

再看六路径，也就是起手次序。神学教科书介绍奥古斯丁，常常从学说起手：光照说、恶是善的缺失、原罪与恩典，然后才讲他的生平，最后讲时代。这样起手，看见的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忏悔录》自己却是从他走过的路起手的，前九卷几乎都在讲他怎样一步步被逼到花园里。本书走的是后一种次序：先跟序列，再看显露，再追土壤与回写。起手不同，看见的奥古斯丁就不同：从学说起手，他是一位体系建造者；从序列起手，他是一个被逼到墙角、才把答案搬了家的人。认识一位新同事也一样，看简历上的职称，和听他讲这些年怎样换了三次工作、每次为什么换，得到的是两个人。

还要提醒一句：在这一轮里，奥古斯丁的地址是被逼出来的新显露；到了第16章，他留下的内省之路，又成了笛卡尔脚下的土壤。位置在轮转，不能把他钉死成某一个角色。

◆ 最强的反对：他只是一个转运站吗

这里必须正面回答一个反对意见。有人会说："理念是神的思想"这个说法，斐洛有过，罗马时代的柏拉图主义者有过，普罗提诺一系也有类似的讲法；奥古斯丁不过是把现成的东西转手进了拉丁世界。凭什么把这一次"搬家"记在他名下？

前半句我们接受，前文已经交代过，他接过的是一条铺了几百年的路，这是史实。但纠缠史本来就不去找"第一个想到的人"，它问的是：这个地址在什么时候、经过谁的手，变得可维持、可表达，并且开始重置后来者的提问。在拉丁西方，这一步是在奥古斯丁手里完成的。他把这个地址和"从无中创造"接上，和一位会爱、会等人回家的位格的神接上，和一条每个人都可以走的内省之路接上，再用拉丁文写进一大批此后被抄写、诵读了上千年的书里。斐洛的说法没有改掉拉丁修道院的课程，奥古斯丁的说法改掉了。大白话说，送餐上门早就有人做过，可让一座城的人晚饭都习惯拿手机点的，是那个把下单、支付、骑手调度接成一个系统的人。

还有一种反对说：这是神学，不是哲学。我们的回应是，本书这根轴不认学科的门牌，只问"答案住在哪里"；奥古斯丁本人也不把两样分开，他在《论真宗教》里就表达过真哲学与真宗教并非两样的意思。把他请出去，等于在答案搬家的路上抹掉一站，笛卡尔为什么会在"我"里面找上帝，就解释不通了。这是本书的判断，不是史料本身。

◆ 回写：一千年的地基

再追回写。奥古斯丁的显露，重置了什么？最大的一件，是他让柏拉图式的思想在拉丁基督教世界里扎下了根。在他之后的大约八百年里，西欧的神学和哲学，基本是在奥古斯丁铺下的地基上展开的：理念在神的心中，真理靠内在的光照来认识，恶是善的缺失，信仰在先、理解在后，人的意志离开恩典就站不起来。修道院的学校教这些，主教们写的书引用这些。柏拉图通过奥古斯丁，变成了中世纪拉丁世界的"默认设置"。

这种回写有正的一面：它让一套关于永恒真理的思想，在罗马帝国崩溃、文献大量散佚的几百年里，有了一个可以存放和传下去的地方。它也有一个后来才显出来的问题：当一套思想成了默认设置，人们就不再觉得它是一种选择，而觉得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到了十二、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重新大规模进入拉丁西方（第12、13章已谈），一场冲撞开始了。亚里士多德那个"答案住在物中"、凡事从观察和自然原因讲起的学说，撞上了奥古斯丁传统那个"答案住在上帝心中"、凡事从内在光照讲起的地基。巴黎大学一度限制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1277年，巴黎主教发布了一份长长的谴责清单，其中不少条目针对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和他的阿拉伯注释者那里推出来的命题（第22章再详谈）。在这场冲撞里，奥古斯丁的传统扮演的，正是一层厚厚的、有惯性的旧土。

大白话说，一家老店开了几十年，后厨的一套做法是开店的老师傅定的，人人照做，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可商量的。有一天，来了个从外地学成回来的年轻厨师，带回一整套新做法。后厨里吵成一团，老人们说"我们一向这么做"，年轻人说"可外面早就这么做了"。老师傅本人当年也是个革新者，可他定下的做法，此刻成了最难撼动的东西。

◆ 回写也打在他自己身上

第13章说过，回写不光作用于别人，也会落回发出者本人。奥古斯丁是这一点最清楚的例子。他早年写过一部《论自由意志》，是为了驳摩尼教：恶不是另一股与善平起平坐的力量，而是人的意志自己背离了善，所以责任在人。为了把这一点说透，书里相当强调人的选择。二十多年后，一位出身不列颠的修士皮拉吉乌斯主张，人凭上帝所赐的本性就能择善行善，不必事事仰赖额外的恩典；奥古斯丁自己后来记下，皮拉吉乌斯在书里引了他这部早期著作来支持自己。他被自己早年的话将了一军。此后近二十年，他写了一大批反驳皮拉吉乌斯一派的书，越写越强调人离开恩典就站不起来。

到了晚年，大约 426 至 427 年间，他做了一件很少有作者做过的事：把自己九十多部著作一部一部重读，写成一本《订正录》，逐部说明当年哪句话说得不够妥当、应当怎样理解、哪里容易被人误用。这里要附一个限定：他订正的多半是措辞的分寸和容易引起误读的地方，并没有宣布推翻自己的旧作。可这本书本身就是回写的证据：他的显露进入了土壤，土壤里的人拿它去打别的仗，仗打回来，逼得发出者重写自己。

大白话说，一位老师傅晚年把自己当年写给徒弟的菜谱一本本翻出来，在页边批注："这里的盐当年写多了""这一步没说清，后来有人照做出了岔子"。这本批注本，后来反倒成了徒弟们争论"师父到底怎么想"的新依据。后世之所以能讲出许多个奥古斯丁，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他本人的文字本来就是好几层。

◆ 被讲出来的奥古斯丁

再查反向师承。后世的奥古斯丁，是被谁讲出来的？答案是：被很多方面，讲成了很多样子。奥古斯丁写得极多，一生著述浩繁，前后思想又有变化：早年的他更像一位基督徒柏拉图主义者，对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相当乐观；晚年和皮

拉吉乌斯一派论战时，他越来越强调人离开上帝的恩典就什么善事也做不成。这样一位作者，后人想从他身上找到什么，几乎都找得到。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把这一点推到了顶峰。马丁·路德本人原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他和后来的加尔文，都大量援引晚年奥古斯丁关于恩典的论述，来反对当时的罗马教会；罗马教会这边，同样把奥古斯丁奉为最重要的教父之一。十七世纪，天主教内部又出现了一个以一部名为《奥古斯丁》的大书为旗帜的派别，后来被罗马教会谴责。同一个奥古斯丁，被争吵的几方同时举在手里，每一方都说自己才是他真正的继承人。

这正是第12章说的，讲述者会往不同方向添笔：有人讲出一个"恩典的奥古斯丁"，有人讲出一个"柏拉图主义的奥古斯丁"，有人讲出一个"内心的奥古斯丁"，二十世纪还有人讲出一个"存在主义先驱的奥古斯丁"；年轻的加缪在大学里写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普罗提诺与奥古斯丁（第21章再详谈）。哪一个是本人？按第12章的工序，要分层，要找骨架，要看每一位讲述者自己在解决什么问题，要回到原文验关键句。而做完这些之后，得到的多半不是一个"唯一真正的奥古斯丁"，而是一张清楚的账：他本人在不同时期说过什么，后人又各自拿走了哪一部分。

大白话说，一个大家族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十箱书信，子孙分了家，每一房都从箱子里挑出几封最合自己心意的信，装裱起来挂在堂屋里，说"这就是老祖宗的家训"。几房人挂的家训，有时候意思正好相反。不能说哪一房造了假，信都是真的；可每一房讲出来的老祖宗，都只是老祖宗的一面。

◆ 回绕：从"如果我受骗，我就存在"到"我思"

最后看回绕，这里有一个漂亮的例子，正好把我们带向下一章。奥古斯丁在反驳怀疑派时，用过一个论证。在晚年的《上帝之城》里，他说得最集中，大意

是：在这件事上，我不怕学园派的质问——他们说"万一你是受骗了呢？"可是，如果我受骗了，那我就存在；不存在的人，连受骗都不可能。所以，就在我可能受骗的那一刻，我确定我存在。

一千两百多年后，笛卡尔写出了"我思"那个著名的论证。他的同时代人阿尔诺在给他的书提反驳意见时，就指出这个论证和奥古斯丁的说法十分相似。笛卡尔在答辩里对援引奥古斯丁表示领情；在一封书信里，他又说自己乐于与奥古斯丁相合，但他用这个论证去做的事，和奥古斯丁不同（第16章再详谈）。

这是不是一次回绕？用第14章的三个问题来问。回到的旧位置，是"在怀疑本身里找到不可怀疑的东西"这一点。逼它回来的矛盾，在笛卡尔那里，是经院课本的权威摇摇欲坠、新科学兴起、怀疑论重新流行。回来以后改写了什么？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存在"只是通往上帝的一级台阶，答案仍然住在上帝心中；到了笛卡尔那里，"我思"本身成了一切知识的地基，答案的落脚点搬进了人自己的思想之中。形状相似，土壤全换了，落脚点也搬了家。这正是回绕，而不是重复。

◆ 答案搬家的第一站

把这一章收拢一下。奥古斯丁接过的问法，是一颗会变的心怎样抓住不变的真理；他顶撞的，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学园派的怀疑，以及那个"明知道却做不到"的自己；在经由普罗提诺一系讲出来的柏拉图那里，他找到了材料，把答案从柏拉图无主的彼岸，搬进了上帝的心智；他又开出一条往里走的路，让人在自己心里、借着一道更高的光去接近答案；罗马的陷落从反面加固了这个地址；他的回写奠定了拉丁西方近一千年的地基，也让这块地基在亚里士多德回来时变成了一层厚土，甚至反过来逼他重写了自己；后世的他，被争吵的各方讲成了许

多个样子；而他那个"受骗也证明我存在"的论证，一千多年后在一位法国人手里被绕了回去，答案又搬了一次家。

这个地址也留下了它的亏缺。光照在每个人的心里，可谁来判定哪一道才是真光？奥古斯丁的答案是经书与教会的权威。一旦权威自己裂开，像宗教改革时那样，争吵各方都举着奥古斯丁、都说自己心里的光才是真的，内在之路就失去了公断人。上一轮的亏缺，就是下一轮的矛盾：下一位要找的，是一个不靠任何权威作证、任何人关起门来都能自己复走一遍的起点。

从"彼岸"到"上帝心中"，这一次搬家改变了一件根本的事：答案第一次住进了一个"心智"里。它还不是人的心智，而是上帝的心智；可是一旦答案和"心"连在了一起，下一步——把它搬进人自己的心里——就只隔着一道门了。推开这道门的人，把整筐苹果倒在地上，一个一个重新检查。下一章，我们去看笛卡尔。

带走的话

答案第一次住进一个心智；下一步把它搬进人自己心里，只隔着一道门。

本章判错句

如果找不到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文本、与摩尼教和学园派之间的顶撞痕迹，本章的读法就失去根据。

想一想

你在什么时候，一个人安静下来，忽然看清了一件事？

你心里那份"标准"，是属于一个人的，还是没有主人的？

◆

16

第 16 章

笛卡尔：答案住进"我思"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宣布什么都要怀疑，为什么反而刨出了一块地基？

◆ 一筐苹果倒干净

家里的群聊每天都有新消息：今天说隔夜菜致癌，明天说隔夜菜没事；上午有人转发"喝醋软化血管"，下午就有人转来辟谣。时间一久，很多人会生出一种疲惫：到底哪一条能信？大多数人的办法是挑一个看着靠谱的人，信他。还有一种更狠的办法：先把所有说法一律当作可疑，一条一条重新验，验过的才放回脑子里。

三百八十多年前，有人认真地用了第二种办法，而且用在了整个知识上。他叫勒内·笛卡尔（1596—1650）。他自己打过一个比方：一筐苹果里混进了几个烂的，怕烂的传染好的，最稳妥的做法不是在筐里翻来翻去地挑，而是把整筐倒出来，一个一个检查，只把好的放回去。这个比方出自他答复耶稣会士布尔丹的《第七组答辩》。

这一章要处理一个反常现象。按常理，一个人宣布"什么都要怀疑"，应该落进虚无，什么也建不起来。可笛卡尔偏偏从怀疑里刨出了一块地基，近代哲学有好长一段路都踩在这块地基上。更反常的是，这块地基小得出奇：不是上帝，不是自然，不是经典，而是"我正在想"这件事本身。答案从亚里士多德的"物

中"（第7章）、从奥古斯丁的"上帝心中"（第15章），一下子搬进了一个人正在思考的那一刻。

我们照旧用五个动作来解他：先跟他的问法，再找他顶撞的对象，看新的落脚点怎样显露，然后追回写、查反向师承、看回绕。顺序上仍走本书的老路：先跟问法的推进，再看学说怎样显露出来，最后追它的土壤和回写。

◆ 他接过的问题：从"是什么"到"凭什么确定"

跟问法，是第一个动作。读笛卡尔最容易犯的错，是以为他也在问"X 是什么"——灵魂是什么，物体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他确实谈了这些，但他真正咬住的问题换了一个方向：我凭什么确定我知道？

这个转向有它的来路。笛卡尔十岁左右进了拉弗莱什的耶稣会学院，受的是当时欧洲最体面的教育：拉丁文、古典文学、逻辑、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形而上学，还有经院式的论辩。他在《谈谈方法》（1637）第一部分回忆这段学习，口气相当微妙：书读了不少，越读越发现自己无知；哲学经过历代最杰出的头脑耕耘，却没有一个论点不在争论之中，因而也没有一个论点不可疑。唯独数学让他喜欢，因为它的推理确定而明白。

这就是他的差异序列的起点。所谓差异序列，是一个人怎样一步步推进、比较、试探、修正，最后收敛到一个方向。笛卡尔的推进很清楚：他拿数学的确定性当尺子，去量所有学问，量出来的结果是，除了数学，哪一门都不合格。于是"X 是什么"这个老问题被他压到了后面，前面横着一道新关卡：在回答任何"是什么"之前，先找到一个不会动摇的点。

打个比方。一个装修师傅进了一套老房子，房东问他：这面墙刷什么颜色好？靠谱的师傅不会先谈颜色，他会先敲敲墙，听墙皮是不是空鼓，看里面是不

是返潮。墙不稳，颜色再好也白刷。笛卡尔就是那个先敲墙的人。他不是不关心颜色，而是认定前人的这面墙已经空鼓了。

这条序列还有两个推进的节点。1618年，他在荷兰布雷达结识了学者贝克曼，两人一起讨论怎样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这段交往让他确信，自然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把握。第二年冬天，他在德国一间生着炉子的屋子里独处整日（这是他自己在《谈谈方法》第二部分的说法），想出了后来那套方法的雏形。至于1619年11月10日夜里他连做三个梦、醒来认定自己找到了一门奇妙学问的基础，这件事出自他已佚失的笔记，经巴耶在1691年出版的传记转述流传，属于晚出记载，可以当故事听，不能当证据用。

◆ 他在顶撞谁：课本、怀疑派与一场审判

第二个动作是找前置矛盾：他在顶撞谁，谁的答案成了他的土壤。第一个对手是他学过的那套经院亚里士多德主义。要说清楚：笛卡尔顶撞的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而是经过一千多年注释、在大学课堂里被定型的那个亚里士多德。那套东西用"形式""性质""目的"来解释自然：石头下落，因为它的本性趋向大地中心；火往上蹿，因为它趋向自己的位置。第13章会细谈这层回写怎样在经院传统里变厚、变硬。到了笛卡尔这一代，课本能把每一个现象都"解释"一遍，却解释不出任何新东西。这好比一家老字号饭店，菜单上每道菜都配了一段来历故事，讲得头头是道，可你问厨师：这道菜今天怎么咸了？他只会说"本店做法一向如此"。解释到处都有，没有一条能拿来修正。

第二个对手来自相反的方向：怀疑派。16世纪，古代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重新流行；蒙田在随笔里反复追问"我知道什么"，把人的理性写得摇摇晃晃。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与新教各执经文、各说各理，"谁有资格判定真理"本身成了打得头破血流的问题。研究怀疑主义史的学者

波普金把这段时期描述为一场"怀疑论危机"。在这样的空气里，一个只会说"我们不可能确定任何事"的人，并不显得古怪，反倒显得清醒。

第三股力量是新科学，以及它遭遇的打压。1633年伽利略在罗马受审，被迫放弃地动说。笛卡尔当时已写好一部论述宇宙与物理的书稿《论世界》，其中同样主张地球运动。听到伽利略被判的消息，他把书稿收了起来，生前没有出版。

把这三股力量放在一起，笛卡尔的处境就清楚了。他的差异序列——拿数学的确定性去量一切——撞上了一张特征纠缠网络。这里说的"特征纠缠网络"，就是一个思想发生时身边缠在一起的那些东西：书本、制度、对手、风险，一起构成它的土壤。旧课本解释一切又说明不了什么，怀疑派拆掉一切又什么也不建，新科学有力量却随时可能被定罪。推进的方向与土壤的状况之间，矛盾尖锐到这个地步：旧答案不可信，怀疑又无处可停，新学问需要一块谁也推不倒的地基，最好连神学家也挑不出毛病。

这里补一句限定。说笛卡尔"顶撞"经院哲学，不等于他和经院传统一刀两断。20世纪初，法国史家吉尔松专门编过一部经院哲学与笛卡尔用语的对照索引，显示笛卡尔的大量概念——实体、属性、样式、观念的"客观实在性"——几乎都是从经院课本里借来的。儿子接手父亲的店，先改父亲最得意的规矩，可他用的仍是父亲的灶台和刀（第11章讲过这个动作）。顶撞是真的，借用也是真的，两者缠在一起，分不出哪个在先。

◆ 一层层剥到底：三道筛子与一条退路

1641年，笛卡尔用拉丁文出版了《第一哲学沉思集》。全书六个沉思，第一个沉思就是倒苹果。不过在倒之前，先看他给自己留的退路，这是理解他的一道边界。《谈谈方法》第三部分说，拆旧房重建的时候，得先另找一处地方住，于

是他给自己定了一套"临时道德"：遵守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坚守从小信奉的宗教；行动上一旦拿定主意就坚决走下去，像在森林里迷路的人，不要东撞西撞，认准一个方向一直走，总能走出林子。这就像家里装修期间租房过渡，旧房子里墙砸了、地撬了，日子还得照常过。所以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一种在书房里进行的理论操作，不是在街上对一切说不。他在第二部分里也说过，一座由一位建筑师从头规划的城，往往比在旧村落上东补西修出来的老城整齐，但他并不打算去改造国家，只打算改造自己的想法。这和苏格拉底在街头逼问每一个路人（第5章），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怀疑姿态。

然后是三道筛子。第一道是感官。远处的塔看着是圆的，走近了是方的；插进水里的筷子看着是折的。感官骗过我们，就不能无条件信任。但他马上承认，这一筛筛不干净：我此刻坐在炉火边，穿着睡袍，手里拿着纸，这总不会错吧？

于是有了第二道筛子：做梦。他说，我在梦里也常以为自己坐在炉火边，醒来才发现是躺在床上。很多人有过这种经验：半夜被手机铃声惊醒，伸手去摸，手机安安静静，那铃声原来响在梦里。在梦里，我们没法从内部分辨梦与醒。这一筛之后，具体的场景都可疑了，但还剩下一些东西：无论醒着还是做梦，二加三总等于五，正方形总有四条边。

第三道筛子最狠：假设有一个法力强大又狡猾的恶魔（拉丁原文是"某个邪恶的精灵"），用尽一切手段欺骗我，让我每次算二加三都算错，而我毫无察觉。这个假设不是笛卡尔真信有恶魔，而是一种思想上的压力测试。好比银行测试系统安全，会假设最坏的入侵者已经拿到了员工密码，看系统还剩什么能守得住。

三道筛子过完，筐里几乎空了。就在这时，第二个沉思出现了那个转折：就算恶魔在骗我，被骗的总得有一个"我"；我怀疑，我就在思考；"我是，我存在"这句话，每次被我说出或在心里想到时，就必然为真。

别的都可疑，只剩"我正在怀疑"确定。你可以怀疑窗外是不是真在下雨，怀疑昨天那顿饭是不是真吃过，甚至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真的，可"我此刻正在怀疑"这件事，你一怀疑它，就又证实了它一次。这像一个关不掉的开关：你伸手去关它，伸手这个动作本身又把它打开了。

紧接着，笛卡尔用一块蜡说明"我"认识事物靠的是什么。换成厨房的说法：从冰箱里拿出一块冻猪油，白的、硬的、凉的，敲上去有声，闻着有一点肉香。放进热锅，十几秒后，颜色变了，形状没了，硬变软，凉变热，敲也敲不响了。可谁都不会说锅里换了一样东西，它还是那块猪油。那么让我们认定"还是它"的，既不是眼睛看到的颜色，也不是手摸到的软硬，因为这些全变了。笛卡尔的结论是：认出它的是心灵的洞察，是理智而不是感官。连对一块猪油的认识，最后都落在思考那一边。

读到这里，熟悉本书线索的读者会觉出一点味道。亚里士多德说火候就在肉从生到熟的过程里；笛卡尔看着锅里化开的猪油，却说真正认出它的地方不在锅里，在想的那一边。答案离开了灶台。

◆ 答案住进"我思"：一个只在想的时候成立的支点

第三个动作要问：新的落脚点是什么，它显露到了什么程度。笛卡尔在第二个沉思开头提到阿基米德：只要给他一个稳固的支点，他就能撬动地球。笛卡尔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支点，他找到的支点叫"我思"。于是在"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上，地址又改了一次。亚里士多德说答案在物中；奥古斯丁说答案在上帝心中；笛卡尔说：先别管答案在外面哪里，能为任何答案作保的，首先是一个正在思考的我。确定性的总闸，从外面挪到了里面。

用 SDE 的话说（这里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这是一次显露的位移。显露有三个"可"：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我思"在可识别这一项上几乎

满分：它清楚到连怀疑都会反过来证实它。可在可维持这一项上，它有一个先天的短处。第二个沉思里笛卡尔自己问：我存在，那么存在多久？回答是：只要我在思考。我一停止思考，也许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我思"的确定性是一瞬一瞬的，像一支只在你按住按钮时才亮的手电，一松手就灭。

单靠一瞬一瞬的确定，盖不起任何房子。于是第三个沉思里，笛卡尔请出了上帝。他论证说，我心里有一个无限完满者的观念，一个有限的我不可能是这个观念的来源，所以必定有一个无限完满的上帝把它放进我心里；上帝完满，所以不会骗我；所以凡是我清楚明白地认识到的，都可以信赖。他还认为，一样东西从这一刻存续到下一刻，需要的力量与从无中把它造出来相同，这份保存之功也归于上帝。换句话说，"我思"负责点火，上帝负责让火一直着下去。可维持这一个"可"，被交给了上帝。

这一步立刻招来质疑。《沉思集》出版时附上了六组反驳与笛卡尔的答辩（第二版又加了第七组），反驳者包括神学家阿尔诺、哲学家伽森狄，还有英国的霍布斯（霍布斯自己的问题不在这根轴上，第21章再详谈）。阿尔诺指出了后来被称为"笛卡尔循环"的问题：你靠清楚明白的认识证明上帝存在，又靠上帝存在来保证清楚明白的认识可靠，这不是在绕圈吗？

这就像一个人去银行贷款，银行要担保人；他找来的担保人说："我担保他靠得住。"银行问：那谁担保你靠得住？担保人一指贷款人："他可以担保我。"笛卡尔在答辩里对此有辩解，研究者至今争论辩解是否成功。我们在这里不判这桩官司，只指出一点：答案搬进"我思"之后，这个新住处自己撑不住全部重量，它的后墙打通了一道门，门外站着的是上一任房东。

再看可表达。笛卡尔在这一项上做得极其用心。《谈谈方法》用法文而不是拉丁文写成，开篇就说良知是世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意思是人人都有理性，人人都可以自己走这条路。《沉思集》把反驳和答辩一起印出来，像一份产品说

明书后面附上用户差评和厂家回复，让异议成为文本的一部分。苏格拉底拒绝著述（第5章），他的追问只到可识别；笛卡尔则把自己的思考做成了一份任何人都可以照着复走的路线图。这是"我思"能在下一代人手里活下来的重要原因。

把这一轮压成一句话：数学式的确定性要求，撞上了旧课本、怀疑派和宗教审判缠成的土壤，逼出了"我思"这个新的显露；而这个显露在可维持上先天不足，只好把上帝请回来垫底。这是本书的阐释框架，下面要拿史料去看它回写了什么。

◆ 两道反驳：散步的人与打雷的天

追回写之前，先让最强的反对上场，它们正对准"我思"最得意的地方。第一道来自同时代的伽森狄。他在第五组反驳里说：你何必非要从"思"推出"在"？从你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推得出来，比如"我散步，所以我存在"。笛卡尔的回答很见功力：散步可以是梦里的散步，身体也许根本没动；能确定的只是"我觉得自己在散步"这份意识，而这份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思。一个人半夜梦见自己在跑步，醒来腿一点不酸，可"刚才我觉得自己在跑"这件事一点不假。这道反驳，笛卡尔接住了。

第二道反驳晚了一百多年，也更难接。德国物理学家、格言作家利希滕贝格在他的笔记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应当说"它在想"，就像说"天在打雷"；一说"我思"，就已经说多了。打雷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找一个躲在云里打雷的"谁"，"天在打雷"里的那个"天"只是句子需要一个主语。同理，怀疑到底时真正确定的，也许只是"此刻有思想在发生"，至于有没有一个叫"我"的东西在背后思考、它是不是一个能延续的"实体"，那是语法和旧课本悄悄塞进来的。家里群聊常有人转发"据说吃这个能降血压"，你追问"据谁说"，往往追不到任何一个人，"据说"这个说法自己就造出了一个看不见的说话人。

这道反驳要害在于：笛卡尔从"有思想"走到"有一个思考着的东西"，用的正是前面提到、从经院课本里借来的"实体—属性"格式：凡属性必有承载它的实体，思想是属性，所以必有一个思考的实体。倒掉整筐苹果的人，手里还攥着筐。我们不必因此判"我思"破产：笛卡尔守得住的，是"思想正在发生"这一点的确定；守不住的，是把它径直认作一个持存的灵魂实体。后一步该怎样改造，正是一百多年后康德要做的事，第17章再详谈。

◆ 回写：一棵树、一张坐标纸、一道裂缝

第四个动作是追回写：新的显露回过头去重置了什么。回写是循环闭合的条件，要拿史料去看，不能凭空宣布。第一项回写，是重置了哲学的起手动作。1647年《哲学原理》法文版的序言里，他把整个哲学比作一棵树：根是形而上学，干是物理学，枝是医学、力学和伦理学。树根就是《沉思集》里那几步：我思、上帝、清楚明白的标准。他在给梅森的一封信里还私下说过，这几个沉思里藏着他物理学的全部基础，但请梅森先别声张，免得拥护亚里士多德的人看了不肯接受。这话很能说明问题：形而上学的地基，同时就是新物理学的地基，他是借根换树。

此后一百多年，"先问我怎么知道，再问世界是什么"成了哲学的默认起手式。不管后来的人站在哪一边，相信理性能独立认识真理也好，认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也好，大家都从心灵里的"观念"出发，再想办法够到外面的世界。这就是回写改写了差异序列：后人提问的先后次序，被他重新排过了。就像一家公司换了总经理，第一条新规是"任何报销先查票据真伪"，十年后人都换光了，这道先查票据的工序还在，谁也不再问它从哪里来。

第二项回写更日常。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的附录《几何学》里，把代数和几何接到一起，用一对数来表示一个点的位置，这条思路就是今天中学生学的坐

标。电影票上印的"7排12座"，手机地图上的定位，都是它的远亲。他想用数学的确定性重建一切知识，这个雄心没有完全兑现，可"用数去定位"这一招，渗进了几百年后普通人的日常。

第三项回写是一道裂缝。为了让心灵的确定性独立出来，笛卡尔把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只会思考、不占空间的心灵，一边是只占空间、不会思考的物体。物体世界交给机械规律，他甚至主张动物的身体可以看作精巧的机器。这一刀切得干净，物理学从此可以不问"目的"，放手去算；可它留下了一个再也合不拢的问题：不占空间的心灵，怎么推动占空间的身体？

最先把这个问题问得最直白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公主。1643年，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写信问笛卡尔：灵魂只是思维的东西，它怎么能决定身体去动？推动一样东西，总得碰到它吧。换成日常的话：一段没有手的念头，怎么推开一扇门？笛卡尔后来在《论灵魂的激情》（1649）里把心身交汇的地方放在大脑中的松果腺，这个回答几乎没说服什么人。后来马勒伯朗士干脆说，心与身并不真的相互作用，每一次都是上帝在中间安排，这条路叫"偶因论"。一个回答引出一串更难的回答，裂缝没有被缝上，反而被一代代人扩成了"心身问题"这一整个领域。

回写也有负向的一面。1642年前后，乌得勒支大学正式谴责他的新哲学；1663年，他的著作被列入天主教禁书目录。新显露回写土壤的时候，土壤也在回写它。与此同时，板结也在发生。笛卡尔要人拿"清楚明白"当真理的标准，可"清楚明白"是从里面看的标准。两口子吵架，各自都觉得自己的道理再清楚不过，这时候"我觉得很清楚"恰恰解决不了任何事。当后人把内心的确定当作知识的最后裁判，它就从一把开锁的钥匙，慢慢变成了一把锁。

◆ 一个想清零的人，怎样被土壤接住

到这里，可以把这一轮放到三层里走一遍，看看三大方程、六路径和123原理在笛卡尔身上怎样咬合（第9章讲过三层的分工：方程管"同时"，123管"回合"，路径管"入口"）。先看三大方程。笛卡尔的雄心，说穿了是想得到一个不靠土壤的显露：把整筐倒掉，等于想把特征纠缠网络清零，然后只凭一条干净的推理链，从"我思"一路长出上帝、物体和物理学。三大方程恰恰说这件事做不到：显露总是由差异序列在纠缠网络里生成的，S=F(D,E)，这里的 F 只是"由……生成"的占位记号，不是可以计算的公式。"我思"离不开它的差异序列，它只在三道筛子一层层推进到底时才亮起来；它也离不开它的土壤，借来的实体—属性格式、奥古斯丁留下的论证、怀疑论危机逼出的那种对确定性的饥渴，全都缠在里面。反过来，"我思"一显露，他的推进也跟着改道，后面五个沉思的次序都由它排定，这是 D=G(S,E)；梅森替他把书稿传给各方学者收集反驳，再连同答辩一起付印，一张以他为中心的论争网络就此织起，这是 E=H(S,D)。就像一个人搬家时发誓"这回一切从零开始"，把旧家具全扔了，到新家打开纸箱，用惯的菜刀、母亲手写的菜谱一样不少；而他在新家立下的规矩，过不了多久又改变了家里人怎样过日子。

再看六路径。笛卡尔自己走的入口，恰好也是先差异、再显露、后土壤：先怀疑，再得出"我思"，最后重建世界。他也清楚这只是认识的次序，在他看来，存在的次序里上帝在先，我在后。可后世的教科书大多反过来读他，走的是先显露的路：先背"我思故我在"，再讲他的方法，最后补一段十七世纪的时代介绍。这样读，"我思"就像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发现，三道筛子的推进和逼出它的土壤都成了注脚。这很像只看一场球赛的进球集锦，记住了那脚射门，却看不见它是怎样从后场一脚一脚传出来的。

最后看123原理。矛盾逼出显露那一段，前面已压成一句话；这里要补的是回合怎样闭合：只有等上一节那三项回写在史料里落了地，这一轮才算转完，而转完的那一刻，"我思"已经从新显露变成了下一位哲学家脚下的土壤。三层合起来看，笛卡尔不是从零开始的人，而是一个想从零开始、却被土壤接住了的人。这是本书的阐释，不是史料本身。

◆ 被讲出来的笛卡尔

接下来查反向师承：后世的笛卡尔是谁塑造的。先看那句人人会背的话："我思故我在"。在《沉思集》里，笛卡尔并没有写下这句格言，他写的是"我是，我存在"每次被说出或想到时必然为真。法文的"我思，故我在"出现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拉丁文"ego cogito, ergo sum"的写法见于1644年的《哲学原理》。今天印在文化衫上的那句话，是读者从几处文本里挑出、压紧、磨圆的。好比一首老歌里最好记的一句被剪成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听过这一句的人比听过整首歌的多出百倍，于是人们记住的这首歌，就是那一句。

再看"近代哲学之父"这顶帽子。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把笛卡尔称作从头重新开始的英雄、近代哲学真正的开创者（这里是大意）。这顶帽子很大程度上来自黑格尔把哲学史讲成精神发展的框架：笛卡尔在那里被安排为"思维回到自身"的起点（这套叙事第18章再详谈）。后来的教科书把17、18世纪分成"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大阵营，笛卡尔被排在理性主义的队首。这种两军对垒的讲法，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回头整理出来的，当时的人未必这样看自己。斯宾诺莎在1663年用几何学的格式重述过笛卡尔的哲学原理，那是同时代人里最早把他讲成一个"体系"的努力之一。

20世纪的塑造分成相反的两路。一路把他请回来当榜样：1929年胡塞尔在巴黎索邦大学演讲，后来整理成《笛卡尔式的沉思》，要把哲学像笛卡尔那样从

意识重新开始。另一路把他当成靶子：赖尔1949年在《心的概念》里把心身二分讥为"机器中的幽灵"的教条；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1994年出版《笛卡尔的错误》，用病例说明理性离不开情绪和身体。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达马西奥批的"笛卡尔"，很大程度上是赖尔那一路讲出来的笛卡尔；赖尔批的"笛卡尔"，又很大程度上是教科书定型的笛卡尔。真实的笛卡尔，在和伊丽莎白的通信里，反复承认心与身在日常经验里紧密结合，他甚至说，心身结合这件事，靠日常生活和交谈反而比靠形而上学沉思更容易体会。被当作靶子的那个笛卡尔，比真实的他更干净、更绝对。小区里传说某家人"特别抠门"，传到第三栋楼，已经变成"连垃圾袋都要回收再用"，而当事人不过是有一次没随份子。一个人被讲成什么样，取决于讲他的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我们认识的笛卡尔，相当一部分是他的追随者和反对者合写的。

◆ 回绕：我思的后门通向哪里

最后一个动作：看回绕。笛卡尔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吗？先看最直接的一条线。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十一卷第26章里"如果我受骗，我就存在"的论证，阿尔诺在反驳里就提过它和"我思"的相似；这一圈是不是回绕，第15章已经用三个问题问过，这里不再重复，只补一层。目的不同是真的：奥古斯丁要借自我确定走向上帝的光照，笛卡尔要借它为新科学打地基。方向相似也是真的：两人都是从怀疑走到"我"，再从"我"走到上帝。第15章说答案住进了上帝心中，到了笛卡尔这里，门牌改成了"我思"，可这间屋子的后门，仍然通向奥古斯丁的那位上帝。

再往前，还能绕回柏拉图。第五个沉思里，笛卡尔说他发现数学真理时，感觉不像学到了新东西，倒像想起了早已知道的东西。这几乎是柏拉图回忆说（第6章）的口吻。他所说的"天赋观念"，就是心灵里本来就有、不靠感官带进来的

观念。答案搬进了"我"，可"我"里面住着的，又是一些不从经验来的完满标准——像墙上那张标准菜谱，只是从厨房的墙上挪进了厨师的脑子里。

相似不等于回绕，还得用第14章的三个问题来问。回到的旧位置，是"真正可靠的标准先于经验，藏在心灵里"。逼它回来的矛盾，正是他自己的怀疑方法：三道筛子把感官筛掉以后，知识若还要有确定性，来源就只能是不靠感官的东西，柏拉图式的答案是被这条推进逼回来的，不是他怀旧。回来以后改写了什么？天赋观念成了下一代人吵得最凶的题目：洛克1689年出版《人类理解论》，第一卷就专门驳斥天赋观念，主张心灵起初像一张白纸；莱布尼茨写《人类理智新论》逐条回应，把心灵比作一块本来就带着纹理的大理石。后来教科书里"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的两军阵势，有一部分就是从这场争论里排出来的。三个问题都答得出来，这是一次回绕。笛卡尔绕回了柏拉图和奥古斯丁，但回来时手里多了东西：一套任何人都能复走的怀疑方法，一个可以用数学去算的物理世界，一个以"我"为起点的提问次序。就像小区的老菜市场翻修，摊位还是那几排，收钱却改成了扫码。

最后看他留下的亏缺。笛卡尔把确定性的总闸放进了"我思"，可他没有认真检查一件事：这个用来审查一切的理性，自己的工作范围有多大？它能凭自己证明上帝，凭自己推出物体的本性，凭自己给物理学奠基吗？他让理性审查了一切，唯独没让理性审查理性。就像一个人拿一把卷尺量遍了全屋，买家具、定窗帘、算地板，却从没拿这把卷尺去和标准尺比一比——万一它本身就短了一截呢？

上一轮的亏缺，就是下一轮的矛盾。一个多世纪后，一位德国教授接过了这个问题：先别急着用理性去回答上帝、灵魂和世界，先查一查这件工具本身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会保留"我思"，却把它从一个思考着的实体，改造成一切

认识都离不开的条件。答案还要再搬一次家，从"我思"，搬进认识的条件。那是第17章的事。

带走的话

倒空一整筐苹果，剩下的可能只是"我正在检查"这件事本身。

本章判错句

如果笛卡尔的"我思"与奥古斯丁的论证形状相同、落脚点也相同，本章说的"答案搬家"就不成立。

想一想

家里的群聊里，你靠什么判断哪一条能信？

如果把你相信的事全部重验一遍，哪一条最先站不住？

◆

17

第 17 章

康德：答案住进认识的条件

这一章的问题

如果我们戴着一副摘不下来的眼镜，答案还能住在世界本身吗？

◆ 一副摘不下来的蓝眼镜

设想一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就戴着一副蓝色的眼镜，而且这副眼镜摘不下来。他看到的天是蓝的，云是蓝的，母亲的脸是蓝的，桌上的苹果也带着一层蓝。他长大以后，成了一位认真的学者，开始研究世界的颜色。他会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带着蓝色。

这个结论对不对？说它错，似乎不公平：在他能看到的一切里，确实一样不缺地带着蓝色，他的结论在他能看到的范围里，一次都不会被推翻。说它对，又显然有问题：蓝色不在苹果上，在他的眼镜上。

再往前想一步。假如这位学者有一天忽然意识到"我戴着眼镜"，他会怎么做？他大概会放下对苹果、天空、云彩的研究，转过头来研究这副眼镜：它是什么颜色，它会给看到的东西添上什么，又会把什么东西挡在外面。他会发现，有一些关于世界的判断，他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不是因为他把世界看透了，而是因为这些判断说的其实是眼镜：凡是他能看到的东西，必定带着蓝色——这一点他用不着一个个去看，就已经知道了。

两百多年前，有一位德国教授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他叫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一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上一章的末尾

说，笛卡尔用理性审查了一切，唯独没让理性审查理性，就像一个人用一把卷尺量遍了全屋，却从没检查过卷尺本身。康德要做的，就是检查卷尺，或者说，研究眼镜。

经过他这一番检查，"X 是什么"的答案又搬了一次家：它不在柏拉图的彼岸，不在上帝心中，也不只在笛卡尔那颗正在思考的心里，而是住进了"认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之中。

◆ 他接过的问题：理性究竟能知道什么

先跟问法。康德在他最重要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后半部分，把自己的全部关切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要回答的。

注意这个问法的转向。苏格拉底问"勇敢是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都在为"X 是什么"找答案的住处。康德把问题往回拧了一圈：在问"X 是什么"之前，先问一问，我们凭什么能知道任何"X 是什么"？我们的认识能力，它的范围有多大，界限在哪里？

他认什么算回答？这是第10章说的第二问。他要的回答，不是对某一样事物的描述，而是对认识本身的条件的说明；而且这个说明必须有必然性，不能只是"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他特别关心一类判断：它们说出了关于世界的新东西，不只是把概念拆开来重复一遍；可它们又是必然的、普遍的，不靠一次次经验去碰运气。数学里的"七加五等于十二"、物理学里的"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有原因"，在他看来都是这样的判断。他的问题于是可以压成一句：这样的判断，究竟是怎样可能的？

大白话说，一个木匠干了一辈子活，有一天不再问"这张桌子该怎么做"，而是问："我手里这把尺子、这个墨斗、这套榫卯的规矩，凭什么能保证我做出的每一张桌子都是方的、稳的？"他从做桌子，转向了研究自己做桌子的工具。

◆ 他在顶撞谁：两股旧回答，一股新推进

再找前置矛盾。康德的处境，正好是第11章说的"一边厚、一边活"。厚的一边，有两股旧回答。第一股是德国大学里统治了几十年的理性主义，源头是莱布尼茨，经沃尔夫整理成一套庞大的教科书体系。这套体系相信，只要从清楚的概念出发、严格推理，理性就能证明上帝存在、灵魂不朽、世界有一个开端，一路推出关于一切事物的必然真理。康德本人就是在这个传统里成长起来的，他在大学讲形而上学课，多年使用的就是这一派学者鲍姆加滕编写的教本。这股回答，是他脚下最厚的那层土。

第二股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到了苏格兰哲学家休谟那里，被推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地步。休谟问：我们凭什么相信"原因必然带来结果"？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件事在另一件事之后一再出现：火靠近，纸就烧着了。可是"必然"这个连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之所以相信它，只是因为看多了，养成了习惯。照这样说，整个自然科学赖以成立的因果必然性，不过是一种心理习惯。两股旧回答就这样彼此打架：一股说理性无所不能，一股说理性连"原因"都保不住。

活的一边，是牛顿的物理学。到康德的时代，牛顿的力学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能准确地算出行星的轨道、潮汐的涨落。这是一股停不下来的推进：它每天都在证明，人确实能对自然做出普遍必然的判断。可是，按理性主义，这些成功似乎不需要观察；按休谟，这些成功其实没有必然性可言。两股旧回答，都接不住牛顿。

康德的问题，就是被这三股东西挤出来的：科学明明成功了，理性主义解释不了它为什么需要经验，休谟解释不了它为什么有必然性；那么，它到底是怎样可能的?

大白话说，一家公司有两位老顾问。一位说"只要逻辑推得通，方案就一定行"，一位说"所谓规律都是巧合，什么也保证不了"。偏偏公司这几年业绩一路上涨，每个预测都准。新来的经理夹在中间：两位顾问的话都解释不了眼前的成功，他只好坐下来，重新想一想"我们的预测为什么会准"。

◆ 被惊醒的人

关于这个矛盾，康德自己讲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 1783 年出版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序言里，他说，正是对休谟的回忆，许多年前第一次打断了他独断论的迷梦，给他在思辨哲学领域的研究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了康德生平的标准开场。可按第11章说的，当事人的自述也要查。研究者对"迷梦被打断"的具体时间、康德到底读到了休谟的哪些著作，一直有不同的意见；这个转变也不像一个早晨醒来那样干脆，而是延续了很多年。在 1770 年的一篇就职论文里，康德已经提出空间和时间是人感性的形式，这是后来整套学说的一块重要地基；可直到 1781 年，《纯粹理性批判》才出版，中间隔了十一年，研究者常称这段时间为"沉默的十年"。

所以，"被休谟惊醒"这个故事，可以当作一条线索：它告诉我们，休谟是他真正在乎的对手之一。但不能把它当作全部：他顶撞的不只休谟，还有他自己多年讲授的那一整套理性主义；而他真正的转折，是一段很长、很费力的发生，不是一声闹钟。

大白话说，一个人说"那年体检报告一出来，我就下决心改掉了熬夜的毛病"，体检报告是真的，下决心也是真的；可他真正改掉，往往花了好几年，中间还反复了好几次。只听那个干脆的故事，会把一段长长的路，看成一步。

◆ 一次翻转：让对象围着我们转

康德最后拿出的办法，他自己比作哥白尼的翻转。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里，他说，以往人们总是假定，我们的认识必须依照对象；可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先于经验地确定关于对象的任何东西，都失败了。那么，不妨试一试反过来：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认识。就像哥白尼，在假定天体围着观察者转、怎么也解释不通的时候，试着让观察者转、让星星不动。

这就是蓝眼镜的道理。我们之所以能先于一切具体经验，就知道"凡是能被我们经验到的东西，都在空间和时间之中""凡是发生的事，都有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提前看透了世界，而是因为空间、时间和原因，本来就是我们这副"眼镜"的结构。凡是能进入我们经验的东西，都得先穿过这副眼镜；它们穿过以后，必然带着眼镜的形状。

康德把这副眼镜分成两层。一层是感性的形式：空间和时间。我们看到的任何东西，必定在某处、在某时；这不是从经验里学来的，而是经验能够发生的前提。另一层是知性的概念，他称为"范畴"，比如因果、实体、统一、多数等等，一共十二个。我们之所以能把一堆零散的感觉整理成"一个东西""一件事引起了另一件事"，靠的就是这些范畴。

"范畴"这个名字，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来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著作里，也列过一张范畴表。康德借了名字，却批评亚里士多德的那张表是东拼西凑地搜集起来的，没有一个原理把它们推导出来；他要的是一张从知性本身的结构里系统地推出来的表。这正是第11章说的"顶撞的人站在被顶撞者的地上"：他用

亚里士多德的词，去反对亚里士多德把范畴当作"存在者本身的分类"——在康德这里，范畴不再是事物的结构，而是认识的结构。

回到"七加五等于十二"。为什么这个判断既是新的、又是必然的？按康德的说法，因为它扎根在时间这个感性形式之中：数数，就是在时间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个结构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一样。于是，数学的必然性不是来自上帝心中的理念，也不是来自习惯，而是来自我们感性的形式。

◆ 答案住进认识的条件

现在可以说清楚，这一次答案搬到了哪里。在柏拉图那里，"X 是什么"的答案住在彼岸；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住在事物之中；在奥古斯丁那里，住在上帝心中；在笛卡尔那里，以"我思"为地基，住在一颗确定自己存在的心灵里（第16章已谈）。到了康德这里，答案住进了"认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之中：我们能够确定地知道的那些普遍必然的东西，说到底是我们认识的形式；世界之所以向我们显得有秩序、有因果、可以用数学去算，是因为它必须穿过我们的感性和知性，才能成为我们的对象。

这里有一个细微而关键的区别，要和笛卡尔分开。康德并不是说，答案住在某一个具体的人的心里，因人而异。那是心理学，是休谟的习惯说。康德说的"条件"，是任何一个能够认识的主体都必须具备的结构，它不属于张三、也不属于李四，而是一切经验能够成为经验的形式条件。他有一句话常被引用，大意是："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笛卡尔的"我思"是一个找到的实体，一块地基；康德的"我思"是一个形式，一个让一切表象能被统一起来的条件。第16章末尾说，康德会保留"我思"，却把它从一个思考着的实体，改造成一切认识都离不开的条件，指的就是这一点。

大白话说，笛卡尔像是在一片废墟里找到了一块绝对结实的石头，在它上面重建房子。康德则像是发现，人能看见的每一座房子，都是透过同一扇窗户看到

的；他不再去找哪一块石头最结实，而是去研究那扇窗户的形状：窗框是方的，所以你看到的每一片风景都被切成方的。

用全书的话说，这是一次新的显露：答案从一个对象（彼岸的理念、上帝心中的设计、一颗确定的心灵），变成了一组条件。它很好地满足了"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这组条件可以被一项项列出来，可以被一代代学者讨论，可以写成一本又一本厚书。它付出的代价，后面会看到。

这里也要给本书的那根轴加一条限定。严格说，康德问的已经不是"X 是什么"，而是"关于 X 的必然知识怎样可能"；说"答案住进了认识的条件"，是我们把他的问题折回这根轴上来看，折得过去，因为他确实接过了"真正可靠的答案落在哪里"这一层，但折不尽，他的伦理学、美学另有自己的问法，不能硬塞进这根轴。就像用一把卷尺量一张圆桌，量得出直径，量不出桌面的弧度，量完要记得说明自己用的是哪把尺。第21章会碰到完全不在这根轴上的人。

◆ 最强的反对：世界成了我想出来的吗

这套说法一出版，就迎头撞上了最直接的反对。1782年初，哥廷根的一份学术评论刊物登出一篇匿名书评，原稿出自通俗哲学家加尔韦之手，又经编辑费德大幅删改。书评把《纯粹理性批判》归为贝克莱一类的唯心论：既然空间、时间都只是我们感性的形式，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岂不全是心里的表象？照这样说，桌子、房子、星星，和一场做得很逼真的梦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反对之所以最强，是因为它看上去正是从蓝眼镜推出来的：既然一切蓝色都来自眼镜，眼镜外面究竟还有没有苹果？康德被这篇书评激怒了。1783年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里，他专门回应，说自己的观念论和贝克莱的不是一回事；1787年第二版，他又加写了一段"驳斥唯心论"，大意是：我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在时间中前后相续，这本身就要求知觉里有某种持久的东西，而它不能只是我心里的又一个表象。有意思的是，这段论证点名针对的，主要是笛卡尔那

种"只有我思确定、外物尚可怀疑"的立场（第16章）。康德在这里转过身，去修补上一位房客留下的漏洞。

他的立场可以压成两句话。从先验的层面说，空间、时间和范畴是认识的形式，这是"观念论"；从经验的层面说，桌子、房子、星星都是真实的对象，不是幻觉，这是"实在论"。大白话说，收音机决定了你能收到哪几个频段、声音从喇叭里出来是什么音色，可电台播的节目不是收音机编出来的；你不会因为拆开看过喇叭的构造，就怀疑新闻里报的事没有发生。苹果掉下来砸到头，照样疼，蓝眼镜改不了这一点。

这个回答是否完全成立，研究者至今有争论；后面要谈的雅可比那句"进不去、待不住"，对准的正是同一个地方。但有一点是史实：这篇书评改动了康德的书，第二版的修订有一部分就是冲着这类误读去的。显露不只回写土壤，土壤也在回过头来改写显露。

◆ 半个彼岸：物自体

如果世界的秩序是我们这副眼镜给的，那么摘下眼镜以后，世界本身是什么样子？康德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能认识的，只是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样子，他称为"现象"；事物在它自身是什么样子，他称为"物自体"，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认识的。我们知道它在那里——总得有个东西刺激我们的感官，我们才会有感觉——可它本身是什么，永远隔着这副眼镜。

这一步，在本书的那根轴上，意味深长。答案从柏拉图的彼岸出发，经过亚里士多德搬回物中，经过奥古斯丁收进上帝心中，经过笛卡尔落在"我思"之上；到了康德这里，它住进了我们自己的认识条件，可在这个住处的背后，又留下了一个我们永远够不着的"物自体"。一个够不着、却又必须承认它在那里的领域——这多么像柏拉图的彼岸！只不过，柏拉图的彼岸是哲学家可以爬上去、看见

的；康德的物自体，是谁也爬不上去的。它是半个彼岸：一个只能被想到、不能被认识的彼岸。

康德还发现，当理性不甘心停在现象之内，硬要去回答"世界有没有开端""灵魂是不是不朽""上帝是否存在"这类超出一切经验的问题时，它会陷入自相矛盾：正反两个论证，各自都推得似乎无懈可击。他称之为"二律背反"。这说明，理性一旦越过它的界限，就会自己和自己打架。所以，他在第二版序言里说，他必须扬弃知识，为信仰留出地盘。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不能被理论理性证明，却可以在道德实践中被要求、被相信。

这里正好可以看见本书一路碰到的那种亏缺：显露总有代价，答案落在某处，别处就空了出来。康德把答案收进了认识的条件，换来了确定性；却在条件背后，留下了一个永远空着的位置。他的同时代人雅可比有一句尖刻而有名的评论，大意是：没有物自体这个假定，我进不了康德的体系；有了这个假定，我又没法待在里面。上一轮的亏缺，就是下一轮的矛盾。这个空位，很快就成了后来者撞上去的地方。

大白话说，就像一位厨师终于搞清楚了：我尝到的咸淡、我闻到的香气，都受我自己的舌头和鼻子的结构决定；同一盘菜，换一种生物来尝，味道可能完全不同。这个发现很了不起，它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类厨师对"咸"的判断大致一致。可是，它也留下了一个让人睡不着的问题："这盘菜本身"到底是什么味道？他知道这个问题有答案，却永远尝不到。

◆ 回写：一整代人在他的地上盖房子

再追回写。康德的显露重置了什么？最直接的回写，是他之后德国哲学的整整一代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是在康德铺下的地基上起步的，而且几乎人人都从那个"物自体"的空位下手：既然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凭什么说它存

在？能不能把它取消，让一切都从主体自身的活动里生出来？这一条线一路推下去，就到了下一章的黑格尔。康德留下的空位，成了一整个时代的发动机。

更大范围的回写，是"批判"这件事本身。康德之后，"先检查认识的工具，再谈认识的对象"成了现代哲学的一种基本姿态。许多后来的哲学流派，即便和康德意见相反，也很难绕开"我们凭什么能知道"这个问题。他把哲学的重心，从"世界是什么"挪到了"我们怎样能知道世界"。

回写也有板结的一面。康德把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十二个范畴，当作一切可能经验的固定结构，而且认为他已经把它们完整列出了。在他看来，欧几里得几何描述的空间，就是我们感性形式所决定的那个空间，具有必然性。可到了十九世纪，数学家们发展出了不同于欧几里得的几何；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又在描述宇宙时用上了这样的几何。这些后来常被拿来质疑康德：那副"眼镜"的结构，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一成不变？康德的拥护者对此有种种辩护，这里不细说；可它至少提醒我们，一个人把自己找到的结构当作"一切可能的结构"，正是回写变成硬壳的开始。

大白话说，一位老裁缝总结出一套量体裁衣的标准尺寸，几十年里帮整条街的人做出了合身的衣服，大家都说他找到了"人体的规律"。可后来来了一批身材和本地人差别很大的新居民，他的尺寸表就开始不合身了。尺寸表本身没有错，错在他以为那张表就是所有人的身体。

◆ 三层咬合：一本书为什么出了两版

到这里，可以把康德这一轮放进三层里走一遍（第9章讲过分工：三大方程管"同时"，123原理管"回合"，六路径管"入口"）。先看123原理，它最好认：牛顿物理学的成功是一股活的推进，它和沃尔夫体系、休谟怀疑缠成的土壤顶上了，成功明摆着，两套旧回答都接不住；这个矛盾逼出了哥白尼式的翻转；翻转

再回写，重置了后人的问法，也重置了德国大学的格局。可这一回合并不是一步走完的，因为它的显露本身一直在动。

这正是三大方程要提醒的。康德的显露不是某天找到、从此不变的东西。1770年的就职论文里，空间和时间已经成了感性的形式，范畴凭什么能合法地用于经验，却还没有着落；十一年后第一版出来，被书评读成了贝克莱；六年后第二版，关键的"范畴的先验演绎"几乎整段重写，又加上了驳斥唯心论。显露由差异序列在纠缠网络中生成，S=F(D,E)，F 只是"由……生成"的占位记号，不是能算的公式；他自己十多年的修正、书评、读者的误解，都在生成它。反过来，翻转一显露，他的推进也换了方向：1785年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追问"定言命令怎样可能"，提问的格式和"先天综合判断怎样可能"如出一辙，这是 D=G(S,E)。土壤也被它改写：1786到1787年，莱因霍尔德在刊物上连载《关于康德哲学的书信》，把这部出了名难读的书讲给了更广的读者，耶拿很快成了康德哲学的重镇，这是 E=H(S,D)。三者是同时在互相生成，不是排好队一个接一个。

再看六路径。《纯粹理性批判》自己的章法，是先摆出条件（空间、时间、范畴），再推演它们怎样起作用，最后拿它们去清算旧形而上学，近于先显露、再差异、后土壤，很适合教人掌握一个成型的体系。可照这个次序读，那些条件就像一开始就躺在那里、等着被发现的东西。换成本书的入口，先跟他十多年的推进，再看翻转怎样显露，最后追土壤与回写，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条件是被逼出来、又改过一遍的。这是本书的解读。照书的次序读，最容易得出的，正是上一节说的那个板结的判断：这组条件完整无缺、一成不变。

大白话说，新手机的说明书先写"本机功能"，再写"操作步骤"，最后写"注意事项"，读起来功能像是生来如此；可研发工程师知道，每一条注意事项背后都是一次返修，有些功能干脆是被用户投诉逼出来的。还要防一个误读：不能说"休谟是矛盾、康德是显露、费希特们是回写"。同一个康德，在这一轮是被逼

出的新显露，到了下一轮，已经是费希特、黑格尔脚下的土壤，位置在轮转（第9章）。

◆ 被讲出来的康德

再查反向师承。后世的康德，是被谁讲出来的？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在黑格尔之后一度陷入混乱。1865 年，一位年轻的学者奥托·李普曼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康德及其模仿者》，书里讨论了康德之后的几派哲学，每一章都以同一句话结束，大意是：所以，必须回到康德。这句口号后来成了一场运动的旗帜，史称"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的几个学派，讲出了好几个不同的康德。以马堡为中心的一派，把康德主要讲成一位为自然科学奠基的认识论家：《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是说明数学和物理学的知识怎样成立。以德国西南部为中心的另一派，更关心价值和历史、文化科学，把康德讲成一位关于价值与判断的思想家。今天许多人心目中那个"认识论的康德"，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康德主义讲出来的。

二十世纪又有了新的讲法。1929 年，在瑞士的达沃斯，新康德主义传统出身的卡西尔，和刚出版了《存在与时间》不久的海德格尔，就怎样理解康德展开了一场后来很有名的辩论。卡西尔看重康德对人类知识与文化形式的说明；海德格尔则要把《纯粹理性批判》读成一部关于人的有限性、关于"存在"问题的书，而不是一部认识论。同一本书，两种读法，背后是两种哲学的走向。

按第12章的工序，查到这里，就要分开记账。康德本人确实花了大量篇幅讨论数学与物理学知识的条件，新康德主义的马堡派抓住的不是无中生有的东西；但他同样写了关于道德、关于审美判断、关于宗教和历史的三大批判与许多著作，"认识论的康德"只是他的一个侧面。至于海德格尔笔下的康德，他本人也承认是一种有意的、带着暴力的解读。两本账都要记：一本是康德写了什么，一本是后人把他讲成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讲。

大白话说，一位老先生同时是好医生、好父亲、好棋手。他的病人记得他是医生，他的孩子记得他是父亲，他的棋友记得他是棋手。三拨人各自写回忆文章，三篇文章都是真的，可是只读其中一篇，就会以为他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 回绕：两个方向

最后看回绕。康德身上有两个方向的回绕，正好一前一后。往前看，是物自体绕回柏拉图。前面说过，一个只能被想到、不能被认识的领域，带着柏拉图彼岸的影子。用第14章的三个问题来问：回到的旧位置，是"真正的那个东西在我们够不着的地方"；逼它回来的矛盾，是康德一方面要给科学的确定性找地基，另一方面又必须解释我们的感觉从哪里来、又要为道德和信仰留出地盘；回来以后，它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问法，让"能否取消这个够不着的领域"成为德国观念论的核心问题。形状像彼岸，土壤是批判哲学，这是一次回绕，而且是一次被逼出来的、有代价的回绕。

往后看，是"回到康德"。1865 年那句口号，本身就是一次打着旗号的回绕。回到的旧位置，是康德"先检查认识条件"的姿态；逼它回来的矛盾，是黑格尔之后思辨哲学的衰落，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之间的张力：哲学看上去越来越像空谈，科学却在一步步地成功，哲学必须重新找到自己说话的资格；回来以后，它改写了德国大学几十年的哲学格局，也塑造了二十世纪初许多重要哲学家的出发点。而且，就像喇叭裤回来时面料已经不同，新康德主义者回到的那个康德，已经是一个经过十九世纪科学和历史学洗礼的康德。

◆ 留给下一位的缺口

把这一章收拢一下。康德接过的问法，是"理性究竟能知道什么"；他顶撞的，是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和休谟的怀疑，而牛顿物理学的成功是逼他非回答不可的活推进；他用一次"哥白尼式的翻转"，把答案搬进了认识得以可能

的条件：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十二个范畴，以及一个让一切表象能被统一起来的"我思"；他在这个住处背后，留下了一个够不着的物自体，像半个彼岸；他的回写开动了一整个时代，也在他把结构当成一成不变时埋下了板结的种子；后世的他，被新康德主义和二十世纪的辩论讲成了好几个样子；而他身前身后，各有一次回绕。

还有一个缺口，留给了下一位。康德找到的认识条件，是固定的、没有历史的：空间和时间、十二个范畴，对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人都一样，它们不生长，也不变化。可是，人怎样看世界、用什么概念去整理经验，难道真的从古至今都一模一样吗？古希腊人、中世纪的修士、康德同时代的柯尼斯堡市民，戴的真的是同一副眼镜吗？如果眼镜本身也有它的来历，也在一代代地被磨出来、被改造，那么答案就不能停在一组固定的条件里，它得被放进一个更大的东西里：历史。

一位比康德年轻四十多岁的德国人，正要这样做。他认为，真理不是一块立在那里的石碑，也不是一副固定的眼镜，而是在时间里一步步走出来的一整条路。下一章，答案搬进历史。

带走的话

先检查卷尺，再量房子；可卷尺背后，留着一个永远量不到的地方。

本章判错句

如果物自体与柏拉图的彼岸在形状和逼出它的矛盾上都毫无可比之处，本章说的"半个彼岸"就只是比喻。

想一想

你看世界时戴着哪副"眼镜"，是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一件事，你明知道它在那里，却永远够不着？

◆

18

第 18 章

黑格尔：答案住进历史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人是什么样，真的要等他一辈子活完才知道吗？

◆ 盖棺才能论定吗

街坊里有位老张师傅去世了。追悼会上，大家轮流说起他：二十岁在厂里跟人打过架，三十多岁开小饭馆，两次赔得精光，五十岁以后把孙子一手带大，顺带在巷口修了三十年自行车，从不收邻居的钱。致悼词的人最后说："老张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热心肠。"

这话说得大家点头。可细想有点奇怪：老张二十岁打架那天，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热心肠；饭馆赔钱那几年，亲戚说的是"这人不会算账"。悼词一出，前面那些零散的日子忽然被排进了同一条线：打架成了"讲义气"，赔钱成了"太实诚"，连当年的倔脾气都成了"有原则"。中国人管这叫"盖棺论定"。一个人是什么样，要看他一辈子最后活成什么。

这句大白话，正好是黑格尔哲学的骨架。他把"X 是什么"的答案搬进了历史：真理不是一块立在彼岸的石碑，也不是我们每个人脑子里一副固定的眼镜，而是在时间里一步步走出来的一整条路；要知道它是什么，得看它最后走成了什么。

黑格尔（1770—1831）是本书最难对付的一位。第3章批评"正—反—合"的上升叙事时，那套叙事名义上的祖师就是他。可我们不能拿第3章的结论来代替

这一章的功课。这一章要做的，是用解剖三哲时的五个动作，把他本人完整解一遍：他接过的是什么问题，他在顶撞谁，答案被他搬到了哪里，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后世的"黑格尔"是谁讲出来的，循环在他身上有没有绕回去。

先把结论摆在前面，免得读者一路悬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生成"重新抬成哲学主角的人，这一点他比谁都更接近发生学；可也正是他，让亚里士多德的那条目的论尾巴长成了整个世界的尾巴。老张的悼词好听，但悼词有一个前提——棺材已经盖上了。历史有没有那口棺材，是这一章要追问到底的事。

◆ 他问的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真理怎样成为真的"

五个动作的第一个是跟问法，不跟人。黑格尔接过来的问题，表面上还是"真理是什么、答案住在哪里"，但他把问题的词性改了：从名词改成了动词。

第17章讲过，康德把答案搬进了"认识的条件"——我们看世界，戴着一副先天的眼镜，时间、空间和那几条范畴是镜片；镜片之外的物自体，我们永远看不到。黑格尔接过这副眼镜，追问了一句康德没有追问的话：镜片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出生就长这样，还是被磨出来的？如果是被磨出来的，那磨的过程本身，难道不也是"认识"的一部分？

这一问把整个问题翻了个身。《精神现象学》（1807）的序言里，他有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真的东西是整体。紧接着他用了一个植物的比喻，大意是：花开的时候，花蕾就消失了，可以说花蕾被花否定了；结果的时候，果实又宣告花只是植物的一种暂时的样子；但三者并不互相取消，它们都是这株植物生命里必要的一段。在同一篇序言里，他还说要把真的东西不仅理解为"实体"，同样理解为"主体"——意思是：真理不是一块放在那里等你去看的石头，而是一个自己展开、自己走出来的过程。

拿厨房说。一个学徒第一年只会切墩，第三年能掌勺，第八年开始改师傅的菜谱。你问"他会不会做菜"，在哪一年回答都只对了一半。说"他只会切墩"是对的，可那是第一年的他；说"他会改菜谱"也是对的，可那个本事是前七年一刀一刀磨出来的。黑格尔的意思是：你要真想知道他会不会做菜，就得把这八年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路线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

再拿手机导航说。只看终点坐标的人，觉得"到了就行"；可同一个终点，走高速和走乡道，你路上见到的、错过的、绕回去的都不一样。黑格尔坚持的是：过程不是通往答案的梯子，用完就可以踢掉；过程就长在答案里面。

我们要清楚地承认这一步的分量。自柏拉图把答案抬到彼岸以后，"变化"在西方哲学里长期是二等公民——流变的东西被看作影子，不变的才配叫知识。亚里士多德把形式拉回物中，给了"生成"一个位置，可他的潜能—实现仍然把终点预先放进了起点。黑格尔做的，是让"生成"不再只是一类对象，而成了真理本身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讲的"发生"，确实欠了他一份情。

可同一句话里也埋着后来的麻烦。"真的东西是整体"——整体要算整体，路就得走完。一条还在走的路，你说它的"整体"是什么？老张活着的时候，谁也写不出那篇悼词。这个缝，后面要专门拆开。

◆ 前置矛盾：他在顶撞谁

第二个动作是找前置矛盾：他在顶撞谁，谁的答案成了他的土壤。黑格尔顶撞的对象至少有三层，一层比一层贴身。

第一层是康德。康德先审查认识能力，再决定能认识什么，这在黑格尔看来像是一个人决心先学会游泳、再下水。他在《哲学全书》里正是用这个笑话挖苦"先检验认识工具"的做法：认识能力只有在认识的活动里才能被检验，你站在岸上永远学不会游泳。这好比驾校只教理论不让上车，教练讲得再透，你一上路

还是手忙脚乱——会不会开车，本来就只能在开车里见分晓。康德留下的物自体，在黑格尔眼里是一个空空的"彼岸"：既然什么都不能说，凭什么还说它在那里？于是康德的答案成了黑格尔的土壤，也成了他的靶子。

第二层是他的老同学谢林。他们年轻时在图宾根神学院同住一间宿舍，同屋的还有诗人荷尔德林。谢林后来讲一种"绝对"，在那里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差别统统归于无差别。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有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嘲讽这种绝对就像黑夜，在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的。公司年会上领导举杯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听着温暖，可一旦人人都是一家人，谁在加班、谁在摸鱼、谁替谁背了锅，就再也分辨不出来了。把一切差异抹平的统一，什么也说明不了。这句话之后，两位老友的交情明显冷了下来。

第三层不是哪个人，而是一个时代。黑格尔十九岁那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和同学们对革命抱着很大热情；至于他们在图宾根种过"自由树"的故事，属于流传甚广的传述，细节难以坐实，只能当作气氛来听。1806 年 10 月，拿破仑的军队打到耶拿，黑格尔在给朋友尼特哈默尔的信里写道，他看见皇帝骑马出城巡视，称之为"世界灵魂"。《精神现象学》大约也在这前后完成；"他在炮声中赶完最后几页"是常见说法，同样只宜当作传述。可以确认的是：在他的一生里，欧洲的旧秩序被翻了个底朝天，革命、恐怖、帝国、复辟接踵而来。历史不再是书本里的旧事，而是一股看得见的力量，推着每个人的日子改道。经历过拆迁的人，很难再相信"家"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地方；亲眼看过帝国更替的人，也很难再相信真理只住在永恒不动的彼岸。

把这三层合起来，用本书的眼光读一遍（这是阐释，不是史料本身）：他手上的差异序列，是《精神现象学》里那种一步一步的试探——拿意识的一种样子去对照它自己的标准，发现对不上，于是被逼到下一种样子。书一开头的"感性确定性"就是例子：意识以为最确定的知识是"这里、现在"，可你把"现在是夜晚"写在纸上，到中午再拿出来看，这句话就不真了。最朴素的确定性，经不起

时间翻一页。这种层层推进的试探，撞上了一片由康德的两个世界、谢林的无差别绝对、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缠出来的土壤：康德的框架装不下一个会自己运动的思维，谢林的黑夜又吞掉了一切差别。矛盾逼出了一个新的显露——真理就是这个运动本身，答案住进历史。

还要提醒一句：不要把这套读法做成静态对应。康德在第17章是被逼出来的新答案，到了这里已经是黑格尔的土壤；谢林当年是黑格尔的同路人，转眼成了被他顶撞的前人。位置一直在轮转，就像一家店里的老规矩：老店主定下它时，它是一招破旧立新的妙棋；新店主接手时，它已经成了店里的家底，也成了他要动的第一块砖。

◆ 新的落脚点：答案住进历史

"答案住进历史"，听上去像一句口号。落到黑格尔的著作里，它至少有三层意思，一层套一层。第一层是意识的历史。《精神现象学》讲的是意识怎样从最朴素的"这里、现在"，经过感知、知性、自我意识、理性、精神，一路走到他所说的"绝对知识"。每一站都不是错误，而是必经的一段：前一站的失败，恰恰是后一站的起点。这有点像一个人对父亲的认识：小时候觉得"我爸什么都懂"，青春期觉得"我爸什么都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才明白"我爸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第三种理解不是把前两种扔掉，而是把它们收在里面；没有那两段，也就没有这一段。

第二层是哲学的历史。黑格尔在柏林反复开讲哲学史。在他的讲法里，哲学史不是一串互相推翻的意见，而是同一个精神在不同阶段认识自己：没有一种哲学被简单驳倒，被推翻的只是"它自命为最终答案"这一点，它的原则则被收进后来的哲学里。他讲苏格拉底，看重的是苏格拉底把"内心的判断"立了起来——人不再只是照着城邦的习俗过日子，而要追问这些习俗凭什么成立；他把苏格拉底之死讲成一场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城邦的伦理和个人的良知，双方各有其理，撞

在了一起。比较一下第5章：我们把那场死刑读作城邦的负向回写；黑格尔则把它读作精神必须付出的一段代价。同一件事，放在不同的轴上，意义完全不同。他讲柏拉图，看重"理念"；讲亚里士多德，则毫不吝惜地称其为最丰富、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在他的哲学史里，三哲不再是三尊排成一排的雕像，而是同一个精神长大成人的三个年纪。

第三层是世界的历史。在《历史哲学讲演录》里，他把世界历史讲成自由意识的进展：在古代东方，人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在希腊和罗马，人们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到了日耳曼—基督教世界，人们才知道人人生而自由。这个三段排列带着明显的欧洲中心偏见，今天已受到广泛批评，我们不替它辩护。但它的骨架值得看清：自由不是一句写在纸上的宣言，而要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些制度里一点一点落实。家里的规矩从"爸说了算"走到"全家开会商量"，靠的不是哪天有人背熟了"民主"的定义，而是一次次吵架、让步、再立规矩。在黑格尔看来，概念就是这样在历史里实现自己的。

讲到这里，还得补上黑格尔自己留下的一道限定。他在《法哲学原理》序言里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起飞。意思是：哲学总是来得太晚，要等一个时代的样子已经成形，它才能把它想明白；哲学不能教世界"应该"怎样，它只能在事后把已经发生的东西理解清楚。这像球赛的解说员——比赛踢完了，他能把每一次传球讲成精心布局；可在开场哨响的时候，他和观众一样不知道结果。

用"三个可"来量一量，黑格尔的落脚点走到了三哲谁都没有走到的一端。苏格拉底的答案只到"可识别"，他拒绝把它写下来；黑格尔的答案则不但可识别、可维持，而且被表达到了极致——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一部《哲学全书》把从存在到精神的每一步都排进了体系。一个说得最少，一个说得最尽。说得最尽，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负担。

◆ 一个回合，三种尺度

五个动作到这里做了两个。往下拆之前，先把黑格尔这一轮放到全书的三层尺度上走一遍（三层怎样咬合，第9章已讲），因为他最要紧的特点，恰恰要在三层的咬合里才看得清。

先看回合，也就是123原理。意识一站一站的试探，撞上康德的两个世界和谢林的黑夜，二者都接不住一个会自己运动的思维——这是矛盾；矛盾逼出新的显露：真理就是这个运动本身；新显露回写，改了柏林的讲席、改了哲学史在哲学里的位置、改了十九世纪各门学问的问法——这些留到后面追回写时拿史料去看。这三拍不能分给三个人。说"康德负责矛盾、黑格尔负责显露、马克思负责回写"，就又做回了静态对应：每一拍里，三样东西都在场。

再看同一时刻的互生，也就是三大方程。"真理是过程"这个显露，是在《精神现象学》那条试探之路上、在耶拿那片土壤里生成的。可反过来，这个显露一站住，也改了他推进的方式。《精神现象学》的导论把意识走的路称作"怀疑之路"，更确切地说是"绝望之路"，每一站都可能栽跟头；到了《哲学全书》，同样的推进被排成一节节编了号、明言供他课堂讲授之用的段落，试探变成了展开。土壤也被这两样改写：一套能逐节讲授的体系，配上柏林的讲席，造出了一批说同一种话的学生，这批学生又成了后人读黑格尔时脚下的土壤。三条同时成立，拆不出谁最先。

再看入口，也就是六路径。黑格尔本人就用过两种起手。《精神现象学》从最朴素的"这里、现在"起手，跟着意识一步步碰壁往上走，是先跟推进；他在序言里说，个人有权要求科学至少给他一架通往这个立场的梯子，这本书就是梯子。《逻辑学》和《哲学全书》则从"纯存在"这个最空的概念起手，先立一个最单薄的显露，再看它怎样展开、怎样落进自然与精神；《逻辑学》里还专门讨论过"科学必须以什么为开端"。同一个人，任务不同，入口就不同：给初来者搭梯

子，先跟推进；给已经登堂的人讲全貌，先立概念。带一个新人进后厨也是这样：可以让他从洗菜切墩一样样做上来，也可以先请他尝一桌做好的菜，再告诉他每道菜怎么来的。

三层合起来看，黑格尔的毛病就露了出来：在他的体系里，三层最后被收成了一层。土壤里的偶然，要么被讲成概念展开的一个环节，要么被打发成不值得哲学操心的零碎。同时代的哲学家克鲁格曾挑衅观念论：你们既然什么都推得出来，就推一推我手里这支笔。黑格尔撰文讥讽过这个要求，后来讲自然哲学时还拿它当笑话提起，意思是哲学没有义务去推演这类偶然之物。单论这支笔，他说得不错；可这个回答透出一种分工：能被概念收编的，算历史；收编不了的，算偶然，不入账。三大方程里，土壤与显露、推进平起平坐、互相生成；到了黑格尔这里，土壤成了舞台，戏由概念自己演。连锁店的年度总结常是这个样子：哪家分店赶上门口修地铁、遇上房东涨租，总结里要么写成"印证了总部战略"，要么一句"个别门店受偶发因素影响"带过。河道被岩石逼着拐的那个弯，在这份总结里永远不会出现。

这是本书对黑格尔最要紧的一处判断，属于阐释，不是史料本身：他让"生成"当了主角，却没有让土壤当真正的合伙人。下面那条目的论的尾巴，就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 橡子长成了整个世界

现在可以拆那道缝了。第7章讲过，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实现是目的论的：橡子里早已有橡树作为它的目的，生长不过是把这个目的实现出来。黑格尔把这颗橡子放大到了整个世界。精神就是那颗橡子，世界历史就是它长成橡树的过程。连他自己挑的比喻都露了底：花蕾、花、果实——那是一株植物按既定方向的生长，不是一条可能拐弯、可能断流、可能改道的河。

这条尾巴一长，后果就来了。在《法哲学原理》序言里，还有一句比猫头鹰更出名的话，大意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善意地读，它说的是理性不是空想，它要在现实中实现，而真正称得上"现实"的东西都有其道理。可这句话一旦放进"答案住在历史尽头"的框架里，就有了另一层分量：既然一切阶段的意义都要从终点倒推回来，那么每一个已经发生的东西，似乎都可以被说成"终点所必需的一环"。

回到老张的悼词。悼词之所以能把打架说成讲义气，是因为写悼词的人站在终点往回看，挑那些能连成一条线的事来讲。可假如老张三十岁那年就出了意外，那篇悼词会怎么写？也许是"一个没算明白账的年轻人"。同一段日子，意义取决于终点落在哪里，更取决于谁站在终点执笔。高考状元写经验谈，每一个习惯都被讲成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那些和他用一样方法、却落了榜的人，不会出现在这份报告里。历史若由终点来认领，被认领的永远是走到终点的那一支，那些断掉的、被压下去的、绕了远路的，只能当作"环节"，甚至连环节都算不上。

更深的一层麻烦在这里：盖棺论定需要棺材，可历史没有棺材。黑格尔一面说哲学只能理解自己的时代、不能跳出时代，一面又在讲演里把此前全部的哲学史安排成一条通往他自己立场的路。站在路的中间，却按路的尽头来排座次——这等于把自己的时代当成了一口临时的棺材盖。

为了公正，我们也要把替他辩护的声音摆出来。不少研究者主张，黑格尔的"终点"并不是日历上的某一天，而是一种逻辑上的完成：概念认识了自己，并不意味着历史从此停止发生。按这种读法，他的体系比通常想象的要开放。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限定，但判断不变：哪怕终点被读得再开放，"后来者把前者收进来、因而更高"这条排序仍然在那里。它让每一次回头都只能被理解成倒退或者残余。而本书第3章、第14章与第22章要说明的恰恰是：回绕不是倒退，河流改道也不是河流升级。

所以我们和黑格尔的分野，可以压成一句话：本书接过他的动词——生成、运动、在过程中实现——卸掉他的排序与终点。第3章把这叫作目的论与非目的论之别，这里只补一个日常的画面：同一颗橡子，种在花盆里成了盆景，种在风口长成歪脖子树，你不能说盆景是"失败的橡树"，也不能说歪脖子树是橡树精神的"更高阶段"。它们各自是在不同土壤里发生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件常被忽略的事值得一提。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就讥讽过那种把"三分法"当成万能公式、往一切事物上机械套用的做法，说那只会造出毫无生气的图式。后来家喻户晓的"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恰恰是他未必认领的东西。这件事要放到"反向师承"里才看得清，下面再说。

◆ 回写：历史成了主语，也成了硬壳

第四个动作是追回写：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回写要拿史料去观察，不能凭一句"影响深远"宣布了事。先看重置。1818 年，黑格尔应聘到柏林大学，接的正是费希特去世后空出的哲学讲席。此后十余年间，他的学说在德国大学里蔚为显学，学生遍布各地。更深的重置不在人数，而在问法：在他之后，哲学史第一次成了哲学本身的一部分。此前的哲学史，多半是一份前人意见的汇编，像一本"谁说过什么"的语录集；在他之后，一个哲学家要立论，就很难不先回答"我站在历史的哪一段"。整个十九世纪，从宗教研究到法律、从经济到艺术，各门学问都开始追问"它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这股风气并非全出自黑格尔，有些学派恰恰是在反对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大家都在他重置过的土壤上说话。好比一家公司把"复盘"定成制度，此后不管谁上台、喜不喜欢前任，汇报都得先讲"历史沿革"——土壤一旦被改过，连反对者也只能在新的土壤里反对。

马克思的工作是这次回写最有分量的一支。他保留了黑格尔的历史运动，却把推动历史的主角从"精神"换成了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在《资本论》第二版的

跋（1873）里，他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一个被倒过来的东西，仍然是那个东西——这正是回写的证据：连最激烈的继承者，也是在黑格尔重置过的问法里改写答案。

回写也有负向的一面。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对着这座体系大声抗议：体系能安排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却安排不了一个此刻正在焦虑、正在抉择的具体的人。他问：在这座宏伟的宫殿里，思想者自己住在哪里？大概住在旁边的小棚子里。体系说得越尽，被它挤出去的东西就越显眼。这种抗议本身，就是黑格尔回写所激起的反弹。

再看板结。"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那句话，后来被一些批评者读成了为现存秩序背书，他的学说也被扣上了"普鲁士国家哲学"的帽子。黑格尔死后不久，他的学派就分裂了：一派强调"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倾向于为既有的宗教与国家辩护；另一派，即青年黑格尔派，抓住"合理的必将成为现实"，拿它当作批判与变革的武器，费尔巴哈和青年时代的马克思都与这一派有过渊源。同一句话，两种读法，读出了两条路。这很像家里那句老话"家和万事兴"：老人说它，是要年轻人忍着点；年轻人说它，是要老人也改一改。一句话一旦成为权威，就不再归说话的人所有。板结，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一种为了让思维流动起来的学说，被当成了可以引用、可以站队、可以拿来压人的定论。

◆ 被讲出来的黑格尔

第五个动作之前，先做第三个动作：查反向师承。后世的黑格尔是谁塑造的？头一个事实是：我们读到的大量"黑格尔"，并不是他本人写定的书。他在世时亲自出版的主要是《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而最常被大众引用的哲学史、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这几套讲演录，都是他 1831 年在柏林去世后，由学生们根据他的讲稿和多份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哲学史讲演录》的编者米希勒就是其中之一。笔记有详有略，各年讲法也

不尽相同，编者为了成书，难免剪裁拼接。我们熟悉的那个把三哲排成一条上升阶梯的黑格尔，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课堂笔记里被编出来的——这和第8章讲的"学生生成老师"，是同一种机制。

第二个事实是那套标签。"正题—反题—合题"这个三段式，黑格尔本人极少这样用；研究者多认为它更接近费希特的用语，到了十九世纪，又经一些通俗讲解推广，才牢牢贴到黑格尔身上。前面说过，他自己还讥讽过机械套用三分法的做法。教科书里那个手持"正反合"公式的黑格尔，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替他定型的。

第三个事实是二十世纪的几次重塑。1930 年代，科耶夫在巴黎开讲《精神现象学》，听众里有好几位后来成名的法国思想家；他把"主奴辩证法"和"历史的终结"讲成了黑格尔的核心，整整一代法国知识人是经由他认识黑格尔的。1945 年，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把黑格尔与柏拉图、马克思并列，当作极权主义的思想源头来批判。1989 年，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三年后扩成专书，把冷战结束读成自由民主作为历史终点的到来——这个"黑格尔"，又是经科耶夫转手的那一个。

于是我们手里至少有三张黑格尔的脸：正反合公式的黑格尔，历史终结的黑格尔，国家崇拜的黑格尔。每一张都有他本人文本里的根据，每一张又都被后来的讲述者放大、裁剪、着色过。这就像一道网红菜：你吃到的"正宗做法"，常常是模仿者们一轮轮定下来的，原创那位厨子未必认得。

这对本书自己也是一个提醒。第3章批评的上升叙事，打中的一部分是后人定型的那个黑格尔；但要说清楚，"后来者把前者收进来、因而更高"这根主心骨，确实写在他本人的哲学史讲演里，不能全推给后人。查反向师承的用处，不是替谁开脱，而是把"他本人"和"被讲出来的他"分开记账，账分清了，批评才打得准。

◆ 回绕：绕回亚里士多德，把问题交给下一个人

最后一个动作是看回绕：循环在他身上有没有绕回去？答案是绕了，而且绕得很明显。1830 年版的《哲学全书》，在整部体系的最后，没有用他自己的话收尾，而是抄录了一段希腊原文，出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七章，讲的是神的活动乃是思想对思想自身的思想。一个用三大部类、几百个小节搭起来的近代体系，最后一笔落在了两千多年前的吕克昂。这不是装饰，而是自我定位：黑格尔认为自己完成的，正是亚里士多德开了头的那件事。

细看下去，三哲在他身上同时回来了。苏格拉底的诘问，在他这里变成了意识对自己的诘问——意识的每一种样子都被追问到自相矛盾，然后被逼到下一站，只是这一次，诘问不再停在无解，而是一路推到体系的终点。柏拉图的"理念"，他照用了这个词，只是让它下到时间里来，在历史中一步步实现。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实现，则被他放大成整部世界历史的走法。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回绕：答案从奥古斯丁的上帝心中、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认识条件，一路搬到历史，最后又落回希腊的那一句话里。

可回绕从来不是原样复制。它把一样旧东西也带了回来——彼岸。柏拉图的彼岸在空间之外，抬头看不见；黑格尔的"历史尽头"，是一个搬到时间前方的彼岸，往前看也看不见。很多人对"理想的自己"都有这种体会：真正的自己总在"等我以后"——等我换了工作、等孩子上了大学、等我退休那天——今天的自己永远只是半成品。答案住进历史，听起来比住在天上更踏实；可如果它住在历史的尽头，今天的我们就依然够不着它。

于是新的问题露了出来。如果"公平""游戏""火候"这些词的真正意思，要等历史走完、等精神完全认识了自己才能定下来，那么今天说这些词的人，说的岂不都是半成品？可是一个小学生在操场上喊一声"我们玩个游戏吧"，别的孩子立刻就懂了，而且懂得没有半点含糊。这种懂，难道也要等世界历史盖棺？

二十世纪有一个奥地利人对这个问题很不耐烦。据他的学生德鲁里回忆，他说过：黑格尔似乎总想说明，看上去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同一个；而他自己感兴趣的，是指出看上去相同的东西其实各不相同。他还动过念头，要拿《李尔王》里那句"我要教你们看到差异"做自己书的题词。他没有把答案放在历史的尽头，而是把它放回了此刻、放回了人们说话做事的地方。他是维特根斯坦，第19章轮到他。

带走的话

把答案交给历史，是给变化正了名；把历史写成必然的终点，又把变化关进了笼子。

本章判错句

如果黑格尔本人的哲学史并没有把后来者讲成更高，只是后人如此讲他，本章对他的回写判断就要改记在讲述者账上。

想一想

你对一个人的判断，是不是常常等到"结局"才下？

你写过的哪一份总结，把一路的波折排成了一条直线？

◆

19

第 19 章

维特根斯坦：对苏格拉底的正面回答

> 这一章的问题
>
> 说不出一个定义，是不是就等于不知道？

◆ 操场上的"玩个游戏吧"

课间十分钟，一个孩子冲出教室，对着操场喊了一声："我们玩个游戏吧！"几个孩子立刻围过来。有人提议跳房子，有人说捉迷藏，有人掏出一副卡片，有人说比赛谁先跑到旗杆。没有一个孩子停下来问："你说的'游戏'是什么意思？请先给出一个定义。"

假如真有一个孩子这样问，会发生什么？其他孩子大概会白他一眼，接着玩。可是如果他坚持要一个答案，事情就难办了。游戏是什么？有输赢的活动？可一个人对着墙打球，没有输赢，也是游戏。有规则的活动？可小孩子在沙堆里随便堆堆挖挖，规则在哪里？好玩的活动？可下棋下到要输的时候，一点也不好玩，还是游戏。为了娱乐？可职业棋手下棋是工作。你会发现，越想给"游戏"找一个所有游戏都具备的共同点，越是找不到。可是，找不到共同点，并不妨碍孩子们在两秒钟之内就懂了"玩个游戏吧"的意思，而且懂得毫不含糊。

二十世纪有一位哲学家，把这个小小的场景，变成了对两千多年前雅典街头那场追问最直接的回答。苏格拉底要人说出"勇敢是什么"，说不出来，就证明你不知道。这位哲学家却说：说不出一个定义，不等于不知道；你会用这个词，能在无数场合正确地用它，能举出例子、能辨认新的例子，这本身就是一种知道。而且，对许多词来说，根本就没有那个"所有例子共有的东西"可找。

他叫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上一章末尾说，他对黑格尔那种把一切归于同一的做法很不耐烦。这一章看他怎样把"X 是什么"的答案，从历史的尽头，搬回此刻人们说话做事的地方：搬进用法里。

◆ 一个人，两本书

先看这个人。维特根斯坦生在维也纳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年轻时学的是工程，研究过飞机螺旋桨。他对数学的基础起了兴趣，于是去剑桥找罗素，很快从学生变成了让罗素又佩服又头疼的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奥地利军队里服役，上了前线，在战壕和战俘营里写完了一本薄薄的书，就是《逻辑哲学论》，1921 年出版。

这本书用一条条编了号的短句写成，最后一句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序言里，他相信自己已经在根本上解决了哲学的问题。既然问题解决了，他就离开了哲学，把继承来的巨额财产送给了兄弟姐妹，去奥地利乡下当小学教师，后来又当过园丁助手，还参与设计过一座房子。

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1929 年，他回到剑桥，重新开始做哲学。此后二十多年里，他留下了大量手稿和讲课记录，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研究》，在他去世后的 1953 年才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承认，自己不得不认识到，写在第一本书里的东西有严重的错误。一个人一生写了两本书，第二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和第一本书吵架。这是第11章说过的那种情况：前置矛盾不一定在别人身上，也可能在自己身上。

大白话说，一位老厨师年轻时写过一本菜谱，每道菜都精确到克、精确到秒，他坚信做菜的道理就在这本书里，写完就金盆洗手。十年后他回到厨房，发现照着那本书做出来的菜，总是差一口气；真正的火候，偏偏在书里写不下的地方。于是他开始写第二本书，不再写配方，而是写一个个厨房里的场景、一段段师徒的对话。第二本书的读者常常会问：这和第一本书是同一个人写的吗?

◆ 他接过的问题：词怎样有意义

先跟问法。维特根斯坦的问法也分两段。前期，他问的是：语言怎样能说出世界？一句话凭什么能是真的或假的？《逻辑哲学论》的回答，大致是说，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像一幅图画，它的结构和它所描述的事实的结构相对应；语言和世界共享一种逻辑的形式。凡是不能这样被描画的东西——伦理、审美、人生的意义——都属于"不可说"的领域，只能"显示"，不能被说出。后期，问法变了。他不再问语言和世界之间有什么固定的对应，而是问：一个词，究竟是怎样有意义的？我们是怎样学会、又是怎样使用这些词的？

注意这个问法和苏格拉底的关系。苏格拉底的问法是"X 是什么"，他认的回答，是一个能覆盖一切例子、不靠例子的定义。维特根斯坦后期问的是"X 这个词是怎样被使用的"，他认的回答，恰恰是一个个具体的用法、一个个例子，以及这些例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似。这是第10章说的第二问上的根本翻转：什么算回答，变了。

大白话说，苏格拉底问老师傅"火候是什么"，要的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维特根斯坦会去后厨站一个星期，看老师傅在什么时候说"火候到了"，看徒弟怎样一次次被纠正，看"火候"这个词在炒青菜、炖肉、蒸鱼时各自怎样被用。他要的回答，就在那一个星期的观察里。

◆ 他在顶撞谁

再找前置矛盾。维特根斯坦顶撞的，至少有三股。第一股，是他的老师们留下的那种语言观。弗雷格和罗素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建立了现代逻辑，他们怀着一个理想：日常语言含混、多歧，充满陷阱，应该用一种精确的逻辑语言去把握思想和世界的真正结构。《逻辑哲学论》本身就站在这片地上；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转过头来顶撞的，正是这片地。

第二股，是他自己的《逻辑哲学论》。前面说过，《哲学研究》的序言里，他公开承认第一本书有严重的错误。他后来的许多讨论，都是在拆自己早年搭的架子：语言并不只有一种描画事实的功能，一个词的意思也不必对应一个固定的对象。

关于这个转变，流传着一则轶事。据他的朋友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曾和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争论，他坚持一个命题必须和它所描述的东西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斯拉法做了一个那不勒斯人表示不屑的手势，用指尖从下巴往外一刷，问他：这个手势的逻辑形式是什么？据说这让维特根斯坦大受触动。这是一则轶事，细节未必可靠，但它很传神：一个活生生的、在生活中有意思的动作，根本不需要什么"逻辑形式"，它的意思就在人们怎样使用它里面。

第三股，是一种更古老、更深的东西，他称之为"对一般性的渴求"。在1933到1934年间口述给学生的讲稿，即后来所谓的《蓝皮书》里，他说，这种渴求让哲学家总想找到一切例子共有的东西，并对具体的个别情况抱着一种轻视的态度。他在那里还特意提到了苏格拉底：当苏格拉底问"知识是什么"时，他并不把列举各种知识当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正是哲学陷入困境的一个源头。这一股矛盾，直接对着两千多年前的雅典。

大白话说，一个家族里，祖上传下一条规矩：凡事要找到"根本原因"，找不到就不算懂。几代人都照这条规矩办事，看病要找根本病因，吵架要找根本症结，教孩子要找根本方法。到了某一代，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有些事，根本就没有一个"根本原因"，它是好几样东西缠在一起的；硬要找那一个根本，反而会让你看不见眼前的东西。他顶撞的，不是某一位长辈，而是这个家族几代人共同的一个习惯。

◆ 《哲学研究》第一节：从奥古斯丁开始

《哲学研究》的开头，有一个巧合，对本书来说再合适不过。这本书第一节，引的是奥古斯丁《忏悔录》里的一段话——就是第15章那位"答案住进上帝心中"的主教。奥古斯丁在那里回忆自己小时候怎样学说话：大人说出一个东西的名称，同时转向那个东西，他看在眼里，就明白了这个声音指的是那个东西；慢慢地，他学会了用这些词表达自己的愿望。

维特根斯坦说，这段话给了我们一幅关于语言本质的图画：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和词相关联，就是这个词所代表的对象。他接着说，这幅图画并非全错，但它只适用于语言中很窄的一部分；拿它当作整个语言的图画，就好比说"游戏就是在棋盘上按规则移动棋子"，对某些游戏是对的，对大多数游戏却不对。

他紧接着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建筑工人和他的助手，只用四个词，"方石""柱石""板石""长石"。工人喊出一个词，助手就把相应的石料递过去。在这个简单的语言里，喊出"板石"，不是在"给一个对象命名"，而是在下一道命令。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起点。在本书的轴上，奥古斯丁把答案收进了上帝心中，每个事物的"是什么"都是上帝心中的一个理念；他关于语言的那幅图画，和这个落脚点是一路的：一个词对应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对应一个确定的"是什么"。维特根斯坦从这幅图画开刀，是从根上松动了"每个词背后都有一个固定的本质"这个两千年的预设。

大白话说，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学中文，老师指着桌子说"桌子"，指着杯子说"杯子"，他以为学语言就是给东西贴标签。直到有一天，他在饭馆里听到邻桌的人对服务员说"来一下"，服务员立刻拿来了菜单；又听到有人喝了一口汤说"可以啊"，服务员笑着走开了。他才发现，很多话根本不是在给什么东西贴标签。

◆ 对苏格拉底的正面回答

现在到了这一章的中心。在《哲学研究》第六十六节左右，维特根斯坦请读者想一想各种各样的游戏：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竞技游戏。它们共同的东西是什么？他说，不要说"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否则就不会都叫游戏"，而要去看，看它们是否有共同之处。他有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别想，要看！

你去看，会发现：有些游戏有输赢，有些没有；有些靠运气，有些靠技巧；有些要很多人，有些一个人也能玩。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贯穿一切的共同点，而是一张错综复杂、相互交叉重叠的相似之网：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他说，他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说法来形容这种相似：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身材、面貌、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气，以各种方式交叉重叠地相似，却不必有一样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

这就是对苏格拉底的正面回答，可以分三层说。第一层：苏格拉底的追问预设了每一个"X"背后都有一个共同本质，说不出它，就是不知道 X。维特根斯坦说，对许多概念而言，这个预设本身就是错的。"游戏"没有那个共同本质，"勇敢""正义"很可能也没有。所以，拉凯斯说不出勇敢的定义，未必是因为他无知；可能只是因为，苏格拉底要他说出一样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第二层：苏格拉底不把列举例子当作回答。维特根斯坦说，对许多概念而言，例子恰恰就是回答。我们怎样向一个孩子解释什么是游戏？我们给他描述一些游戏，说"这些，以及类似的东西，就叫游戏"。这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好像我们其实知道一个更好的定义只是懒得说；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全部。

第三层：会用，本身就是一种知道。在《哲学研究》第四十三节，他说，在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词的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

一个能在无数新情况里正确使用"勇敢"这个词的人，能在战场上认出勇敢、在讲台上认出怯懦，他并非不知道勇敢是什么；他的知道，就住在他的使用里。

回到第5章那位被问倒的老师傅。他说不出"火候是什么"，却能在一千锅菜里准确地判断火候到了没有，能把一个笨手笨脚的徒弟教成好厨师。苏格拉底式的追问会说：你其实不知道火候是什么。维特根斯坦会说：不，他知道；他的知道不在一句定义里，在他的眼睛、手和那一千锅菜里；你要一个定义，是你的问法出了问题，不是他的知识出了问题。

这是本书那根轴上最有戏剧性的一次搬家：答案从苏格拉底身边被拿走，飞到了彼岸、上帝心中、我思、认识的条件、历史之中，飞了两千多年；到了维特根斯坦这里，它又回到了当初那个被问倒的人身上，回到了他每天的使用之中。

◆ 答案住在用法里

那么，这一次答案住在了哪里？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答案住在"语言游戏"里。维特根斯坦用这个词，指的是语言和与它交织在一起的活动所构成的整体：下命令、服从命令；描述一个东西的样子；报告一件事；编故事；开玩笑；问候；祈祷……语言不是一套贴在世界上的标签，而是人们做事的一部分。一个词的意义，要到它所在的那个游戏里去看。

语言游戏又扎根在他所说的"生活形式"里：一个共同体共享的做事方式、反应方式、判断方式。我们之所以能在"玩个游戏吧"这句话上毫无困难地彼此理解，不是因为我们心里都存着同一个定义，而是因为我们共享了一整套生活：都当过孩子，都在课间冲出过教室，都知道什么样的事叫"玩"。

这一步，用全书的话说，把答案从一个稳定显露出来的东西（一个理念、一个范畴、一个定义），搬进了正在进行的使用和它脚下厚厚的共同生活。这里只是解读，不是说维特根斯坦用了我们的语言。但不妨这样看：在前面几站，人们

总想给答案找一个"不动的住处"；到了这里，答案住进了一个一直在动、却又因为共享的生活而不至于乱动的地方。

大白话说，"火候"这个词的意思，不在任何一本菜谱上，也不在任何一个厨师的脑子里单独存着；它在一代代厨师怎样在灶台前用这个词、怎样纠正徒弟、怎样被食客的反应校准的那一整套做法里。离开了厨房，这个词就只剩一个空壳。

◆ 两个回合，两个入口

维特根斯坦是本书里少见的、一个人身上转了两个完整回合的哲学家。把他放到全书的三层尺度上看（三层怎样咬合，第9章已讲），能看清这次自我顶撞的来路，而不只是记住一句"前期错了，后期对了"。

先看回合。第一个回合里，弗雷格、罗素那套逻辑分析的推进，撞上"一句话凭什么能说出世界"的难题和日常语言的含混，逼出"命题是事实的图画"这个显露；回写却很古怪：他宣布问题已经解决，自己离开了哲学，那本书反倒在维也纳学派手里改写了别人的土壤。第二个回合里，他回到剑桥后一遍遍的追问，撞上自己那本书在活语言面前处处接不住，逼出"意义在使用中"；回写就是下文要看的二十世纪风气。两个回合不是两个人，而是同一台引擎转了两圈：后一圈的矛盾，正是前一圈的显露。

两个回合之间，还隔着一片常被略过的土壤。1920 到 1926 年，他在奥地利几个山村当小学老师，还为乡村小学编过一本拼写词典，1926 年出版。十岁上下的孩子学会一个词，不是先听定义，而是跟着做、被纠正、再做。《哲学研究》开头几节就说，教孩子说话，靠的不是解释，而是训练。把那几年的课堂和后期的问法连起来，是不少研究者的看法，本书也取这个读法；但要说明，这是阐释，没有他本人的自述可以坐实。

再看同一时刻的互生。"意义在使用中"这个显露，是在他那种不停举例、不停替对手设想反驳的推进里，在剑桥的课堂、与斯拉法等人的争论、山村课堂的记忆这片土壤里长出来的。反过来，显露一站住，推进的方式也跟着改了：既然意义要到使用里去看，哲学就不能再从几条总纲往下推，只能一处一处去看。他说哲学家的工作，是为某个特定目的收集提醒物；《哲学研究》的序言也承认，这本书其实只是一本画册，一组从不同方向画同一片风景的速写。土壤同样被改写：他口述的讲稿在学生中传抄，学生后来成了编者和讲述者，"先看用法"在英国的课堂里扎下了根。三条同时成立，拆不出谁最先。

最后看入口。两本书的起手截然不同。《逻辑哲学论》第一句就是总纲：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下面的命题按编号一层层从总纲推出，先立显露，再往下展开，像一份产品说明书。《哲学研究》却从一个场景起手：一个孩子怎样学说话，一位工人怎样喊"板石"。先站进人们做事的土壤，再看词怎样在活动中被推着用，最后才看那点意思怎样显露出来。入口的改变，本身就是他自我顶撞的一部分。学开车可以先背交规手册，也可以先坐在副驾驶看老司机怎么开；前一种适合应考，后一种适合上路。他后期要解决的，是上路的事。

三层合起来，也照出了他的边界。他说，理由给尽了，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铁锹被顶弯了，这时他会说："我就是这么做的。"在他那里，生活形式是解释的尽头，是不必再问的地基。可按三大方程，土壤本身也是被显露和推进生成出来的。奶奶说"我们家饺子就是这么包的"，可这个"就是"，是太奶奶当年从北方搬来、在南方买不到某样菜、凑合着改出来的。用法有来历，地基也会动。这一步维特根斯坦没有走，后来有人把"会动"推到了极处，第20章再详谈。

◆ 这算不算取消了问题

读到这里，有人会不服气：这不是把苏格拉底的问题取消了吗？如果一切都只是"用法"，那么"正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岂不是永远没法好好讨论了？

这个质疑要认真对待，也有几处要说清楚。第一，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说任何概念都没有清楚的定义。数学里、法律条文里、科学的术语里，我们常常需要并且能够给出严格的定义。他反对的是一种普遍的预设：凡是概念都必须有一个共同本质，说不出它就是不懂。

第二，他确实把哲学的任务看得和苏格拉底很不一样。他说，哲学是一场战斗，对抗的是语言对我们理智的蛊惑；哲学不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只是让一切保持原样；哲学的目的，是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路。在他看来，许多哲学问题之所以缠人，是因为我们被某幅图画俘虏了，比如"每个词背后都有一个本质"；看清了这一点，问题不是被回答了，而是消散了。

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解放，让哲学不再白白追逐不存在的东西；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放弃，把哲学本来可以有的批判力量也放走了：如果"正义"的意思就在我们现有的用法里，那么我们拿什么去批评一种现有的、不公正的用法？这个质疑很有力，本书不替任何一方下结论。不过，从本书的眼光可以补一条线索，算不上裁决："现有的用法"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游戏里常常互相顶撞。分家产时，"公平"在老一辈嘴里是长子多分、因为长子养老；到了继承法的条文里，"公平"是子女平分；到了照顾老人最多的小女儿嘴里，"公平"又是谁出力多谁多得。批评一种用法，未必要跳到用法之外，去彼岸找一把标准尺，也可以拿另一种用法去顶它。用法与用法顶上了，新的说法才被逼出来，这正是全书讲的矛盾驱动；只是在维特根斯坦这里，矛盾的落点不在定义上，而在用法与用法的碰撞里。

第三，从本书的眼光看，有一处要特别提醒：维特根斯坦对苏格拉底的回答，不是简单地说"苏格拉底错了"。苏格拉底的追问，让雅典人看见了"会用"和"说得清"之间的那道缝；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否认这道缝，他是重新解释了这道缝：它不说明会用的人无知，而说明"说得清"并不是知道的唯一形式。两个人隔着两千四百年，对着同一道缝，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读法。

大白话说，一个孩子考试时写不出"什么是诚实"的标准定义，却从不撒谎。老师甲说：你连诚实是什么都说不清，怎么能算懂诚实？老师乙说：他天天在做诚实的事，这就是懂。两位老师都看到了"做到"和"说清"之间的差距，只是对这个差距的意思，看法相反。

◆ 回写

再追回写。维特根斯坦重置了什么？在他身后，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尤其是牛津，兴起了一股重视日常语言的哲学风气，主张先仔细看一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怎样被使用，再去谈哲学问题。这股风气并非全由他一人开出，但他的影响清楚可见。在社会科学里，也有人沿着"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思路，主张要理解一个社会里的行为，必须先理解这个社会里人们共享的规则和意义，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家族相似"更是走出了哲学，成了心理学研究人怎样形成概念、语言学研究词义时常用的一个说法。

回写也有板结的一面。"意义即使用""家族相似"这些说法太好用了，以至于很快变成了口号。有人遇到任何难以定义的概念，都随口一句"这是家族相似"，就不再往下想；有人用"意义就是使用"来挡掉一切追问。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考极其艰苦，一个例子往往要反复推敲几十遍；可当他的发现变成口号以后，它反倒成了一种新的、让人停止思考的东西。第13章说的那张"不许改的方子"，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

◆ 被讲出来的维特根斯坦

再查反向师承。维特根斯坦身后的形象，被几拨人讲成了很不一样的样子。最早的一拨是维也纳学派。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一批哲学家和科学家，把《逻辑哲学论》当作他们"科学的世界观"的重要依据，把它读成一部要求一切有意义的命题都必须能被经验证实的书。维特根斯坦和他们见过面，却并不认同这种读法。据卡尔纳普回忆，有一次聚会，维特根斯坦没有讨论

哲学，而是转过身去，背对着众人，朗诵起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他看重的，恰恰是那本书里关于"不可说"的部分，而维也纳学派看重的，是"可说"的部分。

后来的一拨，把他讲成"两个维特根斯坦"：前期一个，后期一个，彼此对立。这个讲法很方便，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标准讲法。到了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又有一批学者提出，前后期之间的连续性比通常以为的更强，甚至《逻辑哲学论》本身就该被读成一部要读者最终把它"扔掉"的书——那本书倒数第二句确实说，读懂他的人最终会认识到书中的命题都没有意义，就像爬上梯子之后要把梯子扔掉。哪一种读法更接近本人，至今仍有争论。

还有一层更基础的讲述：编者。维特根斯坦生前几乎只出版了《逻辑哲学论》，身后留下了几万页手稿。《哲学研究》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许多书，都是他的遗稿管理人从手稿中整理、编排、翻译出来的。读者今天看到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有相当一部分的结构和面貌，经过了编者之手。按第12章的工序，这些都要分开记账：他本人写了什么，维也纳学派讲成了什么，"两个维特根斯坦"的讲法讲成了什么，编者又怎样安排了他的遗稿。

◆ 回绕：两千四百年的一问一答

最后看回绕。这一章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维特根斯坦和苏格拉底之间那道跨越两千四百年的弧线。用第14章的三个问题来问。回到的旧位置是什么？是苏格拉底的出发点：雅典人"会用却说不清"的那个状态。不过，维特根斯坦回到这里，不是为了重新追问出一个定义，而是为了替那些"会用却说不清"的人辩护：他们的会用，本身就是答案的所在。

逼它回来的矛盾是什么？是现代逻辑追求精确理想语言的雄心，与日常语言那种含混却又运转自如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张力；还有他自己早年那本书，在活生生的语言面前处处接不住。回来以后改写了什么？它改变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许多哲学家看待概念、意义和哲学任务的方式，也让"家族相似"成了跨出哲学的常用

工具。三个问题都答得出，这就是第14章意义上的回绕，不是倒退：他没有要人退回不读逻辑、不讲精确的时代，逻辑学照样是他那代人脚下的土壤；也不是打转：回来以后，"会用算不算知道"这道题的地形整个改了。

还有一个形式上的小回绕，也值得一提。《哲学研究》的写法很奇特：书里常常出现一个看不见的对话者，提出反驳、表示怀疑，作者再回应、再追问；许多段落以问题结尾，而不是以结论结尾。这多少像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多声部，反复盘问，不急着下定论。只是这一次，盘问的锋芒，对准的正是苏格拉底式的"给我一个定义"。这是本书的解读，不是说维特根斯坦有意模仿柏拉图。

如果把这根轴画成一个圈，那么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圈的一头几乎碰到了起点：答案回到了苏格拉底当年追问的那些普通人身上。但它不是倒退，回来的已经不是"无知"，而是"会用"；土壤也不再是雅典的广场，而是一个经历过现代逻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经历过科学和语言学洗礼的时代。

◆ 下一个缺口

收拢一下这一章。维特根斯坦后期的问法，是"词怎样有意义"；他顶撞的，是老师们追求精确理想语言的传统、他自己早年的《逻辑哲学论》，以及一种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对一般性的渴求"；他从奥古斯丁那幅"词就是事物的名称"的图画开刀，把答案搬进了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搬进了用法里；这是本书那根轴上对苏格拉底最直接的回答：说不出定义不等于不知道，会用本身就是一种知道；他的回写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哲学风气，也被用成了口号；后世的他，被维也纳学派、"两个维特根斯坦"的讲法和编者们讲成了不同的样子；他和苏格拉底之间，画出了一道两千四百年的弧线。

可是，这里又留下了一个缺口。如果意义住在用法里，而用法总在变——一个词在这家人和那家人嘴里不同，在这一代和下一代嘴里不同，在被引用、被翻译、被误解的过程中一路漂移——那么，意义到底能不能稳稳地住下来？维特根

斯坦让答案落在共享的生活形式上，可是如果"共享"本身就裂开了、错位了，如果每一次使用都在推迟、改写前一次使用，那么答案是不是又一次悬在了半空？

有一位法国哲学家，正要把这个问题推到底。他说，意义永远在路上，永远在一个词把你送往下一个词的途中。下一章，我们看德里达怎样让答案再度悬空，让这根轴首尾相接。

带走的话

会用，本身就是一种知道；对许多词来说，那个所有例子共有的东西根本不存在。

本章判错句

如果"勇敢""正义"这类词确有一个人人可认的共同本质，只是我们还没找到，本章对苏格拉底的回答就要收窄。

想一想

有什么事你做得很好，却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你家里的一个词，在别人家是不是另一个意思？

◆

20

第 20 章

德里达：答案永远在路上

这一章的问题

如果每个词的意思都要靠别的词来撑，意思到底能不能住下来？

◆ 一本查不到底的字典

小时候查字典，多半有过这样的经历：查"愉快"，字典说"快乐、舒畅"；去查"舒畅"，字典说"开朗、愉快"；再查"开朗"，又绕到"乐观、舒畅"。查了一圈，手指在几页之间来回翻，始终没有一个词停下来对你说："到我这里为止，意思就在这儿。"每个词都把你送去另一个词，像一列没有终点站的车。

大多数人翻到第三次就放弃了，心想反正大概懂了，接着写作业。可是有一个人把这件小事当了真。他追问：如果每个词的意思都要靠别的词来撑，那"意思"到底在哪儿？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意思稳稳地住下来？这个人叫雅克·德里达（1930—2004），生在当时属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后来在巴黎教书写作，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受争议的哲学家之一。

争议有多大，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来。1992 年，剑桥大学打算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校内罕见地为此付诸表决；一批哲学家联名在报上写信反对，说他的东西不合学术标准。最后投票通过了，但反对票也有两百多张。一个哲学家要不要被承认，竟然要拿票数来定——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围绕他已经缠成了一团。

前面几章，我们看着"X 是什么——答案住在哪里"这道题一路搬家：从苏格拉底的悬空，到柏拉图的彼岸、亚里士多德的物中，再到上帝心中、我思、认识

的条件、历史，直到第 19 章维特根斯坦把它安顿进"用法"。到了德里达，事情起了一个奇怪的变化：答案不再搬进任何一个新住所，它干脆上了路，永远在路上。这一章，我们还是用那五个动作来解他，看看这条"在路上"究竟是一句俏皮话，还是两千五百年这根轴的一次真正的首尾相接。

◆ 跟问法：他问的不是"X 是什么"，而是"是"怎么站得住

第一个动作是跟问法，不跟人。读德里达，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一上来就问"他的主张是什么"，然后列出几条结论：意义不确定、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一切都可以解构。这样列出来的德里达，看上去像一个专门拆台的人。

可是如果先问"他在解决哪道题做不好"，画面就不一样了。德里达真正盯住的，不是某一个"X"，而是"X 是什么"这个问法本身是怎么成立的。当我们问"正义是什么""美是什么""火候是什么"时，我们心里已经预设了一件事：总有一个地方，那个意思会完整地、当下地摆在那里，只等我们去把它说出来。苏格拉底在街头追问时，相信定义"应当有"；柏拉图把它安顿在彼岸；亚里士多德把它放进事物自身的形式。他们对"住在哪儿"意见不同，但都默认"有一个住处"。德里达问的是：这个"有住处"的默认，是从哪里来的？它站得住吗？

打个比方。一家人为了老房子分家，吵了三天，争的是"房子算谁的"。忽然一个人站起来说：先别争归谁，咱们先看看，这房产证上写的那条边界线，当初是怎么划的？依据是什么？划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偏向了谁？他没有回答"归谁"，他退了一步，去查"归谁"这个问题本身靠什么站着。德里达干的就是这件事。这不是逃避问题，而是换了一个更靠底层的问法。所以，用 SDE 的说法，德里达的任务 DNA（即他这一辈子的工作被什么问题驱动）不在"给出答案"，而在"检查答案的地基"。读懂这一点，后面的四个动作才不会走歪。

◆ 前置矛盾：他在顶撞谁

第二个动作，找前置矛盾：他在顶撞谁，谁的答案成了他的土壤。德里达的土壤很厚，至少有三层。最近的一层是二十世纪中叶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有一个惊人的观察：语言里只有差异，没有不靠别的而独立存在的项。"猫"之所以是"猫"，不是因为这个音里装着猫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不是"帽"、不是"毛"、不是"包"。意思是在一张差别的网里被"分"出来的。顺带一提，索绪尔生前并没有把这套讲义写成书，今天人们读到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他去世后由学生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又一个"学生生成老师"的例子，第 8 章讲过这种纠缠的硬度。结构主义者把索绪尔这个观察推到人类学、文学、神话研究里，相信只要找到那张差异之网的结构，意义就能被一网打尽。

德里达接过了"只有差异"这一半，却顶撞了"结构能把意义收住"这一半。他在 1966 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论文，矛头就指向结构主义的一个默认：任何结构都需要一个"中心"把它固定住，而这个中心本身却被放在结构之外，不受差异游戏的约束。他问：凭什么？如果一切都靠差异，那个中心为什么可以例外？

第二层土壤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认为，意义在"我对自己说话"那一刻最纯粹，因为声音一出口，我就同时听见了，意思和意识贴在一起，没有隔阂。德里达在 1967 年的《声音与现象》里细读这套说法，指出即使是内心独白，也已经依赖重复、依赖符号、依赖时间上的错开，那个"完全的当下"从来没有真正到场过。

第三层最深，是从柏拉图一路下来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德里达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与之相连的"语音中心主义"。大白话讲：西方哲学有一个两千多年不变的偏好——说出来的话比写下来的字更"真"，因为说话

时人在场，写字时人不在场；在场的比不在场的更可靠。这条土壤，正是他要顶撞的最大对手。

这个偏好我们每天都在用。公司开会，总有人说"会议纪要写的不算，我当时说的意思不是这样"；朋友之间吵架，常听见"你别看我发的文字，你听我当面跟你讲"。我们天然觉得现场的声音更接近本意，纸上的文字只是转述、只是影子。德里达偏偏问：你当面讲的那句话，难道就不是一串要靠别的词来撑的符号吗？你怎么确定你自己"当时的意思"是完整到场的？

还有一层不能漏掉：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已经提出要对传统存在论做一番"拆解"，揭示西方哲学把"存在"理解为"在场"的偏好。德里达的"解构"一词，就是在这条线上接着往下走的。所以说德里达横空出世、无中生有，是不对的；他是在一张已经缠得很紧的网里，找到了一个松动的线头。前置矛盾越清楚，越能看出他不是来砸场子的，而是来接这场两千年的老账的。

土壤也不只是书本。德里达生在阿尔及尔郊外的一个犹太家庭，1942 年，维希政权在阿尔及利亚推行针对犹太学生的入学限额，十二岁的他被赶出了学校；他后来多次谈到，自己和法语、和法国之间，是一种既在里面、又不全在里面的关系。我们不想把一套哲学还原成一段童年，那等于把土壤写成了在身后推着学说走的"背景"。更稳妥的说法是：这段被划到边上的经历，和他日后对"中心怎样划线"的敏感缠在了一起。这是本书的阐释，不是因果证明。好比一个总被排在最后一排的孩子，长大当了班主任，排座位前会先问一句"这张座次表是按什么排的"；他未必因此就对，却比别人更早看见了座次表本身。

◆ 延异：一个只能看见、听不见的字母

德里达给出的那个新东西，有一个刻意造出来的名字：différance，中文通常译作"延异"。他 1968 年在法国哲学学会做过一次专题讲演，后来收进文集出版。这个词的妙处要用法语才能看清。法语里本来有 différence（差异），德

里达把其中一个字母 e 改成了 a。改完以后，两个词的读音一模一样，耳朵根本分不出来；只有写在纸上，眼睛才看得出差别。这个小把戏本身就是论证：如果说话真比写字更接近意义，那这两个词的区别靠说话为什么传不出来？此处，偏偏是写下的字承载了说话丢掉的那一点差别。

"延异"同时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差异"：一个符号的意思来自它与别的符号的不同，这是从索绪尔那里接过来的。另一层是"延迟"：意思从来不会在某一刻全部到场，它总要被推到下一个符号、下一次阅读、下一个语境里去。两层合起来说：意义是在差别中被一路推迟地生成的，它没有一个可以停靠的终点。

回到开头的字典。字典查不到底，不是因为字典编得不好，而是因为语言本来就是这样工作的：每个词都只是一张指路牌，指向别的指路牌。德里达用"痕迹"一词描述这种状态：每一个当下的意思里，都留着别的意思的痕迹，也预留着将来意思的空位，它从来不是纯粹的、自足的。

再举一个更贴近今天的例子：快递单号。你在手机上查一个包裹，页面告诉你"已到达转运中心"，点进去又是"正在派送途中"，再刷新是"已交由某驿站"。包裹的"位置"一直是一串状态的接力，每一条状态都依赖上一条和下一条才有意义。你想问"它此刻到底在哪"，系统给你的永远是一个刚刚过去的记录和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在德里达看来，意义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在途中的包裹。

现在可以把德里达放回本书这根轴上了。苏格拉底那里，答案悬空，是因为对话问到最后找不到定义；柏拉图把它搬到彼岸，亚里士多德搬回物中，此后两千年它不断换房子。到了德里达，答案不再有房子，它的存在方式就是"在路上"：不是在某处，而是在一个符号向另一个符号的移交之中。这里需要说明，"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是本书的整理方式，不是德里达自己的说法；把延异读成"答案上了路"，是本书的解读，不是史料本身。

用 SDE 的话说，德里达抓住了极其要紧的一面：差异序列（D）。差异序列不是简单的"变化"，而是推进、比较、试探、修正的一串动作；意义正是在这串差异的推进里发生的，不是先在某处备好、再被人领走的。前面两千年的哲学大多盯着"显露"（S），也就是那个终于被看见、被说出来的答案，并想给它找一个牢靠的住所；德里达把目光掉过来，盯住了让答案能够显露、又不断让它松动的那串差异。这是一次方向上的大翻转。

◆ 这一轮怎样发生：一个字母撑起的显露

先把五个动作放一放，用本书的发生引擎把德里达这一轮从头走一遍。123 原理只讲一个循环：差异序列与土壤顶出矛盾，逼出显露的改变，新的显露再回过头来重置差异与土壤。它不是能套在任何事上的三步法，所以要拿德里达自己的材料来走。差异序列这一头，是他那种极端耐心的细读：一个词一个词地读胡塞尔，一段一段地读索绪尔和卢梭，专盯文本里一个两可的词、一处压在边上的比喻、一个作者自己没留意的转折。土壤这一头，是前面那几层：结构能收住意义，意义在当下的自我言说里最纯，在场高于不在场。矛盾就在这里：细读每推进一步，那个被当作地基的"在场"就往后退一步；而土壤要求的，恰恰是一个不再后退的地方。读得越认真，矛盾越尖。

被逼出来的新显露，就是"延异"与"痕迹"这一组说法。用 S 的"三个可"来量，有一处耐人寻味：这个自造的词认得出来，一个字母之差，过目难忘；维持得住，他此后三十多年反复回到它、改写它；表达得出去，被写下、被讲演、被翻译、被争论。第 5 章说过，苏格拉底的显露只走到"可识别"，因为他拒绝著述。德里达说的是"意义不会完全到场"，可这句话本身恰恰借着写作，三个"可"都走到了。这不是自相矛盾，而正是他的论点：意义不必完全到场，照样能在文字里被认出、被接住、被传下去。再从三大方程看，三样东西同时互生：没有那几层土壤，细读找不到下手处；没有那串细读，土壤里的裂缝不会被看

见；没有"延异"这个被逼出来的词，这场顶撞散了就散了，留不下形状。F、G、H 在这里只是占位记号，什么也算不出来，说的只是三者缠在一起、一起长出来。

起手次序也值得一提。本书解哲学史用 D→S→E：先跟一个人的问法和推进，再看他显露出的学说，最后追土壤与回写。德里达读一部经典，起手却接近 D→E→S：先抓一个细小的差别，一个字母、一个两可的词，再把它牵出的整片传统拖出来，最后回头看那部经典的中心论点怎样在这片土壤上摇晃。两种起手没有高下，任务不同：我们要追一次发生怎样走完，他要查一个已经站好的显露靠什么站着。这是本书的阐释。好比验房，有人先看整体格局再看水电；老练的验房师却先蹲下去摸墙角一道细缝，顺着它查整面墙、整根管线，最后才对整套房下判断。德里达就是那位先摸墙缝的人。

◆ 回到《斐德若篇》：一味药，也是一味毒

德里达有一篇长文叫《柏拉图的药》，1968 年发表，后来收进《播撒》一书。文章细读的正是我们在第 6 章提到过的《斐德若篇》。《斐德若篇》末尾，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埃及故事：发明文字的神把文字献给国王，说它是一剂让人记性更好的良药；国王却说，不，文字会让人不再用心记，只是靠外在的记号去"想起"，它给的是记忆的提示，不是记忆本身。苏格拉底接着评论：写下来的东西不会回答你的追问，被人误解时也无法替自己辩护，它需要它的"父亲"——也就是作者——在场来救援。

德里达注意到故事里那个希腊词 pharmakon：它既可以指"药"，也可以指"毒"。柏拉图让苏格拉底用这个词描述文字，这个词本身就拒绝只取一个意思。翻译者往往只能二选一，选了"药"就丢了"毒"，选了"毒"就丢了"药"。而柏拉图的文本恰恰依赖这个两可。德里达由此读出：柏拉图想把文字贬为活的言说

的影子，可他的论证本身就站在一个说不清好坏的词上，"说话高于写字"这座房子，地基是晃的。

更妙的是那个所有读者都绕不开的反讽：苏格拉底批评文字，而我们之所以知道他批评文字，全靠柏拉图把它写了下来。一个一字未写的人对文字的指控，被他的学生用文字保存了两千四百年。第 8 章讲反向师承时，我们说"我们知道的苏格拉底来自柏拉图的笔"；德里达把这件事推进了一步：不只是苏格拉底的形象靠文字留存，连"活的言说更真"这个主张本身，也只能活在文字里。德里达后来写过一本《明信片》（1980），开篇讨论的就是一张中世纪手抄本插图印成的明信片，画上苏格拉底坐着写字，柏拉图站在他身后，像在指点。这幅颠倒的图，被德里达拿来作为师承颠倒的象征。

日常生活里有现成的对照。手机备忘录是不是"药"？它帮你记住了下周三的体检、妈妈的生日、停车的楼层。可是你也会发现，自从有了备忘录，你自己记住的东西越来越少，一旦手机没电，整个人就像被抽掉了半截记忆。同一样东西，既救了你，也让你变弱。德里达说，文字就是这样一个"药/毒"，你没法只取它好的那一半。

这一段对本书格外重要。德里达并不是从外面来批评希腊三哲的，他是钻进柏拉图的文本里，从苏格拉底那个"不写字"的选择里，找到了整个传统的裂缝。第一轮发生循环里那个"拒绝著述"的苏格拉底，在两千多年后被德里达重新请回桌上——这条线索，我们在本章最后一节再收回来。

◆ 查反向师承：被讲出来的德里达

第三个动作，查反向师承：后世的他是谁塑造的。我们今天脑子里的那个德里达形象——一个说"什么都可以解构""文本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真理"的人——很大一部分不是他本人写出来的，是被讲出来的。

第一批讲述者在美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解构"在美国的文学系迅速走红，尤其在耶鲁大学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耶鲁学派"的文学批评群体。英语世界的读者大多先通过这些文学批评、通过译本的长篇导言认识德里达。在这条路上，解构渐渐变成了一种"读出文本自相矛盾"的批评技术，一种可以教、可以套的方法。方法传得越广，它离德里达对胡塞尔、对索绪尔的那种逐字逐句的哲学细读就越远。

第二批讲述者是他的反对者。美国哲学家塞尔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德里达有过一场著名的笔战，双方都认为对方误读了自己。剑桥那次投票前的联名信，也把他描绘成一个故意晦涩、取消论证标准的人。反对者的描绘和追随者的简化，从两头一起捏，捏出了一个"只破不立"的德里达。

最典型的例子是那句"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句话出自《论文字学》（1967）中读卢梭的部分。被传开以后，它常被理解为"世界不存在，只有书本"。可在原来的语境里，德里达讲的是：我们接触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跳出符号、语境、解释的网络，直接摸到一个"纯粹的外面"。这更接近"没有不经过语境的阅读"，而不是"现实是假的"。一句话脱离语境被传播，最后变成了它本来想反对的那种"站在网络外面的定论"——这本身几乎就是一次延异的现场演示。

这种事我们都见过。一家老字号的招牌菜，本来是老板根据当季食材随手调的；后来有人拍成短视频，配上"正宗做法三步走"，几百万人照着学。过几年，你要是按老板当初的随性去做，反倒会被网友指着说"不正宗"。被讲出来的那个版本，压过了本人。

所以，公正对待德里达，第一件事就是把"被讲出来的德里达"与他本人的文本分开。而一旦分开，有一件事就躲不过去：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德里达大量写作的主题恰恰是正义、法律、友爱、好客、宽恕、民主。1989 年他在美

国一所法学院的研讨会上宣读《法的力量》，提出法律可以被解构，而正义不可被解构，甚至说"解构就是正义"——意思是，正因为任何一部现行法律都不可能完全等于正义，我们才必须不断回到具体的人、具体的案子上，重新承担判断的责任。1993 年的《马克思的幽灵》，以及他反复谈论的"将来的民主"，都在说同一件事：正义与民主不是一个已经到手的东西，而是一个总在前方、要求我们不断兑现的承诺。

这不是"只破不立"。他立的东西，形态和传统不同：不是一个可以挂在墙上的标准，而是一种不许你把标准当成终点的责任。好比一位好的法官，手里有法条，却从不认为"照条文判了"就等于"判对了"，每个案子都要再掂量一次。你可以不同意德里达的路子，但不能说他什么也没立。整体贬评他"建设性为零"，恰恰是被那个"讲出来的德里达"牵着走的结果。

◆ 最硬的一条反驳：凭什么说别人读错了

公正对待德里达，也包括认真对待最强的反对意见，而不只是替他挡箭。最有分量的一条大致是：如果意义永远推迟、永远到不了场，他凭什么抱怨塞尔读错了他？笔战里他明明在要求对方把他读对。一边说意义没有终点，一边争"我原本的意思是这样"，这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吗？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里从另一头批评他：把哲学论证和文学修辞的界线抹平，等于放弃了用理由说服人的那套规矩。这些批评打在要害上，不是胡搅。

德里达的回应，可以概括成一句：意义由语境决定，但语境永远封不死。他在笔战文集《有限公司》（1988）的后记里明说，他从没主张"怎么读都行"；一段话在给定语境里，意思可以相当确定，有读对也有读错。他坚持的只是：没有哪个语境能被一次穷尽，一段话总可能被引用、被移进新的场合，在那里长出新的意思。"封不死"和"怎么都行"是两回事。工作群里领导发通知，你回"收到"，意思清清楚楚，谁说它不确定就是抬杠；可同一句"收到"被截图转进家族群，配

上一句"看我们领导多凶"，它就成了一份证据、一声叹气。前一种说明语境稳得住意义，后一种说明语境永远能被换掉。德里达要两句一起说，批评者常常只听见了后一句。这个回应能否完全化解批评，至今有争论，我们不替他把话说圆；能确定的是，把他读成"意义不存在"，正是他明确拒绝的读法。

◆ 追回写：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

第四个动作，追回写：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回写，用大白话说，就是一个新显露反过来改了原来的问法和土壤，让下一轮从不同的地方起跑。回写要拿史料来看，不能宣布。

德里达的回写，在几个地方看得很清楚。第一是读书的方法。在他之后，人文学科里很多人读一部经典，不再只读它的中心论点，而是去读它的脚注、它的比喻、它不经意用到的一个两可词、它压在边上不说的东西。"从边缘读中心"成了一种常见的功夫。第二是一大批学科的问法。文学研究、法学理论、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都从他那里借来了一个基本动作：先查一个看似天经地义的二分（说/写、中心/边缘、男/女、本土/外来）里，哪一边被默认为高、哪一边被默认为低，再看这个高低是怎么被造出来的。第三是更远处的回写，"解构"一词甚至进入了建筑界和日常语言，成了一个人人都用的词。

这些回写都有实际后果。一家公司做员工满意度调查，过去只看"满意率"这个总数；受过这类训练的人会去追问：问卷里哪些问题没被问？哪些人根本没机会填？"满意"这个选项是怎么被设计得最好勾的？这种追问并不神秘，它就是德里达式阅读下沉到日常管理里的样子。

回写也有板结的地方，而且板结得很快。"解构"被用多了，成了一个万能动词：什么都可以"解构一下"，一部电视剧、一款手机、一顿年夜饭。词用滥了，原来那种逐字逐句、极端耐心的细读功夫反而丢了，只剩下一个"反正都不确定"的姿态。更麻烦的是，"意义永远延迟"有时被当成了不做判断的挡箭牌。

职场上有一类人：每次开会到要拍板的时候，他总说"这个还需要再想想""每个人理解不一样""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项目拖了半年，什么也没定。他未必读过德里达，但他用的正是一个板结了的、被抽空的"延异"。德里达自己的意思恰恰相反：正因为没有哪个决定能被现成的规则完全担保，做决定的人才必须承担起决定的全部分量，而不是躲到规则后面去。延迟是意义的处境，不是推卸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看，德里达的回写和亚里士多德的回写，板结方式正好相反。第13章讲过，亚里士多德的回写过厚，后世把他的学说压成了不许动的权威，像一块越来越硬的地基；德里达的回写则容易被稀释，变成一种什么都不肯压实的漂浮。一个板结成石头，一个化成了雾。两种板结都背离了原作者那一刻真正的锋利。

◆ 看回绕：轴首尾相接

第五个动作，看回绕：循环有没有绕回去。到这里，本书这根轴的形状显出来了。两千五百年前，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追问"勇敢是什么""虔敬是什么"，对话常常在没有答案的地方停下，希腊人把这种状态叫作 aporia，也就是"无路可走"。答案悬在半空。两千五百年后，德里达说，意义从来没有一个可以安顿的住处，它永远在路上。答案又一次悬空了。

这是不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不是。第14章区分过回绕与倒退：时装几十年后转回来，看着像，但面料、剪裁、穿的人都已经不同。苏格拉底的悬空与德里达的悬空，差别至少有三处。

第一，苏格拉底的悬空是"还没找到"。他相信定义应该有，只是今天这场对话没问出来，明天接着问。德里达的悬空是"结构上找不到终点"。不是找得不够努力，而是意义本来就以延迟的方式存在。好比一个人丢了钥匙，苏格拉底是在

房间里翻来翻去还没找着；德里达是告诉你，这扇门本来就没有一把能一劳永逸打开它的钥匙，每次进门都要重新开一次。

第二，苏格拉底的悬空在说话里，德里达的悬空在文字里。苏格拉底拒绝写书，信任当面的追问；德里达恰恰把文字、把那个"不在场"推到了舞台中央。两人站在了说与写这条线的两端，却在"答案不肯落地"这一点上碰了头。这种碰头不是师承，两人隔着两千多年，没有一句当面的话；它是经过柏拉图的文本、经过一代代注释与翻译缠出来的。

第三，两千年的搬家史已经发生过了。德里达的悬空，是在见过彼岸、物中、上帝心中、我思、认识的条件、历史、用法这一连串住所之后的悬空。他知道每一个住所是怎么建起来、又是怎么松动的。这就像一个搬过七八次家的人说"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一个永久地址了"，和一个从没有过家的流浪少年说同一句话，分量完全不同。

于是这根轴首尾相接了：悬空——彼岸——物中——上帝心中——我思——认识的条件——历史——用法——在路上，再度悬空。首尾相接，不是一个圆圈封口，也不是一圈螺旋升到更高处，而是河道绕了一个大弯，流回起点附近，水和河床都已经换过。第 22 章会把这种回绕和学园怀疑派、新柏拉图主义等别的回绕放在一起看，这里只先把形状指出来。

最后，有一处 SDE 的补充，不是要给德里达打分，而是要把他看清楚。德里达把差异序列这一面看得极深：意义确实是在差异的推进中发生的，确实不会在某一刻一次性完全到场。可是三大方程讲的是显露、差异、纠缠三者同时互生，缺了哪一个都不成局。查字典查不到底，这是真的；可我们照样用"愉快"这个词写贺卡、订合同、点外卖，事情照样办成。为什么？因为在一张具体的生活之网里，一个词的意思会被暂时地稳住：能被认出来，能维持到这件事办完，能被别人接过去接着用。这就是 S 的"三个可"。第 19 章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在用法

里，正好描述了这种暂时的稳住。暂时的显露不是终点，但它是真的，它会回写，会成为下一轮差异推进的起点。

所以，"答案在路上"与"答案在用法里"并不互相取消。前者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永久的住所可以让人躺平；后者告诉我们，在路上的每一站，人们照样卸货、交接、过日子。德里达把轴的这一端推到了尽头，他照亮的是差异推进这一面；而本书想接着做的，是把显露的暂时稳住与土壤的纠缠一起放回来看。这是在德里达的肩膀上往前走，不是绕开他。

还剩一个问题。从苏格拉底到德里达，我们一直沿着"X 是什么——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走，每个人都被放到轴上某一个点。轴越清楚，一个疑问就越大：是不是每位哲学家都在这根轴上？有些人问的根本不是"X 是什么"，比如一个在内战炮声里问"秩序怎样可能"的英国人，一个在战争年代问"世界无意义时人怎么活"的阿尔及利亚孩子，一个问"蛋糕怎么切才公道"的美国教授。把他们硬塞到这根轴上，会发生什么？下一章就去看这些不在轴上的人。

带走的话

意义在路上，不等于路上什么都没有；每一站照样卸货、交接、过日子。

本章判错句

如果德里达的延异与苏格拉底的无解之间找不到可比的推进方式，本章说的"首尾相接"就只是排列上的巧合。

想一想

你查过一个词，越查越远的经历吗？

你说过的哪一句话，在别人那里被读出了你没想到的意思？

◆

21

第 21 章

不在这根轴上的人：霍布斯、加缪、罗尔斯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不在这根轴上的哲学家，五个动作还管用吗？

◆ 同一套流程，不同的病

一位老医生带学生，第一课教的是一套问诊流程：先问主诉，哪里不舒服；再问来历，什么时候开始、之前做过什么；再看别人怎么说，以前的病历、家属的描述；再看这病改变了身体的什么、哪里已经留下了硬块；最后看它有没有反复。学生学得很快，也很得意。

第二课，老医生让学生去看三位病人。第一位咳嗽，第二位失眠，第三位膝盖疼。学生拿着第一位病人的经验去看第二位，开口就问："您咳了多久？"病人愣住了：我没咳嗽，我是睡不着。老医生说：流程是可以带走的，药方不能带走。问诊的五步，对咳嗽、失眠、膝盖疼都用得上；可是你从咳嗽病人身上得出的那个结论——"病根在肺"——不能拿去套在失眠病人身上。

本书到这里，一直沿着一根轴在走："X 是什么——答案住在哪里"。从苏格拉底的悬空，到柏拉图的彼岸、亚里士多德的物中、奥古斯丁的上帝心中、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认识条件、黑格尔的历史、维特根斯坦的用法，再到德里达那里答案又悬在了路上（第20章已谈），这根轴画出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圈。轴越清楚，一个危险就越大：我们会以为，每一位哲学家都该被放到这根轴上的某一个点。

这一章就是来检查这个危险的。导论里说过，这盏灯给的是方法，不是结论。五个动作是那套问诊流程，"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只是从三哲这位病人身上得出的一张药方。这一章请三位"别的病人"上场：一位在内战炮声里问秩序怎样可能的英国人，一位在战争年代问世界没有意义时人怎样活的阿尔及利亚孩子，一位问蛋糕怎样切才公道的美国教授。我们对每一位都做两件事：先老老实实用五个动作走一遍；再试着把他硬塞到轴上，看看会发生什么。

做这件事之前，要先提醒一句第10章说过的话：读一个人，先读他的问法，也就是他的"任务 DNA"——这个人的问题里，最吃紧、最该先抓住的是什么。对三哲和第四编的六位来说，最吃紧的，恰好都和"X 是什么、答案住在哪里"有关，所以那根轴好用。可对这一章的三位来说，最吃紧的东西各不相同：霍布斯最吃紧的是"人怎样才能不互相残杀"，加缪最吃紧的是"没有答案的时候人还要不要活、怎样活"，罗尔斯最吃紧的是"一个社会的好处和负担应当怎样分"。这些问题当然也会牵涉到"正义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但那不是他们出发的地方。起点错了，越努力越远（第10章已谈）。所以，这一章的规矩是：先把轴放下，从每个人自己的问法出发；轴最后再拿出来，只用来做一次对照实验。

◆ 霍布斯：秩序怎样可能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活了九十一岁，几乎贯穿了英国最动荡的一个世纪。他在一首用拉丁文写的自传诗里说，他出生那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正逼近英国，母亲受了惊吓早产，于是"恐惧和我是一对双胞胎"。这句话是他晚年对自己的讲述，可以当作一条线索。

先跟问法。霍布斯的时代，英国爆发了内战，国王和议会兵戎相见，国王查理一世在 1649 年被送上断头台。霍布斯在内战前夕就逃到了巴黎，在那里流亡了十多年。他问的问题，简单得近乎赤裸：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能让所有人畏惧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会是什么状态？怎样才能走出这种状态？他认什么算回答？

不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是一个能让人不再互相残杀、能被每一个怕死的人理性地接受的安排。

再找前置矛盾。他顶撞的第一股，是亚里士多德。第7章讲过，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自然地倾向于结成城邦。霍布斯对这一套极为不满，他在 1651 年出版的《利维坦》里，把大学里讲授的那种亚里士多德哲学斥为空洞无用。在他看来，人并不天生合群；人人平等地脆弱，平等地想要保全自己，平等地互相猜疑。第二股，是内战本身：一个国家怎样从秩序滑进流血，他亲眼看着。顺带一提，霍布斯年轻时第一部出版的书，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英译本，就是第4章引过的那位写科西拉内乱、写"词语在内战中改变了意思"的史家。他从这部两千年前的史书里，早早看到了一个共同体撕裂时会发生什么。

第三股，是一股活的推进：新兴的几何学与机械论科学。据他同时代人奥布里的记述，霍布斯四十岁时偶然在一位绅士的书房里看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翻开的一页，读了一条命题，大呼不可能，于是倒着往前一条条查证，最后被说服，从此爱上了几何学。这是一则轶事，细节未必可靠，但霍布斯确实想用几何学那种从定义出发、一步步推出必然结论的方式，来建立一门关于国家的学问。

答案落在哪里？霍布斯的推理是这样的：在没有共同权力的"自然状态"里，每个人都可能为了自保而先下手为强，结果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促。理性告诉每一个人，这样下去谁都活不好；于是人们彼此立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一个主权者，由它来维持和平。那个主权者，就是他借用《圣经》里的海怪之名所称的"利维坦"。秩序不是天生的，是怕死的人们用契约造出来的。

再追回写。霍布斯的回写极其深远：此后三百多年，"人们在一种设想的初始状态里，彼此立约，建立政治秩序"成了政治哲学里最重要的思路之一，史称"社会契约"传统。洛克、卢梭、康德都在这条路上，本章后面要讲的罗尔斯也

在这条路上。回写也有负向的一面：1683 年，牛津大学颁布决议，谴责一批被认为危害君权与宗教的论点，并把霍布斯的《利维坦》等书当众焚毁。先被烧、后成起点，正负两种回写落在同一本书上。

再查反向师承。后世的霍布斯，被讲成了许多样子：在十七世纪，"霍布斯主义者"几乎是一个骂人的词，意思是无神论者和道德虚无者；后来，有人把他讲成专制君主制的辩护士，也有人把他讲成现代自由主义的真正源头，因为他的整个体系都从个人的自我保存出发；二十世纪又有人把他讲成博弈论的先驱，把自然状态读成一场人人都想合作、却人人都不敢先合作的困局。几种讲法彼此打架，都在他的书里找得到依据。

最后看回绕。霍布斯身后，最明显的回绕之一，正是二十世纪的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回到他的自然状态，用数学重新讲一遍"为什么理性的个人会陷入集体的坏结果"。用三个问题问：回到的是"人人自保、谁也不敢先放下武器"这个初始困局；逼它回来的，是冷战年代核对峙之下"合作为什么这么难"的现实焦虑；回来以后，改写了经济学和国际关系谈合作的方式。形状是霍布斯的，工具是新的。

大白话说，一栋老旧小区，物业撤了，没人管了。起初大家还相安无事，后来有人把垃圾堆在楼道里，有人占了别人的车位，有人装了个大音响半夜放歌。谁都想管别人，谁都怕先吃亏。吵到最后，全体业主开会，大家把一部分权利交出去——同意每个月交钱，同意某个人或某家公司说了算——请一家新物业来管。霍布斯问的就是这件事：没人管的时候会乱成什么样，以及人们为什么会、也应该同意被管。

◆ 硬塞上轴：霍布斯

现在做对照实验：把霍布斯硬塞到"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上，会得到什么？会得到一个看上去不错的结果。霍布斯确实讨论过"正义是什么"。他在《利维

坦》里说，正义就是遵守已经订立的契约；在没有契约、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他还很重视定义，说词语对聪明人来说是计数用的筹码，对愚人来说却是当真的钱币。照这样看，我们可以写一句：在霍布斯那里，正义的答案住进了契约和主权者的命令之中。

这句话不算错，可它几乎把霍布斯的一切要紧之处都漏掉了。它没有说出他的恐惧，没有说出内战的血，没有说出他为什么觉得"人天生合群"是一个危险的谎言，也没有说出他要解决的是"怎样活下去"，而不是"怎样给正义下定义"。在轴上，他只是一个点，"契约"这个点；可在他自己的问法里，正义的定义只是一块垫脚石，他真正要搭的，是一座能让人不再互相杀戮的桥。这就是硬塞的代价：得到一个半真的结论，同时错过了这个人。

◆ 加缪：没有答案时怎么活

阿尔贝·加缪（1913—1960）生在当时属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他还不满一岁时，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中阵亡。他在阿尔及尔的贫民区长大，母亲是一个几乎不识字、耳朵又不好的清洁工。他靠奖学金读书，年轻时得了肺结核，这断送了他做中学教师的路，也让他一辈子与疾病为伴。

先跟问法。1942 年，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他出版了一本随笔《西西弗神话》。书一开头，他就把问题摆得极其尖锐，大意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其余的问题，世界有几个维度、心灵有几种范畴，都在其次。他认什么算回答？不是一套关于世界本质的学说，而是一种能让人在清醒中继续活下去的态度。他把人的处境称为"荒诞"。荒诞不在人身上，也不在世界身上，而在两者的相遇之中：人渴望理解，渴望意义，渴望一个答案；世界却沉默不语，不回应人的这种渴望。

再找前置矛盾。加缪顶撞的东西，耐人寻味地，恰好是本书那根轴上的几个落脚点。他年轻时在阿尔及尔大学写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正是普罗提诺与奥古斯

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第15章讲过的那段"答案收进上帝心中"的历史。他熟悉这条路，却不肯走：在他看来，把意义交给一个超越的上帝，是用一个世界之外的答案，来回避世界之内的沉默。他同样不满意当时的一些存在哲学家：他们先是直面了荒诞，最后却总要纵身一跳，跳进某种超越的东西里去，他把这称为"哲学上的自杀"。后来在 1951 年的《反抗者》里，他又把矛头指向那些把意义和正义交给历史、以"历史的必然"为名为暴力辩护的思想，这使他和老朋友萨特在 1952 年公开决裂。

答案落在哪里？加缪的回答是：不落在任何地方，至少不落在一个能让人一劳永逸的地方。可是他并不因此主张放弃，而是主张在清醒中继续：既不靠一个虚假的答案来安慰自己，也不以自我毁灭来逃避，而是带着这份清醒去反抗、去爱、去尽情地活。他用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作为这种态度的形象：众神罚他推一块巨石上山，石头一到山顶就会滚下来，他永远推不完。加缪在书的最后写道：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再追回写。加缪的作品在二战后的法国乃至整个世界影响极大，1957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让"荒诞"这个词走出了哲学，进入了文学、戏剧和普通人的日常语言。

再查反向师承。后世的加缪，最常见的一个形象是"存在主义者"，和萨特并列。可他本人多次拒绝这个标签。他还被讲成一个道德楷模，也被讲成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问题上立场暧昧的人；他对殖民地问题的态度，至今仍有很多争论。哪一个是他？按第12章的工序，要分开记账。

最后看回绕。加缪身上有一个很美的回绕：回到希腊。他用希腊神话来讲现代人的处境，在《反抗者》的结尾，又呼唤一种他称为"正午思想"的地中海式的尺度感：承认界限，拒绝过度，拒绝任何以绝对之名吞噬一切的东西。用三个问题问：回到的是希腊人对"界限"和"分寸"的感受；逼它回来的，是二十世纪以历

史和意识形态之名进行的大规模暴力；回来以后，它改写了战后许多人思考反抗与政治的方式。

大白话说，一个人在医院里拿到了一张诊断书，医生告诉他：这个病没有根治的办法，也说不清为什么偏偏是你。他面前有几条路：去求一个说"其实这病有深意"的人，让自己好受一点；或者干脆放弃。还有第三条路：不骗自己，也不放弃，每天照样去楼下的小公园晒太阳，和老伙计下棋，认真地过每一天。加缪问的就是：第三条路走得通吗？凭什么走？

◆ 硬塞上轴：加缪

把加缪硬塞到轴上，会得到什么？会得到一个很容易让人误会的结果。我们可能写：在加缪那里，答案无处可住，世界是沉默的。这看上去很像苏格拉底的悬空，又很像德里达的"永远在路上"。于是加缪似乎落在了轴的两端交接的地方。

可这完全搞错了他的重心。苏格拉底的悬空，是一个追问没有落地；德里达的悬空，是意义在语言里不断推迟（第20章已谈）。加缪关心的根本不是"意义住在哪里"这个认识上的问题，而是"知道了意义无处可住以后，人怎么办"这个生活上的问题。在轴上，他只是一个空位；在他自己的问法里，那个空位恰恰是他出发的地方，而不是他到达的地方。他的全部力量，都用在了轴根本不问的那一段：从空位出发，怎样活。这一次，硬塞的代价更大：它不只是漏掉了要紧之处，还把他放错了位置，让他看上去和几个跟他毫不相干的人站在了一起。

◆ 罗尔斯：蛋糕怎么切才公道

约翰·罗尔斯（1921—2002）是美国哲学家，二战时作为步兵在太平洋战场服役，后来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1971 年，他出版了《正义论》，被许多人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也让沉寂多年的政治哲学重新热闹起来。

先跟问法。罗尔斯问的是：一个由自由、平等的人组成的社会，它的基本结构——宪法、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应当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安排，才算公平？说得通俗一点：一个社会的好处和负担，应当怎样分配？他认什么算回答？不是"正义是什么"的一个定义，而是一组原则，以及一个能说明为什么这组原则是合理的程序。

他在《正义论》里举过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一群人分一块蛋糕，怎样分才公道？假定平均分是公平的，那么有一个简单的程序能保证结果公平：让切蛋糕的人最后一个拿。他为了自己不吃亏，自然会切得一样大。罗尔斯的思路，就是要为整个社会找到类似的程序。

再找前置矛盾。罗尔斯顶撞的厚土，是当时在英语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一个社会的安排好不好，看它能不能带来最大的总体幸福。罗尔斯认为，这种看法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只要总量够大，它原则上可以容许牺牲少数人的基本利益。他悄悄借用的，则是霍布斯开出、洛克、卢梭、康德接续的社会契约传统。他在书的序言里说，他要做的，是把这个传统加以概括，提升到更抽象的层次。他也说过，霍布斯的《利维坦》会带来一些特殊的问题，所以他主要依据的是洛克、卢梭和康德。

答案落在哪里？罗尔斯设想了一个"原初状态"：人们聚在一起，为将来的社会挑选正义原则，但每个人都被一层"无知之幕"遮住，不知道自己将来会生在富人家还是穷人家，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性别、信仰。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人会选出什么样的原则？罗尔斯认为，他们会选出两条：第一，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整套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第二，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只有在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平机会之下，并且对社会中处境最差的人最有利时，才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第一条优先于第二条。

他还提出了一种检验这些原则的方法，称为"反思的平衡"：拿原则去对照我们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判断，比如"奴隶制是不公正的"；两边对不上时，有时调整原则，有时调整判断，来回往复，直到两边大致相合。

再追回写。1956 年，英国学者拉斯莱特还在一本政治哲学文集的导言里说，政治哲学"至少眼下"已经死了；十五年后《正义论》出版，几乎重新塑造了整个领域：此后几十年里，讨论正义的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很难不从罗尔斯谈起，"无知之幕"也从学术术语走进了报纸和课堂。

再查反向师承。后世的罗尔斯也被讲成了几个样子：在有些人那里，他主要是一位强调平等、为福利国家辩护的思想家；在另一些人那里，他首先是一位把基本自由放在最优先位置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哈佛同事诺齐克在 1974 年出版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从个人权利出发，猛烈地批评他的分配原则；八十年代以后，又有一批被称为"社群主义者"的学者批评他所设想的那个"被无知之幕遮住的自我"太单薄，脱离了人的共同体和传统——第14章提到的麦金太尔，就是其中一位。罗尔斯本人也在不断修正自己，1993 年的《政治自由主义》，把他的理论收窄为一种只针对政治领域的构想，不再依赖任何一种关于人生意义的整全学说。

最后看回绕。罗尔斯本身就是一次回绕：在功利主义占上风二百年之后，他回到了社会契约。用三个问题问：回到的是"人们在一种设想的初始状态中立约"这个旧位置；逼它回来的，是功利主义在保护个人权利上的漏洞，以及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民权运动等现实中关于平等的激烈争论；回来以后，它改写了整个政治哲学的版图。而且，这次回来的契约，已经不是霍布斯那种怕死的人为了活命订立的契约，而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用来检验原则是否公平的思想实验。形状是旧的，面料全换了。

大白话说，一个大家庭要分家产。有人主张谁出力多谁分得多，有人主张谁困难谁多分点，吵个不停。家里一位明白的长辈出了个主意：先把每一份怎么分

的规矩定下来，再抽签决定谁拿哪一份——你不知道自己会抽到哪一份，所以你会希望最差的那一份也不至于太差。罗尔斯问的，就是这样一个"先定规矩、后抽签"的办法，放到整个社会上，会定出什么样的规矩。

◆ 硬塞上轴：罗尔斯

把罗尔斯硬塞到轴上，会得到什么？可能写成：在罗尔斯那里，正义的答案住进了原初状态的选择程序之中。这比前两位的结果好一些，因为罗尔斯确实在回答"正义"的问题，而且他确实把答案放进了一个程序里，而不是放进一个彼岸或一个本质里。可是，这句话仍然会误导。罗尔斯关心的不是"正义"这个词的意思住在哪里，而是一个具体社会的制度应当怎样安排；他的原初状态，是一个用来检验原则的装置，不是"正义本身"的住址。他的方法是"反思的平衡"，在原则和具体判断之间来回调整，这甚至有点接近维特根斯坦那种从具体使用出发的思路，而不是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落脚点。把他放到轴上，他就被讲成了柏拉图问题的又一个答案；可他自己会说，他根本不想回答柏拉图的问题，他在《政治自由主义》里正是有意地避开这类形而上的问题。

◆ 轴套不上，引擎照转

三次对照做完，要问深一层：轴套不上他们，本书一路用的发生引擎——123原理那个"差异与土壤顶出矛盾、逼出显露、显露再回写"的循环——还转不转？转。霍布斯这一轮，差异序列是他从几何学学来的推法，从定义出发，人、欲望、恐惧，一条条往下推；土壤是内战的血、国王议会与各派教会各称最高权威的乱局、大学里讲人天生合群的亚里士多德。推法要一个确定的出发点和确定的结论，土壤给的却是谁都有理、谁也压不住谁，矛盾逼出的显露，是一个用契约造出来的主权者。加缪这一轮，差异序列是一种不肯跳跃的清醒推理，每走一步都查一查是不是偷借了世界之外的保证；土壤是战争、占领，以及现成的两种安顿，交给上帝或交给历史。推理不许跳，土壤处处在跳，逼出的显露是"荒

诞"与"反抗"。罗尔斯这一轮最直观：反思的平衡本身就是一串比较、试探、修正、收敛的差异序列；撞上功利主义的厚土和民权年代的现实争吵，逼出两条原则；1993 年的自我修正，正是新显露回写之后，差异序列被重置、又跑了一圈。

三台引擎都转了，转出来的却是秩序的造法、活法、分法，没有一样是"答案的住址"。这就说清了轴和引擎的关系："答案住在哪里"只是引擎在"X 是什么"这类问题上转出来的那一种显露的形状，引擎比轴更底层。同一台柴油机，装上卡车拉货，装上拖拉机犁地，装上渔船出海，转法一样，干出的活各不相同。也要防反向的错：别把三人分进三个格子，说霍布斯管土壤、加缪管差异、罗尔斯管显露。三大方程说的是三样东西在每个人身上同时互生，F、G、H 只是占位记号；三样人人都有，只是缠法不同。我们解他们，仍按 D→S→E 起手；教科书讲罗尔斯多从两条原则讲起，走的是 S→D→E，便于学会体系，却容易看不见他和霍布斯、和功利主义之间的缠绕。

◆ 三个人也缠在一起

把三个人放在一章里，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们彼此之间也缠在一起，而且缠的方式，正好说明了五个动作为什么比那根轴更耐用。霍布斯和罗尔斯之间，隔着三百多年，却同在一条社会契约的线上：霍布斯开了头，罗尔斯在线的另一端，一边借用这个思路，一边特意把霍布斯本人放在一旁。加缪和那根轴上的好几位缠在一起：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奥古斯丁，他的《反抗者》顶撞的是把答案交给历史的思想，而那种思想的源头之一，正是第18章的黑格尔。罗尔斯和第14章的麦金太尔也缠在一起：一个回到契约，一个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两个回绕撞在了一起。这些缠绕，用那根轴是看不见的，因为轴只问"答案住在哪里"；用五个动作却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前置矛盾、反向师承、回绕，本来就是用来看缠绕的。

◆ 隔着书的缠绕，和当着面的缠绕

第2章和第12章都提到过，希腊三哲之间的缠绕是当面的，后世的缠绕大多是隔代的、经过文本的。这一章的三位，正好让我们把这个区别看得更细一些。他们和三百年、两千年前的人之间，确实是隔着书的缠绕。霍布斯通过他亲手翻译的修昔底德、通过大学课本里的亚里士多德与古人相缠；罗尔斯通过洛克、卢梭、康德的著作与契约传统相缠；加缪通过他论文里研究过的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与"上帝心中"那个落脚点相缠。隔着书的缠绕有几个特点：对方不能回嘴；我们读到的对方，已经经过了编者、译者、注释者和课本的层层讲述（第12章已谈）；而且，缠绕的一方可以挑选，只拿起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罗尔斯可以说"我主要依据洛克、卢梭、康德"，把霍布斯放在一旁，霍布斯不能抗议。

可是，他们和同时代人之间，又一次出现了当面的缠绕。霍布斯在巴黎流亡时，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梅森神父，读到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手稿，写下了一组反驳意见，笛卡尔逐条作了答复，两人的书信往来火药味很浓。加缪和萨特是多年的朋友，在同一家咖啡馆、同一份报纸、同一场抵抗运动里缠在一起，最后在一场公开的笔战中决裂。罗尔斯和诺齐克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里共事，诺齐克的书正是对着罗尔斯写的。

当面的缠绕和隔着书的缠绕，机制不同。当面的缠绕快，你来我往，彼此都能当场修正、当场反击，常常还掺着私人的情谊和恩怨，第11章提醒过，恩怨可以作材料，但不能代替矛盾。隔着书的缠绕慢，单向，经过的手多，被挑选的余地大，可它能跨越几百上千年，把相隔很远的人缠在一起。一位思想者身上，往往两种缠绕同时都有：他一边隔着书和古人相缠，一边当着面和同代人相缠。看他，两条线都要看。

大白话说，一个年轻厨师的手艺，一半来自他每天在后厨跟着的师傅，师傅骂他、教他、当场纠正他；另一半来自他翻烂了的几本老菜谱，那些菜谱的作者

早就不在了，他只能凭自己的理解去琢磨，还专挑自己喜欢的那几页看。两种学法都塑造了他，但塑造的方式完全不同。

◆ 五个动作会不会也是一副模具

最强的反驳也该摆上桌了：五个动作同样是从三哲身上提炼的，凭什么它是方法、轴是模具？这个反驳有一半是对的。五个动作带着出生地的印记："找前置矛盾"默认有可顶撞的前人，"看回绕"默认身后有足够长的时间。用在这三位身上已有两处吃紧：加缪最大的对手很大一部分不是哪本书，而是战争和占领，好在本书说的土壤从来不只是前人学说，事件、制度、身体都缠在里面，动作不必改，取材要放宽；罗尔斯去世才二十多年，回写和反向师承还在发生，"看回绕"只能先记一笔开着的账。另一半不对：轴给的是结论的形状，套上去之前结果已定；五个动作给的是要查的问题，查出什么事先不知道。它算不算方法，要看能不能查出生平简介里没有的东西——罗尔斯特意把霍布斯放在一旁，加缪的毕业论文正好写在"上帝心中"那一段，这类缠绕简介通常不写；第 23 章会把"做不出简介之外的发现"列为本书的失效条件。问诊流程是在成年人身上磨出来的，看婴儿时问不了主诉，只能问家长、听哭声、量体温；流程没作废，只是每一步重新落地。

◆ 方法与模具

现在可以把这一章收拢，也给第四编收个尾。这一章做了一个对照实验。对霍布斯、加缪、罗尔斯三位，五个动作——跟问法、找前置矛盾、查反向师承、追回写、看回绕——全都用得上，而且每一个动作都帮我们看见了一些要紧的东西：霍布斯的恐惧和他对亚里士多德的顶撞，加缪对"上帝心中"和"历史之中"两个落脚点的拒绝，罗尔斯对契约传统的回绕。可是"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用在他们身上，最好的情况是得到一句半真的话（霍布斯），最坏的情况是把人放错

了位置（加缪），中间的情况是让人误会他想回答一个他有意避开的问题（罗尔斯）。

这就是方法与模具的分界。方法，是从一次完整的发生里提炼出来、能带到别处去用的看法：从三哲身上，我们提炼出了五个动作。模具，是从那一次发生里得出的具体结论：三哲留下的问题恰好是"X 是什么"，所以有了那根轴。方法可以迁移，模具不行。把模具当方法用，就像那个拿着咳嗽病人的结论去问失眠病人"您咳了多久"的学生。

第四编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拿五个动作走了两千年：答案从上帝心中，到我思，到认识的条件，到历史，到用法，到永远在路上；最后又看到，有些人根本不在这根轴上，而五个动作对他们照样管用。

接下来是最后一编。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回到从前"的圈究竟是怎样画出来的；要老老实实地说清楚，本书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最后，还要把这道问了两千五百年的题，交到今天每一个普通人的手里——在一个随时可以问机器"火候是什么"的时代，答案又住在哪里？

带走的话

流程可以带走，药方不能带走；方法能迁移，模具不能。

本章判错句

如果"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对霍布斯、加缪、罗尔斯同样好用而不失真，本章划的方法与模具之分就不成立。

想一想

你从一件成功的事里学到的，是流程，还是药方？

你有没有把上一次的答案，硬套在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上？

◆



第　五　编

新缺口：轮到我们

导　语

一盏灯照了两千年，最后要照回点灯的人自己。

这一编做三件事。第 22 章回头看那些"回到从前"的圈：学园转向怀疑，普罗提诺回到柏拉图，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带回中世纪，文艺复兴的两根手指，德里达与苏格拉底隔空相望——拿三个问题去分辨回绕、倒退与打转，看回绕为什么是这台引擎没有预定终点的证据。第 23 章把这本书放上被告席，写明它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并列出全书史实、阐释与传说的总账。第 24 章把老问题交给今天：当我们去问机器"火候是什么"，答案又住在哪里？

这一编不给定论，只把问题交还给读者。每一代人都得重新回答，答案住在哪里。

22

第 22 章

回绕不是倒退

这一章的问题

两千年里画出的那些"回到从前"的圈，说明了什么？

◆ 柏拉图的学园，为什么教起了"什么都不知道"

先说一件怪事。柏拉图在雅典城外建了学园，在那里把老师留下的悬空问题搬到彼岸，立起了理念论（第6章）。按常理推想，这座学园应当世世代代守着理念论，越讲越细，越讲越牢。可是柏拉图去世大约八十年后，接掌学园的阿尔克西劳却带着整座学园转了向：他不再传授理念，而是教人对一切判断"悬置"——不肯定，也不否定，先把话停在半空。

更怪的是，他给这次转向找的靠山，正是苏格拉底。据西塞罗在《学园派》里的转述，阿尔克西劳认为没有什么是可以确知的，甚至连苏格拉底给自己留下的那一点——"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也不肯认作确知。这等于说：柏拉图从老师那里出发，走了一辈子，才把答案搬到彼岸；八十年后，他亲手建的学校又把答案搬回半空，而且悬得比苏格拉底还彻底。

教科书遇到这类事，常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这是"退步"：好好的体系不要了，回到了原点。另一种说这是"插曲"：怀疑派只是主流之外的一段旁支，不影响大局。我们觉得两种说法都把它看轻了。如果它是退步，就得解释一座拥有图书、制度、师承和声望的学校，为什么会主动往回"退"；如果它是插曲，就得解释它为什么在学园里一持续就是一百多年。

我们的说法是：这是一次回绕，而回绕不是倒退。这一章要做的，是把三哲之后两千年里画出的几个圈摊开来看——学园转向怀疑派，普罗提诺越过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请回中世纪，文艺复兴重新捧出柏拉图，德里达在二十世纪隔空呼应苏格拉底——看清每一圈回到了什么，又换掉了什么。看清了，第3章对"上升叙事"提出的那个质疑，才算在史料上落了地。

◆ 拿第14章的尺子，量两千年的圈

回绕、倒退、打转这三件事怎样分，第14章已经用女儿衣柜里那条喇叭裤分清楚了，并且留下了三个问题：回到的是哪个旧位置？逼它回来的，是当时的什么矛盾？回来之后，它又改写了什么？这里不再重讲，只把这把尺子从一条裤子、一个学园，拿到两千年的尺度上去量。

先拿一栋老房子试一下手。一家人住了四十年的老屋，九十年代改过一回：拆掉堂屋和厢房之间的墙，做成一个大客厅，时髦了二十年。到了儿子这一辈重新装修，他把那堵墙又砌了回去，格局几乎回到爷爷那时的样子——堂屋是堂屋，厢房是厢房。可墙里的电线、水管全换了新的，地暖和网线也走好了。三问一问：回到的是爷爷那时的格局；逼它回来的，是家里添了老人和孩子，大开间太吵；回来以后，老人午睡有了安静的房间，孩子写作业不再被电视打扰。三问都答得出，这是回绕。

放到两千年的尺度上，这三个问题各自要多问一层。第一问，"回到的旧位置"不能只看口号，要对着两边的原文看他回到的是哪一个点——普罗提诺自称只在解释柏拉图，回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第二问，"逼它回来的矛盾"要特别提防一个替身：书恰好到了。隔着几百年，一个旧位置能不能回来，首先要看它的文本有没有传下来、有没有被译出来，这一层属于第2章所说的"特征纠缠网络"，也就是一个人思考时脚下踩着的全部既有东西：书、对手、机构、语言。书到了，只是让回绕成为可能；接收的人当时卡在什么矛盾上，才决定它会不会

真的发生。第三问，"回来以后改写了什么"，要拿课程、注释、论证习惯去观察，不能拿"影响深远"四个字去宣布。下面每一个圈，我们都这样问。

◆ 第一个圈：学园里的悬置与回摆

先回到阿尔克西劳。他回到的旧位置，是苏格拉底的半空：问而不答，止于无解。柏拉图早期对话里那些不了了之的结尾——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虔敬，谈到最后谁也没给出站得住的定义——成了他手里现成的材料。在他看来，自己不是背叛柏拉图，而是回到那个爱问而不下结论的柏拉图。

逼他回来的矛盾是什么？要看他在顶撞谁。阿尔克西劳那个时代，雅典声势最盛的新学派是斯多亚派。斯多亚派的创始人芝诺主张，有一种印象清楚到不可能出错，人可以凭它把握真理——这种印象后来被称为"把握性印象"，是斯多亚派给"知识"安放的基石。阿尔克西劳的全部功夫，几乎都花在攻这块基石上。学园派常举的例子，西塞罗记下了不少：一对双胞胎，两枚一模一样的鸡蛋，梦里和醒着时一样鲜明的景象。如果一真一假两个印象可以分辨不出，那就没有哪一个印象能单凭自己担保自己为真。

这次回绕和苏格拉底不同在哪？苏格拉底在街头面对的，是一群熟练使用美德词、却说不清它们的普通雅典人；阿尔克西劳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把"知识的标准"做成体系的学派。苏格拉底的无解，是"我们还没找到"；阿尔克西劳的悬置，是"凡宣称找到了的，我都能指给你看它站不住"。前者像刚进厨房的学徒，问遍了师傅也问不出火候是什么；后者像一位挑剔的品鉴员，专门拆穿那些号称"掌握了标准火候"的连锁菜谱。格局回到了半空，土壤和手段全换了。

回来之后，它改写了什么？学园从此有了一套延续很久的论辩功夫：就一个问题正反两面都说，让两边势均力敌，然后不下判断。这套功夫在后来的卡尔涅阿德斯手里发展得更细，又借西塞罗的拉丁文著作传到后世——西塞罗本人就自

认属于学园这一脉。怀疑派不但没让学园消失，反倒让它在罗马人那里留下了最长的一道影子。

但这个圈还没画完。到了公元前1世纪初，学园里出了一位安提奥库斯，他又反了回来，主张怀疑派背离了老学园，真正的柏拉图传统是有学说、有定论的，而且这套学说与亚里士多德一派、斯多亚派在要紧处大体一致。答案又从半空被拉回"有处可住"。

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只钟摆：彼岸，半空，再回到有定论。每一次摆动都由当时的对手逼出——阿尔克西劳顶撞斯多亚派的独断，安提奥库斯又顶撞学园自己的悬置。如果哲学史真是一部朝着终点上升的历史，这座学园两三百年里的来回摆动就很难解释；而用"上一轮的亏缺成了下一轮的矛盾"去看，它就顺了：悬置治好了独断的病，又留下"那我们靠什么生活、靠什么行动"的亏缺——一个对什么都不下判断的人，早上起来连该不该出门都定不下来——这个亏缺，正是下一次回摆的入口。

这里要说明一句：史料能证明的，是学园先转向怀疑、后又转回有定论这条线索；把它看成钟摆，看成亏缺逼出回摆，是本书的读法，不是史料本身。

◆ 第二个圈：彼岸回来了，物中也回来了

第二个圈更大，跨度一千多年。公元3世纪，普罗提诺在罗马讲学。他把世界讲成层层流溢而出的等级：最高处是不可言说的"太一"，其下是"理智"，再下是"灵魂"，最后才是我们摸得着的物质世界。柏拉图的理念，在他这里住进了"理智"之中。我们今天称他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开创者，但这个名称是近代学者加上去的；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在解释柏拉图。

这一次，回到的旧位置是彼岸。中间那位把答案搬回物中的亚里士多德，被跳过去了吗？没有被跳过，是被吃了进去。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替老师整理遗

稿，编成六组、每组九篇的《九章集》，又写了一篇老师的生平。据这篇生平说，老师的著作里暗暗掺着斯多亚派和逍遥学派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尤其浓缩在其中。普罗提诺回到柏拉图的时候，手里拿着亚里士多德磨出来的工具。格局是彼岸，电线是亚里士多德的。

逼他回到彼岸的，又是什么矛盾？普罗提诺生活的3世纪，罗马帝国内外交困，各路宗教与救赎学说竞相流行。《九章集》里有一篇专门反驳诺斯替派的文章：那些人主张这个可见世界是一个低劣的造物者造出来的，是该逃离的牢笼。普罗提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他要守住的是两头：真正的答案确实在上面，在不变的理智里；可这个可见世界并不是牢笼，而是从上面流溢下来的、带着那份光的一层。这就像一家老字号，有人说"现在的分店全是骗人的，只有祖店才是真的"，普罗提诺的回答是：祖店当然是源头，可每家分店里都有从祖店一路传下来的那口老汤，只是越往下越淡。回到彼岸，是为了替此岸辩护——这和柏拉图当年为了让老师的追问有处落脚而搬去彼岸，起因已经完全不同。

这里还有一层值得多看一眼。我们今天读到的普罗提诺，是波菲利编出来的普罗提诺——篇章怎样分组、按什么次序排列，都出自学生之手。第8章讲过"学生生成老师"在三哲身上的样子，同一个机制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

波菲利自己还做了一件影响更深远的事。他给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写过一本入门小书，开头就提出三个问题：种和属——比如"人""动物"——是实际存在的，还是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如果存在，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是与可感事物分离，还是就在可感事物之中？问完，他说这些问题太深，不适合在入门书里讨论，就搁下了。

请把这三个问题和本书那根轴放在一起看。"种和属住在哪里"，不正是"答案住在哪里"吗？分离，是柏拉图的彼岸；在可感事物之中，是亚里士多德的物中；只在思想里，则预告了很久以后把答案搬进"我"之中的那条路。一个学生在

给入门书写开场白时，把三哲之间的整场纠缠压成三个问句，然后故意不答。这本小书后来被波爱修斯译成拉丁文，成了中世纪学校里人人要读的入门书——中世纪关于"共相"的长期争论，就是从这三个被搁下的问题里长出来的。一次悬置，被下一个时代当成了作业。

中间还隔着奥古斯丁，他把理念收进了神的心智（第15章再详谈）。彼岸有了主人：标准不再贴在墙上，而是收进了总店老板心里。

然后，物中也回来了。12、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大批著作经由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的译本重新进入拉丁世界，一同进来的还有阿威罗伊等人的注释。在拉丁学者口中，阿威罗伊被直接称作"注释家"，亚里士多德则被称作"哲学家"——不带名字，仿佛天下只有这一位。这次回来并不顺利：13世纪初，巴黎曾禁止在课堂上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1277年，巴黎主教又谴责了一大批命题，其中不少与亚里士多德主义有关。

托马斯·阿奎那是这一圈里最要紧的人物。他回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位置：事物的形式就在事物之中，人通过感觉经验，从具体事物里把握普遍的东西。可他没有扔掉奥古斯丁。在《神学大全》第一集专论"理念"的那一题里，他仍然承认，万物的范型以理念的方式存在于神的理智之中。于是答案同时住在两处：物中是事物自己的形式，神那里是造物者心中的样板。

用翻修的话说，阿奎那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老格局，却在墙里铺了一整套基督教神学的管线。逼他这样做的矛盾也很具体：一边是刚涌进来的、讲自然、讲推理、讲经验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以及阿威罗伊一派的某些读法——例如世界是否永恒、人的理智是否只有一个公共的；另一边是教会的信仰和大学的神学课程。两头顶在一起，逼出一种新的显露：理性与信仰各有其所，又能接得上。

回写看得见。阿奎那死后不到半个世纪就被封为圣徒，他的体系后来在天主教教育里占据了极高的位置；亚里士多德也随之从一个被禁止讲授的作者，变成

大学课程的骨架。可第13章讲过的那一面，也在这里埋下了：回写一旦过厚，就会板结。到了伽利略的时代，人们要推倒的那堵墙，正是这一圈砌得太牢的墙。

◆ 打开一个圈：阿奎那身上的三层咬合

三个问题是站在圈外量它的形状。现在打开一个圈，看里面的引擎怎么转。第9章说过，三大方程管"同时"，123原理管"回合"，六路径管"入口"。阿奎那这一圈材料最足，正好走一遍。

先看回合。阿奎那的追问是怎样推进的？翻开《神学大全》，每一条都是同一个走法：先以"看来……"列出几条反方意见，再引一句"但是相反"的权威说法，然后是"我回答说"，最后回头把开头那几条反方意见逐一答复。这是中世纪大学"争辩"课的格式写进了书。比较、试探、修正、收敛全在其中——这就是他的差异序列。它撞上的土壤，是刚涌进来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与阿威罗伊的注释，是奥古斯丁传下来的神学传统，是巴黎大学里艺学院与神学院的分工，还有教会对"世界是否永恒"这类命题的警觉。追问推不下去、土壤也让不开，逼出的显露是：形式在物中，范型在神的理智中；理性管得到的归理性，管不到的交给启示，两边接得上。回写先是负向的。阿奎那1274年去世，三年后那份1277年的谴责清单，被不少学者认为有几条触及他的立场；可到了1323年他被封为圣徒，1325年巴黎主教又宣布，那份谴责凡涉及托马斯学说之处，一律撤销。回写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来回拉扯了半个世纪才落定。

再看同时。别把这个回合读成"先有土壤，再有追问，最后出答案"。在13世纪的巴黎，三样东西是一起长的：争辩的格式决定了答案只能长成"区分"的样子——每一条反方意见都得被接住，于是答案天然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在那个意义上不是"；这些区分一写下，又成了别的教师必须对付的东西，改写了课堂的土壤；土壤一变——禁令下来，新译本到了——下一条"看来……"列的反方意见也跟着变。哪一样都不是先站稳了再扶别的。

最后看入口。我们是从他的问法起手的：先看一条一条的推进，再看推出了什么，最后追土壤与回写。教科书常从另一头起手：先告诉你"托马斯主义是理性与信仰的伟大综合"，再讲来源，最后铺时代。这条路给人一张清楚的地图，却容易漏掉那个"综合"的形状，很大程度上是被反方先行、逐条答复的格式压出来的。研究中世纪大学制度的史家，也可以从土壤起手，先查课程表和禁令。入口不同，看见的是同一台引擎的不同侧面，选哪个看手上的任务。

小区里也有这台引擎。一栋老楼商量加装电梯，物业定了规矩：任何方案都要先把反对意见一条条列在前面，再一条条回应。最后通过的方案，天然带着折中的形状——一楼住户有补偿，二楼少出钱，施工避开午休。商量的格式压出了答案的形状；答案定下来，又成了下次商量"改不改造楼道"时默认的规矩。把阿奎那读成三层咬合，是本书的阐释；文体、年份、谴责与撤销，才是史实。

◆ 第三个圈：文艺复兴的两根手指

梵蒂冈有一幅拉斐尔的壁画，通常叫作《雅典学院》，画于1509至1511年间。画面正中走来两个人：左边的老人一根手指指向天上，腋下夹着《蒂迈欧篇》；右边的中年人手掌向下平伸，手里拿着《伦理学》。一般认为，前者是柏拉图，后者是亚里士多德。一根手指指向彼岸，一只手掌按向人间——一千八百多年前学园里的那场缠绕，被画家用两个手势画成了一个时代的徽记。把两个手势读成"彼岸"与"物中"，是后人通行的解读，画家本人没有留下说明；我们借它作图，不把它当证据。

这幅画出现的时候，柏拉图正在回来。15世纪的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费奇诺把柏拉图的全部对话译成拉丁文，1484年刊印。在此之前，拉丁世界能直接读到的柏拉图很有限，经院里当家的是亚里士多德；有了费奇诺的译本，读书人第一次能成套地读柏拉图。至于常被提起的那所"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究竟是一个正式机构，还是一个松散的朋友圈子，学者之间仍有争论。

这一次回来的柏拉图，也带着新电线：一股对数学秩序的热情。到了17世纪，伽利略说，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这句话的骨架很像柏拉图——真正的答案不在眼前杂乱的现象里，而在背后可以计算的形式中。可它的用法完全不是柏拉图式的：伽利略的"形式"要拿斜面、摆和望远镜去试，试不出来就作废。他借一个回到柏拉图的姿态，去撬动在经院里板结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这场冲突第13章详谈，答案随后怎样住进"我思"，第16章再讲）。这一圈让人看到回绕的另一种用处：它不只是重复，而是借一个旧位置去撬开一块新板结。翻修时把老墙砌回去，有时恰恰是为了拆掉九十年代那面做坏了的吊顶。

同一个世纪里，回来的还不止彼岸。半空也回来了：16世纪，古代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蒙田在随笔里一遍遍问"我知道什么"（第16章已谈）。阿尔克西劳那套"正反两面都说、然后不下判断"的功夫，借这批译本重新上了桌。逼它回来的，是宗教改革之后各执一词、谁也判不了谁的局面；它回来以后被拿去做的事，又出人意料——笛卡尔把怀疑推到极处，不是为了停在半空，而是为了在半空的尽头找到一块再也怀疑不动的地基，把答案安进"我思"。悬空在这里成了一根撬棍，撬开的是一个新的落脚点。像把老屋的墙全拆光，不是为了住废墟，是为了看清哪根柱子真正承重。

◆ 学园这块招牌：回绕靠什么熬过断档

前面三个圈画完，有一个常被跳过的问题该补上了：一个旧位置隔了几百年还能回来，它这几百年住在哪里？柏拉图建的那座学园，作为一个连续的机构，并没有一直开下去。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罗马将领苏拉围攻雅典，学园所在的林地遭到破坏；学园派当时的主持人斐洛已先一步离开雅典去了罗马。此后雅典仍有人讲柏拉图，5世纪还有普罗克洛这样的新柏拉图主义名家授课，但那已不是当年那座机构一脉相传的学校。传统上说，529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禁

止异教徒在雅典教授哲学，这所学校随之关门；禁令的确切内容和效力史家仍有争论，我们只当它是大致的时间标记。

房子没了，招牌摘了，柏拉图靠什么熬过断档？靠抄本，靠注释，靠别人家的课程。他的部分对话在拉丁世界只剩下零星的译本，比如《蒂迈欧篇》的一部分；他的许多想法，是借奥古斯丁的书、借波爱修斯的书、借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转述，换了一身衣服活下来的。这一点很要紧：回绕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旧位置原样摆着等人回来，而是因为它被拆成零件，散在别人的房子里；想回去的人，先得把零件找出来拼回去。

有意思的是，等到柏拉图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回来时，那个围在费奇诺身边的圈子，被称作"学园"。不管它是不是一个正式机构（前面说过，学界对此仍有争论），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次回绕——一个摘下来一千年的招牌又被挂了回去，挂在一群拿着新译本、新资助、新口味的人门口。第14章说过"旧词新用"是回绕的一个信号；这里，连门牌都回来了，门里的人和他们读的书却全换了。

街坊里也有这样的事。一家老字号饭馆早年关了张，房子也拆了，几样招牌菜的做法散落在当年几个伙计各自开的小馆子里，有的还被改过。几十年后，老掌柜的孙子要重开老字号，得一家家去找伙计的后人，尝菜、问做法，把散了的东西拼回来。重开那天挂的还是老招牌，菜单却是拼出来、又按今天的口味调过的。这种"重开"，正是回绕的常态：没有一条不断的线，只有散落的零件和一个被新矛盾逼着去拼它们的人。

◆ 最大的圈：德里达与苏格拉底隔空相望

再往后，答案又搬了好几次家：住进"我思"，住进认识的条件，住进历史，住进用法（第16至19章）。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德里达用"延异"这个自造的词说：意义总是在差异中被推迟——一个词的意思要靠别的词来确定，别的词又要靠更多的词，像查字典一样，永远查不到底（第20章再详谈）。答案再一次悬

空。这是全书那根轴首尾相接的地方：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让答案悬在半空，德里达在书页之间让答案永远在路上。

这次回绕有一个格外具体的接口：德里达1968年的长文《柏拉图的药》，细读的正是《斐德若篇》里苏格拉底批评文字的那一段，抓住"药"这个希腊词既指良药又指毒药的两可（第20章已细读，这里不重复）。拿三个问题来问这一圈。回到的旧位置，是苏格拉底悬空里的一个点：每个看似到手的定义，再多问一步就松动。逼它回来的矛盾，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界的两股强势：一边是结构主义，相信意义可以由一套差异系统稳稳托住；一边是现象学，相信意义可以在意识里直接到场——德里达1967年的《声音与现象》，对付的就是后者。回来以后改写了什么？"解构"一词走出哲学系，进了文学研究、法学和建筑评论，许多人读文本的习惯从"找出它的中心意思"变成了"看它在哪里自己拆自己的台"。三问都答得出。

苏格拉底不信任文字，德里达不信任"活的话语比文字更可靠"这个假定。两人回到同一个半空，脚下的土壤却天差地别：一边是城邦的口头论辩，一边是二十世纪的语言学、现象学和大学里成熟的文本研究。

我们要公正地看这一圈。不能把德里达说成"只破不立"，这种整体贬评站不住。他抓住的，恰恰是苏格拉底诘问里那股不肯停下的差异推进：每一个看似到手的定义，再多问一步就松动。他回到半空，不是回到"什么都没有"，而是指出：一切"住下来"的答案，地基里都还埋着没结算完的差异。这一点，正是本书一路在讲的——三哲的每一次落脚，都在下一轮被翻出了亏缺。他留下的任务也很清楚：暂时的、受约束的理解，究竟怎样在不断推迟中形成？这个问题，他打开了，后人还在答。

◆ 拿三句话去查一次"回到从前"

上面几个圈，都是拿同样三句话问出来的：回到哪个旧位置，被什么矛盾逼回，回来后改写了什么。这三句话不只适用于哲学史，也可以拿来查身边任何一次"又回去了"。

举一个职场里常见的例子。一家公司十年前学互联网大厂，砍掉中层，搞扁平化，人人直接向老板汇报，口号是"小团队、快决策"。头几年确实快。后来人多了，老板一天要回两百条消息，决定越来越慢，小团队之间互相踩线也没人裁决。于是公司又设回了部门经理，一层一层，看上去回到了十年前的科层制。

这是倒退吗？拿三句话问一下。回到的旧位置：有中间层的组织。逼它回来的矛盾：扁平结构撞上了规模——两百人的沟通量，一个人的脑子接不住。回来之后改写了什么？这一次的部门经理，手里有十年前没有的东西：共享文档、项目看板、随时可查的数据。他不再是层层传话的"二传手"，而是替一个小团队拿主意、并对结果负责的人；考核他的标准，也从"管住多少人"换成了"带出多少能独立做决定的人"。三句都答得出来——这是回绕。

如果答不出来呢？假如设回经理的理由只是"老板觉得以前那样踏实"，经理的职责、工具、考核和十年前一模一样，那就是倒退。假如这家公司每隔三年就在扁平与科层之间来回切换一次，每次的理由和结果都一样，什么也没留下，那就是打转。

哲学史上的回绕也要这样逐一去查，不能看见"又回到柏拉图了"就一律叫好。阿奎那回到亚里士多德，三句都答得出；可后世有些学派只是把阿奎那的结论一代代背下去，不再被任何新矛盾逼迫，也不改写任何东西——那已经不是回绕，而是第13章所说的板结。同一个旧位置，有人住进去是翻修，有人住进去是守灵。

◆ 回绕为什么是非目的论的证据

把这几个圈并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得更硬一点：回绕，是哲学史没有预定终点的证据之一。如果哲学史是一架朝着最终答案爬的楼梯，被超越的台阶就该留在身后。彼岸被物中超越了，就不该再回来；悬空被定义超越了，也不该再回来。可事实是，彼岸回来了不止一次，物中回来了，悬空也回来了。直到今天，每一个旧位置都还有人住着：谈到数学对象，不少数学家会坦然自认是"柏拉图主义者"；生物学家讲器官的功能，说话方式离亚里士多德并不远；把意义交给用法与语境的人，也大有人在。没有哪个位置被一劳永逸地清退。

所以更贴切的比喻，还是第3章用过的那条河，不是楼梯。河会往前流，但它会拐弯，会回流，会在冲出新河道之后又漫回旧河床。每一次漫回去，水已不是原来的水，河床也已被冲刷过。

我们也要给这个判断划出边界，免得它膨胀成一句什么都能解释的口号。第一，不是每一次"回到古人"都是同一台发动机在转。三哲之间的缠绕是当面的：师生同处一座学园，彼此顶撞，互相改写。后世的回绕多半是隔代的，要经过手抄本、译本、注释家和学校课程。亚里士多德回到拉丁世界，离不开译者；柏拉图回到佛罗伦萨，离不开费奇诺。很多回绕的时间点，首先取决于书什么时候到手。我们的主张不是"书一到就必然回绕"，而是：书到了以后，接不接、怎么接、接回来改写什么，要看接收的一方当时卡在什么矛盾上。这一点能不能成立，要逐例去查，第23章会把它列为本书的一条失效条件。

第二，回绕不等于"一切都在转圈，毫无积累"。逻辑的技术、证据的规矩、观察的工具，许多东西是一代代攒下来的。翻修时砌回去的是墙，没有把电线也换回旧的。我们说的回绕，只针对"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上的位置，不针对哲学里的一切。

第三，回绕不是一条可以拿来预言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再过多少年，答案必然回到彼岸"。圈是事后画出来的，它帮我们看清来路，却不能替我们算命。

守住这三条边界，"回绕"才是一个有刃的词：它告诉我们，旧位置的复活不是倒车，而是一次新的发生；它也提醒我们，今天看来已被超越的位置，都可能在某个新矛盾面前重新成为出路。

家里也常是这样。奶奶那辈人讲，孩子要多在外头跑；到了妈妈这一辈，这被说成土办法，一律改上兴趣班；等孙女自己当了妈妈，又把孩子送去野外营地，理由是近视、久坐、注意力不集中——带着体检报告和一堆新名词，回到了奶奶的老规矩。格局回来了，水电全换。

画出这么多圈之后，一个问题自然冒了出来：这些圈，会不会只是我们事后描上去的好看图案？一个能把学园怀疑派、普罗提诺、阿奎那、费奇诺和德里达统统装进去的框架，会不会正因为装得太顺，反而什么也没说？一个解释如果怎样都对，它就一次也没有对过。那么，这本书在什么情况下算错？下一章，我们把自己放上被告席。

带 走 的 话

回绕是这台引擎没有预定终点的证据。

本 章 判 错 句

如果思想史上的回绕都可以被解释为更高一级的进步而不丢东西，回绕就不能作为非目的论的证据。

想 一 想

你的人生里，有没有一次绕回老路，却走出了新意思？

你所在的行当，最近绕回了哪一个老做法？

◆

23

第 23 章

这本书怎样算错

这一章的问题

一本书怎样才算错?

◆ 好医生先说清楚，什么情况说明他看错了

有一类医生让人放心。他看完你的片子，会这样说："我判断是普通的肌肉拉伤。吃三天药，休息一周。如果一周后夜里还疼得睡不着，或者腿开始发麻，那就说明我判断错了，得马上去做核磁。"

另一类医生说话滴水不漏："这个病嘛，可能好，也可能不好；好了说明调理得当，不好说明体质特殊。"他永远不会错，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已经提前解释过了。

我们更信前一位，不是因为他更谦虚，而是因为他把判断交到了事实手里：他说出了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旦出现，他就认输。后一位把话说圆了，代价是那些话什么也没告诉你。

街坊里也有这样一位媒人。她撮合的人家，日子过得好，她说"我早看出两人八字相合"；过不下去了，她说"我早说过两人性子都硬，得互相让着"。她从不看走眼——这恰恰说明她的"眼光"不值钱。

一本讲哲学史的书，很容易变成那位媒人。上一章我们画了好几个圈：学园转向怀疑派，普罗提诺回到柏拉图，阿奎那请回亚里士多德，德里达与苏格拉底隔空相望。这些圈画得越顺，越该警惕：一个能把一切都装进去的框架，可能只

是一只足够大的口袋。我们用的这套解读——显露、差异、纠缠，三轮发生循环，回写与回绕——本身要求"整体的看法增加举证的责任，而不是减轻它"。如果它在任何结果出现之后都能把位置随手换一换、把话重新说圆，它就从来没有接受过检验。

所以这一章，本书自己坐上被告席。我们要做两件事：第一，把全书的主要判断逐条摆出来，说清每一条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第二，把全书用到的材料分成三堆——史实、阐释、传说——让读者知道每一句话的分量。

◆ 三种话，三种分量

先把话分开。本书里出现过的句子，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史实。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受审，被判死刑；亚里士多德17岁进入学园，待到柏拉图去世，大约二十年；他在《形而上学》A卷第9章批评理念对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毫无贡献。这些话有文献可查，读者可以翻原书核对；查出来不对，我们就错了，没有商量。

第二种是阐释。"苏格拉底的新显露只到了可识别，没到可维持、可表达"；"柏拉图把答案搬到了彼岸"；"上一轮的亏缺成了下一轮的矛盾"。这些不是史料里写着的，是本书拿一套眼光去看史料得出的读法。它们不能用"翻一翻原书"来核对，但也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种读法要站得住，得满足两个条件——它和史实不冲突，而且它能说出别的读法说不出的东西。

第三种是传说。"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刻在学园门口；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时说，不让雅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犯罪；他的书稿在地窖里埋了很久。这些话流传很广，但出处晚，或者来源可疑。本书写到它们，都标了"相传"或"据晚出记载"，只拿来点缀，不拿来当证据。

三种话的分量不同，出错的方式也不同。史实错了，是查证不严；阐释错了，是眼光不准；传说被当成史实，是纪律松了。这就像家里讲爷爷的故事：爷爷哪年参军，有档案可查，这是史实；"爷爷那股倔劲儿全传给了你爸"，是家里人的看法；"爷爷年轻时一个人打跑了三个土匪"，是酒桌上越讲越大的传说。三种都可以讲，但不能混着讲——尤其不能拿第三种去证明第二种。下面几节检查的，主要是第二种话：本书的阐释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 第一条：找不到前置矛盾

全书最核心的一个判断是：每一次新的显露——每一次答案搬家——都是被逼出来的。逼它的，是"追问的推进"撞上了"已有的土壤"，两者顶在一起，张力无处可去，才逼出一个新的落脚点。苏格拉底撞上的是雅典人对美德词的熟练使用和民主法庭；柏拉图撞上的是老师之死和巴门尼德"知识对象须不变"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撞上的是在学园里沉淀了二十年的理念论。第11章把这件事做成了五个动作中的第二个：找前置矛盾，看他在顶撞谁。

那么，这个判断怎样算错？很简单：只要在本书讲过的任何一轮里，出现一次新显露，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辨认的前置矛盾——找不到他在顶撞谁、他脚下的土壤和他的追问在哪里打架——这个判断就有了一个反例。

这里有两点要说清楚，免得这条失效条件被悄悄架空。其一，"可以辨认"不能事后凑。如果我们只要找不到矛盾，就去别处再翻一个出来——政治上找不到就找宗教，宗教上找不到就找心理，心理上找不到就说"矛盾太微妙，还没显形"——那这条判断就成了那位媒人。所以我们给自己定一个规矩：前置矛盾必须能指向具体的对手、具体的文本或具体的制度，必须在新显露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必须在当事人自己的著作或同时代的记载里留下痕迹。指不出来，就记作反例。

拿两个例子试一试这把尺子。先试一个容易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本书说他"回写"后世最深的一件东西。它的前置矛盾在哪里？可以指出来：在《前分析篇》第一卷第31章，他专门批评了柏拉图一派惯用的"划分法"——把一个大类一刀一刀切成小类，以为切到底就得到了定义。他说这种办法只能算一种"软弱的推理"，因为每一刀往哪边切，都是先假定好的，并没有被证明。对手是谁，文本在哪，矛盾是什么，三样都指得出来。这一例过关。

再试一个难的。苏格拉底为什么从街头开始追问"美德是什么"？《斐多篇》里有一段苏格拉底自述：年轻时他热衷于研究自然的成因，读了阿那克萨戈拉的书，以为找到了老师，结果大失所望，于是转向了另一条路。这看上去正好是一个前置矛盾。麻烦在于，这段自述是柏拉图写的，而且写在一篇讲灵魂不朽的中期对话里，它是苏格拉底本人的经历，还是柏拉图替老师安排的来路，我们分不清。按我们自己定的规矩，这一例只能算"半过关"：矛盾可以辨认，可它的痕迹留在学生笔下，而这恰恰是第8章所说的反向师承最活跃的地方。我们不把它藏起来，也不把它当成铁证。

其二，一个反例不会推倒全书，但会削掉一块。如果绝大多数答案搬家都找得到前置矛盾，只有少数找不到，那么"每一次都是被逼出来的"就要改成"多数是"，而那些找不到的例子，恰恰值得单独研究：也许有些新想法确实来得更像灵感，更像偶然。我们宁可把话改小，也不把反例藏起来。

厨房里也有同样的事。师傅说："每一道新菜，都是被一个老问题逼出来的——客人嫌腻，才有了解腻的凉拌；食材断货，才有了替代的做法。"这话大体对。可如果哪天他碰上一道菜，查遍了店里的记录，找不到任何"被逼"的痕迹，就是某个徒弟某天手一抖多放了一样东西，客人说好吃——那么他该老实承认：有些新菜是碰出来的，不是逼出来的。

◆ 第二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若与学园无关

第三轮循环的讲法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学说，是他的观察和分类撞上学园二十年的理念论土壤后逼出来的。形式回到质料之中，是对"把形式分离出去"的顶撞；没有那片土壤，就没有这次顶撞。

这一条的失效条件也很具体：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学说可以独立于学园形成——比如，他在进入学园之前就已经有了成型的"形式在质料中"的想法，或者这套学说的关键部分来自某个与柏拉图一派毫不相干的源头，学园二十年对它没有实质塑造——那么第三轮就不能再讲成"被逼出来的顶撞"，最多只能讲成"一个本来就有自己想法的人，顺手批评了一下老师"。

我们为什么觉得这条目前还站得住？因为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写法到处带着学园的印记。他批评理念论时，多次用"我们"来称呼柏拉图一派，把自己放在同一个圈子里说话；他记下柏拉图"未成文的学说"（《物理学》第四卷里有一处提到）；他用的许多基本词汇，从学园的讨论里来。一个与学园无关的人，不会这样说话。

但我们也要承认，证据有限。亚里士多德17岁进学园，我们对他之前的思想几乎一无所知；他父亲是宫廷医生，家学里可能有医学和观察的传统，这份传统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塑造了他，史料说不清。这条失效条件在今天的状态是"没有被触发，但也没有被彻底排除"。

用家里的事打个比方。一位徒弟出师开了自己的面包房，改掉了师傅最得意的发面法。我们说，他是在顶撞师傅。可如果后来查出来，他十几岁时在外婆家的作坊里就学会了这套新做法，进师傅的店只是带着它来——那就不是顶撞，是移植。两种讲法差别很大，要看外婆家的账本。

◆ 第三条：耶格尔的时间表若被推翻

第7章讲到亚里士多德时，借用过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假说：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耶格尔提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年更接近柏拉图，后来才逐渐走出自己的路，越到晚年越重视经验观察。他用的材料之一，是亚里士多德早年那些已经失传、只剩残篇的对话体作品，那些残篇读起来颇有柏拉图的味道。

本书的第三轮循环，并不依赖耶格尔的全部论证，但依赖一个比它弱得多的前提：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是在学园里、在和理念论的长期相处中一步步分出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对面。这个前提和耶格尔的大方向是相容的。

于是有了第三条失效条件：如果将来有可靠的断代证据——比如能确定各部著作的写作先后——表明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评、形式在质料中的学说，在他最早的作品里就已经完全成型，后来只是重复，并不存在"从接近到分离"的过程；或者表明他的生物学观察整体晚于形式学说的成型，根本不可能参与"逼出"它——那么第三轮里"观察撞上理念论土壤"这个讲法就要重写。

这里我们必须加一句诚实的话：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们今天读到的版本，经过了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的编订；许多篇章内部还可能有不同时期的层次。要为它们给出可靠的先后次序，极其困难。耶格尔之后，学者们为此争了一百年，至今没有定论。有学者根据生物学著作中出现的地名，推测那些观察多半做于他离开雅典、在小亚细亚沿岸和莱斯博斯岛一带的那几年——这对本书有利，但这一推测本身也有争议。

所以这条失效条件目前的状态是"悬而未决"。我们的第三轮讲法，是在一个尚未定案的问题上押了一边。押了，就要说清楚：押输了，第三轮就得改写。

这就像看病时的另一种情况。医生说："我的判断取决于这份化验单上的一个数值。现在这个数值处在临界点，再过两周复查。复查结果往上走，就是我判断的那样；往下走，我们换一条思路。"他没有把临界当确诊，也没有因为临界就什么都不说。

◆ 第四条：如果和教科书所得无异

前三条，是本书的讲法可能和史实撞车的地方。第四条更要命，它问的不是"对不对"，而是"有没有用"。第1章说过，教科书常用"师承—批判—综合"的接力棒来讲三哲：苏格拉底开创，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亚里士多德批判并综合。本书换了一套说法：纠缠在先，端点在后；学生生成老师；三轮发生循环；回写与回绕。可是，如果读者拿我们的说法去读三哲，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拿教科书读出来的一模一样——那么本书只是换了一套词，给旧房子刷了一遍新漆。

这条失效条件该怎么检验？我们得先说清楚，本书声称自己能多给出什么。我们认为至少有三样。第一样，是"学生生成老师"带来的预测。如果"后世看到的老师，很大程度上是学生讲出来的"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同一位老师经由不同学生之口，形象应当系统地不同，而且不同之处应当正好对应各个学生自己的问题。苏格拉底在柏拉图、色诺芬、阿里斯托芬笔下三像不一（第8章），就是一个检验点：如果三像的差异只是随机的记忆误差，跟三人各自的关切毫无关系，这个判断就站不住。接力棒叙事不会做出这种预测，它默认老师是先在的、学生只是传递者。

第二样，是对回绕的解释。接力棒是单向的，只能往前传；它很难说明怀疑派为什么在学园里一住就是一百多年，普罗提诺为什么越过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第22章）。如果本书对这些回绕的解释，并不比"思想时有反复"这句老话多说出什么，那这一样也不算数。

第三样，是位置的轮转。同一个柏拉图，在第二轮是被逼出来的新答案，在第三轮成了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土壤。教科书把每个人钉在一个格子里——"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本书说，格子是会换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循环里站在不同的位置。这一点能否帮读者看懂一些原来看不懂的事——比如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能一边批评理念论、一边离不开它——就是检验。如果这三样都落空，我们就承认：本书的增量有限，它至多是一种更热闹的讲法。

这就像一家餐馆改了菜单，把"红烧肉"改叫"慢火酱焖五花"。如果端上来还是那一盘，改名只是营销；如果新菜名背后是一套不同的火候、能做出原来做不出的口感，那才算真的出了新菜。食客尝一口就知道。

◆ 第五条：三层若能拆开各自讲完

前四条问的是史实与读法。还有一条，针对本书最底下那块地基：三大方程说，显露、差异序列、纠缠土壤三者同时互生（第2章、第9章）。这句话怎样算错？

它算错的样子是这样的：在本书讲过的某一轮里，如果我们能把三样东西拆开，排成一条先后分明的因果链，而且讲得一样好——先有一片完全成形的土壤，土壤里冒出一种追问，追问得出一个学说，学说出来以后又没有反过来改动那片土壤和那种追问——那么"同时互生"在这一轮就是多余的话，换成一句"时代造就思想"也不损失什么。拿亚里士多德来查：如果学园里的理念论在他到来之前已经定型，二十年里没有因为任何人的追问而变动；他的观察分类完全是自己带来的，不受学园讨论方式的影响；他的形式学说出来以后，学园的问法和土壤也纹丝不动——三样各自讲得完，这一轮就用不着三大方程。目前的材料指向相反的方向：柏拉图晚期对理念论的自我批判，与青年亚里士多德在学园的那些年大致重叠（第6、7章）。但"同时"的许多细节只能推断，这一点我们承认。

六路径也有自己的失效条件。本书说，解哲学史从问法起手，比从学说起手更能看见纠缠。检验办法很直接：拿同一位哲学家，两条路各走一遍，各列一张"看见了什么"的清单。两张清单如果一样，路径之说就只是调换了章节顺序。第22章拿阿奎那试过一次：从问法起手，看见了那个"综合"的形状是被逐条答复反方的格式压出来的；从学说起手，这一点容易漏掉。这是一个对本书有利的例子，可一个例子不够，读者可以挑一位自己熟悉的人再试。至于123原理，它的失效条件已经分在第一条（找不到前置矛盾）和下面关于回写的一条里：一个回合若观察不到任何回写，循环就没有闭合，只能算半个回合。

一家人闹矛盾，亲戚劝架时常说："这是婆媳、房子、孩子三样缠在一起的事。"可如果后来换了一套大房子，婆媳立刻和好，孩子的事也自然解开，那"三样缠在一起"就说多了，真正的原因只是房子小。缠绕之说要站得住，就得经得起这种"拆开试一试"。

◆ 还有几条，是我们自己补上的

上面五条，针对的是全书最大的几块承重墙。下面还有几条，它们更琐碎，但同样能让本书出错。一条关于事后调换。全书反复说，不能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静态地对应成"差异""显露""纠缠"（第9章）。可这句话也有被滥用的危险：如果一位哲学家的情况，我们怎么讲都行——这样讲他是逼出来的新答案，那样讲他是别人的土壤，结果不合意就换一个位置——那么"位置轮转"就成了一张万能牌。所以，每一次指认位置，都必须说明是在哪一轮循环里、相对于谁、凭什么材料。说不出来，就不算。

一条关于回写。本书说某个新答案"回写"了后人的问法和土壤：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重置了后世的推理方式，柏拉图建学园让追问从街头进了机构。回写不能靠宣布，必须能在史料里观察到痕迹——课程里有没有这本书，注释传统

里有没有这套术语，后人的论证方式有没有改变。如果有一处回写，我们只能说"它的影响很深远"，却指不出任何具体痕迹，那一处就该删去。

一条关于回绕。上一章说，回绕不是倒退，回来的旧位置带着新土壤，而且是被新矛盾逼回来的。可也有另一种可能：很多回绕，也许只是因为书恰好在那个时候到了——12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译本涌进来，15世纪费奇诺译出了柏拉图全集，人们就读什么信什么。如果细查之下，某一次回绕完全可以用"书什么时候到手、谁出钱翻译"来解释，看不出接收者当时卡在什么矛盾上，那么对这一次，"被新矛盾逼回来"的说法就要撤下。

拿这把尺子当场对一次账。第22章说，柏拉图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回来了。书到手的一面清清楚楚：拜占庭学者带来了希腊文抄本，美第奇家族出钱，费奇诺用多年工夫译出全集。据费奇诺晚年的追述，科西莫·德·美第奇起意复兴柏拉图，是因为听了来佛罗伦萨参加宗教会议的拜占庭学者普莱桑讲柏拉图——这是当事人事后的说法，只能当线索。矛盾的一面却难指认得多。说人文学者厌倦了经院里干巴巴的亚里士多德，想要一种更能安顿灵魂、也更配得上优美文辞的哲学，大体不错；可要按第一条的规矩，指向具体的对手、具体的文本，并且早于新显露、留下了痕迹，许多地方我们只能给出概括。所以这一圈我们只给"半过关"：回绕的形状清楚，"被逼回来"的那一半，证据比阿奎那那一圈薄。第22章把两个圈并排画，这里补一句：两个圈的证据不一样厚。就像体检报告上两项指标都标了"偏高"，一项复查了三次，一项只测过一回，医生不会拿它们当同一种分量。

一条关于五个动作。第三编讲的五个动作，是本书声称可以迁移的方法。如果有人拿它去解一位哲学家，得到的东西和一份认真写的生平简介差不多——生平里本来就有"他反对谁""谁继承了他""他影响了什么"——那么五个动作就没有

多出东西。第21章用霍布斯、加缪、罗尔斯做过小试，读者可以自己再挑一位，看看能不能做出生平简介里没有的发现。

把这几条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它们防的是同一种病：解释变得太便宜。单位里常有这样的年终总结——业绩好了，是"战略对头"；业绩差了，是"战略对头，但外部环境恶化"。战略永远对头，这份总结也就永远无法告诉下一年该改什么。本书的阐释如果也走到这一步，越能解释，越不值钱。所以，凡是一个判断在两种相反的结果面前都能说得通，我们就把它降一级，从"本书的判断"降为"本书的一种看法"，并且明说它还缺什么证据才能升回去。这些规矩看起来像在给自己找麻烦。可一个不给自己找麻烦的框架，最后会被别人的麻烦找上门。

◆ 回头对账：接受史那一问，和斯金纳那一刀

第2章已经正面接过一次反对：你们讲的"学生生成老师"，不就是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文学研究里的"接受史"吗？当时我们承认了这份亲缘，说出了两处不同——接受史留着一个先在的原点，纠缠史说原点本身在缠绕中定型；接受史问"被怎样读"，纠缠史还问"被逼出了什么"——并且立下一句话：这两处不同要在后面各章拿史料兑现，兑现不了，就只是接受史换了个名字。现在全书走完，该回来对这笔账了。

先说兑现得好的地方。苏格拉底一字未写，他的"原作"就是学生的书写，这里确实没有一个先放在那里等着被接受的原点；柏拉图"分离理念"的形象有一部分由学生的转述定型，也站得住（第8章）。再说兑现得弱的地方。到了第四编，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都留下了大量亲笔著作，原点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在他们身上，"端点在缠绕中成形"这句话就要打折扣——新康德主义塑造了"认识论的康德"，这更像接受史所说的一层层解读，而不是原点本身被缠出来。我们老实承认：反向师承最硬的证据集中在三哲，越往后，它越接近接受

史，第四条失效条件在这里已经部分触发。这不推翻全书，但划出了它最有力的范围。

还有一刀，是第2章没有接过的。英国史家斯金纳1969年有一篇名文，批评思想史写作里的几种"神话"，其中一种，是拿后人认定的某个大问题去要求每一位古人表态，好像大家都在答同一张卷子。"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看上去正是这样一张卷子。这一刀，本书在第21章已经让过一步：许多哲学家的问题根本不是"X 是什么"，轴不能硬套；账本里也把这根轴归为"阐释"。可斯金纳的提醒不能只在第21章用一次。第四编的每一位，我们都应当能在他自己的文本里指出一个"答案在哪里"的问法，而不是我们替他出的题；指不出来的，就该从轴上撤下。家里整理太爷爷的旧信，孙子读到一句"甚念"，就断定太爷爷和太奶奶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是孙子那一代的卷子，太爷爷未必在答它。

◆ 全书的账本：史实、阐释与传说

下面这张表，把全书反复用到的主要说法分了类。它不是穷尽的清单，但足以让读者在每一章里自己做判断。

说法	归类	说明
苏格拉底一字未写，前399年受审被判死刑	史实	见柏拉图《申辩篇》、色诺芬等记载；罪名为不敬城邦之神、引入新神、败坏青年
德尔斐神谕说无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	史实（经学生转述）	出自柏拉图《申辩篇》，是学生笔下的记载
苏格拉底与克里底亚、亚西比德的交往是审判的政治诱因	阐释（学界常见看法）	前403年大赦使政治罪名不便直接提出，此说有据但非定论
"给答案最少的人被处死"	阐释	本书的读法，须配合上一条的政治诱因一起看
柏拉图约前387年建学园	史实	年份为通行说法

说法	归类	说明
学园门口刻"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传说	晚出记载，不作证据
柏拉图对话分早、中、晚期	阐释（学界通行做法）	分期本身有争议
《第七封信》出自柏拉图	存疑	真伪有争议，本书未拿它作论证依据
"理念分离"的柏拉图形象经亚里士多德转述定型	阐释	依据《形而上学》A卷第6章、M卷第4章的转述
亚里士多德在学园约二十年	史实	前367年入学园，至前347年柏拉图去世
亚里士多德早年更接近柏拉图	有争议的学术假说	耶格尔1923年提出，至今未定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后世概括	意思出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6章，格言形式是后世拉丁文的概括
亚里士多德说不让雅典再次对哲学犯罪	传说	相传之语
亚里士多德书稿藏于地窖	可疑记载	见斯特拉波
三轮发生循环；上一轮亏缺成为下一轮矛盾	阐释	本书的核心读法，失效条件见本章前文
答案落脚点从悬空到彼岸、物中，再到上帝心中、我思、认识的条件、历史、用法、永远在路上	阐释	一根贯穿全书的观察轴，不是哲学家们自己的说法
阿尔克西劳使学园转向怀疑派；普罗提诺开新柏拉图主义	史实	"新柏拉图主义"是近代学者所加的名称
学园的来回摆动是"钟摆"、回绕是非目的论的证据	阐释	见第22章，附有三条边界
拉斐尔壁画里两人手势指向"彼岸"与"物中"	后人通行解读	画家未留说明，本书仅借作图示

表里有几种归类，在"史实、阐释、传说"三分之外多了一层：有些是经学生转述的史实，有些是学界通行的做法而非定论，有些是真伪存疑的文献。这不是给三分法打补丁，而是提醒：分量是连续的，不是三个整齐的抽屉。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证据面前可以挪动位置——今天的有争议假说，明天可能被新材料定为史实，也可能被推翻。读者读每一章，都可以拿这张表对照：作者说的这句话，是在报告档案，还是在提出一种看法，还是在讲一个故事？

◆ 判断交到事实手里之后

把这一章写下来，本书并没有变弱，反倒变得更有用了。一个说清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的判断，等于给了读者一把尺子：您不必信我们，您可以去查。去查苏格拉底三个画像的差异是否对得上三位作者的关切；去查某一次答案搬家，能不能指认出前置矛盾；去查某一次回写，有没有留下痕迹。查出来对得上，这本书就多了一块证据；对不上，我们就改。改的时候，也按同样的次序来：先改史实，再改阐释，最后才动框架本身。一处年份错了，改年份；一次回写指不出痕迹，删掉那一处回写；只有当反例多到某一条核心判断撑不住时，才去动那条判断。这就像修一辆车，先换坏掉的零件，不会因为一个轮胎漏气就把整辆车送去报废。

这和手机导航是一个道理。好的导航会告诉你"预计十五分钟到达"，而不是"总会到的"。说了十五分钟，路上堵了二十分钟，它就要重新规划，你也会知道它这次估错了。正是这种会错，让它值得信。

但是，这一章也留下一个更难的问题。本书检验自己的办法，说到底是拿判断去碰事实：找档案，查文本，看痕迹。这套办法在一个人人都能翻书核对的世界里管用。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遇到"X 是什么"时，第一个去问的不再是书，

也不是老师傅，而是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你问它"火候是什么"，它几秒钟就能给你一段头头是道的回答——比那位说不出来的老师傅流利得多。

那么，这段回答里的"答案"，住在哪里？它说通了，是不是就说对了？它说错了，错误会不会进入下一次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同样要拿可以检查的方式去问，而不是急着下结论。下一章就来试一试。

> **带走的话**
>
> **一个怎样都对的解释，一次也没有对过。**

> **本章判错句**
>
> 如果本书列出的失效条件没有一条是能被史料真正检查的，这一章就只是姿态。

> **想一想**
>
> 你最相信的一个判断，你写得出它的推翻条件吗？
>
> 你上一次承认自己错了，是因为什么证据？

◆

24

第 24 章

AI 时代，答案住在哪里

这一章的问题

在一个随时可以问机器的时代，答案住在哪里？

◆ 问机器"火候是什么"

做一个小实验。打开手机上任何一个会聊天的程序，问它："做红烧肉，火候是什么？"几秒钟后，它会给你一段相当漂亮的回答。大意是：火候是火力大小与加热时间的配合；红烧肉要先大火煸出油、炒糖色上色，再转小火慢炖，让胶原蛋白慢慢转化，肉才软糯；收汁时再开大火，汤汁浓稠挂在肉上。它可能还会告诉你，小火的标准是汤面微微冒泡、不翻滚，炖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因肉块大小而异。

请回想全书开头那位老师傅。他做了三十年红烧肉，你问他火候是什么，他张了张嘴，说不出来，最后只憋出一句："你站这儿看着，看多了就知道了。"

两相对照，情形颠倒得有些滑稽。两千五百年前，苏格拉底满街追问"X 是什么"，问到人人语塞；今天，一台机器对几乎任何"X 是什么"都答得出来，而且答得条理分明、不卑不亢。如果苏格拉底活在今天，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可能不是没人答得上来，而是有人答得太顺了。

可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台机器没有站在灶台边。它没有闻过糖色从焦香转向焦苦的那一瞬，也没有手被热油溅过。它的回答流利，却不来自锅边。

于是本书那个老问题——答案住在哪里——在今天有了一个新的问法。悬空、彼岸、物中、上帝心中、我思、认识的条件、历史、用法、永远在路上——

这条轴走了两千五百年。现在，一个新的候选地址出现了：答案是住进了模型里？住在人与机器之间？还是又一次悬空？

这一章不打算给出定论。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问题拆成几个可以检查的小问题，看看每一个该怎么查。在这件事上，过早的结论——无论是"机器已经懂了"，还是"机器永远不可能懂"——都和那位万能的媒人一样，是在把话说圆。

◆ 三个候选地址

先把三种可能摆出来。第一种：答案住进了模型里。模型从海量文字中学到了人们谈论火候的方式，这些方式以某种形态压缩在它内部。就像一本极厚的菜谱，答案写在里面，只是这本菜谱会说话。如果是这样，那么从柏拉图的眼光看，模型有点像那张贴在墙上的标准——一个脱离了每一口锅的、普遍的样板，只不过它不是理念，而是人类所有说法的统计沉淀。

第二种：答案住在人与机器之间。机器给出一段说法，人拿着这段说法回到灶台边去试；试的结果又回过头来，改变人下一次怎么问、怎么用。答案不在任何一端，而在这个来回之中。这有点像维特根斯坦说的"意义在于使用"（第19章），只是用的一方从说话的人群，扩展到了人和机器组成的整体。

第三种：答案又一次悬空了。机器给出的说法越来越多、越来越顺，可每一段说法都可以被另一段说法替换，没有哪一段真正被一口锅检验过。答案像德里达笔下的延异（第20章），在说法与说法之间无尽地滑动——只不过这一次，滑动的速度快了千万倍。

这三个地址，和两千五百年前那三个地址，有一种奇怪的对应。答案住进模型，像柏拉图的彼岸：一个离开每一口锅的普遍样板。答案住在人与机器之间，像亚里士多德的物中：答案只在一次次具体的过程里成形。答案又一次悬空，像苏格拉底的街头：问来问去，没有一个答案站得住。但我们要立刻提醒自己，这只是一种相似，不能当成对应表来用。第9章说过，不能把三哲静态地钉成三个

格子；这里也一样。机器里的"样板"不是理念——理念据说是唯一的、不变的，而模型里的说法是千万种说法的加权混合，换一个问法、换一个版本就会变。人与机器之间的"过程"，也不是亚里士多德那种朝着既定目的展开的生成——它没有一颗橡子里预先装好的橡树。相似帮我们提问，不帮我们下结论。

更要紧的是，三个地址并不互相排斥。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事情上，可能同时遇到三种情形：查一个历史年份，答案大体就在模型里，查得到、对得上；学一门手艺，答案在人和机器的来回中慢慢长出来；问一个"人该怎样活"的问题，机器给出十种说法，每种都有道理，答案又悬在半空。答案住在哪里，要看问的是什么。

三个地址都有道理，也都可能部分为真。要在它们之间做判断，光靠争论"机器到底懂不懂"是不够的。"懂"这个字太大了，至少可以分出好几层意思：能不能正确使用一个概念？能不能完成推理？能不能应付没见过的新情况？有没有切身的体验？愿不愿意、能不能为自己说的话承担后果？这几层意思完全不同，不能用一个"懂"字一锅端。说机器"懂了"的人和说机器"不懂"的人，常常说的根本不是同一层。所以，与其问"它懂不懂"，不如换成两个更具体、可以动手去查的问题。

◆ 第一道检查：说通了，不等于说对了

第一个问题是：机器的回答，有没有接到一个能判它对错的东西上？回到红烧肉。机器说"小火炖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句话说得通，前后连贯，和网上大多数菜谱一致。可它对不对？要看你家的锅、你买的肉、你家灶头的火力。同样一块五花肉，在铸铁锅里和在薄铝锅里，一个小时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说法是通的，结果可能是一锅柴肉。

"说通了"和"说对了"是两件事。说通了，是指一段话内部连贯、和别的说法相容、听起来合理；说对了，是指它放到具体的现实里，经得起那个现实的检

验。苏格拉底当年在街头揭穿的，正是这两件事的距离：那些雅典人谈论勇敢、虔敬、正义，说得都很通——直到他追问一个具体的情形，说法才露出破绽。

人类自己也常常混淆这两件事。单位里那份逻辑严密、图表漂亮的方案，开会时人人点头，执行三个月才发现根本行不通；朋友圈里那篇"十分钟看懂经济形势"的文章，读起来豁然开朗，可它说对了什么，谁也没去对过账。机器在这一点上并不比人更特殊，只是它产出"说得通的话"的速度和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

于是第一道检查可以这样问：在你使用机器的这一次任务里，它的回答有没有接到一个能判对错的反馈上？这个反馈可以是一次实验、一个测量、一个现场的结果、一位有经验的人的复核。如果有，那么不管它的回答从哪里来，都会被拉回到"对不对"上；如果没有，那么它的回答再漂亮，也只停在"通不通"上。

再举一个离厨房远一点的例子。一位老人拿着体检单问机器："我的某项指标偏高，要紧吗？"机器的回答通常很稳妥：解释这个指标是什么，列出几种可能的原因，最后建议咨询医生。这段话说得通，大概率也没有说错什么。可它对这位老人"对不对"，要看他上个月是不是刚换了药、昨晚吃了什么、这个数值三年来是一直如此还是突然升高——这些都在体检单之外，在老人自己的日子里。机器的回答越周全，越像一份适用于所有人的说明书；而一份适用于所有人的说明书，恰好不负责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这不是机器的过错，是"说通"和"说对"之间那段距离的本性。能把这段距离走完的，是那位知道老人换过药的医生，或者老人自己。

注意，这道检查查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机器所在的那一整套安排。同一个模型，接上一个能自动运行代码并报告错误的工具，它写出的程序就会被一次次判对错；不接，它写出的程序就只是一段看上去像程序的文字。同一个模型，被一位老厨师拿来出主意、再由他在锅边试，它的说法就有了锅边的检验；被一个

从不下厨的人拿来抄进朋友圈，它的说法就只停在纸上。所以，答案住在哪里，不是一个光问机器就能回答的问题，要看机器被安放在什么样的关系里。

◆ 第二道检查：错误能不能进入后来

第二个问题更细，也更关键：机器（或者人与机器组成的那个整体）犯了错，这个错误能不能进入后来的工作，改变它下一次的做法？

还是用厨房来说。一个学徒第一次炖红烧肉，火开大了，肉柴了。师傅骂了他一顿。第二天他再炖，火调小了一点。第三天他发现，同样的火候，换了一口新锅又不对了，于是开始留意锅的厚薄。一个月后，他说不出火候是什么，可他的手已经知道了。他的每一次错误都进入了下一次——这就是全书反复说的"回写"：新的东西反过来改写了发生它的那些条件，让下一轮从一个不同的起点开始。

现在来看机器。你告诉它："按你说的炖了一个半小时，肉柴了。"它多半会立刻道歉，给出新的建议："可能是火力偏大，建议改为……"这一次对话之内，你的反馈确实进入了它的下一句话。可是，明天你重新打开一个对话，再问同样的问题，它很可能给出和昨天一模一样的第一句回答。你昨天那锅柴掉的肉，没有进入它的明天。

这里要格外小心，不能把这个观察一口气推成结论。今天的许多系统已经有了各种记忆功能，能记住你上次说过什么；模型也会被不断地重新训练，把大量反馈吸收进新版本；还有一些系统专门设计成在执行任务时边做边检查、边改。错误能不能进入后来，答案取决于具体的安排：基础模型是怎样训练的，接了什么工具，有没有记忆、记的是什么，以及有没有一个人在旁边把错误接住、带进下一轮。这四样东西，每一样都要分开看。

所以第二道检查可以这样问：在你关心的那件事上，一次错误发生之后，有什么具体的通道能把它带进下一次？这个通道是对话里的上下文，是系统的记

忆，是下一个版本的训练，还是你自己——你记住了，下次换了问法？通道在哪里，答案就有一部分住在哪里。

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做菜，第一次肉柴了，第二次人把火关小了，第三次人告诉机器"我家的锅很薄"，机器调整了建议——在这个过程里，回写确实发生了，但它主要发生在人这一边，以及人与机器之间那段累积起来的对话里。如果这时候人换了一台机器，或者清空了对话，那段回写还剩多少？这也是可以动手去查的。

◆ 一个硬反例：已经站到锅边的机器

本章开头说，机器没有站在灶台边。这句话要马上接受一次反驳，而且是很硬的反驳。在有些领域，机器早已站到了"锅边"。围棋是一例：2016年，AlphaGo 战胜李世石。它的每一步都要接受一个毫不含糊的裁判——输赢；后来的版本更是靠自己和自己下了海量的对局，把每一盘的输赢带进下一盘。在这件事上，第一道检查（有没有接上能判对错的东西）和第二道检查（错误能不能进入后来），它都过了，而且过得比大多数人类棋手更彻底。蛋白质结构预测也是这样，机器给出的结构，要拿去和实验测出的结构逐一对照、打分。厨房里也开始有类似的东西：带温度探针的烤箱，一边烤一边读肉的中心温度，到点自动关火。它不知道"火候"这个词有多少讲究，可它确实在读那块肉。

这条反驳说明，"机器没站在灶台边"不是机器的本性，而是某一种安排的样子。同一类技术，接上了裁判和回路，就在锅边；只接上文字，就在纸上。如果把"机器不在锅边"当成一条永久的判断，就犯了本章一开头警告过的错——提前宣判终局。

但反驳也有它的边界。围棋的输赢一清二楚，蛋白质的结构可以测，"火候"里也有一部分可以测：中心温度、时间、汤汁的浓度。可还有一部分没有现成的裁判：这一锅肉配今晚这一桌人合不合适，老人的牙口咬不咬得动，孩子肯

不肯吃。凡是裁判清楚的地方，机器越来越能站到锅边；凡是裁判本身还在争的地方——什么算"好吃"，什么算"好老师"，什么算"好日子"——机器给出的多半还是说法。苏格拉底在街头追问的，恰恰是后一类词：勇敢、虔敬、正义，都没有一个现成的裁判。这一类问题上，答案住在哪里，仍然要回到人这一边去查。

◆ 机器是谁的学生，又会成为谁的土壤

本书第8章讲过"学生生成老师"：我们知道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色诺芬、阿里斯托芬讲出来的苏格拉底。第12章把它做成了第三个动作：查反向师承，看后世的他是谁塑造的。

这个动作搬到机器身上，会照出一个有趣的局面。机器关于"火候"的回答，是从千千万万人写下的文字里学来的：菜谱、美食博客、烹饪论坛上的争论、教科书、电视节目的字幕。换句话说，机器是千万个学生的学生。它讲出来的"火候"，是这千万个讲述者共同塑造的火候。

问题在于，写下来的火候和锅边的火候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会写菜谱的人，未必是炖得最好的人；炖得最好的人，像那位老师傅，往往一个字也没写下。苏格拉底一字未写，于是后人只能通过学生认识他；三十年的老师傅一字未写，于是机器只能通过那些写了字的人认识火候。一字未写的苏格拉底被学生改写过一次，机器又把所有写下来的东西压缩、混合了一次。

这不意味着机器的回答没有价值。正相反，它可能比任何一位单个的讲述者都更全面。但这提醒我们查一件事：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机器学到的那些文字，是来自锅边的人，还是来自只在纸上转述的人？如果一个领域里，真正干活的人很少写字，而写字的人很少干活，那么机器从这个领域学到的，可能更接近墙上的标准，而不是锅里的肉。这一点同样可以检查：找几位真正的行家，让他们看看机器在他们的行当里说的话，哪些是行家会说的，哪些只是外行之间口口相传的说法。

从"谁的学生"再往前一步，就会碰到另一个问题：机器会不会成为谁的土壤？全书一再强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循环里站在不同的位置：柏拉图在第二轮是被逼出来的新答案，到第三轮就成了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土壤。这条位置轮转的眼光，用在机器身上，也会生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今天，我们把机器当作一个"答者"——问它问题，它给答案。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工作、写作时都先问它，它的说法就会慢慢沉进下一代人的脚下，成为他们思考时踩着的土壤。将来某个年轻人追问"火候是什么"，他顶撞的，也许不再是一位说不出话的老师傅，而是一台说得太多的机器。到那时，机器就从"答者"的位置，挪到了"土壤"的位置——像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一样，重置了后人的推理方式。

而这片土壤也可能板结。第13章讲过，回写过厚会变成权威：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经院传统里被奉为不可动摇，到伽利略时代成了旧壳。如果某一种说法因为被机器重复了千万次，就被当成了"标准答案"，没有人再去锅边试一试，那么一个新的板结就在形成。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可能：机器的说法被人写进新的文字，新的文字又被下一代机器学去。这就像一家人讲爷爷的故事，讲的人越来越多，听过爷爷本人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所有人都只记得那个被讲出来的爷爷。

家里其实早有类似的事。外婆那一代人做菜，口味各家各样，同一道红烧肉，东家偏甜，西家偏咸，隔壁还要放一把笋干。后来电视上的烹饪节目火了，许多人家照着同一位名厨的做法学，十几年下来，一条街上的红烧肉越来越像。这算不算进步，各人看法不同；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些偏甜、偏咸、放笋干的做法里，藏着各家几十年在自家灶台边试出来的东西，它们一旦被统一的做法替掉，就很难再找回来。机器要是成了新的"电视名厨"，而且是一位全天候、有问必答的名厨，这种趋同只会更快。

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发生到什么程度，现在都还说不准。但它提出了一个可以长期观察的问题：在某个领域里，人们的说法是越来越多样，还是越来越趋同？趋同的那部分，是因为大家都在锅边试出了同一个结果，还是因为大家都问了同一台机器？这两种趋同，表面一样，来路完全不同。

◆ 去掉一环，看看结果变不变

前面两道检查都指向同一件事：很多时候，值得看的不是单独一台机器，也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人和机器一起组成的那个整体。可一旦把整体当作看的对象，又会冒出一个新麻烦：功劳和责任怎么分？一锅肉炖好了，是机器的建议好，还是人的手稳？

有一个笨办法很管用：去掉一环，看结果变不变。假设一家小饭馆的厨师，这半年一直让机器帮他琢磨新菜。新菜卖得不错。那么请他做一个试验：接下来两周，不用机器，自己琢磨。如果新菜的质量明显下降，说明机器在这个整体里确实承担了一环；如果没什么变化，说明机器在这里只是一个顺手的记事本，真正起作用的，一直是他自己在锅边的那些试错。反过来也可以试：让一个从没下过厨的人，拿着同一台机器、问同样的问题，去做同一道菜。如果他也做得出来，说明答案相当程度上住在机器给出的说法里；如果他做砸了，说明那些说法要接上一双试过千百次的手才能变成一锅好肉。

这个办法不高明，但它有一个好处：它不需要先回答"机器懂不懂"这个大问题，就能在一件具体的事上看出，答案有多少住在机器那一侧，有多少住在人这一侧，又有多少住在两者的来回之中。而且，同一个试验在不同的行当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写一封客套的邮件，去掉人，结果差别不大；炖一锅红烧肉，去掉锅边的那个人，结果可能面目全非。

这个笨办法也有它的毛病，要老实说出来。整体里的几样东西是一起长的：厨师用了半年机器，他琢磨菜的习惯、记笔记的方式、对哪些问题敏感，都已经

跟着变了。这时候拿走机器，剩下的并不是半年前那个厨师，而是一个被机器改过、又突然少了机器的人。结果变差，未必说明机器承担了多少，也可能只说明他的习惯一时没转回来；结果没变，也未必说明机器无足轻重，也许它教给他的东西已经长进了他的手里。所以去掉一环的试验要做得久一点、多做几回，并且把"刚拿走时"和"拿走一阵以后"分开记。就像一个家里，保姆走了第一个星期，家里乱成一团，不能就此断定这个家离不开保姆；要看一个月以后，这家人是重新理顺了，还是一直乱着。

还要补一句：就算试验表明机器承担了很大一环，责任也不会因此挪到机器那边去。肉端给客人，客人吃坏了肚子，站出来道歉的是厨师。能力怎么分布，和责任怎么分布，是两本账。这两本账一混，就会出两种毛病：一种是功劳归自己、出错怪机器，"是它让我这么炖的"；另一种反过来，因为怕担责任，干脆什么都不敢交给机器，连查个年份也要自己翻半天书。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没有把自己的追问推给德尔斐的神谕，他说神谕只是让他开始去查，查的人是他自己（第5章）。用机器的人，也站在这个位置上：机器可以让你开始去查，查完以后签字的，还是你。

◆ 提问的人站在哪里

去掉一环的试验，最后总会把目光引回到人这一环。说了这么多机器，也该回头看看提问的那个人。答案来得太容易，最先变化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提问者自己。一个学徒如果每次拿不准火候都去问机器，而机器每次都给出一段像样的建议，那么他站在锅边的时间可能会变少，自己闻、自己看、自己犯错的机会也会变少。三年后，他也许能说出一大套关于火候的道理，比那位老师傅说得还多，手上却没有老师傅那份把握。他学会了"说"，没有学会"做"——这正好把老师傅的情形倒了过来。

这里要守住分寸。不能说"用了机器的人一定退步"，这同样是一个过早的结论。一个善用机器的学徒，完全可能反过来：让机器替他记下每一次炖肉的火

力、时间和结果，帮他看出自己没注意到的规律，从而比前人更快地在锅边长出把握。机器可以挤掉一个人站在锅边的时间，也可以让他站在锅边的每一分钟都更有收获。

哪一种情形发生，也是可以检查的：一个人用了机器一段时间之后，离开机器，他还能不能自己做出判断？他犯的错，是越来越少、越来越新，还是一直在重复同一种？他问机器的问题，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贴着自己的那口锅，还是越来越笼统、越来越像在背书？

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说，他比别人多出的那一点智慧，只在于不以为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今天，这句话也许可以换一种问法：在机器给我的答案里，哪些是我自己在锅边验证过的，哪些我只是知道它"听起来对"？一个能把这两部分分开的人，答案无论住在哪里，他都不会迷路。

◆ 用三层再看一遍人与机器的那一锅

前面几节一直在说"整体"：人、机器、锅和锅里的肉。这个整体怎样运转？拿全书的三层来看一遍（第9章），就能看清下面那份检查清单为什么偏偏是那几个问题。

先看回合。一个学徒照机器说的炖了一锅肉，肉柴了。他的试——第一锅、第二锅、换锅、调火——是一条差异序列；他脚下的土壤里，如今多了一层东西：机器给出的那套说法，以及说法背后千万篇菜谱的沉淀。说法说一个半小时，他的锅说不行，两边顶住了，逼出一个新的显露：他自己认得出、留得住、说得给别人听的那份把握——"我家这口薄锅，一个小时零十分，汤面刚冒小泡就转最小火"。然后是回写：他下次问机器，先报锅的厚薄；他把这条心得发到网上，它又成了下一代机器要学的文字。一个回合到这里才闭合。请注意，这个回合里机器站在土壤那一边，不站在答案那一边；答案是在人的试撞上机器的说法时被逼出来的。

再看同时。别把这个回合读成"先有机器的说法，再有人的试，最后才有把握"。任何一刻，三样都在一起动：人问的方式决定了机器给出什么说法，机器的说法改变了人接下来怎么试，人试出来的东西又改写了他的问法和他放上网的文字。哪一样都不是先站稳了再去扶别的。

最后看入口。用机器至少有三种起手：先要答案，让机器给结论，再去试，最后才管自己家的锅，这是从显露起手；先动手，自己试几锅，带着试出来的疑问去问机器，这是从差异起手；先把土壤摆出来，告诉机器家里几口人、什么锅、谁忌口，这是从土壤起手。三种都可以，选哪个看任务：查一个年份，先要答案最省事；学一门手艺，先动手更稳。很多人用机器不顺手，不是机器不好，而是把学手艺的任务，走成了查年份的入口。用三层去读人与机器，是本书的阐释，不是对任何一个具体系统内部机制的描述。

◆ 不急着下结论的理由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着急：说了半天，机器到底懂不懂火候？答案到底住没住进机器？我们的回答是：现在下结论，无论哪一边，都太早了，而且下结论的方式本身就有问题。

说"机器已经懂了"，是把"说通了"当成了"说对了"，把对话里的流利当成了锅边的把握。说"机器永远不可能懂"，则是在一件仍在快速变化、我们还没有找到好办法去检查的事情上，提前宣判了终局——这正是本书一路反对的目的论：好像历史有一个预定的终点，而我们已经知道它在哪里。两千五百年里，答案的落脚点一再搬家，每一次搬家都出乎前人的意料。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次我们就能预先看到它最后住进哪里。

所以，比起结论，更有用的是一份检查清单。面对你在某件具体事情上使用的机器，可以问四个问题：它的回答有没有接到一个能判对错的反馈上？它犯了错，这个错有没有一条通道进入后来？它的说法学自锅边的人，还是纸上的人？

在你这个行当里，人们的说法是因为试过而趋同，还是因为问过同一台机器而趋同？

这四个问题，每一个都可以在具体的场景里查出答案，而且答案会随着具体的安排而改变。换一套工具、换一种用法、换一个人在旁边，答案可能就变了。这正说明，答案住在哪里，不是机器单方面的事，而是人、机器、锅和锅里的肉一起缠出来的。

设想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她的情形在今天并不少见，可以作为这一章的落脚。她的学生用机器写作文，写得通顺、结构完整，几乎挑不出毛病。可她发现，学生交上来的作文越来越像，像同一家工厂出来的产品。她没有禁止学生用机器，而是改了布置作业的方式：每篇作文必须写一件只有你自己经历过的事，写完以后，要在课堂上当面讲给同学听，回答同学的追问。机器可以帮你理顺句子，却替不了你站在讲台上被追问的那几分钟。她做的，其实就是苏格拉底在街头做的事——把一段说得通的话，拉回到一个能判对错、也能把错误带进下一次的现场。

◆ 苏格拉底若在今天

最后，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还给苏格拉底。如果他在今天的雅典街头遇到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他会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打算替他回答——第8章讲过，替苏格拉底说话，是后人最容易犯的错。但我们知道他当年做了什么：他不满足于听起来对的回答，他追问具体的情形，他让每一个定义在一个反例面前接受检验，他不肯在一个说得通的答案上停下来。

这四件事，今天依然可以做，而且做起来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对机器的每一个流利回答，追问一个具体的情形；让它的每一个说法，在一口真实的锅前接受检验；看它的每一个错误，有没有被带进下一次；警惕自己因为它答得太顺，就停止了追问。

这样看，机器的出现，没有让苏格拉底的问题过时，反倒让它变得更紧迫了。当年的难处是没有人答得出来，今天的难处是答案来得太容易。答案来得太容易的时候，追问就成了稀缺的东西。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普通人手里，还剩下什么可以依靠的方法？全书最后，我们回到那口锅、那位老师傅，回到五个动作。

带走的话

说通了不等于说对了；答案来得太容易时，追问就成了稀缺的东西。

本章判错句

如果机器的回答经得起本章列出的几项检查——能接到反馈、错误能进入下一次、撤掉人那一环结果明显不同——本章的担忧就要收回一部分。

想一想

你上一次问机器的问题，答案对你的生活有没有留下痕迹？

如果撤掉你自己那一部分，你最近做成的一件事还成立吗？

◆

结语

灯与模具

◆ 回到那口锅

这本书从一口锅开始，也该在一口锅前结束。一位做了三十年菜的老师傅，被问"火候是什么"，说不出来。他天天在用，天天在教，徒弟一个个出师，可他就是讲不出一句站得住的定义。他的徒弟受不了这种说不出，把一张完美的标准贴在墙上，从此每一口锅都只是在模仿那张标准，像不像，差多少。徒孙在那张标准下学了二十年，有一天忽然发现：墙上那张纸，对一块肉怎么从生变熟，一句话也没说过。火候不在墙上，就在这块肉从生到熟的过程里。

这是导论里讲过的故事，我们用它来比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读完全书再回头看，这个故事里藏着的东西比开头多了不少。

第一，三个人不是排成一排、一棒接一棒的。徒弟之所以要贴那张标准，是因为师傅说不出来——师傅的"说不出"，是徒弟的起点；徒孙之所以要回到锅里，是因为在那张标准下学了二十年——标准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脚下的土。三个人缠在一起，先有缠，后有各自的样子（第2章）。

第二，我们今天知道的那位师傅，很大程度上是徒弟讲出来的。师傅一字未写，墙上的标准却是徒弟贴的，徒弟还把师傅写成了自己菜谱里的主角。我们以为在认识老师，其实常常在认识学生眼里的老师（第8章）。

第三，故事没有在徒孙那里结束。墙上的标准后来又回来过，说不出的那种状态也回来过，每一次回来都换了一批水电（第22章）。今天，又有一台会说

话的机器站到了灶台旁，它对"火候是什么"答得比谁都流利，却从没闻过糖色（第24章）。

第四，同一个人在故事里站的位置会变。徒弟在师傅面前，是那个被"说不出"逼出新办法的人；到了徒孙面前，他贴的那张标准，已经成了徒孙要顶撞的旧规矩。同一个柏拉图，在第二轮是新答案，在第三轮是旧土壤（第9章）。这就像同一块砖，砌在旧墙里时是承重的，拆下来铺在院子里就成了路面——不是砖变了，是它所在的那一圈换了。

把这四点合起来，就是全书反复讲的那个循环：一边是不肯停下的追问，一边是已经沉淀下来的土壤，两者顶在一起，张力无处可去，逼出一个新的落脚点；新的落脚点立住以后，又反过来改写了后人怎么问、脚下踩的是什么。这一笔"反过来改写"最容易被漏掉，可正是它，决定一次突破是从此生生不息，还是热闹一阵就沉了底。一口锅，两千五百年，答案搬了很多次家。这本书想留给读者的，不是这份搬家清单，而是一种看搬家的办法。

◆ 这盏灯照路，不替你走路

我们把三哲看作西方哲学第一轮完整跑通的循环：追问撞上土壤，张力逼出新的落脚点，新的落脚点又反过来改写后人的问法和土壤。从这三轮里，我们提炼出五个动作。它们是一盏灯，不是一副模具。

两者的区别，厨房里的人一听就懂。模具是月饼模子：面团塞进去，压一下，出来的都是一个花样。它省事，可它只能做月饼，而且做出来的月饼不会比模子更好。灯是厨房顶上那盏灯：它不告诉你今晚做什么菜，不替你掌勺，可有了它，你看得清锅里的颜色、看得清肉的纹理、看得清油什么时候开始冒烟。做什么菜，怎么做，还是你的事。

第21章拿霍布斯、加缪、罗尔斯做过一次小试：这三人的问题根本不是"X是什么"，"答案住在哪里"那根轴套不上他们。可五个动作照样能用。这就是灯和模具的分界：可以带走的是看的办法，不是看出来的结论。如果有人读完这本书，拿"悬空—彼岸—物中"去套每一位思想家，把所有人都塞进三个格子，那他就把灯当成了模子——这本书最不希望发生的，正是这件事。

同样，这盏灯也照它自己。第23章把本书放上被告席，列出了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算错：找不到前置矛盾，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学园无关，耶格尔的时间表被推翻，所得与教科书无异，三层可以拆开各自讲完；它还接下了最硬的一条反对——这会不会只是接受史换了个名字。一盏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灯，迟早会变成一块招牌。

◆ 五个动作，再说一遍

现在把五个动作再说一遍。每个先用一句话说清它是什么，再补一句它最容易被用歪的地方。第一，跟问法，不跟人。先弄清他在解决哪道菜做不好，再去看他的菜谱；起点错了，越努力越远（第10章）。最常见的走偏，是先记住了人名和标签——"唯心""经验"——再回头去找他的问法，结果连问法也被标签染了色。

第二，找前置矛盾。问一句：他在顶撞谁，谁的答案成了他脚下的土？儿子改掉父亲最得意的规矩，不是不孝，是新店开张的第一步（第11章）。要留心的是，找到的矛盾得指得出对手、文本和时间；指不出来，就老老实实记一笔"没找到"，不要去别处随手翻一个来凑（第23章）。

第三，查反向师承。问一句：今天我们看到的他，是谁讲出来的？网红菜的"正宗做法"，常常是模仿者定的（第12章）。这一问不是为了剥掉所有后人的

讲法、挖出一个"纯粹的本人"——那样的本人多半挖不出来——而是为了分清两本账：哪些出自他，哪些出自讲他的人。

第四，追回写。问一句：他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板结？祖传秘方，三代之后可能成了不许改的教条（第13章）。回写要拿痕迹去看：课程表、术语、后人的论证习惯；只会说"影响深远"，等于什么也没看见。

第五，看回绕。问一句：之后有没有绕回去，绕回来时换了什么？老房子翻修，格局回到从前，水电全换（第14章、第22章）。看见两个相隔千年的人说了相似的话，别急着叫它回绕，先问是什么矛盾把它逼了回来。

这五句话，换一个对象照样能用。读一位哲学家可以，读一家公司的历史可以，读一个家族的规矩也可以。你家里有没有一条"向来如此"的规矩？试试看：这条规矩当初在解决什么问题？它在顶撞哪一条更老的规矩？今天大家口中的"向来如此"，是谁讲出来的？它重置了什么，又在哪里卡住了一家人？有没有哪一代人把它废了，后来又悄悄恢复了，恢复时变了样子？五个问题问下来，那条规矩就不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段活过的历史。

再举一个人人碰到过的例子："好老师是什么？"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可真要下一个定义，又像那位老师傅一样张口结舌——这正是苏格拉底在街头最爱问的那一类问题。拿五个动作试一试。先跟问法：说这话的人，是在为孩子择校发愁，还是在评职称，还是在回忆自己的少年？问法不同，"好"字的意思就不同。再找前置矛盾：今天人们说"好老师要尊重个性"，是在顶撞上一代"严师出高徒"的那句老话；而那句老话当年也在顶撞更早的放任。再查反向师承：我们心里那位"好老师"的样子，有多少来自亲身经历，有多少来自电影、来自家长群里的转述？然后追回写：某一种"好老师"的标准一旦写进考核表，它重置了老师们每天怎么上课，又在哪里板结成了只看分数、只看表格的东西？最后看回绕：有没有哪种被批判过的教法，近几年又悄悄回来了，回来时换了什么？

五个问题问完，你未必得到一个"好老师"的定义——苏格拉底也没有得到。但你会清楚地看到，这个答案在你所处的这一圈里，是被什么逼出来的，又可能在哪里卡住。这比一个定义更有用：定义会过时，看的办法不会。

◆ 灯下面那台引擎

五个动作是拿在手上的工序，它们底下还有一台引擎，全书一直在用：三大方程、123原理、六路径。读者不必记住这些名字，但值得记住它们说的三件事，因为五个动作之所以管用，全靠这三件事撑着。第一件，任何一刻，三样东西同时在长：冒出来、立得住的那个答案，一步步推进的追问，脚下踩着的那片土；没有哪一样先站稳了再去扶别的。第二件，从时间上看，它们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走：追问撞上土壤，张力无处可去，逼出一个新的落脚点；新的落脚点回过头改写了追问和土壤，这个回合才算闭合。第三件，人去看这件事，总得先从一头起手；起手不同，看见的侧面不同，选哪一头看手上的任务。我们解哲学史，是从追问起手的。

拿一家人第一次给孩子办生日会来说。任何一刻，蛋糕的样子、大人张罗的手法、家里的条件——预算多少、地方多大、请了谁——都在互相牵扯着变。从头到尾看，有一个个回合：孩子非要一个恐龙蛋糕，附近却没有一家店会做，两头顶住了，逼出一个"大人自己在奶油上画恐龙"的办法；这个办法又成了第二年过生日的默认规矩，连孩子的期待都跟着改了。而一个后来才到的亲戚，想弄明白这场生日会，可以先看蛋糕，可以先听大人讲张罗的经过，也可以先打听预算和客人。

三件事缺一件，五个动作都会走样。没有"同时"，五个动作会退化成一张先做甲、再做乙的流水线工单；没有"回合"，回写和回绕就无从谈起；没有"起

手"，第一个动作"跟问法"就只剩一句个人偏好。这三件事也不能拿来给人贴格子：同一个人，这一回合是被逼出来的新答案，下一回合就成了别人脚下的土。

◆ 灯也会被讲成模具

还要提防一件事：这盏灯本身，也会被后来的人改写。全书讲过的机制，对这本书同样适用。苏格拉底被学生讲成了不同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被经院传统讲成了不许质疑的"哲学家"。这本书一旦交到读者手里，也会被讲出许多个版本。有人会把五个动作压成五个口号，挂在嘴边，用来给每一位思想家贴标签；有人会只记住"悬空—彼岸—物中"三个词，把它当作一张万能的分类表。真到那一步，灯就被讲成了模子，而讲的人未必察觉。

单位里常见这样的事。一位老同事总结出一套很好用的工作方法，起初是几条提醒：先弄清客户真正要什么，再看前任为什么没做成。几年后，它被印进新员工手册，变成一张必须逐项打勾的表格。新人一项项打勾，勾得整整齐齐，可没人再问"客户真正要什么"——那几条提醒本来是要人睁开眼睛的，最后成了让人可以闭着眼睛照做的东西。这就是第13章所说的板结，它不只发生在亚里士多德身上，也会发生在任何一套好用的方法上。

所以，用五个动作的时候，请也拿五个动作照一照它自己：它在解决什么问题？它在顶撞哪一种讲法？你手里的这个版本，是谁讲给你的？它重置了你的什么，又在哪里让你偷了懒？哪一天它被人翻过去了，翻回来时又换了什么？一盏灯能被这样照，它就还是灯。

◆ 每一代人都得重新回答

为什么不能把答案一次性定下来，交给后人照用？因为答案住在哪里，本身就是被每一代人的问题逼出来的。柏拉图搬到彼岸，是因为老师死了，问题悬在半空，城邦的流变撑不住一个答案。亚里士多德搬回物中，是因为他看了太多海

边的生物，墙上的标准解释不了一只章鱼怎样长大。笛卡尔搬进"我思"，是因为他身处的经院传统已经板结，只剩怀疑能撬开它。每一次搬家，都是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困境里，被一个具体的对手逼出来的。

家里也是这样。父母那一辈人觉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好日子的答案：进了单位，有了编制，这一辈子就算落了地。到了子女这一辈，单位不再保终身，行业几年一变，"好日子住在哪里"这个问题又被重新问了一遍：有人说住在一门手艺里，有人说住在不断学习的能力里，有人说住在一家人的相互照应里。父母的答案没有错，它是被他们那个年代的困境逼出来的；子女的答案也没有错，它是被今天的困境逼出来的。错的只是一种想法——以为上一代人的答案，可以原封不动地交给下一代人去住。而且下一代人的答案，也可能绕回上上一代：爷爷那辈讲"手艺人饿不死"，父母那辈改成了"考编制、进单位"，到了孙子这辈，又有人回去学木工、学修表——只不过是带着网店和短视频回去的。格局像爷爷，水电全是新的（第22章）。

下一代人的困境不会和上一代一样，所以答案也不会原地不动。这不是相对主义——不是说"怎么都行"。每一次落脚，都要面对它那个时代的矛盾，都要接受后人的追问，站不住的会被翻过去。这也不是进步论——不是说越往后越接近真理。答案会回绕，被超越的位置会复活，今天以为过时的东西，可能正是明天的出路。

它更像每一家都要学的那一道家常菜。外婆会做，妈妈也会做，可妈妈的那一锅，不是照着外婆的菜谱做出来的，是在自己家的灶上、用自己家的锅、给自己家的人，一锅一锅试出来的。女儿将来也会做，她也得自己去试。菜谱可以传，火候传不了。传得了的，是"去试"这件事本身，和试的时候该看哪里。

今天，答案来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手机里随时有一台机器，对任何"X 是什么"都能说出一段像样的话。在这样的时代，"自己去试"不是变得多余，而是变得更稀缺。说通的话越多，越需要有人去锅边看一看，它说对了没有。

◆ 这本书的回写，轮不到我们宣布

全书反复说，回写要拿史料去观察，不能靠宣布。这条规矩，最后也要用在本书自己身上。一本书写完，作者最想说的，往往是"它会改变什么"。可按本书自己的规矩，这句话轮不到我们说。这本书有没有回写，要看几年以后：有没有人拿五个动作去读一位本书没讲过的哲学家，读出了生平简介里没有的东西；有没有人在单位里、在家里，碰到一条"向来如此"的规矩时，多问了一句"它当初在顶撞什么"；有没有人拿第23章的失效条件真的去查，查出了本书的错。最后这一种，对本书最有用。一个判断被人查出了错，说明它曾被认真用过；从来没人去查，才是一本书真正沉了底。

这就像一本家传的菜谱。它值不值钱，不在于封面上写着"祖传"两个字，而在于有没有哪一代人照着它做菜的时候，在页边写下一行小字："这里糖少放一勺，我家孩子不爱太甜。"页边那行小字，就是回写。它改了菜谱，也说明菜谱被用过。本书的页边，留给读者。

◆ 火候在锅里，也在追问里

最后，回到那位说不出火候的老师傅。全书开头，我们把他比作苏格拉底：一个天天在用、却说不出定义的人。苏格拉底的追问止于无解，他没有给出火候的定义，城邦嫌他捣乱，最后把他处死。两千五百年后，我们知道了一件当时没人知道的事：那个"说不出"，不是失败，而是一道门。正因为他说不出，徒弟才要去找；正因为徒弟找到的答案太远，徒孙才要回到锅里；正因为锅里的答案后来板结了，又有人把它撬开。一连串的发生，都是从一个说不出的人开始的。

这条路上，亚里士多德走得离我们最近。他第一个把"生成"本身当作要追问的对象：一块肉怎样从生到熟，一颗橡子怎样长成橡树。可他给这个过程预先装了一个终点——橡子里早已有橡树作为目的。这本书接过了他的动词，卸掉了他的终点。同一颗橡子，种在花盆里成了盆景，种在风口长成了歪脖子树；同一个问题，落在不同的年代、撞上不同的对手，就发生出不同的答案。没有哪一棵是橡子"本来就该长成"的那棵。哲学史也是这样：它不朝着一个早已写好的结局走，它在每一次追问与土壤的相撞里，长出原本不存在的形状。

所以，说不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再问。答得太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再去锅边试一试。火候不在墙上，也不在机器里，不在任何一处可以一劳永逸搬进去住的地方。它在每一块肉从生到熟的过程里，也在每一个站在锅边、不肯停止追问的人手上。答案住在哪里？这个问题，两千五百年前有人问过，后来一代一代的人接着问。现在，轮到我们了。

◆

参考书目

本书引用原典一律转述大意，不作长段逐字引文；凡属晚出或可疑的记载，已在原处标明"相传"或"传说"，并在第 23 章的总账里分类登记。下列书目按作者年代排列，译名取通行译法；读者可据此回到原典核对。

一、希腊与罗马

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4 章内战中词语改变意思的观察（科西拉内乱一段）；第 21 章霍布斯的英译本。

2.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约公元前 441 年上演。第 4 章剧场里的两种正义。

3. 阿里斯托芬：《云》，公元前 423 年上演。第 4、5、8 章喜剧中的苏格拉底。

4. 柏拉图：《申辩篇》《克力同篇》《斐多篇》《游叙弗伦篇》《拉凯斯篇》《卡尔米德篇》《美诺篇》《会饮篇》《泰阿泰德篇》《斐德若篇》《理想国》《巴门尼德篇》《智者篇》《蒂迈欧篇》；署名《第七封信》，真伪有争议。第 5—8 章。

5.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申辩》。第 8 章三幅画像之一。

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 卷第 6、9 章，M 卷第 4 章，Z、Θ、Λ 卷）、《物理学》、《论生成与消灭》、《论动物部分》、《范畴篇》、《前分析篇》、《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 6 章）、《修辞学》、《诗学》。第 7、8、11、14 章。

7. 西塞罗：《学园派》《图斯库路姆论辩》《荷尔顿西乌斯》（已佚）。第 4、14、15、22 章。

8.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 1 章按师承排列哲学家的写法；书中诸多逸事属晚出记载。

9. 斯特拉波：《地理学》。亚里士多德书稿藏于地窖之说，本书视为可疑记载（第 7 章）。

10. 普罗提诺：《九章集》，波菲利编。第 15、22 章。

11. 波菲利：《导论》。第 22 章。

二、中世纪与近代

1. 奥古斯丁：《忏悔录》《上帝之城》《驳学园派》《论真宗教》《八十三个问题》（第46问论理念）。第15、19章。
2. 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第12、22章。
3.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论理念。第22章。
4. 费奇诺：柏拉图全集拉丁译本，1484年刊印。第22章。
5. 笛卡尔：《谈谈方法》（1637）、《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及所附诸组反驳与答辩。第16章。
6. 霍布斯：《利维坦》（1651）。第21章。
7.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伦理学》（1677）。第10章。
8. 休谟：《人性论》（1739—1740）、《人类理智研究》（1748）。第17章。
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初版，1787二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第17章。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哲学全书》、《哲学史讲演录》。第3、18章。

三、十九世纪以后

1. 李普曼：《康德及其模仿者》（1865）。第17章"回到康德"。
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第11章。
3. 尼采著作与遗稿；福斯特-尼采编《权力意志》。第12章。
4. 耶格尔：《亚里士多德：其发展史纲要》（1923）。第7、23章发展论。
5.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21）、《蓝皮书》（1933—1934口述）、《哲学研究》（1953）。第19章。
6. 加缪：《西西弗神话》（1942）、《反抗者》（1951）。第21章。
7. 安斯康姆：《现代道德哲学》（1958）。第14章。
8. 德里达：《论文字学》（1967）、《柏拉图的药》（1968）、《明信片》（1980）、《有限公司》（1988）。第20、22章。

9. 罗尔斯：《正义论》（1971）、《政治自由主义》（1993）。第 21 章。

10.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第 21 章。

11.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1981）。第 14、21 章。

四、本系列

1. 王德生：《SDE思想体系入门——从基本概念到跨领域的发生问题》，德麦国际专著第 395 号。本书所用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三大方程、六路径、123原理、回写诸概念，口径均以该书为准；三大方程中的 F、G、H 是生成关系的占位记号，不是可计算的公式。

附录

附录三件：一是五个动作的工作卡，可以拿去解构任何一位哲学家；二是"答案住在哪里"的搬家年表；三是白话小词典。

附录一

五个动作工作卡

这张卡把第三编五章压成一页。用它读一位哲学家时，按次序填，填不出的格子照实写"填不出"，不要硬编。第 21 章的经验是：轴可以不填，五个动作都要填。

次序	动作	要问的问题	去哪里找材料	常见的用歪
1	跟问法，不跟人	他接过来的是哪道题？他认什么算回答，什么不算？	他最用力的著作的开头与结尾；他反复回到的那个问题	逸事化；按教科书标签起手；以为同一句话就是同一道题
2	找前置矛盾	谁的回答，在哪一处，接不住他手里的什么？	点名反驳的人；悄悄借用的词与分类；学说里最拧巴的地方	事后安排对手；只找一个对手；讲成私人恩怨；忘了他借来的东西
3	查反向师承	后世的他是被谁讲出来的？哪些是骨架，哪些是添笔？	编者、注释者、译者、门徒、教科书、对手；分层排开再对照原文	以为能剥出纯粹的本人；一概斥为歪曲；把本人的变化算到讲述者头上
4	追回写	他重置了什么推进与土壤？又在哪里板结？	学派、课程、机构、文体、日常语言里看得见的痕迹	只宣布"影响深远"；把维持当板结；忘了负向回写
5	看回绕	之后有没有人回到他的位置？被什么矛盾逼回来？回来后改写了什么？	自称"回到"的旗号；跳代引用；旧词新用	见圈就说回绕；用回绕证明"古已有之"；把回绕浪漫化

填完五格，再写一句话收口：在他手里，答案住到了哪里？如果这句话写不出，或者写出来显得削足适履，就像第 21 章那样，承认他不在这根轴上，五个动作照样留着。

附录二

答案住在哪里：一张搬家年表

这张表只排本书讨论过的落脚点，不是哲学史的全部。"阐释"一栏是本书的读法，不是史料本身。

时间	人物	答案住在哪里（阐释）	逼它搬家的矛盾（阐释）	本书章节
约前 469—前 399	苏格拉底	悬空：追问不落地	熟练使用的美德词，一问就空	第 5 章
约前 428—前 348	柏拉图	彼岸：分离的理念	老师之死、问题悬置、知识要有不变的对象	第 6 章
前 384—前 322	亚里士多德	物中：形式在质料里	理念论对生成与变化一句没说	第 7 章
354—430	奥古斯丁	上帝心中：理念是造物主的蓝图	一颗会变的心怎样抓住不变的真理	第 15 章
1596—1650	笛卡尔	我思：一个只在想的时候成立的支点	课本权威动摇、怀疑论重新流行	第 16 章
1724—1804	康德	认识的条件；背后留下物自体	理性主义与休谟都接不住牛顿	第 17 章
1770—1831	黑格尔	历史：真理在时间里走出来	固定的认识条件没有来历	第 18 章
1889—1951	维特根斯坦	用法：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	理想语言接不住运转自如的日常语言	第 19 章
1930—2004	德里达	永远在路上：意义不断推迟	在场优先的传统与活的书写	第 20 章

表里的箭头是读出来的，不是排出来的：每一次搬家，都要能在那个人的文本里找到逼他搬家的那道缝。找不到，那一行就该删掉。

附录三

白话小词典

显露（S）。 一样东西从混沌里站出来、被认出、留得住、说得清的样子。检查用"三个可"：可识别、可维持、可表达。显露不是"结构"，结构只是它最坚硬的一种。

差异序列（D），推进。 一步步的试探、比较、修正与收敛。它关心哪种差异能推进下去、哪种被压住，不是中性的"步骤"。

特征纠缠（E），土壤。 思考时脚下踩着的全部既有东西：书、对手、机构、语言、刚经历过的事。不是背景，抽掉它，那件事就不会发生。

三大方程。 显露、推进、土壤三者同时互相生成，没有谁先谁后。书面写作 S＝F(D,E)、D＝G(S,E)、E＝H(S,D)；F、G、H 只是生成关系的占位记号，不是可计算的公式。

123原理。 只讲一件事：推进与土壤的矛盾累积，逼出显露改变；新的显露回写，重置推进与土壤；循环不止。它不是万能三步法。

六路径。 显露、推进、土壤三者的六种起手次序。本书解哲学史一律先跟问法的推进（D→S→E）；教科书常走"先学说、再师承、后背景"（S→D→E）。

回写。 新的显露反过来改写生成它的推进与土壤。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要拿史料去看，不能宣布。

板结。 回写过厚，曾经的新答案变成谁也不敢动的硬壳。

亏缺。 一轮循环留下的缺口。本书的核心规律：上一轮的亏缺，就是下一轮的矛盾。

反向师承。 后人的讲述反过来决定了前人在我们眼中的样子。它不等于造假，也不等于没有约束。

回绕、倒退、打转。 回绕：回到旧位置，土壤已整体换过，被新矛盾逼回，回来后有所改写。倒退：连土壤也退回去。打转：同一个矛盾反复逼回，什么也没留下。定义见第 14 章。

方法与模具。 方法是从一次完整的发生里提炼、能带到别处去用的看法（五个动作）；模具是那一次发生得出的具体结论（"答案住在哪里"这根轴）。方法能迁移，模具不能。

史实、阐释、传说。 有文献可查的是史实；本书的读法是阐释；晚出或可疑的记载是传说，不拿来当证据。

后记

这本书从一句话开始，到一张表结束。

那句话是：希腊三哲的 SDE 解构，会成为解构后代哲学家的指路明灯。写完二十四章回头看，这句话有一半被证实了，另一半被修正了。被证实的是：从三哲那一轮完整的发生里拣出来的五个动作，拿到奥古斯丁、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身上，确实照出了教科书照不到的东西——每一次答案搬家，都能在那个人的文本里找到逼他搬家的那道缝；每一位哲学家，都有一个"被讲出来的他"要和"他本人"分开记账。被修正的是：灯照得见的范围，比我们开头以为的小一些。霍布斯、加缪、罗尔斯不在那根轴上，硬把轴套上去，会把人照歪。于是那句话最后被改写成了另一句：灯是方法，不是模具。

我们愿意把这次修正当作这本书最好的证据。一盏只会照出自己想看的东西的灯，不是灯，是镜子。

写作过程中，最难的不是讲清楚某一位哲学家，而是守住两条规矩。一条是每个观点都要配一个大白话的例子——厨房、饭桌、业主群、衣柜里的喇叭裤——哲学讲不进厨房，就还没讲清楚。另一条是史实、阐释、传说分开记账——把"相传"写成"据载"，把"本书认为"写成"事实是"，是这类书最容易犯、也最不容易被发现的错。读者若在书里抓到我们犯了这两条，请告诉我们。

最后回到那口锅。老师傅说不出火候是什么，可他做了一辈子好菜。两千五百年后，我们还是说不出一个所有火候都共有的定义；但我们多知道了一件事：每一代人都在问"答案住在哪里"，每一代人的回答都缠着上一代的缺口。这本书只是又一次回答。它会有缺口，那正是下一轮的开始。

判　词

哲学史不是一场接力，
而是一场纠缠；
三哲交给后人的，是一盏灯。

——本书判词

老师傅说不出火候是什么，徒弟把一张完美的标准贴上墙，徒孙说火候就在肉从生到熟的过程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后接续的不是三套学说，而是一个问题的落脚点：答案住在哪里——悬空、彼岸、物中。

本书不把三哲排成接力，而看他们怎样缠在一起：学生在后，却参与生成了老师；一台引擎转了三轮，上一轮的缺口正是下一轮的矛盾。由此提炼出解构任何一位哲学家的五个动作——跟问法、找前置矛盾、查反向师承、追回写、看回绕——拿去走奥古斯丁、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的两千年，再请霍布斯、加缪、罗尔斯检验方法与模具的分界。

每个观点配一个大白话例子，史实、阐释与传说分开记账，每一章写明怎样算错。

每一代人都得重新回答：答案住在哪里。

ISBN 979-8-90690-465-2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65 号 · 五编二十四章 · 约 20 万字
定价 US$23.00